

社会理论译丛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J.M. 布劳特 著 傅荣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布劳特教授的书对许多试图建立一种长期的维持欧洲优越论的学术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为美洲的被征服和征服者对1492年之后近代欧洲国家和文化兴起的重要意义作了无可辩驳的阐述。他的论点总是具有启发性……”

——《黑色雅典娜》作者马丁·伯纳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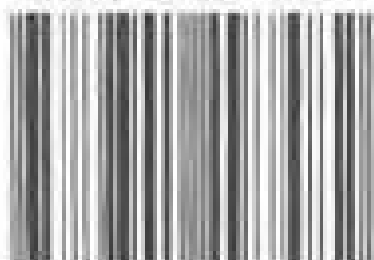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具有真正的革命意义的著作，是人们非常需要的。对我们漏掉白出的、传统的单一世界观点的质疑，也是对现代历史的质疑……这一著作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民族国家的演变》作者威尔伯·泽林斯基

“它对让人爱不释手……它对西方崛起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有力的辩驳，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是对当前这个领域中的辩论的一项重要贡献。”

——《欧洲取得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作者
珍妮特·阿布-卢戈特

ISBN 7-80149-748-1



9 787801 497482 >

ISBN 7-80149-748-1/D·124

定价：

19.00元

■ 社会理论译丛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J.M. 布劳特 著 谭荣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 (美) J. M. 布劳特著; 谭荣根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9

(社会理论译丛)

ISBN 7-80149-748-1

I. 殖… II. ①J…②谭… III. 殖民主义—研究—欧洲
IV. D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0129 号

· 社会理论译丛 ·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著 者: J. M. 布劳特

译 者: 谭荣根

责任编辑: 仇 扬

责任校对: 杨蔚琴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748-1/D·124 定价: 19.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1-5128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J.M.Blaut, The colonizer '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Listory,
The Guilford Press.

根据 Guilford Press 1993 年版本译出

内容简介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在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的领域中，对一种在我们当代无所不在的、强有力的信仰进行了挑战。这种信仰就是欧洲文化传播主义的理论主张。这种理论主张认为，欧洲走向现代化的崛起及其在世界上取得支配地位，是由于某种独特的、种族的、环境的、文化的、心灵的或者说精神上的品质，而且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进步是欧洲文明传播的结果。J.M. 布劳特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指出上述理论不是建立在历史和地理事事实上，而是来自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是欧洲人构造出来的，是他们用来为殖民扩张进行说明、辩护和支持的。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启发性，将为广大读者包括一般读者提出挑战性的论点并为他们提供信息。这本书对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基本思想提出了异议，因此对这些领域的教授和学者来说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关于作者：J.M. 布劳特 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他写了三部关于第三世界的历史和政治地理的著作并撰写了多篇相关文章。



译者简介

本书译者谭荣祺，1936年生，原籍山东省，1956~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本科、研究生班学习、进修，毕业后先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我国驻外使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单位长期从事翻译、国际问题研究和外事工作，曾任处长、局长等职，现为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曾合译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自传《通往权力之路》、《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编译《亚太的机遇与挑战》（英文部分）等。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渊源	1
一、争 论.....	1
二、时间隧道.....	3
三、欧洲中心传播主义.....	9
(一) 欧洲中心主义.....	9
(二) 文化传播主义	12
四、殖民者的模式	20
(一) 起 源	20
(二) 经典文化传播主义	24
(三) 现代文化传播主义	29
五、世界模式和世俗利益	34
(一) 人种论信仰	34
(二) 作为信仰体系的文化传播主义	47
六、注 释	49
第二章 欧洲奇迹的神话	62
一、神话的制造者和批判者	64
(一) 历史上的现代化	65

► 2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

(二) 批 判	67
(三) 反批判	71
二、神 话	72
(一) 生物学	75
1. 种 族	75
2. 人 口	80
(二) 环 境	84
1. 糟糕的热带非洲	85
2. 干旱的、独裁的亚洲	97
3. 温和的欧洲	110
(三) 理 性	114
1. 理性论学说	115
2. 理性与欧洲奇迹	123
(四) 技 术	132
(五) 社 会	144
1. 国 家	145
2. 教 会	149
3. 阶 级	151
4. 家 庭	155
三、注 释	164
第三章 1492 年之前	194
一、中世纪的景观	195
二、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原型资本主义	209
三、注 释	219
第四章 1492 年之后	228
一、关于 1492 年的说明	228

(一) 为什么美洲被欧洲人征服而不是被非洲人或亚洲人征服·····	229
(二) 为什么征服取得成功·····	232
(三) 1492 年的欧洲 ·····	236
二、殖民主义和欧洲的兴起 1492~1688 年 ·····	237
(一) 16 世纪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 ·····	237
1. 贵重金属 ·····	239
2. 种植园 ·····	241
3. 影 响 ·····	243
(二) 17 世纪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 ·····	249
三、资本主义的定心·····	252
四、注 释·····	259
第五章 结 论 ·····	271
一、结 论·····	271
二、注 释·····	273
Bibliography ·····	275
Index ·····	295

第一章 历史渊源

一、争 论

本书写作的目的在于破除关于当代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的一种强而有力的信仰。这一信仰的概念是，欧洲文明——即“西方”——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上的或精神上的特质。这一特质使欧洲人群在所有历史时代直至当今时代，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

上述信仰既涉及历史又涉及地理。欧洲人被看做是“历史的创造者”。欧洲永远是先进的、进步的、现代化的。世界其他地区或者进步缓慢，或者停滞不前：属于“传统社会”。因此，世界有一个永久的中心和一个永久的外围：一个内圈，一个外圈。内圈领先，外圈落后。内圈创新，外圈模仿。^①

这一信仰是一种传播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欧洲中心传播论。这是一种关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流传的理论。其流传的趋势是从欧洲部分流出，流向欧洲以外的地方。这种流动是文化、创新、人类发展因果的自然的、正常的、合乎逻辑的和伦理方面的流动。欧洲永远处于内圈，其他部分永远处于外圈。欧洲是传播的渊源，其他部分是接受者。

文化传播论植根于历史学和地理学。近年来这一信仰的某些部分受到怀疑，但其基本信条尚未受到挑战，因此，这一理论就其整体来说尚未根除，现代学术研究也没有在很大程度上使之受到削弱。

文化传播论的最重要信条是“欧洲自身崛起论”，有时（更冠冕堂皇地）表述为“欧洲奇迹”的思想。这一思想认为，在1492年之前，欧洲比其他地区先进，比其他地区进步。也就是说，在殖民主义时代开始之前，在欧洲与欧洲以外的地方进入强烈的相互作用之前，欧洲比其他地区先进，比其他地区进步。如果人们认为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大多数现代学者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其结论就是，欧洲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欧洲内部的素质所造就的，而不是在1492年之后与非洲、亚洲、美洲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欧洲现代化的主要构件是欧洲的。因此，殖民主义对欧洲的现代化并不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因此，殖民主义对非洲人、亚洲人和美洲人来说并不意味着掠夺和文化毁灭，他们是欧洲文明传播的接受者：现代化。

本书将把欧洲中心传播论作为一个思想整体进行分析批判，并将破除其具体理论——欧洲自身崛起论。第一章讨论文化传播论的历史和性质。第二章把欧洲自身崛起论作为一种关于欧洲优越论（和“欧洲奇迹”）的整体进行分析。然后，逐一进行批驳。第三章讨论1492年前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试图说明在那个时代欧洲并不比其他文明或地区优越。第四章论证殖民主义是1492年以后的一个进程，它导致了欧洲的崛起、现代化和发展（以及欧洲以外的欧洲化文化地区如美国），导致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第四章还论证，对美洲的征服及此后的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不能用欧洲的内在特点来解释，而是反映了世俗的地域现实。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一系列论证作为一个整体，在于说明欧洲并不比现在我们所说的第三世界具有历史优先

性——优越性。

这些任务对于一本篇幅不大的书来说也可能胃口过大了。实际上我仅仅想做到一点，我只是在说，在我们的过去的传统思想中，关于历史和地理人们犯了一个基本的明显错误。这一错误歪曲了许多领域中的思想和行动。我将提供大量证据证明，欧洲文化传播主义或欧洲历史优越论，或欧洲优先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尽管它在西方文化中牢固地得到确立，但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地理事实。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民间传说。

二、时间隧道

如果在150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中期，你进入欧洲的或者英语区的美洲学校，你学的是一种非常稀奇古怪的历史。你学到的是，人类间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其发生地点将是所谓“大欧洲”的某一地区，也就是欧洲地理上的大陆，加上向（仅就古代而言）它的东南方向的扩大，即“圣经地带”——从北部非洲到美索不达米亚——加上（仅就现代而言）欧洲海外移民国家。你受到的教育是，上帝在这一地区创造了人；关于这一时期的典型世界历史教科书将会提到，伊甸园是人类历史的起点。而且这些教科书把伊甸园放在不同的地点，从地中海到亚洲内地的山区。

有些教员将会声称，只有这个地区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类：似乎上帝把其他地区的人创造成为不同的、非人的或类人的人种。而且所有教科学的老师也和教历史的老师一样说，欧洲人以外的人不像欧洲人那么聪明，那么忠诚，（就大部分来说）不如欧洲人那么勇敢；上帝把他们创造成为劣等人。如果你问你的老师为什么欧洲人更富有人性、更聪明，你可能会受到训斥。教师将告诉你，基督上帝创造了世界并管理世界，如果认为他对欧洲以外的人也会一视同仁那将是愚蠢的，而且是亵渎神灵。这是因为欧

洲人信仰真正的上帝，而且用恰当的圣礼信仰他。

如果你是在 19 世纪中期学习地理和历史，你将会学到欧洲以外的东西。生活在非洲和亚洲的人们不仅被描述为劣等人，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被描述为妖魔。他们拒绝上帝的恩惠，因而，失去上帝的恩宠。因此，非洲人是残酷的野蛮人，他们的最好命运就是去做有益的工作并信奉基督教。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中国人和印第安人建立了他们的野蛮文化。但由于他们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基督徒，他们的文化很久以前就开始停滞不前和倒退。而且，尽管曾经一度辉煌，他们的文化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文化：只是野蛮的“东方独裁主义”。只有欧洲人懂得真正的自由。

人们的思想当然会发生变化。如果你在 50 年前上学，也就是在世纪之交的年月，你学的历史会更世俗些，进化论的味道会更浓些（尽管还不是达尔文式的）。你将会学到地球已经很古老，生命也由来已久，物种已有久远的历史。但是，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都发生在欧洲（即在大欧洲）。第一个真正的人克罗·马尼昂生活在欧洲，农业在大欧洲问世（可能是在欧洲大陆，可能是在基督教圣地——欧洲人自称的文化心脏地区）。在世界历史课上会讲到，最初的野蛮文化发生在基督教圣地。在那里出现了两个高加索人群，他们创造了全部历史。闪米特人创建了城市和帝国，为我们创造了单一神教和基督教。但他们到此为止，此后沉沦为东方的腐朽。雅利安人即印欧语系人尽管落后，但热爱自由，他们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进步，从欧洲的东南部或亚洲的西南部移入欧洲，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文明社会即希腊。然后，罗马人把文明又提高了一步，从那以后世界历史不可阻挡地向西北方向迈进。如果你在英格兰上学，老师在历史课上会说，历史从“东方”（基督教圣地）走向雅典，走向罗马，走向封建的法国，最后走向现代的英格兰——一条由东方通向西方的大道。

这时，在欧洲的学校里开始教授欧洲以外的世俗地理。非洲

人仍被描写成野蛮人，东方社会被描写成腐朽专制的社会。但是当谈到 19 世纪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到 1900 年，在一般讨论中这种关系已有一种固定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学校教学中已成为标准的世界地理。按照这一理论（本章将在后边讨论）欧洲以外的人在欧洲人的教导下，即在殖民统治下，能够而且的确达到了文明水平，如果说没有达到欧洲水平的話，也接近于欧洲的水平。

让我们再向前推进半个世纪，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教授的历史和地理。这时没有太多变化。第一个真正的人仍然是欧洲的克罗·马尼昂。农业在基督教圣地问世；野蛮文明也是在那里发生。真正的文明仍然是从雅典到罗马，到巴黎，到伦敦，也许从那里扬帆远航走向纽约。欧洲以外的人对世界历史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尽管他们在欧洲人的影响下开始做出贡献。（殖民地人民向他们的教师爷学习，日本人进行了成功的模仿，等等。）欧洲人仍然比其他人聪明、能干、勇敢。^②

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作一个概括，这个形象将有利于本书说明问题。这个形象说法就是世界有一个内层和一个外层。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内层的历史。基本与外层无关。欧洲人所教授的、著作的、想象的历史和历史地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而且在许多方面直到今天（我们将会看到），仍然处于一个时间隧道之中。这个时间隧道的墙壁形象地说就是大欧洲的空间边界。所谓历史就是顺着欧洲时间隧道的時間向后看或向下看，并试图决定什么事件在那里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发生。为了说明“为什么”，当然需要把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但是只是把发生在欧洲时间隧道的事件联系起来。墙外的事件看来像岩石一样僵硬、没有时限、没有变化的传统。我把这种思想称为“历史隧道眼光”，或者简单地称为“隧道历史”。

老式的隧道历史简单地无视欧洲以外的世界：典型的教科书

和历史地图直到 1492 年很少涉及大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就是说，欧洲加上欧洲在海外的移民，古代历史再加上十字军东征和近东）。欧洲以外的地区（非洲、基督教圣地以东的亚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只有作为欧洲人的活动地点时才给予注意。而且这时谈论的大多是关于帝国在这个地区的历史。^③这些老的教科书和历史地图不仅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大欧洲，而且把世界历史描写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西方移动的历史，从基督教圣地移向东地中海欧洲，移向欧洲西北部。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所提到的地名的突出地位，就会看到一种模式，即在不同时期所提到的地名的频率不同。早期的地名集中于基督教圣地和地中海最东部的地区。在此后的不同时期，提到的地名大多集中在逐步向西移动的方向和西北方向，大约到公元 1000 年后主要集中在欧洲西北部：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东方大道”模式。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教科书开始展示另外一种更微妙的隧道历史。随着对日战争的结束，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加强和美国民权斗争的兴起，欧洲以外的世界在欧洲人的意识中的地位日益加强。大多数新教科书加大了关于欧洲以外的历史的讨论，而且提到非欧洲文化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大多数教科书对欧洲以外的历史赋予历史的味道，提及其与欧洲历史相对的演变历程，从而脱离了原来把这些地区描述为停滞不前、没有变化的模式。亚洲社会被描述为具有一种演化的动力，尽管这一动力比欧洲要缓慢。非洲在殖民时代之前仍被描述为停滞不前，没有历史。这时对亚洲给予了较多的注意。然而，在 1492 年前的历史部分非洲和西半球很少给予注意。在多数（不是全部）教科书和历史地图中提及的地名仍然给人一种向西部和西北部移动的模式，从近东向西欧移动的模式。而且，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即在说明“为什么”时，隧道历史观仍然在大多数教科书中占主导地位。历史的进步仍然被说成是由于欧洲做出了最重要的发明或最

初做出了创造，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教科书描述的世界历史的动因基本上都发生在欧洲时间隧道之内，尽管历史形成的结果在各地都能看到。^④

教科书是观察文化的重要窗口。教科书不仅仅是图书，它是制造舆论的文化精英们的半官方声明，用来使受教育的青年相信他们所说明的历史和现状都是真实的。^⑤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和盎格鲁——美洲的历史教科书强调历史发展的动因大多来自世界的欧洲部分。19世纪早中期的教科书把欧洲中心隧道历史往往相当公开地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后来的教科书不再把《圣经》作为历史事实的渊源。历史的动因明确地植根于一种理论，认为基督教徒创造了历史，从而也是白人创造了历史。这个理论的总体就是白人进行创造并取得进步，欧洲以外的人停滞不前，没有变化（“传统的”）。他们就像睡美人，由王子来把他们唤醒。尽管种族主义已被放弃，欧洲以外的人也不再被认为是绝对停滞不前和死守传统，但这种观点大体上仍占上风。

在教授新的课题或思想时，教科书总是稍稍落在时间的后边。我希望我能够这样说，关于内圈与外圈的老的观念在今天已成为低劣之作，之所以仍在一些学校中教授，是因为研究工作和教授法之间有一个滞后问题，真正的学者已经摒弃了这种概念，他们进行历史研究，写出了重要的有影响的世界历史书。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就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而言，关于历史主流的解释，今天的历史学学者们仍然与教科书的理论相当一致。今天和过去一样，许多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是由著名的历史学学者撰写的。为什么历史学的学术研究仍然用欧洲中心主义来说明世界历史的若干重要发展，这里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原因：本章后边将讨论其中的部分原因，而且在本书中将在不同的地方讨论这一问题。现在只要注意到一点特别矛盾的现象就够了。历史学家已经收集了详细的学术研究材料，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很少看到偏见

或有意的歪曲。而且，他们关于历史动因的判断也同样按照在其他学术研究中使用的严格的治学方法。但是，当我们涉及重大问题即历史动因问题时，当涉及长时期和大地区的历史发展原因时，当涉及解释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时，欧洲中心主义就对讨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我们将会看到，它使人们接受站不住脚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没有证据支持。

大多数欧洲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大多数真正重要的历史事件即“改变历史的事件”都发生在欧洲，或者是由于在欧洲的刺激下才发生的（“欧洲”仍指“大欧洲”）。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按照历史的顺序列举一系列重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命题。所有这些命题被多数欧洲历史学者接受为真理，在有些情况下被大多数欧洲历史学者接受为真理。其中有些的确是真实的，这不是当前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说明的是关于历史的推理仍然集中在把大欧洲说成是历史的永久源头。

①新石器时代革命——农业的发明，人类定居生活的开始——在中东发生（或基督教圣地）。1930年前没有人反对这一观点，而且多数人今天仍然持这种观点。

②在文化演变中走向现代文明的第二个重要步骤，即最早的公国、城市、有组织的宗教、书写系统、分工等等发生在中东。

③铁器时代在中东开始。铁工活始于中东或东欧，“铁器时代”最早出现在欧洲。

④单一神教首先出现在中东。

⑤民主首先在欧洲发明（古希腊）。

⑥大多数纯科学、数学、物理、历史和地理也是一样。

⑦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首先发生在希腊——罗马时期和地区。^⑧

⑧罗马帝国是第一个伟大的帝国。罗马人发明了官僚体制、法律等。

⑨社会进化中的第二大阶段即封建主义在欧洲得到发展，法国人走在前面。^⑦

⑩欧洲人在中世纪发明了一系列技术，使他们比非欧洲人优越。（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大分歧）。

⑪欧洲人发明了现代国家。

⑫欧洲人发明了资本主义。

⑬欧洲人特别富有“冒险精神”，是伟大的探索者，“发现家”。

⑭欧洲人发明了工业并且缔造了产业革命。

……等等直至今天。

以上所列命题成为今天欧洲历史学术研究中广泛接受的信条，尽管（我们将会看到）对其中一些命题存在学术争论。上述一切意味着你和我学习的是这类内容，也许是在小学，也许是在中学，也许是在图书或报纸中。我们在学习中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理。是这样吗？很清楚，其中一些命题是真实的，有一些在一定条件下是真实的。但是，有些并不真实，我在本书中将阐述我的观点：它们是老的隧道历史的人为之物，外圈在这种历史中没有起重要作用，所有重要事件和有效灵验均归功于内圈。

三、欧洲中心传播主义

（一）欧洲中心主义

我们现在讨论的内容当今一般称为“欧洲中心主义”。^⑧对所有认为欧洲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以及所有非欧洲人后裔少数民族）优越的观点，这个词都是一顶适用的帽子。现在在社会思想的各个领域正在进行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本书当然也是这类批评的一部分。

然而，关于“欧洲中心主义”一词存在着一个问题。在许多讨论中它被认为是一种偏见，一种“态度”，因此可以像清除其他过时的态度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宗教盲从一样在开明的思想界把它清除掉。但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真正重要部分并不是在价值观或偏见意义上的态度问题，而是一个科学问题，一个学术问题，一种训练有素的专家意见。确切地说，欧洲中心主义包括一整套信条，这些信条是经验主义现实的说明，教育者和不带偏见的欧洲人把这些说明看做是真理，看做是得到“事实”支持的命题。例如，考虑一下上边列出的 14 条关于欧洲在历史发明创造方面处于优先地位的命题。如果我们把这些命题描述为“欧洲中心主义信条”，那些认为这些信条是真理的历史学家将会怒不可遏。这类历史学家将会断然否认他或她怀有任何欧洲中心主义偏见，而且实际上他们中的确很少有人怀有这种偏见。如果他们断言欧洲人发明了民主、科学、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事实。

因此，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消除这个词的价值含义，消除偏见，但是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套经验主义信条将依然如故。

这在某些方面来说也是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所谓的历史和科学事实，不是偏见或有倾向性的见解。我们将用历史和科学来表明哪些假设是错误的，哪些阐述是虚假的。

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阐述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有时与事实相矛盾，但为什么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被欧洲历史思想界接受，存活下来并成为被人们接受的信条，人们又很少提出疑问？这对历史地理学和思想史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想充分讨论这个问题，那将会超出本书的范围，本书主要讨论经验主义的历史和地理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这里无法回避。图书馆里充满了本书将要批驳的支持欧洲中心主义历史立场的学术研究著

作。本书的规模和出于对有关学者的尊重，一本书无论如何也是无法令人信服地用事实来批驳那些立论的。不管我们的论点多么具有说服力，也无法把这些论点——不妨说放在天平的一边——来与另一边许多代欧洲学者积累的著作相抗衡，包括他们写的教科书、新闻报道和宣传文章。

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在两个层次上进行论述。第一个层次是经验主义层次：在中世纪和现代世纪早期期间欧洲内部和外部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在这个时期两方面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第二个层次我们将看看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史的一些有关方面以及有关这些思想的社会背景。这一点主要在本章来完成，分析文化传播主义思想的性质和历史，并且讨论这些思想怎样得到社会认可，怎样流行开来并占据了霸主地位。第二章将系统地研究 1492 年以前欧洲优越论的主要立论，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讨论其历史系谱。

今天的学者们都知道，关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科学的经验式的和事实式的信条之所以被人们接受，往往很少与证据有关。这一点人们过去不知道。学术信条的基础是文化，是由文化塑造的。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欧洲中心主义历史信条为什么那么令人奇怪地顽固执著；老的神话在其存在的理由早已被忘记或摒弃之后为什么人们仍然相信（如基于《旧约全书》的观点本来是文学历史）；较新的直言不讳的信条，如果具有适当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即使没有事实根据也能被人们接受；一般来说，欧洲中心主义的信条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保存着其说服力。但是，不仅如此。我将在本书中大量论证欧洲中心主义是一套独特的信条，具有独特的能量，因为它们是为欧洲精英最为强大的社会利益而知识化、学术化了的推理。我将阐明欧洲殖民主义不仅在 1492 年启动了欧洲的发展（以及非欧洲地区的不发达），而且自那时以后通过殖民主义的各种方式，包括新殖民主义，从欧洲以

外获得财富，这些财富是欧洲不断发展和保存欧洲精英权力的必要的、重要的基础。因此，形成一个欧洲中心主义信条的体系，为殖民主义活动辩护并给予支持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欧洲中心主义简直就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欧洲中心主义从字面上说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它不仅是一套信条，而是一大批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非常精雕细琢的模式、一个构件整体；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一套高超的理论，是许多历史、地理、心理、社会逻辑和哲学等次级理论的总架构。这一超级理论就是文化传播主义。

（二）文化传播主义

当文化在一个人群中发生变革时，这可能是由于在那个人群中有了发明创造，也可能是由于某种思想或者物质影响从外界进入这一人群（如一种工具，一种艺术风格等），这些思想或影响起源于其他人群或地区。第一类事件称为“独立发明”。第二类称为“传播”。^⑨这两种过程在各地发生。到此为止还没有问题。但是一些学者认为，独立发明是不多见的，因此对短期内的文化变革和长期的文化演变来说不是非常重要。这些学者认为大多数人是模仿者，不是发明者。因此，他们认为传播是主要的变革机制。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被称为“传播主义者”。当他们在某一地区遇到一项文化发明时，他们总是倾向于用力从其他地区寻找文化传播的过程，寻找最初的痕迹。例如，美洲的土著人和“老世界”最初使用火枪这个事实被文化传播主义者解释为是从“老世界”向新世界传播的结果：他们认为新世界的人们可能没有发明火枪。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具备这种发明力。扩大来说，文化传播论者声称美洲在哥伦布之前的伟大文明必然是跨过太平洋或大西洋文化传播的结果，因为这些文明的最初痕迹（农业、庙宇建筑、文字等）在此之前在老世界中发现了，美洲的土著人也许不

具备发明这些东西的能力。^⑩有些被认为是极端传统的文化传播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从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传播开来的：其中一些人认为这个文明的最初发源地是古埃及，也有人把这个地区定为中亚某地（如高加索地区——学者们认为这里是“白人”或“高加索”种族的最初家园）。^⑪

文化传播主义者与其反对者之间关于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和所有有关领域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文化演变的辩论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⑫反对文化传播主义的人（经常被称为“进化论者”或“独立发明主义者”）对文化传播主义者提出两项基本指责。

a. 文化传播主义者关于人类的创新能力的观点过于苛刻。实际上人类具有很高的创新和发明能力，因此由于人们进行独立的发明创造，新文化发生的可能性比文化传播主义者所承认的要高得多。因此研究者要考虑人们进行独立发明的可能性，而不要先入为主，认为文化传播的过程可以说明他要研究的问题。

b. 文化传播主义者都是精英主义者。每一项传播必然从一个地方开始。任何一项发明必然在某一人群中先发生，然后传播到其他地方。如果我们承认一项非常基本的命题，即所有的人群就他们的思想器官而言都是真正的人类，因此总的来说他们进行发明创造的能力都大体相同，这种假设被称为“人类体质的同一性”，这是19世纪的用词，有些古雅但仍在使用——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所有有人类的地方都可能发生发明创造。^⑬但是，文化传播主义者声称，只有某些经过选择的人群才具有创造力。换句话说，大多数人群发生变化的原因是由于接受了传播来的某些文化而造成的结果，等等。一些地方非常富有创造力，这些地方是最初发明的源泉地带。这些地方的居民比其他地方的居民具有更高的创造能力。人类体质的同一性被否定了：某些人群或者文化，比另外一些人更聪明。他们永远是发明创造的中心。

这是空间精英主义。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说法画一张地图，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永久的中心和一个永久的外围。对极端文化传播主义者来说，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划分的，至少在基督教出现的时代之前是这样的：发明创造的永久性中心是埃及，或在“古代的雅利安人家园”（在神话传说中它在亚洲西部的某个地方或者在欧洲东南部的某个地方），或者是高加索，或者是古代世界的某些被认为的中心地带。但是人们的指责要广泛得多：文化传播主义者作为一个人群倾向于想象，某些地方或者某一个地方，才是文明的最初源头，文明由那里扩散到其他地方。

很明显，文化传播主义非常适合世界具有一个内层和一个外层的思想。实际上，文化传播主义是关于内层和外层思想最充分发展的科学（或者说假科学）的合理推理。我们看到，这种思想为新的思想假定了一个永久的世界中心；总的来说，其他地方的文化演变都是从这个永久性的思想中心传播出去的。这就是文化传播主义者关于整个世界的地图。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常现象。在 19 世纪，甚至在 20 世纪，批判文化传播主义的人完全没有掌握他们批评的全部含义。他们中没有人否认世界有一个内层和一个外层。当他们批评文化传播主义者否定人类体质的同一性原则时，批评者也认为文化的演变是以欧洲为中心。因此他们接受这样的思想——明确地或者不明确地——欧洲人更具有创造力，比其他人更具有发明创造力。^⑧他们写的关于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把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特别是当他们讨论欧洲殖民主义所产生的现代效应和传播效应时就更加明确。这一观点在他们写古代时期的历史时也是明确的。19 世纪后半期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和现实主义的学者把重点放在基督教圣地。而且他们的学术著作也没有表现出接受宗教假设的思想。然而，内层和外层是明确的。他们把近东地区描述为农业和城市化的发源地，

然后他们很顺利地把文明的其他部分的渊源说成是欧洲。

我的基本论点是：所有公然接受内层——外层模式的学者都属于文化传播主义者，他们的概念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有一个永久的中心，文化思想变化从这个中心开始，广大的外层的变化是从这个中心传播出去的文化的结果（主要的）。我不是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学者所提出的和辩护的文化传播主义的正式理论说明了内层——外层的模式，说明了欧洲永远在地理上优越于其他地方的神话。相反，我是说，这一理论是由欧洲广泛的社会力量造成的，是从学术界以外的欧洲社会进入学术世界的。文化传播主义学者实质上是在他们所工作的学术领域中发挥和编制这一理论：如考古学领域，世界历史等等。

在我们进一步进行讨论之前，我必须提出一项警告：“传播主义者”这一词有些含糊不清，不应由于这种含糊不清使我们现在的讨论发生混乱。某一个地方的一项新发明的雏形是由那个地方的人们发明的，还是从其他地方传播来的，在这类辩论中采取后一立场的人是文化传播主义支持论者，也就是说他们赞成文化传播论的观点，他们反对独立发明创造的观点。这倒不一定是说他们喜欢把传播论作为一种松散的公式。有时候一个具体问题可能是重要问题。例如，有些学者辩称重要的西部非洲文化雏形在1492年之前跨过大西洋传播到美洲。不管他们这一论点是否正确，他们都不是在为欧洲中心传播主义辩论，他们也不是赞成文化传播论，反对独立发明论。但是那些一贯坚持传播主义观点的人同时也就是欧洲中心传播论者。

现在我将把欧洲中心传播主义描述为某种正式的科学理论。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但是它的基本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我将描述这一理论的古典（基本上是19世纪）形式，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将讨论一种大体相同的现代式文化传播主义。

我们将会看到，传播主义的基础包括两条原理：①大多数人群不具有发明创造力。②少数人群（或者地点、或者文化）具有创造力，因此他们是文化变革和进步的永久中心。就全球而言，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一个中心的世界模式——大体说，大欧洲——以及一个外围：一个内层和一个外层。关于由这两部分构成的模式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有时候这两部分截然不同，二者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一模式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有时候人们把它称为“中心——外围世界模式”）。另外一种形式对世界的看法略有不同：有一个明确的、确定的中心，它的外层逐步发生变化，文明、进步或者发明的水平逐步下降，越向外层水平越低。另一种观点把世界分为区域，每个区域代表一定水平的现代化、文明和发展。^⑥典型的分法是把人分为三大群：“文明的”、“野蛮的”、“未开化的”。

文化传播主义的基本典型模式是把世界分为两个重要的部分，一部分（大欧洲，内层）发明创造并且取得进步；另一部分（欧洲以外，外层）通过由内层向外层的传播接受进步的发明创造。以此为基础，文化传播主义提出了七条基本的论点来说明这两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①欧洲自然地不断取得进步和现代化。也就是说，欧洲部分（内层）进行发明创造，不断变好。欧洲在发生变化；欧洲具有“历史性”。

②欧洲之外（外层）自然地停滞不前，没有变化，保持传统和落后。那里没有发明创造和变化，也不可以期待有发明创造和变化。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发生变化；欧洲以外地区与“历史无关”。

命题③和命题④说明两个部分之间的不同：

③欧洲进步的基本原因来自某些智力和精神因素，来自“欧洲人头脑”的某些特点，“欧洲人的精神”，“西方人”的特点等

等。这些因素导致了创造力、想象力、发明力、创新力、推理能力、荣誉感和道德感：“欧洲价值观”。

④欧洲以外不能取得进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这些智力和精神因素。这一命题的实质是断言欧洲以外是“理性的”空洞，或部分地是“理性的”空洞，也就是说，不存在思想和一定的精神价值。这一命题在古典文化传播主义中（主要是19世纪后期）有不同的形式。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

a. 就欧洲世界以外的大多数地区来说，这一命题断言那里没有文化体制，甚至没有人的存在。我们不妨把这种观点称为文化传播主义的空洞论神话，这一点与殖民主义定居者有着特殊的联系（欧洲人向非欧洲地区的具体移民，取代或消灭当地的居民），这种空洞论命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它们相互联系：第一、某一非欧洲地区没有人的存在或者几乎没有人的存在（因此欧洲人到那里定居没有取代任何土著人）。第二、这个地区没有定居的人口：那里的人不断移动、游牧、流浪（因此欧洲人到那里定居没有侵犯政治主权，因为流浪者没有要求土地权）。第三、这个地区的文化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地区不存在财产权和财产要求权（因此，既然没有人拥有这些土地，殖民占领者可以任意地把土地分给定居者）。最后一个层次适用于所有的外层部分，那里没有智力创造和精神价值，有时欧洲人（例如马克斯·韦伯）把那里描写为“没有理性”。¹⁹

b. 欧洲以外的某些地区，在某些历史时期，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有理性的”。这样，例如中东，在《圣经》流行的时期那里是有理性的。中国在其历史的某个时期也是有某种理性的。²⁰其他地区，总是包括非洲，无条件地缺乏理性。

命题⑤和命题⑥描述了内层和外层之间互相作用的路径：

⑤对欧洲以外的地区来说，那里所取得的进步、改善、现代化等等正常的和自然的道路是由于欧洲的发明创造和进步思想文

化传播（扩散）所导致的，这种传播的流动就像空气进入真空一样。这种传播采取的方式可能是欧洲思想的扩散，或者是欧洲思想的具体化带来的新的产品的扩散，或者是欧洲人的扩散（移民、定居），他们是这些新的创新思想的载体。

你将会看到，命题 5 是欧洲殖民主义的简单的辩护。它声称，殖民主义包括殖民主义定居，给非欧洲地区带去了文明；这是欧洲以外的世界脱离停滞不前、落后和传统保守而取得进步的自然道路。

但是在殖民主义下，欧洲以外地区的殖民地财富被拿走，欧洲殖民者成为富翁。在欧洲中心传播主义看来，这是内层和外层之间的正常关系。

⑥作为由欧洲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播文明思想的补偿，二者之间存在着物质财富的反向传播，包括种植园产品、矿产、文物、劳力等等。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补偿欧洲人向殖民地传播的文明，因此对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的剥削从道义上说就有了根据。（殖民主义给予的东西多于它得到的东西。）

内层和外层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它是文明思想从欧洲传到欧洲以外地区的反向传播（命题 5）：

⑦既然欧洲先进，欧洲以外的地区落后，因此传播到欧洲的任何思想必然是古老的、野蛮的、隔代遗传的、不文明的、邪恶的——巫术、吸血鬼、鼠疫、“妖怪”等等。¹⁰⁸与这一概念相关联的是关于文化传播的一个神话，人们把这个神话称为“我们当代祖先的理论”。这一神话声称，当我们越来越远地离开文明的欧洲时，我们在那里所碰到的人体现出越来越久远的历史和文化时代的特征。因此，所谓的对跖人中的“石器时代人”被比作是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按照这一理论，文化的传播是一浪接着一浪向外层传播，越往外层那里的文化演变就越加落后。但是反向来看，这些古老的、隔代遗传的文明的雏形也可能反向传播到文明

的中心，采取的是古老的、法术式的、邪恶式的形式如巫术以及德拉库拉小说中所描写的吸血鬼等。

这两部分地区的主要对比可以从下图中看到。以下的对比典型地反映出 19 世纪传播主义者的思想：

核心地区的特点	外围地区的特点
富有创造力	没有创造力
富有理性、智慧	没有理性、感情冲动、本能
理论推理	经验主义的推理、实际的推理
心脑	体驱、物质
纪律	自发
成年	少年
理智	非理智
科学	巫术
进步	停滞

到此为止我所描述的是文化传播主义世界模式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版本。下面我们将更加详细地描述，特别是我们将会看到古典式的文化传播主义与现代化文化传播主义的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关于什么是文化传播主义暂时讲到这里。为什么要讲文化传播主义？我在这本书中将比较详细地说明文化传播主义如何塑造了我们的历史观点，包括欧洲历史和欧洲以外的历史。在本章的后面和第二章我将说明文化传播主义对历史学以外的理论的具体影响，对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

如果我们讨论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这个讨论将具有更大的效益。这个问题就是文化传播主义怎样成为西方思想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四、殖民者的模式

就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言，也许所有的文明都与某种种族优越论相关联，认为自己比别的社会人群更好、更聪明、更勇敢，并构造出经验主义的理论来为这些观点进行解释，把与这种观点不符的尴尬之处解释掉。也许我们从下列思想中能够找到文化传播主义的种子：认为“我们的”社会取得进步是自然的、不需要什么解释；而“他们的”社会取得进步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或者至少进步不那么明显；认为“他们”的进步是借鉴“我们”和模仿“我们的”思想，等等。但是这些思想还不能构成文化传播主义理论，而且对了解文化传播主义来说也不是重要的内容。我所讨论的文化传播主义是现代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它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一）起 源

文化传播主义在 19 世纪形成为一种科学理论。然而，这种理论的起源可追溯到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西部欧洲，在那里构造了一种思想体系，把欧洲内部现实的变化和殖民主义在欧洲以外的扩张联系起来。这个概念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也就是说文化传播主义者把世界分为内层和外层。它起源于非常古老的基督教概念，也是罗马帝国的遗产（这对西部和南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来说，意味着其政治和土地拥有者上层阶级的合法性的共同渊源）。但是如果说中世纪的欧洲人把基督教的发源地看做是一个有明显界限的空间，自然而然地与周围的社会发生冲突，这也是不真实的。关于基督教发源地与伊斯兰教和东方文明的相对的力量、财富和技术天赋，中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并不抱有许多幻想。当然他们有某些想法，但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只是把基

教徒居住地区与其他地区加以区分，他们居住的地区有上帝的旨意和保护。事实上直到 1492 年之后内层才有了明确的地理界线，这种界线与其说来自中世纪的思想，不如说来自现代的早期殖民主义。

欧洲思想中关于欧洲进步的说法，关于欧洲必然取得进步的说法，也主要是在中世纪以后。很明显，这些思想在中世纪讨论过，而且肯定当时人们希望、祈祷并且争取改善，但是中世纪的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社会处于一种相对的均衡状态；他们的宗教谈到大灾难，以及接受现存条件的必要性（和规则），而中世纪生活的现实（特别是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取得了可以看得见的进步。到了 16 世纪和 17 世纪，欧洲的思想家开始构思历史——他们自己的历史——把它看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真正的进步（或者说加速的变化）是在这些思想家居住的地方发生，而且出现这些思想的气候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在许多地区个人发展的机会增加了。

这些早期的现代思想家，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界的，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之一是需要建立一个思想体系、一种意识形态，使欧洲居民中具有比较保守的思想的那部分人相信并接受他们所取得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和可取的，从而使他们能够接受法律体系中的一些变化，允许更快的、更广泛的资本积累，说服土地所有者阶级把土地看作是商品并把他们的地产投资于风险企业，制定法律并采取行动动员劳动力为国内和国外的资本主义活动，说服一般的欧洲人接受这些痛苦的变革等等。同样重要的是有必要用符合宗教要求的方法来说明这些进步。证明不断出现的发明创造是欧洲人的大脑和精神的产物，是上帝的（欧洲的）历史旨意，最终是基督教灵魂的产物。（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将讨论这些问题。）

从此出现了内层总是进步的概念（文化传播主义命题①），

而且这种进步是由于智力和精神的力量所导致的，即“欧洲理性”（文化传播主义命题③）。到19世纪，在世俗著作中讨论历史和哲学的动因时不再提上帝和《圣经》，但是欧洲的进步是当然的、合理的这一基本模式仍然没有本质的变化；而且实际上变得更加牢固。^④在这些思想中，没有任何思想怀疑欧洲以外的文明可能与早期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有很多联系，或者说与它的现代（16世纪到18世纪）的进步有联系。这些地方只是纯粹被动地起着提供劳动力的作用、提供商品和定居土地的作用，提供一些非常简单的技术和艺术雏形。而且没有意识到殖民主义及其横财——资本的流入、欧洲内部和外部的贸易的加强，在商业中心扩大就业机会并在殖民世界扩大就业机会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是欧洲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后，欧洲不是把它的社会活力的概念归于外部原因，而是归于内部原因，归于上帝。这种相对来说一贯无视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甚至在今天所起的重要作用的看法，都需要我们在本书中不断给予注意。

关于外层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西班牙人在16世纪关于新世界印第安人性质的辩论——他们是人类吗？他们能够接受真正的宗教吗？如果他们能够接受，他们能够成为奴隶吗？——这是文化传播主义早期的重要部分，这会导致形成欧洲扩张的概念，并说明欧洲扩张为什么是当然的、可取的和有利可图的，并且导致构思将来被征服的和剥削的世界，再次说明为什么那里的人屈服于欧洲扩张，为欧洲人提供劳动力、土地和产品是理所当然的。^⑤欧洲关于在新世界居住的人们的观点形成得相当快，因为在那个地区殖民主义的模式很快出现了。从一开始那里的企业的利益就非常巨大，那是从16世纪早期第一次大规模运输黄金起（见第四章）。在西班牙殖民地发生的反抗很快被镇压下去，留存下来的美洲人很快地被迫屈服于殖民主义剥削。（我在这里系指早期殖民主义的主要中心，例如墨西哥中部、大

安的列斯群岛和安第斯山脉。)到下一个世纪,在巴西和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种植园所获得的利润,以及尽管非洲的奴隶进行反抗,但仍能被迫为欧洲人做工并生产利润,这一切使得关于外层的概念进一步得到加强:这里的人当然比欧洲人低劣,当然不那么勇敢,不那么热爱自由,不那么富有理性等等,他们要取得进步需要接受欧洲人的支配,也就是文化传播。总之,新世界的经验及关于美洲本地人、非洲人、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他们在矿区、大规模农业地区、商业种植园等地生产出可以导致文化传播主义命题的核心(命题②、④、⑤),认定欧洲以外的地区当然依靠欧洲的进步,这是由于他们缺乏欧洲人所具有的智力和精神素质。这也产生了文化传播主义的命题⑥,即欧洲扩张是自然的而且导致欧洲以外的财富向欧洲的自然转移。

但是这些活动仅仅发生在新世界和进行奴隶交易的非洲海岸。在19世纪之前,苏丹的、非洲南部的和东部的文明并没有被欧洲人征服(在多数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在这一时期不仅坚强不屈,而且在欧洲的东南部扩大它的边界控制线,伊比利亚人也在征服新世界。其他的大帝国在18世纪中期之前也没有向殖民主义屈服: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的所有地区的活动主要是贸易,特别是长途海上贸易,他们只是在某些海岸地区取得小的立足点,等等(见第四章)。因此在16世纪、17世纪、18世纪,文化传播主义的外层模式虽然应用到了美洲人以及从非洲运到美洲地区的奴隶,但是不能应用于旧世界的文明。

关于东半球的这些文明,一种有局限性的暂时的传播主义模式在这个时期被接受。这些文明的内容没有疑问是丰富的,而且在技术上是先进的。从创造发明的能力方面来说,那里也明显地存在着理性,或者至少在过去存在过,曾经发生过伟大的引人注目的发明(技术、建筑、银行等等)。这些文明所缺乏的是道德方面的理性成分,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不是基督教徒。他们

是“东方独裁主义”，在那些社会中自然存在着残酷、缺乏自由、普通人不能过体面的生活（而精英们生活在腐朽和罪恶之中）。道义上的缺陷必然导致这些社会在当今时代不能取得进步，在这个时代欧洲自然而然取得进步，尽管欧洲人无法否认这些独裁式的文明没有疑问地在过去也曾经取得过进步。对此他们感到最为迷惑不解。（有时，他们宣称那种进步发生在基督时代之前，由于他们拒绝接受基督教而丧失了上帝的恩惠。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解决自己的迷惑不解。）^②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对印度、东南亚、非洲内陆的迅速殖民化，以及（作为一种集体的殖民地）对中国的殖民化，传播主义关于外层的命题以及关于内层和外层的自然关系，才形成对所有欧洲以外地区的总概括。我认为，文化传播主义最后的命题、关于邪恶、野蛮与疾病从外层向内层的反向传播在晚期才充分形成。妖怪人（来自马来的布根人）来自外围。德拉库拉所描写的妖怪人的家园也是在亚洲的边缘地带。^③

（二）经典文化传播主义

19世纪是殖民主义的经典世纪，在这个时期欧洲中心传播主义具有了我所说的经典形式。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殖民主义加速扩张并得到加强。在1810~1860年前后，不仅征服了亚洲的大部分，在美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定居，并且开始渗入非洲。从186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亚洲和非洲占领了其他地区，殖民主义赚取了利润，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积累了资本，从欧洲人定居地流入的财富得到巨大的扩张。在那个时期的后半期，殖民地农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其他方面的发展，如非稀有金属的开采，首次成为重要的部分。^④关于这些变化对这个时期欧洲社会和知识界的演变的影响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我将在第四章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要说明欧洲扩张的总影响也就够了。这些扩张是通过狭义的殖民主义、通过定

居和通过半殖民地经济的主导地位来实现的。这些变化的深刻性足以用来创造一个大规模的知识模式即文化传播主义的经典模式。

1870 年左右，欧洲思想家关于世界的基本性质和活力取得了广泛的一致认识。很少有人怀疑生物和社会的进化——即进步——是基本真理，尽管进化的过程经常用宗教或者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进行解释，而不是像达尔文的理论那样用自然的规律进行解释。^④看来很清楚，欧洲人自然要经历经常的社会演化，这是上帝和自然关于历史的计划。有些历史学思想家用整体论的词语来解释这个总的进程，把它说成是社会和国家的变化；另一些人用简化的方法（在一种意义上说是心理学方法）把这个过程解释为智力的着力点，人类推理的不断进步，把资本主义、工业等看做是心灵的产物；但是许多思想家（其中包括赫伯特·斯潘塞）不认为社会模式和智力模式是对立的，而把进步看做是一条流动的河流，社会和心灵的演变随之流动。^⑤对欧洲和欧洲人来说，当然也包括盎格鲁——美洲人，所有这一切都是明白无误的。因此最晚到 1870 年代，文化传播主义的中心命题，也就是进步在欧洲（或西欧）中心地带自然地、不断地从内部发生的思想牢固地树立起来。它的真理性不再受到主流思想家的真正怀疑。

与此同时，关于欧洲以外世界的历史动力和性质的看法也趋于合理。到 19 世纪中期，《圣经》提供的时间表被断然拒绝（尽管不是在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而且这时不再需要争论欧洲人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等等需要经过数千年的演变，除非从一开始那些文化就已存在，也就是说，多元发生说是对的，某些人群是在亚当和夏娃之前单独创造出来的，或者在更早些时候。这就为关于文化差异演变的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发生这一变化的同时，人们一般也拒绝《圣经》关于人类社会的原始本质的思想。现在（世纪中期以后）人们相当普遍地把文化看做是从事务

的原始状态演化而来的产物，这表现在人们关于原始的“石器时代”的观念。（按照《旧约全书》，人类在“创世”时代曾经拥有先进的技术，包括农业和金属的使用）。

关于欧洲以外地区认识的迅速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殖民主义的发展。它特别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是获得了关于欧洲以外地区人们的大量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是被高度歪曲的。欧洲文学第一次能够把欧洲以外的事情在文学中进行连贯的描述，包括那里的文明和“野蛮”。第二个原因是，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世界和人民的情况，证实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具有了现实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这两个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各种殖民主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殖民者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尽可能地去了解那里的人民、资源，以便征服、统治这些地区，或者在那里定居，并且要尽可能地多了解已经征服的地区，以便为管理这些地区和进行经济开发提供方便。19世纪是科学探索的时代——达尔文在比格尔湾、利文斯通在非洲、鲍威尔在洛基山脉等地进行了探索。给这些人提供资源支持的机构对有关的研究地区有着直接的利益。与此同时也发生了巨大的传教活动洪流，他们支持某些探索（包括利文斯通）。数以百计的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最重要的结果是收集到欧洲以外地区的重要详细信息，包括那里的种族、语言和地理，此外还有殖民地行政人员送回的重要的详细报告。他们被要求递送这类报告，提供关于当地的法律体系、土地制度、生产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大部分情况是通过这些途径获得的。不必赘言，提供这些情况的欧洲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文化观点、政治观点和宗教口径，他们不得不用高度歪曲的眼光来看待“当地人”。一个传教士可能对他周围的人民非常热爱和尊敬，但是他

们不可能相信非基督教徒的文化和心灵能够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相提并论。殖民地行政官员不仅有歪曲的文化观点，而且他们通常都有经济利益和阶级背景（欧洲种植园主、矿业公司、地主等等），他们提出的关于普通人、关于资源的观点有意识地或者没有意识地反映出这些高层集团的偏见与具体利益。严格来说，传教士和殖民地行政官员从事的事业是把欧洲模式传播到欧洲以外地区。因此这样收集的关于欧洲以外人们的信息肯定是歪曲的。尽管如此，它仍具有高度价值。根据这些信息所形成的理论——包括 19 世纪人类学、地理学，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政治—经济理论的整体——都是有系统的歪曲。总起来说这些歪曲构成了文化传播主义。

但是，殖民主义的利益增加了歪曲的成分，它需要形成对殖民主义有用的理论。科学和法律理论一般是由政策制定者或者知识分子来完成，他们自己就是政策制定者或者接近于政策。（例如在英格兰，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具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甚至小说家和诗人，都与东印度公司这个殖民地办事处或者其他帝国的、私人的、或者公共的机构有直接联系。^⑧我在“理论”的名义下包括了广泛的一般言论和大的历史架构。

在极为普通的层次上，知识分子形成的社会演化的理论从本质上来说表明了文化传播主义的假设是自然规律。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19 世纪在所谓的“进化论”和“文化传播主义”之间进行的辩论本质上是两个版本的文化传播主义的辩论。两个阵营中的大部分理论架构的目的在于支持殖民主义活动，以形成和巩固关于欧洲殖民主义从科学上来说自然的，是人类进步社会法则不可避免的结果（家庭、法律和国家的形成）。在非一般的层次上，19 世纪中期和晚期关于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初期著作提出了各种现代文化传播主义的思想，主要是关于欧洲人与其他人相比取得了自然的和不断的进步的原因与事实。这些关于历

史的架构对在欧洲人口中取得对殖民活动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后来，随着殖民教育体系的出现，这些理论被用来说服殖民地的居民，使他们相信殖民主义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

我在第二章将讨论这些文化传播主义理论中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在 19 世纪学术界与殖民主义的复杂的结合中出现并具体化，我将重点讨论今天仍在支持着欧洲历史和文化优越性神话的那些理论。我现在想说明经典文化传播主义是怎样与经典殖民主义一起兴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选择了两个有代表性的理论。

其中一种理论假设，非欧洲人关于重要的物质资源，例如土地，没有形成私有财产的概念。这种理论断言私有财产起源于古代欧洲，比较明显的是罗马的土地法和德国的关于个人主义的某些概念的出现；其他文明没有这种历史（而且言外之意是说这些历史缺乏相关的智力和文化素质），他们所处的进化阶段还不能真正形成私有制的概念，需要把资本主义强加给他们。实际上，这一理论是欧洲殖民主义公司和殖民主义办事处的律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制造的，具有非常具体的目的：为剥夺被殖民化的人民的土地提供法律基础，从而制造一种神话，即被殖民化的人们对他们的土地没有财产权，因为他们没有关于土地财产权的概念。^②然而这一理论在 19 世纪知识思想界基本上成了公理。甚至卡尔·马克思也接受这一理论，并由此导致了关于私有财产演化的更大理论——这一理论的大部分内容涉及资本主义的起源——这一理论辩称（或者说假设）这一演变是独特的欧洲现象，殖民主义尽管可怕，但它至少把资本主义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世界，这对欧洲以外的人来说是一个必然而又痛苦的过程。因此，甚至马克思主义，这一 19 世纪欧洲最为反体制的学说，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传播主义缔造的。^③

这一学说更为广泛的形式是更经常使用的“空洞神话”。文化传播主义者认为，在一个殖民化了的地区或者可以殖民化的地

区没有人口，或者只有到处移动的游牧人口，那里的人没有固定的住所，因此对领土没有要求，或者那里的人没有政治主权和经济财产的概念。这种思想与殖民主义的功能是一致的，它的兴起也与殖民主义相同。还有一种与这一学说紧密相连的学说，它具有同样的性质，即“东方独裁主义”（其起源地更为古老，但在19世纪的文化传播主义思想中得到充分发展）。按照这一理论，欧洲人以外的人缺乏自由的概念，因此容忍独裁政府压制所有的进步——直到欧洲人用殖民主义的形式给他们带去自由（可笑的是这是对自由的纯粹否定）。起源于经典文化传播主义的这些理论和其他理论，今天仍然被用来加强欧洲历史和文化的优越性的神话；我们将在第二章讨论这些理论，批驳这一神话。

经典文化传播主义时代也是经典殖民主义时代，在那个时代欧洲扩张得如此迅速、如此有利可图，欧洲的优越几乎成了自然法则。文化传播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把这一表面看来事实形成为关于欧洲历史、文化或心理优越的一般理论，关于欧洲以外的人是劣等人的一般理论，关于欧洲把它的雏形发明传播到欧洲以外地区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绝对正确的一般理论。文化传播主义者把这个一般理论扩散成为无数的经验主义观点，关于所有人文学哲学和艺术的经验主义观点。^⑨他们把这些观点具体应用，用来为具体的征服、压迫和剥削行动进行辩护，把所有这些行动说成是正确的、合理的和自然的。

（三）现代文化传播主义

19世纪，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拿破仑战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间的时期内，是欧洲相对和平和进步的时期。殖民主义给这一过程增添了资源、市场、廉价劳动力以及由于欧洲人定居而取得的土地，殖民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解决了欧洲内部的许多矛盾。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欧洲文明和欧洲文明的扩张所取

得的进展在空间上来说是同一种历史力量的不同方面，这种思想当然也就是文化传播主义的中心思想。

但是，所有这一切在 20 世纪初期发生了变化。世界的体积是有限的，因此空间的扩张需要结束，到 1900 年欧洲以外的世界已被分割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控制圈或者定居地。这些条件的变化带来了思想方面的变化：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那里的剥削和控制面临着当地人的抵抗。因此问题不是进行扩张，而是保持平衡。同时，欧洲各国之间的紧张形势——有些与殖民地的冲突有关——形成欧洲列强之间的一般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发生了大萧条。然后接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 1914 年至 1945 年之间，欧洲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进步和扩张上，而是如何避免灾难、如何维持或者回到和平与繁荣，当时的关键词是“正常状态”。

文化传播主义的中心概念不适合知识分子的这一心态。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学说是静态平衡理论，平衡论，而不是扩张理论。经济学注意的是凯恩斯的平衡论思想。地理学的有关学说“地区主义”占主导地位，这一学说认为世界各个部分是稳定的、相关连的、划分清楚的地区，而且将保持这一状态。人类学强调两种平衡理论：“功能主义”，这是一种社会制度模式（和文化制度），是一种稳定的可以自我纠正的制度；二是“文化相对主义”，这一学说实质上宣布每一文化都有天然的价值。人类学家当然主要是在被殖民化的地区的人们中工作，这两种理论与殖民主义政策紧密地联系为一体，为制定防止当地人暴乱的政策提供基础，而使欧洲人能够利用那里的土地、矿产和劳力，^⑨因此平衡论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欧洲人 20 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的思想里也许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个时期的文化传播主义看来部分地进入了低潮。历史教科书和地理教科书仍然得意洋洋地充斥着文化传播主义思想，基本

上仍然是19世纪的心态，强调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我们的香蕉来自这里”）传播文明的好处，强调“西方”的崛起等等。在社会思想方面，“极端文化传播主义”（在此之前讨论过）的主张仍然有人提出而且进行辩论。^④但是，不应认为，文化传播主义作为文化动力学说的没落意味着偏见的减少。关于非欧洲人具有较少的理性、较小的发明能力等等概念仍然像以前一样强烈，甚至可能更加强烈，因为这个时期是纳粹主义和类似的主张盛行的时期，而且，在那个时代，遗传种族主义被看做是科学，而不是偏见。我们将在第二章讨论这一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种新的现代式的文化传播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殖民帝国垮台、不发达的但是在法律上具有主权的国家的“第三世界”正在出现的时代。这一理论在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出现，这时一般称为“现代化”或“现代化传播”。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显然一批殖民地国家将获得独立。这时解放力量非常强大，在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所有的殖民国家除美国以外都变得相当虚弱。它们都想保持它们的殖民地，保持过去巨大利润的来源，而且也可能是今后的巨大利润来源。每个殖民国家都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殖民地，有时候使用暴力镇压独立运动。当殖民主义控制明显地成为不可能时，有时则勉强用和平方式给予政治独立。^⑤

关于现代化问题，所有的殖民地在经典式的殖民时代都充满了这样的思想信息，即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取得必须通过殖民国家的“现代化”的传播。“现代化”意味着以下内容的传播：现代经济（重要的公司为殖民者所有），现代公共管理（殖民政治机构），现代技术基础设施（殖民者建造的桥梁、水坝等），等等。我把这些称作思想信息，但是实际上殖民主义者在他们的内心相信，把他们的文明传播给在他们的“殖民教导下的”人们是他们的使命，而且认为这种使命为他们的国家生产财

富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回忆文化传播主义命题⑥）。在新的形势下，殖民者需要说服殖民地人民“现代化”信息仍然是有效的。这样，他们或许能够说服殖民地人民自愿地放弃政治独立的理想，赞成更为务实的理想，即在英明的和慈善的殖民统治下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或者，如果坚持争取独立，这一思想将说服正在获得自由的国家的人们相信，那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必须保持殖民经济才能获得发展，也就是说，允许殖民者的公司和银行继续在新的政权下进行他们的业务（有利可图的），今天人们把这一体系称为“新殖民主义”。

这时所有的殖民国家都开始强化殖民经济发展的进程。^⑧不应把这一做法看做是玩世不恭或者虚伪：其中，文化传播主义把殖民进程定义为对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都有益的进程，参与新的殖民地发展活动的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都被完全说服，相信他们是在为殖民地人民的进步而工作。同时，在新独立的国家也在推进同样形式的经济发展，一部分是通过联合国的机构，一部分是通过双边援助协议。^⑨美国这个头号经济大国开始在不发达世界建立自己的援助项目。同样，不应把这种活动看做是玩世不恭和政治化：在这个时期有一种非常欢快的思想，把世界战争的结束看做是发展时代的开始，这时发达世界的国家将致力于——也就是传播——把繁荣和进步带给贫困国家。

非殖民化广泛发展，许多解放运动和新独立国家拒绝接受新殖民主义选择，或者拒绝外国公司（如印度尼西亚）或者选择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又为现代化的传播计划增添了新的刺激。通过传播带来发展的努力得到加强，希望他们的成功能够导致一些国家不去拒绝资本主义和外来的选择。但是不管作出其中哪项选择，都意味着在政治上与苏联或者中国结盟，因此现代化的传播计划在冷战后的外交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使这一计划在美国的日程上排在前面，美国把现代

化和经济发展排在了特别优先的地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需要大量的投资。^⑤

现代文化传播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基于第三世界一整套新条件下的思想体系。现代化的传播是由公共政策制定者和私营公司执行的、由知识分子（至少是大都市、原殖民国家的）理论化了的现代化，基本上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通过不断接受越来越多的来自原殖民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好处而取得繁荣，而且认为这一过程过去和现在对于后者来说都是极为有利的。在文化传播主义者的信仰体系中，这一过程对大家都有利，现在像一个世纪之前一样是正确的、合理的和自然的。

1993年的思想当然不同于1893年的思想，因此如果认为现代文化传播主义与经典文化传播主义一样将是错误的。生物种族主义再不是这个模式的一部分（我们将在第二章看到），而且很少有现代欧洲思想家认为非欧洲人根本不具备最终发展到欧洲人水平的潜力。宗教腔调也大体上不见了，关于基督教上帝创世时是在基督教圣地创造了公认的欧洲人，并在此后指导欧洲人，使基督徒总是比其他人优越的思想也不怎么流行了。某些非欧洲文明在历史上的伟大成就现在也被充分承认。（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限定：与欧洲文明相比合理性较小、创造力较小。我们将在第二章讨论。）人们盲信现代化传播将给各地带来经济发展的思想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现在欧洲专家学者对他们这一模式的信仰进行了限定。特别是，过去他们天真地相信现代技术的传播，特别是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所谓的“持续发展的起飞”的关键。现在他们从这一观点后退了。

尽管如此，文化传播主义的基本命题依然如故。欧洲人仍然认为内层具有一种基本的文化性质，外层具有另一种文化性质，现在承认日本属于内层部分。现在仍然认为欧洲过去表现出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进取性，只有一两个地方在历史的某一两个时刻

是例外。尽管欧洲学者不再坚持具有进取性的内层与停滞不前、进展缓慢的外层的根本不同将延续到无限的未来，但是他们多数人在写作或讲话中当谈到现在和未来时给人的印象是这一根本活力似乎将继续延续下去（这幅图画承认日本、也许还有几个小的东亚国家包括在具有活力的内层）。然而，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今天有一小批人数不断增长的欧洲学者，他们主要是在对来自后殖民社会的非欧洲学术界提出的新思想作出反应时，对文化传播主义模式的整体提出了疑问，他们否认内层比外层优越的历史概念。

五、世界模式和世俗利益

文化传播主义是一种脆弱的理论。本书的立论是文化传播主义不是好的地理学说，也不是好的历史学说。但是，在很长时间之内它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如何来说明这样一个坏的理论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如此广泛地被信以为真呢？在我们把文化传播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理论的性质和演变的讨论转向讨论经验主义历史即以后章节的课题之前，需要简要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需要了解这一（以及每个）理论都与其他思想连接在一起，而且对社会利益作出反应。

（一）人种论信仰

在这一讨论中我们将把思想看做是文化事实：我们将从人种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我们将把思想看做是属于特定社区和类别的人所持有的信仰。我们将会看到，把思想当作信仰进行的研究与对思想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的调查，二者之间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把思想作为信仰进行的研究在一些情况下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这两种研究中具有更为基本的意义。此外，我们将看到科

学信仰使自己具有更大的结构、信仰体系，而且，信仰体系（如文化传播主义）相互之间具有某种重要的相互兼容性，与坚持这些信仰有效性的人群的价值观和利益具有一致性。从人种学角度探讨作为信仰的思想的性质我们将会发现，为什么文化传播主义的生命史可以用欧洲社会生命史来更清楚地说明，特别是欧洲殖民主义的生命史，而不是由科学社会知识和社会进程来说明。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和经验主义思想可用两种办法进行检验。一种办法是轻松的、传统的。它从思想所表达的意义来检验思想。它们是否合乎逻辑；也就是说，它们是否反映了内在一致的论点？它们关于真实世界的言论是否有证据支持，是否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的？这种逻辑的结合或者论点结构和证据基础是我们在评价科学思想时所需要的——实际上包括所有与经验主义现实有关的思想。检验思想的第二种办法是去了解相信某种思想的人，了解把这一思想作为信仰传给其他人的人，并且去了解听取这一思想并把这一思想作为信仰接受的人们。一个人是否相信一种思想的有效性与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否有效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信仰地位问题是人种学问题：找到某些人坚持某些信仰的原因；某些信仰如何被人们接受、如何被某些人拒绝；在这些人们的心目中一些信仰是如何与另外一些信仰相联系的；人们如何看待新的备选思想，如何接受或拒绝这种思想；这类思想如何与文化的其他部分相联系，包括价值观、社会组织、阶级组织、政治等等。这类调查有着不祥之兆，它所提供的独立的、可靠的证据表明某些人坚持认为某一思想是真实的，然而其原因与逻辑和证据毫不相干，而是由于某种寓于文化之中的原因。

有趣的是，当我们阅读某些人类学家或文化地理学家写的关于地球偏远角落某些小的不知名的社会时，对他们所描述的那里的信仰、价值和神话等并不感到不快或感到受到威胁。实际上我们希望人类学家进一步告诉我们“当地人”持有这些思想的社会

和文化原因，而不是想得知这些思想是否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分别描述思想的逻辑、证据基础和文化之间的纽带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当把人类学的这一思路运用到科学、历史等所谓“西方的”思想时，其结果是令人烦恼的，而且这一做法本身看来似乎是不合适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思想是受文化包围的，我们可以检验包围思想的周围环境以及把思想嵌入这一环境的方法。这就是人种思想研究。在人类学的领域中，当我们要研究人类学中的知识体系时，使用术语的习惯做法是在术语之前加上人种这个前缀来命名某一领域的知识，如医药、植物、地理等。例如，“医学”研究不同于“人种医学”研究。或者在人种学领域，所要探讨的是在一定文化下的医学信仰，这些信仰与该文化的其他部分相联系，还要探讨如何把医学信仰在所有（或一些）文化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当我们把人种医学与所有带有“人种”前缀的科学领域放在一起时，我们自然得到足够的人种科学，也就是对全部科学进行人种学的研究；更广泛来说，包括所有领域的经验主义信仰。人种历史学是这一总体的一个部分。^⑥人种地理学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人种科学的主体是信仰。我们一般看到的信仰是包含在经验主义言论中的信仰，是一些关于断言某些主题是真理的话。在人种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单位——虽然不是最小的单位——是关于信仰的言论以及发表、坚持这一言论的个人或人群。对社会科学中的每一经验主义言论来说，都有一个关于其信仰地位的人种科学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的不同问题即其真实性的地位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总是相互分离，但是二者只有在作了长时间的分析后才能走到一起。这一分析最终说明为什么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如此众多的文化传播主义言论都是真正的虚假言辞。

研究信仰也是研究坚持信仰的人群。关于坚持信仰的人群，有两点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信仰人群可以是任何一种类型的人

群。然而，在不同信仰人群中，最基本的重要内容是文化、阶级和可以想到的组合如人种阶级。这些类型中没有任何一类是抽象的——除了定义单位和界限之外。各种文化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进行分析的单位都是真实的、具体的。它的每个成员也都是具体的现实。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中，关于文化整体还是“个体”（人的）没有哲学谜语。因此，有关每一个个人的人种科学，也有关于每一人群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种科学。各个阶级的问题较为麻烦。然而，大多数人接受一种广义的思想，存在着两大人群的分野，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上层阶级，后者运用政治权力，并且积累财富。我简单地假设认为在本世纪和上一个世纪在大多数社会中存在着粗略的阶级分野，同时承认并不是总能说明某一特定社会的特定人群是属于工人（生产）阶级还是属于上层阶级，还是属于某种含糊不清、不确定的人群，从而不能顺理成章地划分为其中的一个阶级。在本书讨论的问题中一个相关的比较麻烦的划分问题包括教授和其他从事研究和写作有关社会和环境的其他人们。他们不是积累财富的阶级，不是上层阶级；但是教授和作家在多数情况下（不是一概）与上层阶级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他们有深邃的知识、专业知识以及诚实的品德，但他们都倾向于按照对上层阶级有利的方向去思考、说话和写作。与文化传播主义有关的思想最为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

文化与阶级在人种阶级人群中相互交叉。人种阶级人群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有一重要用法。我强烈地认为，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上层阶级是一个基本的、永久性的信仰人群，尽管他们在文化（和民族）方面存在着不同。它们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个单一的人种学和人种科学。这一点在下列事实中得到反映：在我们重点讨论的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这些上层阶级与他们本国的和非欧洲世界的工人阶级之间有着一套共同的利益关系，他们共同支持着关于欧洲世界和非欧洲世界的一套内容相连的信

仰体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系。实际上本书最重要的命题是，断言文化传播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在欧洲上层阶级影响下，为了欧洲上层阶级的利益而生成的一个单一的信仰体系。尽管不应认为在人种阶级的刺激下产生的科学和历史带有“偏向性”，但我们将会看到，关于地理、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思想体系受到人种阶级的强烈影响。从总体上看，通过两个世纪的思想交流，这个产物是文化传播主义信仰的体系，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科学的，它长期存在并继续影响社会实践。

信仰把自己组装成为信仰体系。二者之间的不同严格来说不是其相对复杂性。但多数简单的信仰是一些能够用简单的表述性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尽管有些思想需要用诗歌或者图画来说明），当人们表达这些思想时是采取了一种断言的形式，对其真实性表现出一定的信心。关于这些信条式的句子我们对三点感兴趣，我们对表达这些思想的行为也感兴趣。这些思想是经验主义的（不是纯粹逻辑性或者纯粹评价性的）。这些思想被作为真实的东西表达出来，或者作为可能是真实的东西被表达出来。相信这些思想的人把这些思想看做是认识上的全部或者是可分辨的部分，粗略地说，把这些思想看成是“概念”、“思想”。这些思想单位很难是准确的，但它的重要性在于人们作为个人不会凭空或者根据直接观察结果就会想出这些思想和概念。这些信仰单位在长时期内保持着自己作为信仰的特点。经常在大批人群中流传数代。在一个信仰体系中还会看到更多的结构，这些结构包括一系列的联系在一起言论（“因为在……”）。我将把这类信仰称为论点，这样说没有什么新意。只是说需要注意系列性言论可能由简单发展到复杂，也可能不是这样。在这些体系中将会看到一种更为严格的结构，被称为理论。简单的信仰就这样用不同的方式集成成为信仰结构、信仰体系。每一个信仰体系又组装成为（在心理上）不同类别的更高级的体系。

信仰的最高层次是某一信仰单位把它所坚持的经验主义信仰融会贯通——包括一些相互矛盾的信仰——这就是这个人群的（或个人的）人种科学的整体。这里包括所有被认为是真实的或者可能是真实的关于外部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的信仰；关于自己或者人的信仰；关于技术的信仰——自己驾驭和影响世界的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种科学是一部百科全书。

一种新的信仰是怎样得以进入信仰体系的呢？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新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是它是怎样成为有效的思想，也就是说，给这种思想发一种社会执照，允许它获得信仰的身份，至少使它被接受为一种可以站得住脚的假设，“一种合理的思想”，其最高层次是被接受成为事实。在这一发放社会执照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明显的判断——我认为也是三种明显的程序。一种是关于兼容性的判断。第二种是关于可核实性的判断（经验主义的核实）。第三是关于一致性的判断（和价值的一致性）。可核实性在这里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学术界对此可能不以为然。

某一人群的所有信仰体系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互联系。有一些联系得很紧密：一种理论看来追随另一种理论。在通常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但是所有信仰体系与一个人群的另外所有信仰体系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关系。它们相互兼容。这就是说，它们在同一人种科学中和平共处：它们在认识上和文化上并不是不相一致。尽管各种信仰之间有时相互矛盾，从原则上来说，它们之间不可能没有关系：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某一信仰人群的所有信仰（或者个人的）都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人们经常地或者不经常地对它们之间的兼容性作出判断。典型的情况是，信仰体系互相加强：“如果P是真的，那么假设Q是真实的就是合理的。”或者“如果P是真的，那么Q是真的就是理所当然的。”这里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这是一种人种学的蓝图，信仰系统被判断为具有兼容性是重要的。关于兼容性的判断，这不

是一个简单的定义，不是断言说当一个人群坚持两种或三种信仰时只是把他们的信仰称为是“可容的”。可容性是重要的社会过程的结果。当一种新的候选思想出现时，这一过程尤其明显：当一种新的假设在一个信仰人群中被提出而且必须申请执照时，它必须通过的一个重要检验，就是它与现存信仰的兼容性。

在人种科学中，兼容性是所有理论关系和信仰关系中最为松散的一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兼容性是一个思想体系的裂隙之间必须建筑的一座桥梁。一种裂隙是明显的：它是知识的不完整。另一种间隙不太明显，但对本书的论点来说非常重要。理论之间的（和其他信仰）间隙的弥合不是通过论证。用一般语言来说，是用“这看来合理”来假设，一种理论可以支持另一种理论，或者用一种历史信仰解释另一种历史信仰。对这种“合理性”需要进行仔细观察，因为“合理性”是兼容关系的一种形式，它可以使非常荒谬的不合理的思想作为有根据的科学理论蒙混过关。

总的来说，用“合理性”弥补间隙有两种重要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可以代替明确的、辩护性的论证，掩盖不合理性。一种方法是用价值言词代替信仰言词；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探讨这一方法。另一种方法存在于信仰体系的内部，它用含蓄的言辞代替明确的论证。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清明确信仰和含蓄信仰。

明确信仰通常“非常明显，不需赘言”、“一看就明白”，“明显真实”，“当然如此”。这些信仰是一般性的信仰（和理论），在一般讨论中不常出现。关于明显信仰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它们不存在于人们的下意识中，或者故意隐蔽起来。人们对于一些信仰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思考，而且用口头把它们表达出来，而对另外一些信仰则不是这样。这是由一种并不令人惊奇的原因造成的。这些挂在口头上的信仰是明确的信仰，口头上不太讲的信仰

则是含蓄的信仰，二者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因为人们进行非正式的信仰交流。

但是，在正式的、书面的、出版发表的信仰阐述中，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含蓄的信仰很少见诸书面文字。如果说它们被印刷出来，它们出现的形式是明确的言论命题或者“公理”。在这里，含蓄的论点明确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但不是论证本身。很少存在着欺骗或者模糊行为。作者仅仅采取自以为然的态度，认为读者也相信这些明确的信仰，而且愿意接受这些没有证据支持的假设命题的“合理性”。作者和读者都赞扬同样的人种科学和同样的价值体系。

我们将会看到，明确信仰在文化传播主义的世界模式中是最薄弱的一环。在本书中，自始至终我们将会看到悬在半空中的文化传播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没有事实的支持，也没有证据。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就文化传播主义世界模式的大部分来说，根本看不到需要把这些思想联系在一起成为合理的系统的命题。换句话说，这些信仰很少是明确的和有根据的。而且即使这些少数信仰也没有能够连接在一起，因此这个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完整的。这个体系只有那些自以为然的人才认为是完整的。他们用明确信仰弥合理论的间隙。

所谓核实，就是看一个候选信仰是否符合事实。核实有各种方法，关于核实的性质有各种争论，但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些问题上。正常的核实是寻找证据来支持或者反驳新的假设及候补信仰。这一过程从来就不是完整的：每种文化和人群中的每个人不得不对经验主义信仰的某个部分的肯定（或否定）感到满意。对我们来说，核实的重要之点在于：核实从来就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把一项假设转变成为被接受的信仰。甚至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关于兼容性的判断比核实更为重要，这一点对社会科学家来

说是如此，对当地所有的其他人群来说也是如此。核实的部分工作本身就是判断兼容性。进行核实时使用的语言、程序、为了充分核实制定的标准，都来自现存的信仰，因此对一个候选信仰的检验只是部分地面对新的证据。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一点。对任何一个信仰人群来说，一个新的思想、新的候选信仰，对它的判断更多的是看它是否符合现存的信仰体系，而不是对它的直接含义的理解。

在自觉的学术研究中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长期以来，当现存的科学信仰面对新的假设的置疑时，这些信仰往往倾向于受到保护，而且这种保护行动经常是激烈的、尖锐的和教条式的。〔怀特黑德曾说过，科学家是“头号教条主义者。细节上的进展被承认，根本的创新被阻挡。”^⑧这一真理由托马斯·昆在以下与众不同的蓝图中推广开来，他把这一蓝图称为科学革命的理论：从实质上来说，重要的科学信仰取得了宗主权地位，它们的支持者在学术界的权力结构中占有地位，因此这些信仰被巩固下来，在长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当反驳这些信仰的证据已经大量地积累起来的时候。最终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一项“科学革命”推翻了现存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and 体系并且树立起另一种理论，这一理论反过来又在一段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⑨但是，昆的提法的框架（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关于物理科学的，因此他没有告诉我们在社会科学中信仰取得、保持、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包括历史和文化地理。〕在这些领域内，其过程具有根本的不同。就一个方面来说，具有影响的信仰之所以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们更直接地反映了上层人群的利益，脱离了学术信仰本身，而一种理论代替另一种理论则主要反映了这些外部的利益，而不是像昆所说的在学者人群内部的知识革命。其次，在这些理论中用新的证据攻击旧的理论更加困难，其部分原因是在这些理论中使用的科学方法通常是很不严格的。另一部

分原因是，收集证据的工作本身受到现存信仰的指导，有时由现存信仰决定。因此大的信仰结构如文化传播主义世世代代地被坚持下来，不受“科学革命”的干扰。

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这种倾向有时明显，有时不太明显。换句话说，信仰受价值观的影响，或者说，认识与评价相互作用，产生出托尔曼雄辩的所谓“信仰价值铸模”。^⑧最直截了当的（至少是最温和的）“价值”思想是倾向性的判断，关于好与坏的断言，关于正确与错误、喜欢的与不喜欢的、个人的和集体的断言。如同信仰一样，价值被集成为体系。但是，价值体系与经验主义信仰体系非常不同。概括起来说，后者断言某些关于世界的事务是真实的（或不真实的）；前者断言某些事务是人们喜爱的（或者不喜爱的），因此他们要求对信仰揭示的事物采取行动，约翰·杜威正确地把这些断言称为“议事日程”。^⑩从这个角度看，价值的领域不是自主的领域，不是透明的领域。价值领域是信仰与实践之间的过渡地带。价值即利益。

价值与信仰在信仰——价值的铸模中相互作用。一个信仰体系与一个价值体系在一定时间内（非常迅速的社会变革时期除外）倾向于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一贯性。我将把这两个体系之间的某种正常关系称为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双向的。与价值观念不一致的言论因而也是与某一人群的利益不一致的言论，一般不会成为有效的信仰。但是，价值的判断表明对未来事务的预见，如果一项判断要求采取的行动显然不能实行，如果这一行动在价值体系所描写的真实世界的性质中显然不能取得成功，这一判断早早晚晚会被人们拒绝。很明显，事情比这还要复杂得多，而且更加不可预见。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群的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体系必须从长远来看符合其价值体系，而且，如果有两个体系不一致，其中一个体系必将被迫进行变革，既然价值是具体世俗利益的表述，在一般情况下信仰体系将倾向于向价值体系靠拢，向物

质利益靠拢，而不是相反。

关于价值一致性的判断是把信仰与文化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重要部分。信仰与文化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人们熟悉的一个概念，但是关于这一命题完全适用于学者的信仰体系的思想实际上并不被人们接受，这一点只有在最普通的和抽象的方面才被人们接受。因此就某一种意义来说，在通常情况下不允许对一个具体的学者的价值观（或利益观）是怎样影响他的/她的经验主义言论的方式进行分析。因此对于一个更加有力的命题甚至很少给予考虑，社会科学中的所有新的思想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它们是否与价值观念一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与社会的上层价值体系一致——这一体系不一定是学者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一验证的过程一般并且经常导致人们承认并坚持实际上不科学的思想。人们很少考虑这一问题，尽管这在人种科学中是一种平常的主张（至少，一般当应用于当地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时候）。

但是，还有一个更加有力的命题，我将在本书用具体的立论和证据来捍卫这一命题：这个命题是，我们关于世界范围的模式，以及我们许多具体的理论和事实上的真理，被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有时是惟一的原因——是由于它们与欧洲上层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这一情况自 19 世纪初期以来就是如此，今天也还是这样。其中许多可以展示的虚假信仰已经被构造在文化传播主义的世界模式中，这是由于文化传播主义是用来解释欧洲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行动和利益的学说并使这一学说合理化的中心知识学说。

一致性实际上是有效化的重要部分。在通常情况下，这不是一个“权势集团”压制自由言论的问题（尽管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关于一致性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连接过程。在所有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人群（一个阶级或者人种阶级）都有一系列相当具体的利益，其中一些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相冲突，但是都倾向于

保持上层人群的权利和地位。由于这一人群握有奖励、惩罚和控制的权力，他们得以说服多数人，包括多数学者，使他们相信这一人群的利益是每个人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议程，把“应该”这个词加上并把它们变成价值观，这是一个简单的改造过程。静止地来看，利益总是清楚的，从利益中生成的价值观被连接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或多或少地反映出这些利益。因此，我们在所有时候，都处在某种价值环境中，这一环境笼罩或者影响着不断进行的学术界的有效化过程。

在当今社会中，施加这一影响的方法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在上一个世纪则是相当简单而透明的，那时文化传播主义的重要轮廓和与殖民主义相关的信仰被包括在内。那时，不仅如马克思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几乎只有统治阶级及其下属人员才有机会把这些思想变成有效思想，他们采用出版、在有影响的学校和大学中讲演、参加制定和执行政策来施加影响。那时在那些地方，一致性是通过社会审查过程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坚持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的人才有可能提出作为候选信仰的假设。我不认为那时的过程与今天的过程完全不同，但是如果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将使我们离开主题。在这里，我们仅仅看一下大多数教授的背景（他们中很少有人是贫苦家庭或者少数民族家庭的后代），让我们看看大学里和咨询机构的奖励制度结构以及其他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专业社会科学家提出不具有一致性的信仰作为候选信仰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一致性，尽管人们非常严谨地遵循科学方法和学术标准。

总的来说，有效化的过程需要使候选信仰经过三项检验：兼容性、核实性和价值一致性。在这三项检验中，也许只有一致性是重要的（并且只有在相对平静的时期）。有时可以避开核实，

这时提出的假设需要与利益一致，而且与现存的信仰可以很好地兼容，不管这些假设是明确的理论还是含蓄的信仰，是作为发表的或者没有发表的假设。在任何情况下，在社会科学中进行有目的的核实是相当困难的（这是一个方法上的问题，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认识论上的问题）。在这些领域中，人们总是提供关于兼容性的判断——如果不是就候选信仰而言，也是关于提出这一思想的人——一个新的假设或者理论，如果与已经被接受的信仰的整体相矛盾，它作为信仰被接受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当社会及其上层阶层对他们面临的紧迫问题需要提供答案时，这种新的假说总是能够被接受。因此存在着一股重要的反潮流。表现出新意的新的假设如果有可能解决已经被承认的问题，会受到鼓励，实际上会受到奖励。它们必须具有兼容性，但不是完全兼容。

一位学者，一旦进入他的专业，就没有办法防止一致性的价值进入他的著作。尽管他们几乎都是诚实的、认真的和合格的。我的这一理论表面看来像是对学术界的攻击。情况不是这样。这是由于人们总是把这一观点与明确的信仰和有意识地坚持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结果。研究人类社会的领域时，存在着大量的含蓄信仰，明确的理论注入很少。科学方法使我们不能由于某种理论是明确理论而接受它。每一项理论的主要依据是它与体系中的其他信仰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作为“合理性”表达出来。由于“合理”而接受某些假设（反映一定的明确的信仰）而不接受另外一些假设。一种理论看来“是合理的”，或者可行的，是由于它与其他利益相兼容，与被接受的理论相兼容，尽管没有明确的联系环节：理论链条中的大多数环节被埋葬在明确信仰的领域中。最后，用某些观察而不是另外一些观察来检验一项假设看来是“合理的”。

需要补充说明，社会科学家的严谨工作通常使他们在价

值一致性的基础上无意识地使一项假设有效化。严重的问题是，如果认为我们的明确信仰不是由于价值一致性才使之有效的，我们就使价值的一致性控制了我们的含蓄信仰。这就在明确理论之间的间隙上提供了一座桥梁，使他们具有兼容性，为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新的明确理论提供了起点。科学和学术方法只对明确理论要求严谨。

（二）作为信仰体系的文化传播主义

我们的讨论到此为止都是为理解文化传播主义信仰体系的三个方面打下一个基础：它的结构，它与一定社会的一定人群的关系，它的演变。最后一点包括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传播主义为什么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被坚持下来。如果我们说文化传播主义是作为适合于一个强大的长久存在的欧洲利益而形成的信仰体系，这种说法不会是过于简单化：殖民主义。从1492年到现在，从欧洲以外地区吸收到欧洲——在我们的讨论中是指大欧洲——的财富是欧洲上层阶级的重要营养：维持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发展。这一说法是否能够概括为包括欧洲社会的所有阶级，是否在大多数时期和地点能够说殖民主义也是欧洲非上层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是说①欧洲的上层阶级依赖殖民主义；②欧洲上层阶级在欧洲思想的演变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欧洲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③欧洲的上层阶级在形成一个一致信仰体系存在着永久性的社会利益，这个思想体系将使殖民事业合理化，为它辩护，而且最重要的是帮助它发展。随着殖民事业的演变和变化，构成文化传播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发生变化。

本书的大部分篇幅用来描述和批判文化传播主义信仰，因此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去研究信仰体系的性质。我只要提到下列一点就够了，这一学说涉及所有方面的事实，从世界地理、世界历史

到人类个人性质的思想，包括欧洲人和欧洲以外的人，涉及到某些局部事件的描述和解释。文化传播主义信仰的结构涉及到相当分量的欧洲人种科学。也就是说，欧洲人种科学中的相当一部分取得了信仰执照的言论被用于文化传播主义信仰的结构，尽管这些言论也被用在其他结构中。（在第二章讨论的某些例子中有：关于人口行为的信仰，关于智力，关于文明的起源，关于热带土壤的肥沃性。）这些言论从一般的带有证据性的事实，到复杂详细的理论，有正式的言论也有非正式的言论。它们进入文化传播主义的信条，是通过我们上面讨论的关于信仰被接受的全部领取执照的过程。长期以来，所有这些言论都通过了是否与殖民主义价值和利益相一致的甄别过程，或者通过了间接的甄别过程，这一过程使它们具有了兼容性的地位，以便与其他具有一致性的信仰相兼容。长期以来，这一信仰体系生成新的文化传播主义信仰，摒弃那些与信条相矛盾或者与发生了变化的世界无关的信仰。既然殖民主义作为上层阶级的利益采取各种新的形式如新殖民主义，既然含蓄的信仰不被人们注意，不被批评，因此今天仍在继续增添、撤除和修改文化传播主义信仰。如果不是这样，关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上的大量信仰，也就是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信仰，将会在很早以前就被摒弃了。

文化传播主义信仰在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包括了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它倾向于成为一个具有严谨结构的理论，这正如我们在本章的前面所看到的那样。简而言之，这一理论描述基本进程发生在“内层”，主要是欧洲，这里是世界的核心；它们描述了在“外层”发生的进程，主要是在欧洲以外的部分；它描述了两部分相互作用的模式，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具有创造力的思想、人员和商品从内层向外层传播。

我们不妨把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时间空间理论称为“文化传播主义世界模式”。它是殖民者的模式。

在这里我们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设想的非文化传播主义世界模式是什么样子呢？在这个世界中，在其中一部分地区发生的进程也将在其他部分发生。从本质上来说，这一模式的原动力是人们具有相同的能力的概念——心理上的同一性——包括在一切文化中、一切地区中。这一理论要求，有关文化演变的任何不平等的说法，更具体地说在经济发展中的演变，应该得到解释。换句话说：平等是正常的，不平等需要给予解释。文化传播主义相反，它预期世界的内层和外层具有基本的不平等性。其一致性的原则是非一致性；这就是它的人类平等原则。

在比世界小的时空范围内，文化传播主义信仰体系则非常散乱，它的一部分凝聚成正式的雄辩的理论，另一部分作为可以兼容的但是联系不紧密的信仰言论流传于世。本书的篇幅不足以对文化传播主义模式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层次和体系进行描述，不足以描述这个世界模式的上上下下和各个层次的时空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开一个头。

六、注 释

①“欧洲”这个词在本书中系指欧洲大陆和欧洲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如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区。

②对 150 年来世界历史教科书的快速浏览当然是非常粗略的、走马观花式的。进一步的讨论可能是有用的。大约在 1850 年（先后相差 10 年左右），在这第一个时期的教科书中，人类起源的故乡直截了当地被说成是伊甸园，不同的教科书的作者把它的位置放在西部亚洲的不同地区。例如：从卡安以东到美索不达米亚附近；(Robbins, *The World Displayed in its History and Geography*, 1832, p.13)；在“健康”山即里海和克什米尔和西藏之间 (Muller,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o 1783*, 1842, pp.27,

43~44); 也许靠近地中海地区的边界 (Tytler,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Creatio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1, 1844, p.17); 在克什米尔谷地 (Willard, *Universal History in Perspective*, 1845, p.34); 在高加索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某个地方 (Keightley, *Outlines of History*, 1849); 在喜马拉雅山 (Weber, *Outlines of Universal History*, 1853, p.6); 在亚美尼亚 (Collier, *Outlines of General History*, 1868)。看来在高加索山附近有一个伊甸园中间地带, 而且它恰巧是人们认为的“高加索族”发源地。诺亚当然在亚美尼亚亚拉腊特山开始了大洪水发生后的历史 (同样大约是在高加索地区)。诺亚被认为移民到欧洲 (Whelpley, *A Compound of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ol.1, 1844, p.10), 或者美索不达米亚 (Robbins, 1832, p.20), 或者巴勒斯坦, 或者圣经地带的其他地区。诺亚的三个儿子被认为是离散了, 而且奠定了人类分支的基础, 这也就是第一次大的传播过程。在大多数教科书中, 这个时期的历史倾向于向西移动; 有的教科书表述了黑格尔的概念, 历史将不可避免地向西移动, 跟着太阳走, 其含义是在更加遥远的西方的美国将作为世界文明更大的下一个中心取代欧洲。

在这个时期人们广泛地相信, 非白种人并不真正是人或完全的人。这种理论的一个版本是“多源发生论”的概念, 声称上帝在伊甸园创造了真正的人, 其他种族的人至少“黑色人种”是在其他地方和时间创造的。这一理论对《旧约全书》(每个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 的标准说法提出了疑问, 因此在我参考的书中这一点并不是作为一条真理来表述, 这就不足为奇了。(然而, 我没有对南北战争前南部使用的教科书进行审视, 而且多源发生论的理论在奴隶制地区特别流行, 被用来作为把黑人当作物品对待而不是当人对待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但是多元发生论是重要的, 需要提及然后加以批判——以提倡这样的观点, 即所有的人

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在一些教科书中，直到本世纪的末期（例如，见 Dew, *A Digest of the Laws, Customs, Manner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 1853; Fisher, *Outlines of Universal History*, 1885; Duruy and Grosvenor,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 1901）。但是，并不需要多元发生论：在我审视过的教课书中，认为非白种人比白种人低劣的观点都以不同的形式提出。“退化”论与多元发生论起了同样的作用。它的概念是，哈姆的后裔，还有《圣经》上所说的其他人们，从圣经地带移走，向东、向南走去，他们的文明发生了退化，走向野蛮，甚至比这更加低下，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或者是因为他们移民到低劣的环境中去，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例如，见 Keightley, 1849, pp.5~6：“野蛮是从文明生活的退化”，而且，非洲人近似猿人。）一些教科书提出了退化，但是在多数教科书中，他们只是说白人优越而不加以解释。世界的历史，一般是白种人的历史，或者是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的历史（见以下）。关于罗马帝国以后的时期，欧洲以外的地区很少给予讨论，除了作为十字军远征的背景进行讨论，或者作为殖民帝国建立的背景等等。（见 Harris,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968，是对多元发生论和退化论的很好讨论。）

1900年（为数不多的几年）左右，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接受关于地球的年龄的新的科学理论和生物进化论的事实（尽管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然而，《圣经》里关于人类历史的叙述仍然保留在许多书籍中，尽管接受过去的《旧约全书》描述的标准历史（例如，世界上的事物在公元前4004年才开始发生）的书少了。这个时期的图书倾向于描述所谓的“雅利安理论”，这一理论是从哲学引申出来的，但是被引伸成为文化历史的理论。早期的哲学家们已经分辨出一种“雅利安”或者印欧语系，还有一种“闪米特”语系（许多权威，包括教科书的作者，分别确认了诺

亚的儿子杰非斯和谢姆)。白色人种包括以下两种人，雅利安人的一个分支被认为是（从所谓的“雅利安中心地带”，在高加索的西南和西北的某个地方）向西移动进入欧洲。这些人富有进取心和活力，他们从闪米特人那里获取了基督教教义后创立了物质文明，他们创造了最早的野蛮文明和单一神论，但是后来停滞不前，进入富有梦幻的、没落的、不思进取的文化，而且从那以后不再推动文化的发展。除了这两种文明外，其他文化与历史没有什么关系。（按照 Freeman, *General Sketch of History*, 1872, p.2, 的说法，历史“从最高的和最真实的意义来说就是欧洲雅利安民族的历史”；同时见 Collier, 1868; Swinton,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1874; Gilman, *First Steps in General History*, 1874; Anderson, *New Manual of General History*, 1882; Steele and Steele, *A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Peoples*, 1883; Fisher, 1896; Quackenbos, *Illustrated School History of the World*, 1889; Thalheimer, *Outline of General History for the Use of Schools*, 1883; Sanderson,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Year 1898*; Duruy and Grosvenor, 1901. Ploetz and Tillinghast 在 *Epitome of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中提出这一理论。该书于 1883 年首次出版，此后直到 1925 年出版过许多版本，在由 H.E.Barnes 编辑的版本中这一理论最终被消除。见 Bernal's *Black Athena* 1987, 1991), 该书对雅利安理论和有关欧洲思想史课题进行了颇有见解的讨论。

由于《旧约全书》谈到农业——凯恩懂得农业，而且亚伯拉罕有成群的家畜——历史教科书倾向于不去讨论直到 19 世纪晚期农业是在什么地方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这个时期是科学开始研究这一问题的时期。一些科学家和一些教科书作者开始猜测，欧洲大陆的农业可能像西部亚洲和埃及的农业一样古老。（从科

学的观点出发，见 Joly, *Man Before Metals*, 1897。)但是关于农业起源于圣经地带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尽管现在（大多数人）把它看作是一项发明，而不是创世时的造物。关于人种学的事实，即一些部落民族（例如在澳大利亚）没有从事农业，一般在 19 世纪早期的教科书中用退化论来解释：他们的祖先由于某种原因使这种艺术失传了。在那个世纪的晚期，他们更多地使用文化传播主义的概念，农业是由西部亚洲或者（可以想象到）欧洲人发明的，而在现代他们还没有学会，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处境孤立或者是由于他们太愚蠢，学不会。

东方大道是有名的通道，是西部欧洲和西部亚洲之间的通道。尽管在不同时代使用了不同的路线，但基本路线是从伊斯坦布尔，通过希腊到意大利或者奥地利的北部，然后到法国，而且（通过奥斯坦德）到英格兰。大多数教科书把世界历史写成似乎是向西北方向发展，很像是通向西部的东方大道，这中间（好比说）有亚典站、罗马站、巴黎站和伦敦站。（见第二章关于东方大道模式的进一步讨论。）

③在 19 世纪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对于土耳其给予了一定注意，这是由于它参与了欧洲的政治事务。世界地理与世界历史不同，它总是涵盖整个世界，教科书以及多卷的描述性的地理（如 Reclus's classic 19-volume *Nouvelle Geographie Universelle*, published between 1876 and 1894）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给予了相当多的注意。然而，我们不应该被误导。在这整个时期地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教导欧洲的孩子，他们需要知道欧洲以外的地区，这是为了参与他们的国家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帝国的和商业的活动。[见 Hudson, *The New Geography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1870~1918* (1977) and McKay, "Colonialism in the French Geographical Movement" (1043).] 这两部著作论述了地理与殖民活动的密切关系。

④如果我们看一看两本现代大学水平的教科书，这种新的观点的性质就能够看清了，一本是芝加哥大学的 W.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3rd ed., 1979)，另一本是牛津大学的 J.M. Roberts (*The Hutchinson History of the World*, 2d ed., 1987；该著作是作为企鹅出版社世界历史丛书出版的。) 关于公元前时期的世界历史，在这两本书中提到的地名有 3/4 以上在欧洲和中东（包括北部非洲）；不足 1/4 的地名是在世界的其他部分，1% 在非洲。到公元 1491 年，这两本书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分流。在罗伯茨的书中，欧洲和中东地名约占提到的地名的 85%。在麦克尼尔的书中，欧洲和中东的地名占提到地名的 60%，这与老的传统大不相同，尽管这与这个地区的面积和人口仍然不成比例。（次撒哈拉非洲的地名只占公元 1~1491 时期提到地名的 2%。）

因此，在这两本书中，我所说的“大欧洲”地区不像在 1492 年之前老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中那么突出了。这两本书的表述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传统的视角。罗伯茨几乎没有讲述 1492 年之前除欧洲和中东（包括北非）以外的地区起到什么原动作用。麦克尼尔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东亚和南亚的一些地区给予了相当大分量，但是在 1492 年之前几乎所有的创造历史的力量都来自欧洲、西亚和北非。（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鼠疫，按照麦克尼尔的说法是从亚洲较远的地区向西蔓延到这些地区的。关于这个问题，见 McNeill's *Plagues and Peoples*, 1976.）本书第二章提供了这两本书的作者提供的欧洲中心主义解释的例子。

然而，仅仅观察明确地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当今教科书是不够的。在大学的世界历史课程中，经常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冠有“西方文明史”的标题。（见 Lerner, et al.,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1988; Kagan, et al., *The Western Heritage*, 1987; Chambers, et al., *The Western*

Experience, 1987.) 如果说这种教科书忽略了西方以外的世界, 不要抱怨这些书在误导: 标题已明确地表明“西方”, 而不是“世界”。但是如果课程设计为“世界历史”, 而教科书设计为“西方历史”, 那就有问题了。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就是世界历史教学是经过伪装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我不知道有谁曾经做过研究去检验以下的假设: a. 假设今天的历史学家敏感地感到在世界历史教学中需要避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向, 他们中的某些人是否仅简单地把标题改成为“西方”从而使欧洲中心主义合法? b. 现在是否存在一种倾向, 不教“世界”历史而是教“西方”(等等)历史, 而这种倾向反映了今天对非人种中心主义和“公平”的要求的反动(或调整)?

⑤一本教科书的确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件, 是一种现代的石碑。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一本书被接受为高级中学(或者更低水平)的教科书, 它经过了出版社、校董会、行政管理人员的严格审查, 所有这些人都是很敏感地注意其内容需要符合已被接受的主张; 他们需要肯定, 孩子们读到的教科书中叙述的事实是制造舆论的文化精英们能够接受的事实。这样编纂的教科书不再是一般作者的著作, 而是社会既得利益者认为有效和能够向他们的孩子灌输的言论。因此, 对于教科书的研究(包括大学教科书, 也经过同样的过程, 不过更加微妙)实际上是人种地理学研究。它告诉我们的是制造舆论的文化精英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仰体系。因此, 美国地理教科书实际上是人种地理学文件。同样, 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是人种历史学文件。教科书可能与文化产品和古代的陶瓷片、雕刻文字同样有用。见本章的最后部分。

⑥持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这一论点, 因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阶级斗争是历史演变的核心力量。

⑦有时承认中国人早些时候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封建主义, 但是大多数欧洲学者, 包括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 认为欧洲封建

主义在代表一种重要的、本质的、通向现代化桥梁的社会形式方面是独特的（见第三章）。

⑧为了对这一概念进行很好的讨论 [见 Samir Amin 's Eurocentrism (1988)], “欧洲中心主义”这个词很明显地是在近期造出来的, 把“欧洲、人种中心主义”合并成一个词。然而, 我(如同阿明一样)并不认为欧洲中心主义仅仅是人种中心主义的一个类种, 下面的段落将会表明这一点。

⑨我使用“群体”这个词系指任何社会单位、任何规模。在当前的讨论中, 为了简便起见, “群体”被认为是散落在农村地区的村庄。我在这里忽略掉一种情况, 这就是由于一种独立的发明和传播事件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革。[见我的“Two Views of Diffusion”(1977)和“Diffusionism: A Uniformitarian Critique”(1987a)]

⑩见 Jett,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Geography of the Blowgu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ransoceanic Contact”(1991): 还见 Carter, *Man and the Land* (1968), and Edmonson, “Neolithic Diffusion Rates”(1961)。

⑪例如, 见 Eliot Smith, *The Diffusion of Culture* (1933), Perry, *The Primordial Ocean* (1935), and Taylor, *Environment and Nation* (1945)。埃利奥特·史密斯直言不讳, 古代的传播过程主要是从埃及和菲尼西亚传播开来, “继续进行了许多世纪, 到达美洲的太平洋海岸, 在那里导致了出色的哥伦比亚时期之前的文明”(引自 Zwernemann, *Culture History and African Anthropology*, 1983, p.15)。

⑫关于这些问题, 见 Harris,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968) and Steward,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1955)。

⑬见 Koepping, *Adolf Bastian and the Psychic Unity of*

Mankind (1983), Stocking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1968), and Harris,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968).

⑭反对文化扩散主义的阵营经常被称为“文化进化论者”阵营，而且这场辩论总的被称为“扩散还是进化”。但是，正如我在这里论述的，进化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扩散主义者，而且文化扩散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进化论者。而且，我在这本书中使用“文化进化”这个词还有更广的含义，但又较少引起争论的含义，只是为了表明为历史和文化变革等更大的问题寻求解释。当我们广而言之问一个“为什么”时，一个“历史的”问题成了一个“文化进化”问题。当然，一些学者对“文化进化”这种用法感到不舒服。对一些人来说，它带有经济决定论的包袱，或者环境决定论的包袱，或者技术决定论的包袱，或者说它表明了一种一成不变的文化阶段，而且所有的人类种族集团都要经过这些阶段——但是我丝毫没有这种意思。大多数文化地理学家使用“文化演化”时的含义也大约是我所使用的含义。

⑮两种形式有时结合在一起；例如，在19世纪，欧洲西北部被（被欧洲西北部的人）看作是绝对地文明化了，非洲绝对没有文明化，而且所有其他地区（东半球）处于中间状况。这些问题将在本书后边加以讨论。

⑯马克斯·韦伯的“欧洲理性”概念将在第二章讨论。

⑰关于中国以及印度具有半理智，或者有时有理智，有时在某些方面又没有理智等不同的概念，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

⑱“妖怪人”系指布吉人，是一种马来人，与欧洲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因此被戴上了这个帽子。杜撰的最有名的吸血鬼是德拉库拉公爵，他从外地（在土耳其帝国边境的一个野蛮山区）来到英格兰。

⑲关于欧洲思想发展史，见 G.H.Mead, Movements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36), Toulmin and Good-

field, *The Discovery of Time* (1965), Nisbet,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1980), and Bowler, *The Invention of Progress* (1989)。的确, 把关于进步的思想作为正常条件受到 19 世纪一些思想家的怀疑(特别是反对生物进化论的思想), 但这是一种次要的、而且是有间断性的反潮流。见 Stocking,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1987) and Bowler, *The Invention of Progress* (1989)。

②见 Huddleston,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European Concepts, 1492 ~ 1729* (1967), Williams, *The American Indian in Western Legal Thought* (1990); Hulme, *Colonial Encounters: Europe and the Native Caribbean 1492 ~ 1797* (1992); Gossett,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1963)。

③有时候有人提出, 这些文明由于某种原因是在上古时代演化出来的, 而且在大洪水期间没有被消灭掉(例如, 见 Keightley, *Outlines of History*, 1849)。Haskel (*Chronology and Universal History*, 1848, p.9) 推测说, 诺亚移民到中国, 他和他的后代建立了中国的王朝。“东方早期的发展和稠密的人口看来支持这一思想。”

④从 19 世纪起, 也许更早一些, 关于超自然的力量或者鬼怪方面的文献倾向于把它们的起源说是欧洲以外的地方, 关于巫婆、鬼魅、蟒神、会走路的木乃伊、魔法(“魔术”)、超自然力量的造物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作为一种反向传播流传到欧洲的, 是对欧洲扩张主义的一种回流。见 Brantlinger, *Rule of Darknes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mperialism* (1988)。

⑤见 W.A.Lewis, ed., *Tropical development, 1880 ~ 1913* (1970)。

⑥见 Bowler, *The Invention of Progress* (1989), 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1987), Mandelbaum, *History, Man and*

Reason (1971) .

② Spencer,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1969) . 关于 19 世纪历史发展的个人主义的和本体论理论的相互复杂作用, 在 G.H.Mead, *Movements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36) 和 Mandelbaum, *History, Man and Reason* (1971) 中进行了讨论。我试图在 Blaut, *The National Question: Decolonizing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1987) 中说明关于国籍和国家演变的大多数理论是怎样从这些思想潮流中出现的, 其中一股潮流基本上是康德的而且是心理的, 另外一种则是浪漫的, 而且是黑格尔的。

③ 在他们中间有: Malthus, J.S.Mill, T.Macauley, 和 Thackeray. 见 Brantlinger, *Rule of Darknes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mperialism, 1830 ~ 1914* (1987) . 还见 Williams, *British Historians and the West Indies* (1966) and Said, *Orientalism* (1979) .

④ 见 Thapar, *Ancient Indian Social History: Some Interpretations* (1978) and “Ideolog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Indian History” (1982), and B.Chandra, “Karl Marx, His Theories of Asian Societies, and Colonial Rule” (1981) . 我们在第二章还将讨论。

⑤ 特别见马克思的文章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1979)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晚期著作中对殖民主义采取了更多的否定意见,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殖民地不发达思想: 为了讨论, 见 Blaut, *The National Question: Decolonizing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1987)。

⑥ 见第二章。

⑦ 见 Asa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1975), 和 Temu and Swai, *Historians and Africanist History*

(1981)。

③重要的例子有 Eliot Smith *The Diffusion of Culture* (1933), Perry, *The Primordial Ocean* (1935), Schmidt, *The Culture Historical Method of Ethnology* (1939), Griffith Taylor, *Environment and Nation* (1945)。见 critiques in Radin, *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Ethnology* (1965), Lowie, *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 (1937), and Harris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968)。

④在这里我当然对欧洲学者通常所持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殖民地的土地是自愿交出来的。前殖民地的学者几乎都拒绝这一观点。对于少数小的岛屿来说，可以想象有这种情况，那里的利润不再流向殖民国家，但即便是这样的例子也是有争论的。值得注意的是，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没有给它所拥有的殖民地任何独立；甚至没有正式承认充分自治（包括独立）的权利，如波多黎各、美属维尔京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等。可以想象其他殖民国家也采取了同一立场，如果在要求独立的力量面前他们有能力做到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荷兰的东印度群岛，法国的印度支那、肯尼亚、安哥拉、莫桑比克等等，殖民者试图用武装力量维护他们的占有，但他们失败了。我的观点在 Blaut,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87), chap.4, and Blaut and Figueroa, *Aspectos de la cuestion nacional en Puerto Rico* (1988) 中得到了表达。

⑤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在波多黎各进行的“靴襻行动”，在英帝国的殖民地进行的开发和福利计划的某些部分，对殖民农业和卫生部门的资金的增加，在殖民地建立的大学等等。这些计划，不管它们的隐蔽的政治目的（对技术人员是隐蔽的）是什么，从总体上看是非常可观的。

⑥这一工作经常是殖民技术工作的直接继续，经常是同一批

人员，现在是“外国顾问”或者“联合国专家”，而不是“殖民技术官员”。

⑤因此有了进步联盟、和平队、美洲国家组织的技术和金融机构增加的资金等等。

⑥关于人种科学，例如，见 Conklin, “Lexicographical Treatment of Folk Taxonomies” (1969), Frake, “The Ethnographic Study of Cognitive Systems” (1969), Blaut, *Some Principles of Ethnogeography* (1978) and Spradley and McCurdy, *Anthropology: A Cultural Perspective* (1975)。以我之见，“历史”和“科学”的范畴在本体论上不能分清，尽管历史地理学很难说是一门严格的科学。

⑦Whitehead, *Science and Philosophy* (1948), p.129.

⑧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70)。关系更为密切的是 Fleck'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1979)。

⑨Tolman, “A Psychological Model” (1951) .

⑩Dewey, “The Logic of Judgements of Practice,” in his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1916) .

第二章 欧洲奇迹的神话

大部分欧洲历史学者相信某种形式的“欧洲奇迹”理论。这一理论争辩说，早在久远的历史年代，欧洲就走在其他文明的前面——在史前、在古代或者在中世纪时期——认为这种内部产生的历史优越性或者先行性对 1492 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和地理作出了说明：欧洲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世界的征服。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看到什么奇迹，他们只是看到，“欧洲奇迹”这一词语到 1980 年代成了所谓欧洲在 1492 年之前独特兴起的整个理论家族的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语。这个词儿所以变得家喻户晓主要是由于埃里克·琼斯于 1981 年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欧洲奇迹》。^①

至于这一奇迹发生的原因，历史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欧洲以这样奇迹般的方法走在其他人的前面，这是否是由于欧洲人具有遗传上的优越性？他们的文化是不是优越？他们是不是生活在一种优越的环境中？这是不是说由于某种美好的事物在欧洲发生，或者是在某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在欧洲人中发生，从而使欧洲人比其他社会的人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条件？

关于欧洲奇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历史学家也有不同的意见。欧洲奇迹是否发生在史前时代的所谓“雅利安”或者“印——欧”文化？还是发生在史前较晚的“欧

洲的‘铁器时代’”？是不是发生在希腊？发生在罗马？发生在中世纪的早期？发生在中世纪的晚期？是不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发生的——一系列的奇迹——每次都使欧洲人比其他人群更加先进？

历史学家辩论这类问题，辩论“为什么”和“什么时候”等问题，但从不辩论“是否”——是否曾经发生过这种奇迹。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从不考虑直到 1492 年之前，不存在欧洲文化超过其他文化的可能性，欧洲文化的发生不是出于欧洲人心灵上的优越，文化上的优越或者欧洲的环境，而是由于对殖民地的征服和剥削而获得的财富和赃物，是来自对美洲以及后来的非洲和亚洲的剥削。他们根本不辩论这种可能性，他们甚至不讨论这一问题，尽管有少数历史学者（比较明显的有雅内·阿布-路德、萨米尔·阿明、安德列·甘德·弗兰克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年来接近于讨论这一问题。^③

我在本章和第三章（“1492 年之前”）的任务在于说明，欧洲人在 1492 年之前在任何时候都不比非欧洲人优越：欧洲人不比他们更先进、更现代化、更进步。然后我将在第四章（“1492 年之后”）表明，来自殖民地的财富如何使欧洲崛起，最终使欧洲在全世界占据霸主地位。我还要表明，欧洲内部的特点不能解释 1492 年前——也就是说，不能解释殖民主义的起源。

有两种办法可以论证欧洲奇迹的神话是错误的，论证欧洲在 1492 年之前没有超过世界上其他文明。最好的办法是看一看历史事实，从而表明，欧洲在中世纪和中世纪之前的演变过程，就其速度和发展方向来说，基本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演变过程雷同。我将在第三章准确地表明这一点，对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世纪地理地貌进行比较，表明在 1492 年之前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东半球的许多地方也在发生。

但是关于欧洲独特的“崛起”、它的“奇迹”，在欧洲历史学

思想界是根深蒂固的，用事实进行一般的辩论也许说服力不大。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受到一代又一代历史学者的维护，几乎没有不同的论点；这种思想还得到许多其他思想的支持，这些思想在欧洲文化中没有疑问地被人们接受；这种思想符合并且支持欧洲国家的利益（和公司的），符合他们在与非欧洲世界打交道时的利益。由于这些原因，我决定采用另外一种论证形式——以表明占主导地位理论的谬误——我这样做是为进行经验主义的论证打下某种基础。

我在本章中将研究当今历史学提出的用于支持欧洲奇迹理论的最普通的论点，并且表明这些论点没有说服力。这一任务对一本篇幅不大的书来说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因为当前流行着许多有关的论证，而且有大批的历史学家就这个题目写了书或者文章，他们支持欧洲奇迹的理论。那么，我从哪里入手呢？我将分阶段进行。首先，我将讨论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论证欧洲奇迹时所使用的方法，我将表明一种具有批判性的、修正性的观点是如何开始发生的。然后我将提出一种菜单，或者说分类，或者说是一个名单，列出今天提出的支持欧洲奇迹论的最重要的论点，我将逐一表明各个论点实际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在第3节，我将概括提出批判欧洲“奇迹”立场的经验主义论据，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第三章和第四章的题目）：提出证据表明欧洲在1492年之前并没有走在非洲和亚洲（就大陆规模来说）之前，我还提出证据表明，1492年之后的殖民主义使欧洲单独崛起。

一、神话的制造者和批判者

我们在第一章看到，欧洲在1492年之前比其他文明都更加先进、更加进步的思想是古典欧洲中心文化传播主义的中心思想。因此，我们不需要考虑欧洲奇迹理论的起源：它是从早先的

时代继承下来的。然而，这一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采取了一种明显的现代化的形式。首先，种族主义的论点遭到断然拒绝：不再论证非欧洲人从遗传学上来说劣于欧洲人，不再论证这一劣势说明了他们在历史上落后的原因。这时历史学家一般承认，欧洲在历史上的优势反映了早期的事实和实践。欧洲的优越性是由于欧洲人较早地达到了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所有的其他人可以希望在未来达到的阶段：因此这是一个先行性问题，不是内在的优越性问题。其次，1945年以后，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其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用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其中有一部分学术研究是由政府或者基金会支持的“国外地区研究项目”，这种学术研究为西方的非西方历史提供了大量知识。这种新的知识被相当快地进行了非常有限的使用：有一些离奇的寓言被摒弃，但是关于非西方世界以外的思想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战后世界接受了一种最重要的新理论即“现代化”。按照这一理论，欧洲思想、事务和影响的传播将在未来的发展世纪中给非西方世界带来经济发展。这一理论对历史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历史上的现代化

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与当前和将来都有关系，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历史问题。它的基本原则思想是，过去使欧洲具有优越性的因素现在可以传播出去，传播到欧洲世界以外，使那个世界或多或少地赶上来。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这一学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非殖民化阶段，第二个阶段——加强传播力度阶段——发生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兴起之后，特别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

作为这一学术活动的进程，一大批历史学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它们的中心目的在于表明，欧洲发展模式，包括特别

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过去一直是惟一的、人类自然进步的模式，其中的许多著作相当明确地得出这样的意识形态结论，第三世界未来发展的正常的自然的道路将是追随欧洲的这一自然模式（当然不是奴隶式的）。这些著作中最具影响的是1960年出版的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宣言。这本书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断言，欧洲过去的发展公式，到资本主义阶段并包括资本主义阶段，是非欧洲未来发展的惟一的可行公式。罗斯托用单一的文化传播主义论点把世界历史和世界发展结合在一起。^③

但是有一个问题。准确地说是是什么因素使欧洲单独崛起呢？现在我们必须暂时地回到经典文化传播主义时期。上一个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一致（我认为）接受理所当然的欧洲独特进步性这一思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支持这一进程的基本力量从来没有提出过疑问：他们有的借助于宗教信仰，有的借助于形而上学思想（如黑格尔的循环“精神”），有的借助于史密斯式的或者功利主义的个人行为 and 目的的思想，也有的借助于自然环境或者人口行为，或者阶级斗争，或者其他因素。但是我认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怀有关于进步力量的一种共同的概念，一种像太阳风一样的具有基本方向的新力量，而与此有关的部分事实（经济的、心理的、环境的等等）只不过是副现象或者是表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套相当不同的基本信仰成为准则。这时解释欧洲崛起的问题被看做是一个整体性问题。也就是说，所有的现象包括其最基本的动力，要求进行解释，或换句话说，需要放入一个明确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找到明确的变数和“因素”。没有疑问，这一新的——或者说相当新的、流行的——思路的出现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学专业本身的成熟；人们不再相信（在这一动荡的时代）某种必然的进步；欧洲思想的一般世俗化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④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总体解释，出现的还是

一套历史模式，有一些是新的模式，另一些（如韦伯主义）是花样翻新。它们明显地试图用具体的因果因素来解释“欧洲奇迹”。这是文化传播主义历史的现代形式。现代化的观点的影响在全部历史学学术研究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观点在关于欧洲在历史上发生的更大变化过程的学术著作中却占据着主导地位，特别是当说明导致资本主义崛起和现代化的中世纪的变革——“欧洲奇迹”^⑤时。我们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来研究这些说法中的许多论点。

（二）批 判

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很快受到挑战，因为非欧洲地区在这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发挥作用，基本上作为从欧洲传播来的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关于1492年之前的时期，这种思想声称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发生在大欧洲。关于从1492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这种思想声称进化的过程主要发生在欧洲，而且殖民主义把这一进展的果实带到欧洲以外。对于当前和未来来说，欧洲以外（第三世界）的进步主要是通过从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机制把发明创造继续进行扩散。这些说法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明显地不受欢迎，第三世界学术研究在殖民主义时期之后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迅速出现，这是一个具有批判性甚至是拒绝性的思想体系。

有关的基本思想如下：关于殖民主义时代之前的时期，有必要恢复自己的历史，弄清楚自己的历史对世界历史作出的贡献。（殖民主义的历史学把一些殖民地的殖民之前的历史一笔勾销，对于一些殖民地的历史进行歪曲。因此正如阿米尔卡·卡布拉尔辛辣地讽刺说，当殖民地取得独立时，它们重新进入历史。^⑥关于殖民主义时期，认为殖民主义本身是所有进步的源泉的说法是明显地不符合实际的，殖民主义时期的历史必须重写以表明殖民

主义如何导致了贫困而不是进步。在全世界范围来说，需要形成新的模式，表明殖民主义远远不是把现代化传播到欧洲以外的社会，而是传播了好的和坏的发明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对世界的大部分来说不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是一个不发达的过程。^①这个思想体系在非洲和亚洲称为“不发达理论”，在拉丁美洲称为“依赖论”。从这一思想中诞生了对欧洲中心历史学的第一次严肃批判。

关于这一批判，可以追溯到以前的一小批史学著作，作者们大部分是殖民地人民，他们经常是在流亡时期写作的。这些著作的主题是关于殖民主义在某一具体地点或者对某一民族所起的消极影响的记录。其中一些作者——如 W.E.B. 杜波伊斯、R. 帕姆·杜德、K.M. 潘尼迦、M.N. 罗伊、J.C. 范·洛伊尔、C.L.R. 詹姆斯、G. 帕德莫尔和埃利克·威廉斯——他们就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进程形成了自己的论点，而且就殖民主义在中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和欧洲的崛起中的作用也形成了自己的立论。詹姆斯表明加勒比的奴隶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与欧洲的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别无二致。威廉斯的著作最终对欧洲中心的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它表明来自奴隶制和奴隶种植园的财富是英格兰产业革命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这一论点首次表明欧洲以外的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中心作用，而且在欧洲历史学界也出现一大批文献，这些文献一般是反驳现在人们一般所说的“威廉斯学说”。^②在非殖民化过程和以后的时间内，这种批判性历史文献迅速扩大，一大批学者开始对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传播主义历史进行了直接攻击。

我们在此后的章节中将讨论这些著作。在这里我想就有关的批判提出几点具体看法。首先，来自欧洲世界（伯纳尔、弗兰克、沃勒斯坦等）的历史学家与来自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起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其次，这一批判把中心放在 1492 年之

前的时期，表明在此之前在欧洲以外存在着发展——例如，夏尔马和哈比卜记录了中世纪的印度在封建主义和后封建主义社会中的发展——长期以来在这一批判传统中很少有学者把注意力放在1492年之前的欧洲；讨论这一问题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从非欧洲观点——是阿明1974年出版的《世界范围的积累》。^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批判历史学家大多数来自第三世界，不是来自欧洲，因此欧洲不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点。然而，这是反常的。历史上关于现代化学术的核心毕竟是这样一种观点：欧洲现代化发生在其他地区之前，发生在其他地区建立殖民统治之前。因此，反驳这一基本学说，人们需要表明（正如我现在所做的）1492年之前欧洲并不是独一无二取得进步的地区。当然，这一立论包括表明其他地区也取得了进步。这一传播必须包括对各种“奇迹”提法的批驳，批驳关于在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具有某种特殊的进取性的性质的言论。

在这一批判中，存在着一个相当有趣的反常现象。这些历史学家相对而言对1492年之前的欧洲给予的注意不多，他们的批判针对的是不发达理论、依赖论和对殖民主义的批判。这一现象与第三世界的学术研究有着有趣的联系，很多人对这一学术研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的，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欧洲世界进行学术研究。对殖民主义的其他批判主要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依赖论——不发达理论的批判也主要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早先时期继承了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气息，对19世纪欧洲主流派历史学家所阐述的理论抱有深刻的怀疑。^⑩然而，奇怪的是，大多数欧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撰写1492年之前的欧洲时，倾向于赞成欧洲独特论学说。

欧洲主流派历史学家对欧洲中心主义这一中心学术的批判也作出了贡献。这不是一个反常现象。学者试图追求真理并接受真理，不管这一真理是否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倾向相一致。他

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此有一批欧洲学者在专门进行欧洲以外的研究时，揭示出一批相当重要的不利于 1492 年世界历史欧洲中心模式的证据。荷兰历史学者 C. 范洛伊尔在 1930 年代出版的关于南亚和东南亚经济历史的著作是这一反体系的学术研究的典型例子。^①另一个例子与中国的历史有关。半个世纪以前，德伊万达科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在中世纪时期进行了远程航海，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此后，李约瑟和他的助手写出了一系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著作，对欧洲中心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我们将会看到）迫使欧洲中心派历史学家放弃关于中世纪欧洲技术所具有的独特性的绝大部分论点。其他西方学者，如惠特利和埃尔文，不顾意识形态问题，深入研究了中国的经验主义历史，写出了关于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取得进展的其他证据。^②我们将在本章后边看到，所有这些著作打击了奇迹论，尽管欧洲中心派历史学家找出了一些办法进行修补。

对欧洲中心主义历史的批判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本书只是批判其中的一个部分：批判关于 1492 年之前世界出现了欧洲奇迹的理论以及有关的理论。这些理论对早期现代世界历史的处理，只是把欧洲以外地区和殖民主义看做是边缘过程。对于这些问题的批判没有取得深入的进展。我将提出几种最近发表的有关重要著作，其他有关著作将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引用。雅内·阿布-路德最近（1989）出版的书《欧洲取得霸主地位之前：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它表明（我认为全面地）在 1350 年前欧洲文明并不比其他文明更进步和更先进。但作了这样的表述后，她对人们专注的欧洲的独特崛起和东方的衰落只是提供了权宜性的部分解释。她认为，分流的时期是在 1350~1492 年之间。（我在本书中的论点是，分流时期发生在 1492 年之后，也就是西半球进行巨大的积累的开始时期，东半球欧洲以外的文明没有获得这样的额外财富，这一财富使欧洲人

对其他文明初次具有了决定性的优势。见第四章)。萨米尔·阿明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同著作中论述说,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并不比非洲和亚洲更先进,而是更加不稳定:这是由于它处于半球文明的边缘,中世纪的阶级社会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不够稳定,欧洲比其他地方都更加不稳固,因此欧洲更容易发生向资本主义的转变。^⑬这一论点虽然没有提出1492年欧洲的“奇迹”,但它使一种老的信仰得以立足:欧洲在中世纪比欧洲以外的地区具有更大的活力。马丁·伯纳尔的新书《黑雅典娜》看来与本书的联系很少,但是他的论点与本书紧密相连。伯纳尔表明,欧洲历史学家制造了关于古代欧洲的神话,按照这一神话,非洲和亚洲的起源和发明都不见经传:雅典娜女神是非洲人。伯纳尔的著作打击了所谓的欧洲独特性的流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欧洲学术界人种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根源,它们是经典文化传播主义模式的基础。^⑭爱德华·赛义德在1979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中,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保守主义学术著作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了关于近东和亚洲的著作。他的著作与我们现在的讨论密切相关。我们在此后的讨论中还会提到其他类似著作。^⑮

(三) 反 批 判

近些年来出版了一大批强烈地为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进行辩护的著作,它们用不同的形式维护欧洲奇迹论:我们在本章将讨论其中许多这类著作。这些反批评著作,对关于奴隶制、殖民主义等传统欧洲观点提出疑问的具体理论,对于把这些过程和事件看做在社会演变中处于边际地位的观点提出批评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见第四章)。关于欧洲独特性的具体原因他们也提出了新的理论(或者采取老理论的修改形式)并且进行了讨论。我感到,这是针对关于第三世界的新的政治态度的一场学术运

动。无论如何，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批这样的著作，他们看来有意识地体现了对以上讨论的历史批评的反批评。^⑮

在这一批新著作的作者中，有些人非常有意识地参加了这一反击。其中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本源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承认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先行性。例如，罗波特·布伦纳勇敢地辩称，资本主义是由欧洲西北部的人发明的，没有外来的帮助，因此（六百年以后）我们必须承认欧洲继续领先。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佩里·安德逊和比尔·沃伦，他们持类似的论点。^⑯在主流派历史学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是1981年埃里克·琼斯出版了《欧洲奇迹》，这本书的很大部分重复了殖民主义时代的思想，即欧洲早期成熟，欧洲以外的地区落后并且缺乏理性。更加显著的事实是，这本书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接受，似乎这些古老的学说没有受到长时期的批判。

这时还有另外一个运动，它试图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中找到导致欧洲发展的素质，即在其他文化中所不具备的素质：在欧洲家族、欧洲政治制度、欧洲心灵等内部所具有的素质。这一运动积极修复马克斯·韦伯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所谓的欧洲理性；实际上，大多数（不是全部）这类学者可以被认为是韦伯主义者，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这样来界定他们自己。我将在本章的后面讨论韦伯的观点，同时还讨论一些现代韦伯主义学者的观点，其中包括迈克尔·曼和约翰·霍尔。在本章的下一部分，我将简要地提及宣称欧洲1492年前“奇迹”的最为重要的新观点，我将阐述这些观点的谬误。

二、神 话

关于欧洲奇迹的神话是这样一种学说，它认为欧洲的崛起基本上是由于来自欧洲内部的历史动力；认为欧洲的发展水平或者

发展速度，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早在 1492 年现代时代的黎明之前就已经超过了其他文明；1492 年欧洲的现代化基本上是由于这些老的内在的动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从欧洲以外的地区流入的财富或者发明；认为 1492 年以后欧洲以外（殖民地）世界的历史基本上是欧洲文明向外流出的历史。这一神话的核心包括一整套论点，这套论点使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得以声称欧洲在 1492 年之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现代化或者现代化的进程更加迅速。

这个神话含有这个词的古典含义：这是一个关于文化崛起的故事，这个文化的成员广泛相信这个故事。这个神话还含有某些事物是不真实的含义。在以后的讨论中我将揭开这个神话的奥秘，表明这个神话编织得非常脆弱。^⑩

我相信，可以辨认的用来编制这一神话的言论是难以数计的。这个神话能够长期流传的许多原因之一是，这一奇迹论的基本概括得到如此种类繁多的大量的个别信仰的支持，一个时代的历史学者能够批驳这些信仰的某些支流，但神话的支持者可以变换手法用其他信仰来为这个神话提供根据。

这里有一个带有基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信仰是如何取得认可执照的。支持这一神话的信仰往往被人们接受；而不支持这一神话的信仰，或者被拒绝，或者不被人们注意。一个信仰取得认可执照的问题（以及更新执照，撤销执照等等）对批判奇迹理论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或者说独特的极为困难的问题。支持这一理论的许多信仰属于明确信仰，不属于含蓄信仰；也就是说，这些信仰没有进入历史学家的学术讨论的范畴，甚至有时这些信仰一般也没有进入有意识的讨论范畴内。（回忆第一章关于明确信仰的讨论。）当我们还在孩提时，我们就学会了其中的许多信仰。其他一些信仰看来似乎不言而喻是“合理”的，因为它们符合有关文化的深邃的价值观，或者符合其他已被人们接受的信仰（历史

的、实践的、宗教的等等)。因此关于古代和中世纪欧洲比其他文明更加进步的信仰得到明确信仰的支持，但是这些信仰寓于明确信仰的铸模中——不被人们怀疑，通常也不被人们注意——这些明确的信仰是关于“我们的祖先”——欧洲人是先进的，这个明确信仰。相反，关于欧洲以外的历史的明确信仰的铸模是一套陌生的、野蛮的、残酷的、未开化的、欺骗的、愚蠢的、贪婪的、粗野的、肮脏的、疾病的思想——这个铸模牢固地支持关于欧洲以外地区不可能是先进的这种一般信仰。这类明确信仰——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将会出现在我们的讨论中。

有一种关于欧洲优越的明确信仰，我们将不在这里进行详细讨论。这是一种公开的宗教言论，它的基础是宗教信仰，认为基督教的上帝自然会把他的人们提高到比其他人更高的高度。尽管在不同情况下我们将会提到这一观点，但这种论点是无法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宗教信仰，无法用经验进行检验；一些人认为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另一些人认为是不真实的，不一而足。在这里我们提到一点就够了：这种宗教论点在 19 世纪是如此普遍地被人们接受，对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来说，没有必要再提出其他论点。实际上，为什么还要提出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比其他人优越的问题呢，既然我们知道不信教的人将不能进入天堂，而且在当前的世界里也不能得到上帝的恩惠？不信教的人自然就不会那么聪明，不会那么幸运等等。既然学者和受教育的人们相信宗教是一切事物的基础，那么就可以认为欧洲人比其他人优越，因为那是上帝的意志。这样你可以期待基督教的上帝为基督徒做些什么，特别是对那些用正确的方式信仰上帝的基督教徒来说就更是如此。到 19 世纪中期，当欧洲中心文化传播主义达到高潮时，当欧洲人很少怀疑他们比其他人更优越时，尽管明显的宗教言论正在从学术讨论中消失，但是这些言论仍然明显地存在，明显地作为明确信仰存在。我认为关于欧洲人的优越性的许

多论点最终都是基于宗教信仰：如果说欧洲的环境是优越的，那是因为上帝是这样造就的；如果说白种人是优越的，那是因为上帝是这样造就的；如果说欧洲人更富有理性，关于这一点没有明确的解释，人们可以推断这是上帝的功劳；等等。我不知道这类明确依靠神灵的信仰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但是当代欧洲中心主义学者的思想界没有给予注意，我肯定这种情况是经常存在的。我们将不时地讨论某些学者（如小林恩·怀特和 K.E. 沃纳）的论点，他们明确地把自己关于历史的观点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家的随意言论具有方向性，我们将会注意到这一点，但并不在任何意义上对它进行谴责。有时候一个学者发表这类言论时是无意识的，而且是明确的。只有当有关学者有意识地表达这类虚伪言论时才是令人挠头的事。

（一）生 物 学

在解释欧洲和欧洲人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时，基本使用了两类论点。一类论点借助于自然力量或者因素，把这种力量和因素作为主要的原因；另外一类论点则在文化内部找到主要的原因。除了天意干涉论学说外（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人类文化之外的原因，尽管这种论点在神学上来说是相当复杂的），常见的有两种非文化的、外在的原因。一种是借助于人的生理，一种是借助于自然环境。

1. 种 族

生物论观点一般断言，欧洲人在生理上比非欧洲人优越。这种论点的古典典型形式是生物种族主义，这种思想认为欧洲人具有遗传上的优越性，因此，当他们诞生时就具有比非欧洲人更高的能力。欧洲人更聪明、更优秀，并且比非欧洲人更勇敢，这些素质是由继承带来的。在描述这一类别时，一般不使用“欧洲人”，而是使用“白色人种成员”这个词，但是这一区分通常并

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欧洲人以外被划为白种（所谓的）种族成员的人们，也同样被认为是劣等人，因为他们属于劣等的次种族。有时候在欧洲人之间也划分为优秀的和低劣的次种族。在19世纪早期，人们相当广泛地认为白种人甚至也不是属于同一个生物品种，而是属于其他种族，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多源发生说”理论据说有《圣经》和科学的依据。⁴⁹这一理论的重要性主要是用来使奴隶制合理化：如果说非洲人并不是真正的人，那么奴役他们就不是邪恶的行为。这一理论在19世纪逐渐消融，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和反奴隶制的思想反对这一点；而取代这一理论的理论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古典种族主义，这一学说认为不同的人类种族具有不同的天赋，正如不同的家畜具有不同的天赋一样——在智力、进取心、勇敢等方面不同——而这些不同的天赋是由于不同的生理继承造成的。这样他们进一步辩称非洲人生来就比欧洲人的智力低，因此欧洲人把非洲殖民化是自然的、也是合乎道德的。欧洲人为非洲人作出决策，因为非洲人不具备这种内在的决策能力，不能管理自己，他们不具备欧洲人的智力，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欧洲人控制并教导他们是合理的，这些思维缓慢的非洲人需要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简而言之，种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在于使殖民主义合法化，在于使对非洲人进行的所有压迫合法化，也包括对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少数民族的压迫。

在19世纪末期，种族主义取得了一种假科学的、似乎是明显的真理的氛围。科学家声称他们取得了不同种族具有区别的证据，特别是在智力方面。这时，他们用门德尔遗传学武装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种族主义科学家宣称，他们掌握了他们所相信的种族主义理论的证据，他们这样做看来似乎明显合理。这些所谓的证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的缓慢过程中被揭露为伪科学：实际上，甚至今天还有不少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者”。关

于科学种族主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它只不过是用的新的方式证明了某种欧洲人普遍信以为真的理论。这一方面意味着，这种理论在加强种族主义方面没有起到很大作用——这一理论在世纪之交由于社会原因其学识和学术重要性已逐渐达到一个高潮，这是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而发生的——另一方面，对科学种族主义的否定与本世纪种族主义影响的下降没有多大关系。种族主义出现在科学思想之前，不管它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只要有用处，它就存在。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科学种族主义对社会上的种族主义信仰提供了很大的鼓励；当科学正在取得人们的尊敬和发挥影响时，科学论证确实是重要的。^⑩科学种族主义用某些特殊的方法起了作用。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它对所谓的白种人中的次级种族具有不同的天赋的说法产生了影响。伴随着殖民主义在中东所持的反穆斯林态度，反犹太主义导致了关于所谓的“闪米特”次级种族低劣性理论的扩散。（“闪米特”当然仅指某些讲闪米特语言的人，如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这种宗族主义态度构成了反犹太主义的基础，对欧洲人在历史上比非欧洲人具有优越性的一般言论也是非常有用的。^⑪闪米特人被认为属于白色人种。现在可以辩称只有欧洲人才是真正的优越的白色次级人种。闪米特人是低劣的。西亚洲（波斯人、土耳其人等等）非犹太人也是低劣的，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辩称科学种族主义证明了南部和东部欧洲人的低劣性：北部欧洲的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意大利人更优越，比斯拉夫人等更优越。关于这种理论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提供的一系列伪科学证言。那是20年代第一部关于移民的重要立法辩论。科学家们郑重地向议会表明，欧洲南部的人是低劣民族，因此为了维持美国人的高种族素质，不应允许他们自由移民到美国。^⑫

今天，很少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相信，不同种族在遗传方面

存在着差别，以致影响到他们的智力或者其他有利于或不利于社会进步的素质。尽管今天有少数人相信种族主义学说，但他们小心翼翼，不公开自己的观点，因为人们现在对这种学说极为厌恶，彻底拒绝。如果我们这本书是一本讨论思想历史的书，我们将会说明这一转变的过程——经典种族主义在不到二代学人的时期内衰落下来。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遗传和种族的差别的思想影响流传得非常广泛，有时影响很大，有时小一些。1945 年后，很少有人维护这一理论。其重要原因与纳粹主义有关。纳粹的意识形态就是基于这一信仰，声称所谓的北欧人是占主导地位的种族，而那些劣等欧洲人、劣等（所谓的）次级白人——所谓的闪米特种族——以及所有其他种族作为一个整体只能受主导种族的统治。而且，主导种族有权用种族灭绝的方法消灭劣等次级种族。因此，种族主义在过去和现在都被看做是纳粹主义可怕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的确，有一个很小的疯狂人群仍在宣扬经典种族主义，而且学术界有为数很少的人士仍然宣称它有效。批判这一学说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当我们谈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时，这一问题已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另一种学说已经大体上代替了经典种族主义，它起着相同的作用，它的立论不是植根于遗传学，而是植根于文化。这一学说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种族主义。^⑥

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经典种族主义还是如此无处不在，它简直成了欧洲人在历史上的优越性的所有论点的明确或含蓄的基础。当一个学者提出为什么欧洲崛起而其他社会没有崛起的原因时，在他的心目中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部分答案：欧洲人在起步时或多或少地就具有遗传优势，而在其后的历史中，他们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遗传优势，在智力方面它们具有优越的决策能力、创造能力等等。当时没有提出“为什么”这个重要问题，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从骨子里来说，其答案认为这是不言

自明的。甚至温和的种族主义者如马克斯·韦伯（下面我们将研究他的观点）也认为，欧洲的优越性来自于某种微妙的遗传，这一因素使欧洲人在所有时候都稍微更加有“理性”（这是韦伯喜欢用的词），因此，他们更先进一些。有趣的是，现代学者保留了欧洲“理性”优越论的思想，这一思想起源于韦伯而且通过他起源于整个19世纪的社会思想，但是他们强烈地否认这一“理性”的渊源是种族优越感。当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知识的扭曲，他们保留了其中的一个因素，而放弃了另一个因素。

在历史学家中，有些“欧洲奇迹”理论当前仍然得到广泛的支持，但只有马克斯·韦伯公开地、明白无误地使用经典种族主义论点。然而，韦伯的写作时期是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那时经典种族主义仍然被大多数欧洲注学者所接受。韦伯的论点是一种温和的种族主义。他确实在著作中使用了“遗传性的……印度人的歇斯底里”，这是他关于印度的宗教阻止了印度的发展的立论的基础。^④他认为由于遗传因素非洲人不适合做工厂工作。^⑤中国人“对非寻常的（智力的）刺激反应缓慢”，他们具有“轻信性”和“驯服性”，韦伯认为这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来自于遗传因素。^⑥欧洲具有更大的“理性”，这肯定有遗传的基础。^⑦但是，韦伯在很大地程度上重视非种族主义因素，这也是事实。而且，韦伯在他的时代只不过是一个温和的种族主义者。

在当今学术界中，温和的种族主义是比经典的种族主义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在总体上是一个明确的理论。我们注意到，韦伯相信种族区别的重要性，但是他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提到这一点；他的关于社会演变的许多立论以及关于欧洲的演变和非欧洲的演变的对比言论中，有一部分必然是没有言明的或者是含蓄的理论。这种做法在20世纪初期的学术界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在那种学术研究中很难识别出它的种族主义。当那些学者没有

明白地把种族看做是一种因素的时候，他所提出的论点看来就不是种族主义的。但是更为严重的是，非常温和的种族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影响是，一大批，也许是大部分，20世纪20年代的主流学派相信，宗族之间的差别很少，人的能力和潜力很难从他的种族方面预见，种族之间的区别只是在对大的人群的统计的基础上才具有影响，白人与黑人相比较，具有稍高的平均“智商”。这种观点与强烈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当把这一观点应用于社会演变和欧洲与非欧洲历史的比较时，这种观点并不比经典种族主义好多少。这是由于历史学的立论不再需要假定大的种族上的区别。如果在平均水平上白人比非白人具有一点点优势，比如说在创造性方面，这一点优势在几百年中或者上千年中发挥了它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是白种人建立起高度的文明，非白种人则没有建立起这种文明。从一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非常温和的种族主义是一个比普通的种族主义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允许学者在反对公开的种族歧视时采取自由主义立场，而继续认为白种人比非白种人在他们自己研究的领域中具有遗传上的优势——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等。这样就把种族的重要性降低为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但是在假设的欧洲的优越性这个问题上没有消除种族主义的解释。^②

也许在这里需要说明，除了肤色等小的方面以外，没有可信的证据支持不同种族具有不同的遗传基因的思想。甚至关于种族的思想也是一种含糊的抽象，没有真正的实际用处。对我们来说，需要作出概括的是：种族的异同不能解释文化或者文化的演变。^③

2. 人 口

人口行为通常被认为是说明欧洲奇迹的第二个最重要的生物因素。这里的因果关系非常模糊。我要谈的有关的理论的具体形式声称，欧洲人在历史上控制他们的人口增长，而其他地区的人

他们没有这样做，因此欧洲没有遭受人口过剩之苦，因此也没有发生许多历史学家所说的“马尔萨斯灾难”，这种灾难据说阻碍了欧洲以外社会的进步。从实质上来说，马尔萨斯主义假定普通人没有控制他们的性欲，因此生了许多孩子而无法喂养；因此带来了一些灾难，如饥荒、瘟疫以及战争，这些灾难消灭了人口的数量：此后人们又生出许多他们不应该生的孩子，从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马尔萨斯认为这种得不到控制的性的欲望在人类中普遍存在，而受过教育的阶级的人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关于“欧洲奇迹”的现代解释对这一理论作了关键的修改：他们声称，欧洲人在历史上有一种限制生育的文化模式，而欧洲以外的人缺乏这种模式；结果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欧洲人口与资源保持着比例，尽管有时发生马尔萨斯危机，这些危机在说明欧洲历史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欧洲不像其他地区那样长期受到马尔萨斯力量的影响——缺乏人口控制，反复出现人口过剩和灾难。而且，这些历史学家说，当技术取得进步时或者在其他幸运条件下，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时，欧洲人不像欧洲以外的人那样，他们没有由于人口增长而使进步的果实化为乌有。我们需要注意，这种论点并没有真正把注意力放在人类繁衍的生理方面，而是放在理性方面：这一论点声称或者说认为，欧洲人考虑到人口问题，而其他人不考虑人口问题，因此，关于欧洲在历史上的优越性在人口方面的论点，总是回到文化或者种族：欧洲人更富有理性，这或者是由于他们有优越的遗传基因，或者是由于他们有优越的文化。如果说欧洲以外的人们具有不可控制的性欲，如果说他们像田野的野兽那样，那么这就是劣等基因的表现或者是一种文化上的怪癖。今天经常碰到的论点，不是诉诸文化因素就是把问题搞得含糊不清。然而，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人口问题在历史上是一种独立的无意向的力量。这种思想的一般基础是一种准生理学论点：普通人只能部

分地控制他们的性欲望，他们在控制生育或者生育的间隔时只能取得部分成功（或者根本不能成功）。^④许多支持其理论的人直言不讳地宣称，与欧洲以外的人相比较，欧洲人在控制自己的行为方面取得了更大成功，尽管只是部分成功。例如，埃里克·琼斯声称，这就是他所说的“欧洲的素质”：

欧洲没有把它的环境资源迅速地用于麻木的普通生命的繁殖。^⑤

换句话说，欧洲人没有像欧洲以外的人那样拼命地进行繁殖。琼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例如，他说中国的农民喜欢“生育新人”以便改善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条件。^⑥约翰·霍尔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欧洲经济的扩大不像（通过可耕地的扩大）中国的晚期传统那样。它的产量的提高没有被人口的巨大增长所吃掉。人口和（可耕地）土地的比例在欧洲最终都保持着有利的比例，这是因为欧洲的家庭规模有相对的自我约束。^⑦

欧洲人在性的方面“自我约束”。因此，欧洲人没有遭受人口过剩之苦。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历史学家在援引人口增长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积极因素时，也没有感到困难，而且把人口增长看做是进步的表现——例如 11 世纪和此后的欧洲人口的增长被看做是中世纪欧洲健康发展的证明——而对欧洲以外社会人口的增长则看做是消极的，看做是马尔萨斯“人口过剩”规律的作用。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非常片面的论点的例子。

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所有的社会都实行人口控制。^⑧从总

体来说，他们的做法非常有效：尽管单个家庭集体在进行避孕方面可能取得了成功，也可能没有取得成功——因为控制生育的办法经常是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来能够相当成功地鼓励人口增长或者不鼓励人口增长。^⑤如果人口增长从长期来说对社会不利，人口就不大可能增长，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成员在两代人的时间之内会改变他们的人口行为。当他们清楚地看到当孩子们长大成人后的环境要求他们改变自己的人口行为时，他们会作出这样的改变。最近的情况正是说明了这一点。^⑥这一方面积累的证据实际上破坏了历史上或者当代的、欧洲的或者非欧洲的所有马尔萨斯派的理论。认为人口增长是一种自动进行的生理过程，而不管是否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多余的人口的观点是错误的。^⑦

当证据的积累表明在历史上欧洲人口确实进行过人口控制时，一些学者恰当地决定认为老的马尔萨斯模式对欧洲已经没有意义：早在中世纪时期，家庭的规模不大，生育得到控制。这就要求拒绝一种传统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的所谓前工业化社会（或者“传统社会”或者“农民社会”）都有一个一般的模式，包括不加控制的高生育率，大的家庭等等，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种人口过剩的马尔萨斯趋势。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仍然与马尔萨斯理论相关联，仍然相信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变革主要是或者至少部分地是由于马尔萨斯人口过剩周期而产生的。^⑧但有些历史学家现在拒绝这种看法：人口从实质上来说被他们看做是一种依赖其他因素的变数，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变数。

但只是在欧洲。这种新的、从本质上来说是反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很快地形成为对欧洲“奇迹”的新的解释。它直截了当地声称，欧洲人在历史上控制自己的人口，因此当他们积累起剩余食物、商品和财富时，这些东西没有被失去控制的人口浪费掉，没有把储蓄消耗掉。这些历史学家说，这一模式是欧洲独—

无二的模式，这是欧洲人能够积累财富最终崛起进入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欧洲以外的人仍然沿袭他们的非现代化的、传统的模式，过剩的人口把进步的成果消耗殆尽。这些历史学家使用隧道历史的典型办法，他们没有注意到新的人口学的学术研究，其中有些研究历史人口学——这些学者来自欧洲以外的不同地区，如从印度到巴巴多斯——他们像 10 年前欧洲学术研究一样，推翻马尔萨斯理论在欧洲以外地方的应用。^⑧

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谈到一个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关于欧洲家族的独特性。现在，只要提到一点就够了——关于欧洲奇迹的人口论点根本没有说服力。这一论点对基于凶恶的马尔萨斯势力的理论是有效的，对那些只有欧洲人才知道如何躲避马尔萨斯力量的说法也是有效的。

(二) 环 境

环境决定论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事务和人类历史具有强大的影响，这种理论已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学说，但是仍然经常被用来说明欧洲“奇迹”。然而，这一点应该加以限定：今天的人们使用环境决定论论点时，“决定论”的含义是有限的。这种理论并不声称环境说明一切，也不认为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种理论只是把环境看做是一种独立的、简单的原因或“因素”，它不受文化的影响，它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是文化以外的某种东西并且从外部影响文化。人们会看到，每一位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家都会补充一个或者数个环境论论点或者因素，使这一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欧洲的优越性。甚至那些想把他们的理论主要建立在社会或者政治或者知识的基础上的历史学家，也都设法（据我所知很少有例外情况）把一个或者几个环境主义论点注入这个煮锅，使这一理论成形或者增加它的调味。

环境主义理论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关于欧洲环境的优越素质以及用这些素质来说明欧洲的崛起。另一块理论是关于其他地区的恶劣环境如何阻碍了那里的发展。这两种理论——也许令人吃惊的是——在形式上非常不同。让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理论。

关于非洲和亚洲（所谓的）不发达的说明主要有两种经典的环境主义理论，这些理论被不断地使用，而且今天仍在使用。第一种理论声称，热带地区从内在本质来说就比凉快的地区低劣。这一理论主要被用于说明非洲。第二种理论辩称，生活在干旱地区的人们没有得到发展是因为那里干旱，需要灌溉，伴随着灌溉而来的是灌溉河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历史上停滞不前的文明。这种理论用于说明亚洲文明包括埃及。（亚洲的大部分实际上并不干燥。）我将对这两种理论进行讨论，并且简要地涉及其他关于非洲和亚洲落后的几个环境主义的解释。

1. 糟糕的热带非洲

关于热带气候阻碍文明发展的思想是欧洲思想界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④这种思想在19世纪被广泛地用来说明为什么非洲人（被认为）处于不文明状态，而且自然地接受欧洲殖民控制；这是经典文化传播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⑤这种思想通常都被编入欧洲独特性的理论中和欧洲奇迹论中，尽管我必须补充说明，历史学家通常不考虑非洲没有崛起的原因，他们认为不值得去考虑：这个问题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他们把力量花在看来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这就是亚洲（和北部非洲）没有崛起的原因。而且，热带气候糟糕论仍然经常被历史学家使用。例如，这一理论对琼斯在《欧洲奇迹》一书中的立论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理论在一个特殊的舞台上也具有重要性：这就是在历史学家关于非洲奴隶制、奴隶贸易和奴隶种植园制度的辩论中。对照之下，地理学家虽然一般都具有关于自然环境的某些知识，而且长期以来也掌握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但是今天他们并不

看重热带气候糟糕论。^②

热带气候糟糕论主要包括三种明显的理论。第一种理论是所谓炎热的、潮湿的气候对人的心灵和身躯的负面影响；第二种理论是所谓热带气候对粮食生产的不利；第三种理论认为热带地区容易流行疾病。直到20世纪40年代左右，欧洲人关于人们在潮湿的热带工作的效率不如其他气候的观点仍然存在着矛盾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非洲人能够在炽热的太阳下劳动——这就很容易地使种植园奴隶制合理化——而欧洲人做不到，尽管某些文化传播主义的立论的基础是，热带气候条件导致懒散、懒惰，因此需要从温带气候的文明那里进行远程控制。最终，人们弄清楚了，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体育研究所得到的证据说明，各种人的人体都能够在热带或者其他气候条件下进行有效的劳动，如果人的躯体有一定的时间来适应热带气候条件的话。^③尽管有人声称，在潮湿的热带地区的人们不能像生活在温带地区的人们那样进行思考——热带太阳“煮熟了大脑”——而且在上一个世纪普遍被欧洲人所接受，被编织到著名的关于欧洲文明优越的理论中去（例如亨廷顿和马卡姆），这一理论在本世纪的前半期从来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现在受到普遍拒绝。埃里克·琼斯是当今欧洲很少几个不知道这一“气候精力”理论（过去人们这样称呼）已经破产的历史学家之一。琼斯不仅认为这一理论是有效的，而且认为这一理论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

文明在气温很热的纬度上兴起并没落，而看来越往北走文明愈加兴起。文献提供的关于这种变化的说明基本上是气候因素（吉尔菲兰1920年；兰伯特1971年）。这种理论一方面把温和的气候与人类精力的产出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声称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受到体内寄生虫的影响，使那里的每一个社会达到一定高度后就停滞不前。^④

人们需要注意，“文献”没有为任何这类论点提供证据。学术文献直截了当地拒绝“气候精力”理论，而且这种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没有受到认真地维护。气候决定论作为一个整体几乎已经僵死，也不存在古文明（古代文明发生在从赤道到45度之间）向北部的“移动”。所谓热带地区受到寄生虫病的影响从而使那里的文化停滞不前的观念是虚假的（后面我们将稍许给予注意）。琼斯关于热带气候“不适宜人体要求”的一般思想得到学术界稍许支持，但是这一思想没有支持欧洲的气候导致了欧洲奇迹的思想。^⑤所谓温和的纬度气候对人类的心理和体质的影响比热带气候优越的论点是根本没有根据的。

关于热带气候环境是否赋予成果的问题，19世纪的欧洲学者进行了许多辩论，一些学者争论说热带地区物产丰富，但是他们不是用这一命题说明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相反，他们想说明：热带环境的物产太丰富了，提供了如像阿诺德·托因比所说的由于物产过于丰富，人类再也遇不到挑战，因此没有殖民主义的指导那里就不能取得进步。我们在本章后面将讨论这一论点。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论点，这个论点直截了当地声称，热带环境发展农业的潜力非常小，因此妨碍了热带地区的发展。（“热带”或者更恰当地说“潮湿热带”这个词指的是那些没有寒冷季节的地区，这里有适度或者较多的雨量：大约750毫米的年降雨量。次撒哈拉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潮湿的热带，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的大部分以及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热带。）按照这一论点，在热带气候下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很少。

这一论断——热带土地的低生产率——很难用证据来维护，因为在潮湿的热带人口的密度从很低（如亚马逊盆地的部分地区）到极高（在爪哇、孟加拉、萨尔瓦多、巴巴多斯、卢旺达和许多其他地区），差别很大。这一论点的基础是关于热带土壤性

质的理论。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关于热带土壤的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领域；有关的重要论文很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写成的，如果我们不包括关于种植园——如甘蔗园土壤的特别专门的研究的话。^⑧有关赞成传统理论的论据，或者反对传统理论的论据的真正重要信息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此后的年代里在几个实验中心进行的研究中得到的，这些信息此后缓慢地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学术研究界中去。其结果是一些历史学家（包括现在关于“奇迹”的著作）今天仍然能够利用关于热带土壤的所谓的邪恶性质的相当离奇的理论。其中一些理论最近遭到批判；其他理论现在也近乎遭到批判；其中也有少数理论虽然很难进行自我辩护，但仍然存在于学术文献之中，没有遭到批判。现在，我们有必要非常简要地从技术上对这些理论给予评论。

关于热带土壤的老的标准理论如下：由于在潮湿的热带气候下气温很高，雨量充沛，这里的土壤不能够积累有机表面土层，因为有机物很快分解，而且，随着雨水向土壤底部的渗透很快被冲刷掉。因此，热带土壤所含的植物营养物质少。还有，这里的土壤还遭到严重的流失，这一方面是由于热带的土地构造一般坡度较大，另一种原因是高雨量意味着更多的表层土壤的流失。

这两种关于土壤肥力和流失的基本的具体论断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文化论断，下面是有关的论点。由于热带土壤肥力低、流失严重，农民必须实行所谓的“轮耕农业”。（这是一种耕作制度，首先把一片土地上的森林用火烧掉，然后种植几年，放弃这块土地，随后又去开垦另外一片土地，然后放弃它，进行连续的更换土地的耕作。）标准的理论（如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或者 50 年代左右时的论点）对于缺乏肥力、容易流失的热带土壤和轮体制农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概括。声称农民放弃了一片土地以后不能够使它休耕，然后再回到这片土地上来，因为这里的土壤非常贫瘠，用火烧过以后的土壤就永远遭到了破坏，无法得到恢复。即使当

环境条件很好时，农民可以回到原来的土地上重新使用那里的土地，但是单位产量将变少，而且循环的次数越多产量就越低，土壤就会变得越来越贫瘠，最终不能再被使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农民社会不能够永久地居住在一个地区；随着大片森林被使用、被放弃，农民需要到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可以耕种的土地，村庄也必须跟着移动。结果是严重的：形成了一个非常稀疏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人口，他们没有或者很少有机会发展大规模的贸易、城市和稳定的国家。

这时整个论点被塞入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次撒哈拉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因此那里必须实行轮耕农业，不可能形成文明。或者说，由于某种原因，如果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它早晚也要垮台。（古典的处于低地的玛雅文明的没落经常被用来作为说明这一历史结局的典型例子；今天仍有少数学者使用这一例子。）

研究人员获得的关于热带土壤和热带农业的信息越来越多，因此关于热带土壤和轮体制农业的传统模式也逐渐变得温和。到20世纪60年代，专家们一般都知道（尽管不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正常——典型的和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轮体制农业并不破坏土壤。^④进行轮体制农业的农村的迁移从来不是由于土壤的肥力已经耗尽。（人们还知道，轮体制种植在欧洲广泛存在了几个世纪，它对环境没有造成明显的破坏。）鉴于此，出现了一种温和的文化模式：如果人口密度低，如果农民离开放弃的土地许多年，使那里的土壤肥力和植被得到恢复，那么轮体制农业将是一种平衡的耕作制度，而且从长期来看环境不会恶化。

但是，即使这种修改也没有给非洲和一些其他热带地区的历史的判断带来多大变化：历史学家们可能仍然认为，在这种热带地区兴起的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在一般情况下成为非常复杂的文

化，因为生产食品的人口稀少，不可能为形成城市中心、宗教中心、国家等复杂的机构提供基础。（至于处于低地的玛雅文明，一些学者继续声称轮休制农业破坏了那一文明的存在基础，一些学者声称诸如蒂克尔这样的文化中心的没落和遗弃是由于其他过程造成的。）总之，当时流行的关于农民的马尔萨斯观点导致了一种总的论断，人口的增长将失去控制，热带地区的轮休制农业在诸如非洲这样的地区不可能得到高度发展。

这种形式的模式今天仍然在历史学家中流行。在关于欧洲奇迹的文献中这种模式是常见的，是作为非洲不能像欧洲那样“兴起”的说法在环境方面的主要基础。这一点在一些不是非洲人的非洲历史学家中是明显可见的。^④

现在有证据批驳这一整个理论，批驳关于热带土壤不利于农业并阻碍人类历史进步的思想。首先，我们现在知道热带的土壤并不低劣，而是不同的土壤。由于具有较高的化学成分以及在潮湿的热带条件下的风化作用，岩石风化生成土壤的速度比在凉爽的气候条件下要快得多。因此由于矿物的溶解，土壤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肥力，它的肥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于有机物的积累。这种土壤流失较为严重，但是土壤形成的速度比流失的速度更快。热带的土壤是在岩石上生成的，在具有植物需要的丰富的矿物质的岩石上生成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在不富有营养的岩石上生成的土壤极不肥沃。对热带的和温带的“平均数”进行比较是没有基础的：不存在哪一种更好的问题：它们是不同的土壤。

现在有证据批驳关于轮休制农业的老的观点。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这种耕作，他们注意不让火失去控制。他们采取了许多技术来帮助自然植被得到恢复，增加农田的肥力，包括使用绿肥和家畜肥料。当缺乏土地时，轮耕的周期缩短，使用了许多技术如梯田和堆土田，在除草、种植多样化等方面也花费了更多的劳动。^⑤轮休制农业和人口稀少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作用的结果，

而不是生态问题。在美洲，这一情况部分地反映了哥伦布时代之后人口的减少。（在亚马逊盆地，那里今天约有 100 万农业人口，而在 1492 年那里的人口也许比这一数目高出 7 倍之多。^④）它还部分地反映了人们经常注意不到的一个事实，在美洲的大部分热带地区建起了大规模的养牛场，迫使农民离开了较好的土地，使表面上的统计数字表现为人口密度小；牛代替了人。^⑤同样的过程在白人定居的非洲南部也发生了。在非洲热带的其他地区，除了边缘地区或者半干燥荒芜地区之外，那里的农民实行的不是轮休农业。^⑥典型的情况是，那里的农业是第二种产业或者是半农业制度，他们从事半永久性的木薯和树木农业，或灌溉农业，或混合农业，有时种植期超过休耕期，土地的肥力是使用多种文化方式保留的，包括使用绿肥和家畜肥料。但是最重要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凡是土壤退化、存在饥荒和低效农业的技术，这种情况都反映了近期历史上的文化原因或者殖民历史。这种情况不反映内在的热带农业的局限性，不反映当地农民不懂技术。

关于在潮湿的热带气候下，特别是在非洲的热带气候下，粮食生产的潜力低的理论，一些历史学家还制造出几种说法。他们有些人声称，在新的技术由非洲人以外的人创造并传播到非洲之前，非洲人没有能力在潮湿的热带地区从事农业。其中一种论点声称，大约在两千年前可能是由古罗马人把铁器带到非洲，从那以后非洲人才能对付热带的森林。^⑦既然在古代的欧洲使用石器从事轮耕农业，既然铁器在非洲出现——可能是在进行独立的发明之后——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或更早，上述理论当然是无效的。

另外一种更加怪异的理论认为，大约在二千年以前一些东南亚的农作物传播到非洲东部。一些历史学家盲目地断言，在这些由非洲以外的人驯化的热带植物被带到非洲在森林种植之前，非

洲人没有能力在热带森林从事农业。^④很久以来人们已经知道，非洲人驯化了一大批适宜于潮湿的热带地区的农作物，特别是作为这里主食的各种木薯。^⑤所有这些文化传播主义的神话看来都与一种重要的殖民主义信仰相联系——对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构成一个重要的借口。这种信仰认为，先进的非洲文化，包括农业、商业和国家只是在晚期历史时代才通过大陆向东南部扩展，这主要是由于非洲大陆的热带部分妨碍了向南部的扩展。按照这种空洞论的神话（见第一章），当欧洲人占领南非时，非洲人（大部分）还没有到达南非。支持白人在南非至上的想法的人声称，白人首先到达那里，因此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拥有占有南非土地的政治和经济权利。^⑥实际上，非洲农业人口的扩展早在数千年前已经发生；近期的考古学表明，至少在三千年以前农民就已经在雨林带定居，不是白种人首先到达南非。

关于用于非洲的热带气候糟糕论的神话还有一个变种，它认为热带非洲的雨量的变化无常，这种现象是热带非洲独有的现象，具有极高的破坏性，在殖民时代之前，人们无法依赖农业，时常发生广泛的饥荒。由此导致出关于非洲落后的各种论点。对于一些历史学家（其中包括菲利浦·柯廷）来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人口流动的趋势和内部的奴隶买卖；对另外一些人（臭名昭著的约瑟夫·米勒）来说，那里是野蛮地区，不开化地区。^⑦这些历史学家属于我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非洲历史的“绝对主义”派，他们在非洲内部寻找理由为欧洲人对奴隶制应负的责任和现在非洲所面临的问题进行解释，他们经常从非洲的环境方面寻找理由。持欧洲奇迹论观点的历史学家们经常使用这些论点进行比较。在所有半干旱地区，雨量的变化无常恰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地区包括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萨赫勒地带，美国中部的大平原，俄国的大草原等地区。雨量的变化无常并不是非洲的独特现象。非洲大陆更加潮湿的部分不存在气候变化无常的特殊问题；这是一

个历史学家的神话，这种神话一部分来自于传统，一部分是在最近的撒哈拉—苏丹饥荒之后又重新编制的。后一种现象并不反映这一地区经常处于干旱。它反映的是人的问题，大部分是由殖民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而当正常的雨量周期进入干旱期时就给那里的人们带来灾难。^⑧

大致相同的论点用于热带地区的其他部分。在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我们总会看到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存在着永久性的、定居的农业，而在肥力比较低的土地上，我们会看到轮体制农业或者树木性的庄稼。过去两个世纪的殖民主义把这一现象搞得模糊不清，因为那里存在着大的人口流动和人口增长，或者当人们对土地短缺或者对非环境的压力作出反应时，那里的农业制度被歪曲。但是关于环境的概括仍然是：热带条件并不意味着农业潜力的短缺。^⑨

对立的理论认为热带植物繁茂，极为丰富，这种理论又是怎样的呢？直到19世纪中期，这一理论被非常广泛地接受，那么以下的结论也被广泛接受：既然那里的土地生产的果实在热带气候条件下是那么容易获得，那么人们不用费力就可以生活，因此他们不思进取。这种论点被编织到各种理论中去。巴克尔提出其中的一种理论。^⑩马克思相当简明地提出了另一种力量，那是在《资本论》第一章的一个脚注中，它未经讨论断言，热带地区没有向资本主义发展，因为那里“自然条件太丰富了，人们不需要发展自己。”^⑪这一简单的评论看来是马克思关于潮湿的热带地区包括非洲没有像欧洲那样发展的惟一一次论述。

热带物产丰富论今天仍然被一些理论用来说明欧洲崛起的独特性。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欧洲儿童都看见过某种版本的坐在椰子树下的土著人的漫画，他在那里耐心地等待他的食物从树上掉到他的手掌中。这不仅仅是一种过时的思想的遗物，也不仅仅是一种含蓄的理论。埃里克·琼斯在他的《欧洲

奇迹》一书中使用了热带物产丰富论。在西部非洲“生活很容易。”^⑧约翰·霍尔也使用了这种理论。^⑨有时马克思主义者也使用这一理论，他们忠实于上面所引用的马克思所说的话。^⑩也许没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这种热带物产丰富论是不能接受的，既然这种理论——我们已经看到——一次又一次地被那些坚持热带地区物产不丰富的历史学家使用；他们认为那里寸草不生、气候恶劣。这两种理论都是一派胡言。注意，这两种理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表明热带地区的潜力在历史上处于劣等地位。

最后，我们来看看关于热带环境充满疾病的理论，这些疾病使那里的历史进程缓慢、停滞和受到阻碍。一些历史学家把这种论点具体应用于非洲。一些历史学家把这种理论用于所有热带地区：对埃里克·琼斯来说，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和非洲与欧洲相比处于落后的境地的主要原因。如像我们前面讨论的热带气候糟糕论一样，这种理论也是一种传统的欧洲思想，了解这一点对理解为什么这种理论一直流传到现在具有重要意义，对了解各种欧洲奇迹论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经典的文化传播主义的信条之一是，疾病和其他邪恶事物自然从欧洲以外的地区反向传入欧洲。因此许多学者（包括巴克爾）认为，欧洲以外的地区是许多——最严重的——疾病的起源地和传染病地。^⑪这种定理式的信仰今天仍然存在：例如仍然认为鼠疫和艾滋病——这总是一种假定，不管有没有证据——来自于欧洲以外的世界。^⑫

这一基本信仰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之间得到加强，欧洲的上层阶级到外地旅游，他们回来报道说欧洲以外的地区肮脏不堪、令人厌恶、充满疾病。这当然是对他们而言。这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生活方式看来必然是不卫生的。但是这种信仰在 19 世纪得到了有力的加强，那时欧洲（大部分）日益增长的财富和现代化导致了卫生条件的巨大改善，包括总的

生活条件的改善，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条件的进步。因此欧洲看来似乎是卫生的，欧洲以外的地区看来不那么卫生。这一错误的看法今天仍然广泛存在。不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伴随着贫困而来的是健康的恶化。但是人们错误地认为不健康的状况来自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或者来自于当地居民的文化，而不是来自于贫困。然而，印度、非洲、中国等地区可能是在这个时期处于多病时期，而欧洲本身在一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之前也是多病地区（从人口学事实可以部分地得知普通的欧洲人18世纪以来的预期寿命）。

在这同一时期，欧洲的殖民领地得到扩大，很明显，生活在殖民地的欧洲人也日益受到奇特疾病的袭击。这种情况在西部非洲最为明显，那时那里被称为“白人的坟墓”。沿非洲西部海岸的小的定居点很不安全——次撒哈拉非洲的殖民领地直到19世纪才得到真正的扩大——伴随着奴隶的（他们许多人死在定居地内）大批移动，产生了非常不卫生的条件，尽管欧洲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非洲本身内在的不卫生。

那里的人和家畜所得的大部分疾病不是热带疾病。天花、伤寒、肺炎、白喉、麻疹、淋巴腺鼠疫、炭疽和许多其他奇特疾病在许多具体的自然环境中都能看到，而这些疾病流行的严重程度更多的是反映了人类的贫困、拥挤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所谓的“热带病”，如痢疾（甚至在非热带地区包括纽约也流行）也是这样。某些类型的痢疾看来与停滞的积水有关，因此与灌溉农业这一广泛的气候条件有关。其他形式的疾病，包括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与热带森林的条件有关，蚊于这一传染媒介经常是在凤梨科植物中滋生。的确，这种痢疾与潮湿的热带的轮体制农业特别有关。但是农民在森林度过的时间相对来讲很少。而且他们有免疫力，痢疾在他们的社区并不猖狂（不像生活在他们那里的外国人那样：商人、殖民军事人员等等）。

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后，那么是否存在着所谓的“热带的内在的不卫生”？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尽管这一概括已被广泛的接受，一些历史学家仍然顽固地坚持认为非洲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独特的多病地区。这是关于非洲处于世界历史的边沿作用的一个原因，至少就现代世界历史而言。（按照威廉·麦克尼尔所说，疾病“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相比较其发展处于落后的原因”。^⑥）按照某些绝对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比较明显的有柯廷——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的多病特点，在16世纪和此后成为一个辅助说明这里变成大西洋种植经济奴隶来源地区的重要原因，它没有随着大西洋经济“兴起”，而是仍然处于不发达状况。把这一理论与本章开头所说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和第三世界的修正主义学派的理论进行对比具有重要意义。反对派学者（至少包括绝对主义学派）声称，非洲在16世纪人口很少，而且是处于流动的人口，没有形成复杂的文化和国家组织，奴隶和奴隶贸易是这一社会的重要特点。非洲没有脱离这一低水平的文明，其主要原因是那里的人和动物的流行疾病——还有以上讨论过的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其他因素。因此非洲成为天然的种植园奴隶的主要来源；而且，很自然，奴隶贸易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非洲生活的现实。

第三世界历史学家不同意所有这些观点。在奴隶贸易之前非洲的人口稠密，奴隶贸易彻底毁坏了非洲大陆，破坏了那里的国家和文明，使大片地区人口减少，导致了总体上的灾难性的不发达。奴隶贸易主要反映了在17世纪和此后欧洲力量在沿非洲海岸地区的相对强大，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可以获得巨大利润的美洲种植园——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在军事上和商业上强大的西部非洲国家大部分都离开海岸一段距离。疾病的流行随着奴隶贸易的破坏作用而扩大：人口减少、原来的耕地和大片牧场被放弃（现在成为森林和灌木）、战争、经济衰落等等。这一破

坏的一个重要例子与采采蝇和锥虫病有关，也就是非洲惛睡病。传统学者声称，采采蝇在早期阻碍了非洲牛群的大规模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导致了历史上的停滞不前。结果是，锥虫病像炭疽病一样，是许多哺乳动物所得的疾病。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大片土地的荒芜，野生动物数目增加，因此造成了采采蝇大量繁殖的有利条件。但这一疾病又反过来使人和牛都具有了免疫力，随着土地的充分利用这种病的发展受到阻碍，未能发展成具有破坏性的疾病，未能像上一个世纪末那样成为非洲某些地区发展畜牧业的障碍。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灌木林地区的扩大导致了采采蝇地区的扩大，因此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灾难。^⑥除此之外，很少有足够的关于非洲和非洲人健康状况的历史（不是殖民访问者），有许多理由可以怀疑在这一问题上继承下来的文化传播主义的假设和偏见。无论如何，人们不应该把疾病看做是“阻碍”次撒哈拉非洲发展的单独力量。

2. 干旱的、独裁的亚洲

亚洲是一个广阔的地区，具有多样化的环境。人们可以理解，关于亚洲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的环境主义的论断，其中多数论断只适用于亚洲的一个部分，而不适用于其他部分。早在19世纪初期，在地理学中盛行着一种虔诚的环境决定论，在它看来，用一种解释来说明各种各样的环境是有道理的：上帝在不同的亚洲民族面前放置了不同的自然障碍物——这里炎热，那里寒冷，另一个地方干旱。今天，在那些描写“欧洲奇迹”的历史学著作中，人们常常看到的不是一系列关于亚洲环境的脆弱性，而是一套比较性的判断，每一项判断都是关于欧洲，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某一个具体的时期。欧洲，或者欧洲的某些部分，在某些时候，在环境质量X、Y、Z方面都比整个亚洲优越。或者更典型地说，这种比较会使亚洲的一个地区遇到环境方面的障碍，使另一个地区遇到政治方面的障碍，使第三个地区遇到宗教方面的障碍，等

等。他们的论断左右逢源。

由于这些原因，我将不去回顾比较而言所谓亚洲比欧洲落后的环境主义理论，在本章的下一节（“温和的欧洲”），我将逐一进行关于气候和土地构造的比较判断。

然而，今天仍然和上一个世纪一样，有一个庞大的连贯的理论体系，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一概而论地判断为环境低劣。这种理论有几种形式，有不同的名称，其中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水利社会”和“东方独裁主义。”人们通常不认为这种理论是环境决定论的一个例子，因为看来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关于技术的论断，它声称以灌溉为基础（“水利”）的社会具有某种特别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但是这种论断的根源之一是环境。它声称，亚洲的干旱使灌溉成为必然。人们会问，这样一种理论怎样能够应用于那些根本就不干旱的亚洲部分。（这种论断还被用来说明潮湿的、寒冷的俄国的斯大林主义。^⑨）为了解这一矛盾，并了解采取不同形式的此类理论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必须看一下这种学说的历史。

五百多年来，欧洲的著作家倾向于把亚洲看做一个人民缺乏内在自由的地区，亚洲社会是一个内在缺少变化的社会。如果我们去追溯这种观点的演变过程，我们将会离题万里。但是到18世纪，这种观点成为正在出现的文化传播主义学说的重要部分。^⑩这种观点被作为定理式的真理接受下来，很少受到怀疑，它们用各种办法来说明这一内在“东方独裁主义”（如同后来被称谓的那样），它们用神学语言、宗族语言和环境语言来进行说明。这种观点看来主要适用于奥斯曼帝国，这个帝国在当时对一些欧洲社会构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威胁，对另外一些社会构成商业上的威胁。到18世纪后期，欧洲殖民主义在印度和东南亚进行直接扩张后，这一理论被赋予新的功能。东方独裁主义的观点不仅成为为殖民主义扩张进行辩护和合理化的有用思想，而且成

为当时正在形成的殖民主义法律学说的基础。这一学说判断，在亚洲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因为那里的统治者独断专行，拥有一切。因此，当我们欧洲人推翻那里的统治者时，我们就拥有一切。如果我们接管一个独裁国家，我们就取得了对当地人进行独裁统治的权利，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由的。（但是欧洲人的统治，不管多么独裁——殖民地没有民主可言，也被描述为是给予“自由”。）

现代形式的东方独裁主义经常与圣经时代的“东方”联系在一起。现代亚洲社会被描述为“停滞不前”，因此断言亚洲仍然基本保留《旧约全书》所描述的特点是公平的。（我们可以回顾，《旧约全书》提到那里存在的大城市、帝国、农业等等。）对于泰姬陵和大的现代化亚洲国家等现代奇迹需要给以说明，这就不难说明与原先的圣经时代的文明相比，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小的进步，而且还可以看到一种次要的说法，亚洲文明曾经取得过某些进展——但是很久以前已经停滞，因此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圣经》描述的时代，从本质上来说停滞不前。^①

我认为，把干旱与“东方”在地理上联系在一起的部分根源很可能来自于此，来自于《圣经》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所描述的干旱情况。没有疑问，它部分地来自于这样的事实，早期的欧洲人直到18世纪中期把干旱的亚洲西部包括奥斯曼和波斯—内陆—亚洲认为是“东方”，因为那时印度和日本以东的地区较为边远，没有引起欧洲人的注意。无论如何，19世纪早期的地理学家如伟大的卡尔·里特所描述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地理文化体系。这种体系与干旱的亚洲河谷文明和非洲人东北部文明相联系，比较明显的有尼罗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以及具有类似特点的较小的河谷，他把传统的亚洲的独裁主义的萌芽归于这类地区。他还倾向于把这一模式加以扩展用于亚洲比较湿润的河谷地带，通过从干旱地区的灌溉河谷文明思想进行逻辑上的跳

跃，跳跃到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河谷灌溉文明。

从埃及到中国把东方独裁主义与河谷文明进行一般的联系在19世纪是常见的。^②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思想明确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一种东方独裁主义源于干旱和灌溉的命题的理论。^③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严肃地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关于历史演变的基本理论怎样才能适用于世界规模。首先需要说明，就所有的传统的和（他们坚持认为的）流行的上层社会的理论而言，他们也许在当时的欧洲思想家持有最大的怀疑。但是他们的怀疑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因为他们也是德国上层教育的产物，而且关于欧洲以外的社会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只是从报纸上得到一些有关知识，或者从书本上和官方报纸上看到的那些持殖民主义观点并带有偏见的文章。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当时流行的关于东方的学说提出严肃的疑问，当时的流行学说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东方是独裁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在历史上停滞不前、没有进步。但是他们关于欧洲社会理论的疑问，在其上层社会的基础上，使他们没有错误地用通常的说法去说明亚洲的独裁和停滞。亚洲人和欧洲人一样具有理性，而且也同样反对经济剥削。这一推理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猜测，亚洲独裁主义和没有进步的根源不在于人类社会，而是自然环境。看来，亚洲社会的进化没有导致财产的私有制：统治者独裁地拥有土地，只有那些仍然保留着村社财产的地方除外。因此恩格斯推断：

没有土地所有制，在实际上是整个东方的关键。政治和宗教的历史即根源于此。但东方人没有达到土地所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与气候和地势有关，特别是和那个由撒哈拉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鞑靼直至亚洲最高高地的大沙漠地带有关。人工灌溉

是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情。东方的政府老是只有三个部：即财政（掠夺国内）、战争（掠夺国内和外国）和公共劳动（照顾再生产）。^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这一理论时是很不正式的，而且在后来的著作中作了修改：看来恩格斯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彻底否定了这一理论。^⑤我们的兴趣在于，环境论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今天仍具影响，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明显地错误地认为亚洲是干旱的。在近期关于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以及（被认为的）资本主义在亚洲没有兴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中，这一点仍有影响。^⑥更重要的是在一场有趣的知识界的巨大变革中，这一理论被编织到主流欧洲奇迹论的文献中。

马克斯·韦伯在本世纪初期以及卡尔·威特福格尔在世纪中期，在把这一相当古老的学术转变成为现代关于欧洲奇迹论的环境主义问题中，可能是关键性人物。关于自然环境韦伯没有说很多话。他吸取了在世纪之交欧洲流传的各种学术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辩称，在欧洲的远古时期和中世纪所形成的私有财产确实是社会向资本主义演变的主要特征。他强调，在封建的（庄园式的）财产的兴起（这种财产接近于或者向全盘私有财产发展）与他发现与此相对照的亚洲河谷文明（以及古代埃及）相联系的一种所有形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他认为那种社会形式与需要灌溉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联，因此进而推断与环境相联系。他说，后一种社会独裁，土地一般不是直接传给官员，而是暂时租借给他们——作为提供服务的条件，作为他们收取地租的手段，作为收取兵役费的手段等等。灌溉需要在独裁统治下征集集体劳动用来维护运河和水利工程。在布满森林的欧洲，不需要对农民进行这样的独裁统治。^⑦因此，在希腊或者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自由民、个体者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人。城市主要不是独裁

势力的所在地，而是真正的市区。因此，总的来说，这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西方走向现代城市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轨道。

近东的发展与（希腊的发展）是如此不同，其重要因素是那里需要灌溉系统，结果那里的大城市与运河的开凿、水量与河流的不断调节紧密相连，所有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官僚机构。这种发展有一种不可逆转的特点，伴随而来的是对个人的奴役……而在希腊……王室没落……因此开始了一种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从自由民中招募士兵，他们带来自己的武器。政治权利必然落入这一阶级的手中，这样便出现了真正的世俗文明，成为希腊社会的特点，使资本主义在希腊得到发展，这种发展与近东的发展区别开来。^⑧

韦伯关于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提法成为我们当前时代关于欧洲奇迹论的基本论断。但是韦伯的这一理论大厦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不牢固。这就是他所说的为什么从事灌溉的社会需要有所给予它的那些特点：独裁主义和停滞不前，甚至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城市的充分发展等等。1955年卡尔·威特福格尔在他的《东方独裁主义》一书中对这种理论作了重要的技术方面的和环境方面的发挥。

威特福格尔是一个前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初提出的论点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马克思式的命题，他企图表明他的所谓的以灌溉为基础的社会或者“水利社会”必然是独裁的，而且必然具有早期的作家所描述的东方独裁主义的那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属性。同样，通过文化的传播，从远处获得了水利社会的特点的社会也必然具有这种属性。（因此按照威特福格尔所说，非水利社会苏维埃俄国也变成独裁国家。）威特福格尔的推理是环境主义的推理，在地理知识方面不像马克思和韦伯那样无知，但仍然相当天真。威特福格尔认为，一片土地的灌溉必然地、必定无疑地增加其生产能力，因此，某些社会将采取灌溉农业的耕作方式，所以亚洲

的大河河谷被占用。但是，按照威特福格尔所说，为了开凿运河和维护河道，灌溉要求建筑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因此要求一个指令性政治结构——他说这是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起源——这种政治结构还起着控制水源分配的作用。

因此水利社会必然是独裁的。如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论断存在着许多谬误。其中三种谬误涉及环境主义的命题，那就是，关于灌溉必然大幅度地提高生产能力的思想，因此将导致复杂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国家等。第一种谬误：灌溉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能力，但只有当限制庄稼生长的生态因素是缺乏水源时才是这样；然而，在亚洲如同在其他地区一样情况经常不是这样。这就意味着营建大规模的灌溉体系并不是对环境作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在河谷兴建的小规模的灌溉体系能够作为结果扩大成为大的体系，作为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交纳剩余产品的压力促进了这一进程，扩大了灌溉网络，从而合乎逻辑地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换句话说，在兴建大规模的灌溉体系之前就存在着独裁主义或者社会复合体，灌溉体系的形成不是来自环境的要求。（威特福格尔从大致相反的方向辩称：干旱的地区需要灌溉，为了管理灌溉系统导致产生了那个社会强迫命令的结构，从而导致了阶级压迫和国家——以及独裁的东方文明。）不容怀疑的一种关于生态的概括说法是关于生产力与人口规模和密度的相互关系，这是阐述社会等级以及诸如宗教仪式中心和国家的基本因素。但是灌溉并不能魔术般地使土地提高生产力。有些土地没有灌溉也具有很高的生产能力。就经典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来说，我们不知道那里的统治阶级是否强迫人们提高生产力，因此营造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或者说那里的事务进程是与此相反的。第二种谬误认为，对真正的干燥的河谷地带的灌溉使那里的土地大幅度地从总体上提高生产能力。由于有了灌溉才可能在那里的土地上从事农业，否则那里的土地将成为沙

漠。但是那里总是缺水，而且我们不了解那里的产量。我们确实知道，真正高的生产能力，以及大的社会实体（按人口规模或者人口密度来说），是在较潮湿的地区，主要是从事稻谷生产的地区，在那里经常不需要复杂的农业灌溉系统（有时雨水足以灌满稻田，如在伊洛瓦底平原的底部以及吕宋的北部部分地区）。第三种谬误：有理由认为，某些古老的文明的基础不是灌溉，而是排水，这是对生态作出的一种反应，一般不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排水系统在中亚美利加洲早期文明中比灌溉系统出现的时间要早。很可能东半球最初的灌溉体系，如沿尼罗河地区、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渭河、黄河、尼日尔河等，都是排水系统，是为了开发沿河地区的沼泽地，也许，复杂的政体早在社会着手进行大的工程并变成“水利”社会之前就已经出现了。^②

威特福格尔的环境主义论点，把马克思关于干旱、灌溉、独裁主义和停滞不前的老思想带到了我们的现今时代，把韦伯关于东方独裁主义和其他地区的不同论点与这些论点相提并论，他代表了今天许多欧洲奇迹论历史学家的萌芽，尽管这些历史学家对威特福格尔的理论作了重要的修改。其中重要的概念是关于水利社会的思想，明确地或者含蓄地把水利社会看做是干旱的亚洲河谷（和埃及）的自然产物。这种论点是怎样导致了诸如埃里克·琼斯、迈克尔·曼和约翰·霍尔等历史学家著作中的“奇迹”论点，值得我们给予注意。

埃里克·琼斯在《欧洲奇迹》一书中强调他所认为的“雨水农业”欧洲社会与亚洲的灌溉社会之间的根本不同。他说，威特福格尔基本上是正确的。灌溉社会导致了“包括一个巨大的、受操纵的农民群众的政治后果。”

欧洲的农业社会得以避免一种可以与之相对照的专制历

史——一种政治幼稚病——因为这里有一种取之不尽的森林土地和雨水灌溉农业的生产环境。^④

琼斯然后把他的理论补充到所有这些理论上，认为在温暖的死水中工作的农民会得疾病——正如以上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种谬误，把贫困的后果与生态的环境混淆在一起。

把欧洲式的“雨水农业”与奇迹般的社会后果相关联的童话需要我们给予注意。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琼斯——正如在他之前的威特福格尔——对于灌溉社会的所谓的可怕后果，实际上都是古代的阶级社会和古代文明所具有的一般特性。也就是说，当这些文明出现时，作为过程的一个部分我们发现农民的自由被减少，为了各种目的，广大的人群被招募。关于自由农的浪漫形象实际上是农奴制以前的形象，是封建时代以前的形象。自从法兰西、罗马实行殖民以后，欧洲的农民正像亚洲河谷或者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是不自由的。而且，雨水农业以及森林边疆农业也是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特点。

约翰·霍尔在他的《权利与自由：西方崛起的原因和后果》中想要使他自己离开威特福格尔的“空想”，（正如他所说）关于东方社会内在的独裁本质的空想。然后，他马上又吸取了很大一部分威特福格尔的理论把它补充到欧洲“奇迹”的推理的提法中去。正如大多数奇迹理论一样，霍尔试图利用传统的奇迹论的最大部分内容，然后把其中的某些论点提出来作为最重要的论点。他认为，政治力量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力量是最重要的，尽管他认为韦伯的欧洲“理性”思想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力量。霍尔不接受把东方国家概括为独裁的公式。不，他说，他们是武断的、残酷的、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鼓励经济发展，他们使东方社会停滞不前（或者大体上说，反复循环），但他们并不是独裁的。他在这里的含义是，东方的国家并不真正强而有力，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强

大的。我们不久将会看到，他是怎样看待欧洲的，他说中世纪的欧洲国家具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具有某种有机的品质，以中世纪的形式预先设想了某种宇宙目的论式的不断变革。因此，按照霍尔的说法，东方独裁主义是存在的，但是独裁者是虚弱的。^⑧霍尔然后把灌溉说成是另一种独立的因素。

“(在欧洲)不需要灌溉。这很可能鼓励了或至少使分散的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文明得以发展。”^⑨

亚洲“需要”灌溉，这必定是一种环境上的需要。这样，又回到了老式的威特福格尔的等式，把灌溉与独裁主义（与“个体的主动性”相对立）等同起来。然后，霍尔论及一系列其他因素。

迈克尔·曼是“欧洲奇迹”当代理论家之一，他也列举了一个很长的因素名单，他认为这些因素构成了奇迹，^⑩他倾向于强调古代欧洲获得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军事权力的重要性。曼努力地使自己离开威特福格尔，但是他最终还是回到威特福格尔的模式，把他的大部分理论编入了他的著作——也许我应该把这称为马克思-韦伯-威特福格尔模式。如像马克思、韦伯、威特福格尔、琼斯和霍尔一样，他也接受关于东方社会（从埃及到中国）是不自由的和不进步的概括。但他指出，独裁主义没有扩大到真正的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权力。而且古老的东方文明，尽管植根于灌溉农业，还是利用了河谷附近地区的其他形式的资源。主要出于这些原因，曼声称威特福格尔“把他的模式过于扩大了”。^⑪古代的灌溉社会是独裁的，但它们并不强大，这一点对曼来说是重要的。然后曼对这一模式进行了改装，基本上把这一模式装入了自己的理论。不同的区别是，他说，在“灌溉”和“雨水”农业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亚洲社会一概被划分为前一种模

式，欧洲社会被划分为后一种模式。按照曼的说法，以古代的希腊人为起点，欧洲的农民使用铁制犁耕田，种植着不用灌溉的（“雨水”）土地，这是欧洲走在亚洲和北部非洲前面的最重要原因。这是第一个伟大的奇迹。这使欧洲走在所有其他地区的前面，而且欧洲从那以后一直走在前面。

简单地说，下面是曼的论点。我们首先从古老的近东文明着手，这种文明的基础主要是灌溉。首先，他承认灌溉是一项发明并导致了这里的文明。曼辩称，灌溉这个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笼住了”或者局限了人口；这个比喻是想表达一种思想，即这里的人民是不自由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受到束缚，不能取得进一步的社会进步。（这是一个比喻而不是一个论点。）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八百年，曼说，“中东帝国的统治由于来自北方的两个重大的挑战……而被动摇，”来自印欧的人侵者——这看来是信誉不高的“雅利安人”理论的一个版本——带来了两场革命，一种是以战车战争为基础，另一个革命就是使用铁器——特别是铁制的耕犁。“现在力量对比向北方倾斜”。^⑤曼在叙述的过程中承认，这些来自北部的民族实际上没有发明战车战和铁器（这些东西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但是他没有停顿地（或在逻辑上）进入了这样的命题，即北部的民族包括印欧人就政治军事和生产能力而言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这一点为起点，曼把两种文明进行对比，那就是中东的“灌溉”文明和使用铁犁的雨水农业的北部民族——希腊以及广而言之包括欧洲。由于欧洲人使用铁犁从事雨水农业，他们最初在希腊获得了现代文明，包括民主、阶级、私有（在一定程度上）财产、科学并且尊重人的理性。^⑥为什么？这一模式的中心是一个个体农业家庭的形象，这种家庭基本上是独立的，它从天上得到水，而不是从独裁管制下的灌溉系统。曼说，铁矿是丰富的，因此农民不需要依靠城市或者长途贸易网络来获得铁犁和斧头。这种独立的农民是真正的自由民农民（韦伯也是

这样说的)，是民主的、文明的、富有活力和向前看的欧洲人的原型。

这些论点没有一个是有意义的。首先，从地理方面来说，把中东想象成为没有耕犁的农业的地区是荒诞的，把那里的居民想象成为依靠河谷灌溉的人口是荒诞的。在灌溉的农业中也使用了耕犁。雨水农业在埃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在黎凡特、安纳托利亚、伊朗以及亚洲更东部的地区，更不用说非洲。铁器不是由欧洲人发明的，非欧洲人也像欧洲人一样使用铁器。铁犁也是这样，在中国的早期如同在欧洲的早期一样是重要的。^⑧（关于讲印欧语的人、雅利安人把犁的使用传播到了他们的定居地或者征服地的说法是一个古老的神话。）可以使用的铁矿并不像曼说的那么丰富（除了在某些特别地区例如某些潮湿的热带红土矿）。

但是，曼的论断中最为愚蠢的部分是环境决定论。它给人们一种干燥地区的形象，这里只能从事灌溉农业，而灌溉被看做是对文明进步的束缚。它还给人以一种具有优质土壤开阔地区的形象，那里布满森林，使用铁器的农民不仅生产出无可比拟的丰富物产，而且从他们的生态中获得了一种民主的、勇敢的、光明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以此为基础走向现代化。关于这两种形式让我简单说几句。

在许多奇迹论者的眼中，灌溉没有生产效率。琼斯、曼和其他人断言，在依靠雨水的土地上每个人生产的粮食要多一些。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灌溉的发展提高了粮食的生产，不管这一过程的初衷是出于村民自己的愿望还是出于政治的或者宗教的上层建筑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愿望。当灌溉的地区达到严重缺乏土地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后期（这是一种可能的发展主线），每个人的生产能力下降。这一点是明显的。这首先意味着，这里的农业工人每年用于生产的时间要多些，用于非

农业活动的时间要少些，包括村里的文化生活以及建筑那些纪念碑式的建筑物。最终这种形式可能导致农业系统的垮台，土地盐碱化等等，也许最后发生饥荒。现在把这一点与非灌溉农业进行对照。在正常情况下，土地的肥力要差些（灌溉带走了溶于水中的营养，而冲积土壤具有丰富的营养）。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依靠难以预测的雨水，水分缺乏较多。因此，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条件经常是不相同的），没有灌溉的土地自然肥力倾向于较低。的确，早期使用铁器的农民把森林铲除掉，建立起新的农场，在这种新开垦的土地上获得高产量，但是这种现象是过渡性的，无论如何它对半干旱的希腊河谷土地没有产生多少影响。早期的欧洲农民实际上倾向于在冲积的或者在地势低的梯形土地上定居，而且，他们相当早地使用了灌溉——因为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一神话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关于欧洲的农业与亚洲的农业相比有利于独立生存的思想。正如曼所描述的那样，早期的欧洲农民并不是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孤立生存的，或被森林包围起来。即使有时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生存，这也是一种边际现象，这种现象在亚洲和欧洲的是一样的。农民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社会群体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大大小小的村庄内，有时密集，有时稀疏，这取决于许多条件。没有理由认为亚洲居住在高地上的农民群体与欧洲居住在高地上的农民群体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在本章后而还将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将讨论独特的欧洲家族的神话。现在，我只是把认为早期欧洲农业社会比其他地方的社区更加个体化、更加独立和更加进步的看法归为神话。

19世纪的思想家以及韦伯和现在机械地进行重复的历史学家如琼斯、霍尔和曼，他们所犯的最基本错误是，相信或者认为一种形式的环境产生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而且这种社会将在历史的进程中流传不变。人们根本不能把亚洲和北部非洲非常古老

的灌溉与后来的欧洲文明的不进行灌溉的农业进行对照——或者说，绝不能与亚洲对照——然后假定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并在历史进程中保持下来。文化是变化的。农民从一种环境转移到另一种环境，在许多地方农民既从事灌溉农业，也从事非灌溉农业，这要看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的不同类型。^⑧因此，断言干旱的亚洲农业文明在此后的岁月中产生了停滞不前的、独裁的社会形式，不会走向现代化，这纯粹是神话。

3. 温和的欧洲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如何构造了一个“雨水农业”欧洲社会的神话模式，认为雨水带来了与灌溉无关的好处，而且，只有欧洲在其半球从事“雨水农业”。历史学家如曼、琼斯和霍尔把这一论点进一步向前推进。欧洲的以雨水为基础的农业，加上欧洲的被认为是良好的肥沃土壤，为农业生产构成了一种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环境基础。这些历史学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他们认为的欧洲心灵的独特理性和创造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肯定了欧洲的自然环境。

例如，迈克尔·曼把欧洲的历史描述为稳步地向西北方向发展——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所描述的所谓东方大道模式——他把向西北方向延伸的这一轨道看做是具有个性特点的、富有创造力和富足的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直到中世纪连续不断的进程。他认为，这个社会在铁器时代由于欧洲人独特地把农业和铁结合在一起，再加上雨水湿润的土地，才出现了这一社会。他的关于欧洲社会（他的“奇迹”）的演变模式比这还要复杂，但是这一模式的关键部分是不可逆转的、稳步的、历史上孕育着的地理上的运动——他所称谓的向西北方向的“漂移”，永远带有朝向西北方向的“发展势头”。他避开哲学决定论，赋予这一整个过程很强的黑格尔味道和宇宙目的论的味道。^⑨这一向西北方向移动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是欧洲西北部的良好环境。这里的环境为什

么这么好，那是因为这里的“较厚的、较湿润的、更肥沃的土壤”。^④

约翰·霍尔也同样称赞“北部欧洲的粘土”，^⑤西北部欧洲的“深厚的和雨量充沛而肥沃的粘土”（“不需要进行灌溉”），^⑥埃里克·琼斯在他的《欧洲奇迹》一书中也作了大体相同的论述，只是稍加修饰。他描述了欧洲“森林土地和雨水农业无止境的生产环境”，^⑦欧洲的“充沛而均匀的雨量和好过的夏天”。^⑧琼斯（不像曼和霍尔那样）承认亚洲的土地能够支持更多的农业人口，也就是说那里的土地具有较高的生产力。但他说欧洲的生产土地是小块的、处于相互分离的地区，然后他给我们描述了关于东方独裁主义的一种神话：

水利农业的不可行性使一部分欧洲的人精力用于其他目的。欧洲的依靠雨水的农业农民在数目上可能比中国和印度的农民要少，但是前者花在农业上的时间比后者用于水利工程的时间要少。^⑨

当然，这里的含义是欧洲的农民不需要把很多时间花在农活上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和剩余产品，而亚洲人要想获得同样多的产品就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除非我们不顾历史方法，把在现代条件下极端缺乏土地的亚洲农民与古代的处于边疆条件的欧洲农民或者现代欧洲资本主义农民进行比较。换一个说法，这种理论就实际农业技术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灌溉的目的是增加每一个劳动力的产量，而且一般都是这样做——就任何模式的历史上的欧洲的农民来说也同样是贫穷的、受压迫的、负担过重的。

这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湿润的土壤”通常是极湿的土壤：具有酸性的灰壤和灰粘土，除非大量施肥，否则很难具有肥力。所

谓的“充沛而均匀的雨量和好过的夏天”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潮湿的气候，太阳能经常严重地受到限制，庄稼有时很难长好（回顾一下1492年以后引进番茄的重要意义），这种土壤直到晚春时期才干松下来，如果能够干松的话。我不想扭曲这一形势。情况只不过是欧洲西北部的土壤，尽管有各种不同，但并不比许多其他地区的土壤更优越。就生产来说，温暖地区的土地、较干燥的地区或者有较好雨量，或者有较好的灌溉和排水可能性，倾向于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我的观点还有进一步的限定。欧洲的农业环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明所谓的奇迹，或者使人能够相信（正如我所援引的作者所相信的）欧洲的历史与亚洲的历史相比较一直受惠于欧洲的农业环境。

所谓的欧洲的环境优越性还不局限于农业。在我们结束对环境主义的讨论之前，我将简略地评论一下四种其他带有比较性的判断，这些判断是当代欧洲“奇迹”历史学家通常使用的。

首先是经典的“角和河湾”的论点，欧洲和盎格鲁——美洲学校的学生大多熟悉这些论点。据说，欧洲的半岛和海湾的配置，欧洲人拥有的可供航行的河道，使这个大陆的交通、贸易和通达性具有了自然的基础，而其他大陆不具备这些条件。然后，认为这些条件与市场的兴起和资本主义最终在欧洲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关系。^⑥这一论点的一个部分，正如皇帝的新衣，明显是虚假的，当我们直接观察时就可以发现。例如，关于海上的通达性，印度洋海岸和中国南海的大部分海岸在中世纪时期出海更为方便，比处于大西洋的欧洲更为方便。（如果说台风对印度洋来说是一个问题，那么暴风对北大西洋来说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贸易城市散落在印度洋沿岸，各种商船来往于印度洋沿岸，到达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满载着诸如大米、铁等商品，以及具有更高价值的货品，这比意大利人的单甲板平底船所从事的在地中海和西北大西洋之间的定期贸易更早。我不是在贬低大西洋渔民、

冰岛的商人和汉莎同盟的伟大的航海技术，我只是说在可比的时期内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像欧洲人一样在有效地使用海洋。

至于河流，欧洲有众多的河流用于水运，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并不比印度和中国的河流更多。东南亚各岛之间的航运就像莱茵河或者说多瑙河一样方便。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把比较转化为现实。“角和海湾”理论的错误通常又引出另外一个错误：这就是关于欧洲早期的文明比需要在陆路上运输商品的文明具有优势的思想。许多“奇迹论”历史学家不断重复陆路运输必然比水路运输更加昂贵的理论。这是一种多层的比较。当曼和其他人援引关于拉车的家畜在一定的距离内消耗它们的饲料重量（有人说这种情况发生在100~150公里），他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大多数拉车的家畜沿途食草：因此伟大的亚洲内部的丝绸之路和苏丹驼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⑧中国的运河比欧洲海岸弯曲的路线更为有效。水路运输——特别是逆风或者逆流时——一千年以前并不比陆路运输具有优势。

埃里克·琼斯在《欧洲奇迹》一书中大肆声称，亚洲比欧洲遭受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因而那里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⑨他进而声称，自然灾害的风险是如此巨大，普通人受到恐吓，他们的人口行为反常，消除了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等等。关于这一说法我们没有历史数据，撇开这一点不说，这里的主要错误是个简单的规模问题。琼斯的“欧洲”实际上是指西部和中部欧洲。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印度次大陆的规模或者也许相当于亚洲有定居人口面积的四分之一。因此，如果其他情况相同的话，欧洲的自然灾害最多只有亚洲自然灾害的四分之一。的确，当人们在河谷从事农业时，那个地区的洪水会更严重些，但是人口会随之进行调整，使这一风险保持在较小规模，不至于影响长期的发展。而且，如果按人均水平来说的话，我认为欧洲农村冬季天气的危险如同亚洲的洪水危险一样巨大。台风的危害与北大西洋

冬季的风暴的破坏力同样大。因此上述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根据的，作为欧洲“奇迹”的论点是不可信的。

持奇迹理论观点的历史学家反复指出，欧洲的环境有种种差别，他们声称这导致了各地区间进行贸易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独特潜力。^⑨我们在这里仅仅需要注意，欧洲与其他面积可以相比的地区相比较并不具有非同寻常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自然产品。例如，中国大致享有同样的各种纬度的自然环境，而且还有热带的南方海岸。

我们在这里将要讨论的最后一个环境主义的神话是，欧洲各种不同的表层土质可以分成许多小的“核心地区”，它们被山脉和森林分开，因此导致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具有独特特点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甚至包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贸易体系和独特的中等大小的国家制度，以及从此而来的许多所谓的优点。既然这一问题与关于欧洲的所谓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独特性的部分“奇迹”文献联系在一起，我将把关于地理方面的讨论放在本章的后面。现在我仅想指出，这种关于“核心”的思想有一部分是神话，而就其有效的部分来说，在其他大陆上也具有同种类型的“核心”。

（三）理 性

现在我们来看看关于欧洲历史优越性的理论或者先行性的理论——欧洲的“奇迹”——这种理论的基础不是生理学，不是环境，而是文化。首先我将讨论那种以欧洲人具有优越的“理性”的概念为出发点的理论。这类理论所说的“理性”包括许多心理学的属性，总是包括创造力和发明力（或者进取性），通常是一种抽象思维的能力，而且经常包括某种进行伦理道德判断的能力。这个问题不在于理性是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这个问题是欧洲是否更具有理性，或者具有更高层的理性，比其他任何人

类社会都具有更高的理性；这个问题是理性是否是欧洲独特崛起的主要原因或者主要原因之一。关于欧洲人比其他人都更优秀的直接断言，看来具有某种古老的或者说维多利亚式的味道。但情况并非如此：关于“西方理性”的理论，其重要性在今天与以前数代学者时期一样是重要的。有时候很难看出是理性论，因为它带有别的色彩。这一理论的说明有时集中在比如技术方面，它们辩称欧洲的科技发明带来了欧洲历史上新的不同的发展；如果仔细看一下，从技术方面做的说明通常都是溶于一种关于欧洲人富有创造力的理论中，也就是说，他们的理性。同样，有的理论是从国家或者自由市场或者家庭着手来进行说明，但通常（不总是这样）他们关于这些结构的说法往往来自一种更基本的东西，那就是理性。有时候这些理论采取相反的方法。古典的种族主义的理论是理性论：如果是白人，就要比别人聪明。一些（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性论：封建主义的失败释放出创造的活力，从而导致了技术上的发明等等。另外一种含义是，优越的理性可以假定发生在某一重要的时期或者地点，它是一种启动整个过程的奇妙的钥匙：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谷登堡车间等。我将首先通过对“理性理论”本身进行分类，然后转而讨论其他种类的理论，用这种方法来把包括技术和制度方面的理论问题弄清，其中一些理论植根于欧洲理性的思想中。

1. 理性论学说

在本世纪初期，大多数欧洲学者接受关于欧洲人比非欧洲人更富有理性的基本命题。这一学说由众多的相互竞争的理论来进行说明，其中生理种族主义也许是最为突出的，但是我认为大多数欧洲人把这一命题作为无可争议的正确的命题接受下来，而不管是什么样的解释。很明显，欧洲国家比其他国家都具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水平的文明。它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主要是通过发明创造来完成的。欧洲人现在还控制了整个世界，这反映了某种

智力上也许是道义上的优越性。这是经典的文化传播主义（第一章讨论过）学说的黄金时代，很少有人怀疑这些学说的基本命题：欧洲发展；欧洲以外没有发展或者发展很慢；欧洲的发展最终是基于某种智力的或者精神的原则；对欧洲以外来说其正常的、自然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进步的道路是接受具有理性的欧洲思想的传播，而这些思想是由欧洲殖民管理人员、定居者、种植者、牧师和商品的供应者带来的。

这时，大多数欧洲思想家已经接受关于“人类体质统一”的学说，至少同意全人类都具有向现代化发展的共同的能力。这种学说提炼成为一种理论，这一理论在本世纪初期被广泛地但不是普遍地接受下来，这一理论可以被称为人类理性概念的双重发展。初级的双重论把儿童的心态与成人的心态区别开来。人类的心灵是在史前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那是人类心态的童年时期。欧洲的历史或者被说成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成果，或者被说成是与人类智力发展密切伴随的结果，这一过程基本上与从童年的心理发展到成年人的心理基本相同。随着历史的发展，欧洲人更富有理性，正如儿意随着身体的发育获得了理性一样。古代的人们不仅仅在智力上低下，而且更多地受感情和激情的支配，而不是受理性的支配，正如现代的儿童一样。这同一种理论应用于现代的欧洲妇女，只是稍稍作了修正，她们的理性被认为比男人的理性要少，她们更多的是受情绪的支配，也就是说，她们的理智比男人少，而且，妇女也将经历智力的发展，最终会发展到具有一定的理智水平，可以进行投票，承担公共职务等。

在这同一理论中，非欧洲人的体质被认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幼年时期。但是，在人的体质统一理论的影响下，非欧洲人当然可以成年，发展到具有理性，具有现代性，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完成的，主要是通过殖民。（“殖民教导”这一短语代表了这一学说，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历

史和地理教科书中都会看到这一概念。)问题还不仅仅是“当地人像儿童一样”。关于非欧洲人的非理性的思想是一种肯定的、推定的科学原则，这一原则被广泛地接受：非欧洲人像儿童那样思考，在欧洲人的带领下发展到成年。非欧洲人当然也分不同的等级。“野蛮人”在智力上是儿童，没有学历。有争议的人群，如印第安人、奥斯曼人和中国人，在某些方面被认为像儿童一样，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不然。他们与欧洲人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受情绪和激情的支配。(殖民地的暴乱明显是不合理的——是儿童情绪的爆发)就科学和抽象哲学思维而言，这些人们的文化明显没有达到完全的成年人的标准，但在某些方面如艺术和手工艺品方面，他们也许属于有才华的青少年。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即具有理性的、现代的欧洲成年男人。历史就是他在智力上成年的进程。他与古代欧洲人相对照；与现代欧洲儿童相对照；与现代欧洲妇女相对照；与现代非欧洲人相对照。这一对照还经常被延伸，直至包括精神病；在某些学派看来他们明确地被认为在智力的发展上受到阻碍，而且实际上这一点被当作一种治疗方法。⁹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理论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因此在上述的各种对照范围内交换要素是有效的。对我们来说，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智力发展的属性与欧洲历史的关系，智力不发展的属性对欧洲以外历史的关系，包括过去和现在；因此欧洲人自然地获得一种独特的理性。

把过去几代人的学术理论漫画化将是错误的，但我所描述的模式表面上看来像是一幅漫画。多数学者没有使用美洲的印第安人在脑力上是儿童这样的字眼，或者个体脑力的发展完全重复了人类脑力发展的过程。但是上述模式在欧洲思想界确实是一股占主导地位的力量。在非学术的谈论中（在报纸新闻，《人猿泰山》式的小说中等），把非欧洲人等同于儿童和古代人的思想明确地

得到解释。美国关于印第安人和其他殖民地人的教育政策明显地基于这一模式，尽管是一个磨去了棱角的版本。大量的历史著作、地理著作和社会科学著作都利用了这一模式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而且其中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实际上是同一模式的不同形式。现举出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大多数人类学家接受关于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脑力类型的观点，一种是所谓的“原始心灵”，这就是各地的部落人的心灵（有些人补充：包括各地的农民）。“原始心灵”被描述得很明确——最著名的描述是莱维·布吕尔所著的有影响的著作《土著人怎样思考》——他们不能进行高层次的理论上的或者抽象的思考，他们受情绪的驱使等等。^④另一些人类学家反对这一观点（鲍斯、雷宾和米德是最为有名的^⑤）；大多数人类学家有条件地接受这一观点；一些人类学家彻底接受这一观点。莱维·布吕尔关于这一理论的赤裸裸的形式对心理学家具有重要影响，对所有的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影响。与这一理论密切关联的是关于“原始语言”的思想，这种语言不能表达高层次的理论或者抽象的思想。这一老的观点（威廉·冯·洪堡使用了这种理论的一种形式）与人们不能够超越他们的自然语言的局限进行思考的命题联结在一起，因此一种原始的语言导致了一种原始的心灵。^⑥此外，关于印欧语言具有内在的优越性的老的哲学理论仍然有许多追随者，而且这一理论扩大到包括世界上大多数非欧洲语言的思想。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一种心理学的广泛的理论家族，他们利用了个人脑力的发展与类种的脑力发展是同源的思想，现代的原始人具有儿童的和古代人的心态，他们有时候把这一概念扩大，推定非欧洲人一般的心理构成（及其局限性）。在20世纪，卡尔·荣格及其追随者的精神分析观点充分表达这一理论并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荣格把非西方文化一概而论（阿拉伯的、印第安的、非洲的、非洲裔美国人及其他人），他宣称只有现代欧洲人才充分

发展了个人的意识，一种自我，一种思考能力，甚至一种能够把自己想象为一个脱离外部世界的个体的能力。只有欧洲人才具有理性。^⑩

当这一学说被吸收到“现代化的”思想系列中时，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现代化的”思想系列在50年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今天，仍然支配着欧洲的社会思想。“殖民主义教导”让位于“现代化发明的传播”。非欧洲人不再是“土著人”，不再被描述成为“孩子般的”。传统思维的概念代替了“原始心灵”和“原始语言”的概念。非欧洲人在两种意义上是“传统的”：他们缺乏“现代的认识能力”，也就是说，他们缺乏进行理论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能力，他们缺乏某种使人得以完成更高层次事务的“现代态度”，它们缺乏摒弃老的东西的态度等等。

这看起来仍然是原始的心灵，但是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传统的心灵”只是等待别人来唤醒，被现代化。摊开来看，这是一幅传统社会的景象，这里的人们具有传统的思维，现代化将使这场戏开幕。人们的思维将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将发生变化。新的思想和技术将从已经现代化了的欧洲社会传播到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等等。回忆一下，关于现代化的学说不仅仅是在空间上把欧洲的思想、态度等等传播到今天的后殖民主义世界的概念。它还是一个历史概念：作为历史上的现代化。“传统社会”和“传统思维”用来被描述早期的欧洲，欧洲的崛起现在被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点是一个争论颇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确定欧洲在什么时候开始“起飞”——欧洲从传统主义向现代化兴起。历史被用来提供其基本原因：欧洲现代化，而且现在非欧洲将效仿它——尽管不是奴隶般地——效仿它的道路。我们等一会儿还会讨论这一问题。首先我想评议一下人们认为导致不同发展方向的主要原因。我将表明，在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

方面兴起了一些学派，这些学派声称他们可以科学地表明“传统心灵”的确切性质，而且这些学者的作品又有被吸收到历史的倾向，关于欧洲奇迹的新著作中出现了这些学者的思想。

在心理学方面，一个重要的人物是让·皮亚特。他的关于智力发展的基本理论假定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发展“阶段”系列，所有的儿童都必须经过这个发展过程。皮亚特受到莱维·布吕尔的影响，也受到关于原始心灵学说的影响，直到1971年他还认为：

很可能，这时我们从著名的人种学著作中得出的印象是，在许多社会中，成年人的思维没有超出“具体的”活动的水平，因此没有达到提出命题的水平，命题的能力在我们的环境下是在12岁至15岁之间形成的。^⑧

“命题活动”大体意味着逻辑。“具体（思维）”是儿童进行逻辑思维前的思维方式，不能进行抽象的或者理论的思维。现在皮亚特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但他不具有也没有声称具有关于非欧洲人心理的直接知识。他的论点是从传统的双重性发展模式而来的，这种模式把儿童与原始人等同起来。（从人种学来说，他大约落后了30年。）但是他的许多门徒试图把他们的理论与现代化学说相联系，他们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试图发现是否非西方人（特别是非洲人）确实具有低劣的认知能力。如果说所有这些研究都犯了一个错误而且得出了事先预计的结论，这并不是把问题简单化。他们所使用的检测认识能力的方法，是皮亚特曾经对欧洲儿童使用的方法，没有什么变动，他们把这些方法用于非洲儿童和成年人，他们像事先预计的那样，发现这里的人们不具有充分的成年人的认知能力。这样他们的错误就很明白了，今天大多数皮亚特学派的心理学家并不断言非欧洲人在认知能力上像儿童那样。伴随着60年代和70年代皮亚特派的研究，在这个时

代还有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进行的许多研究（如海因茨·沃纳），他们把旧的原始心灵学说作为事实。^⑧还有南非的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他们把白人和黑人进行比较，其他欧洲人对另外的非洲人口也进行了研究，几个以色列心理学家对阿拉伯和犹太人的认知能力进行了比较。除少数例外，欧洲心理学家发现非欧洲人在认知能力上有缺陷，因此是属于“传统的”。^⑨在几乎所有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测试方法都不会使“当地人”有任何好的机会，因为这些测试是欧洲式的，由欧洲人进行的或者是由欧洲人在当地的助手在欧洲化了的背景下进行的测试。他们所犯的错误是著名的，整个“跨文化心理学”领域获得了一个坏的名声——成为人种中心主义的辩护人——直到80年代他们改变研究方向时为止。问题在于，当大多数跨文化心理学家今天表面上否认非欧洲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具有理性时，他们的一系列已经站住脚的出版物仍然被其他人用来阐述相反的观点。

理性主义学说对与现代化学说联系最为紧密的那部分——社会学和经济学——影响最大，特别是那些在50年代和60年代参与制定和执行开发不发达国家政策的学者。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这个领域的思想对现代化的政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和最基本的是，需要使文化传播主义有效。其次，从原则上来说，仅仅涉及新思想和新技术的传播的发展，比涉及大量资本和产业的发展更为便宜。第三，同样，在思想、研究、宣传和教育的层次上进行开发没有威胁性；不会带来革命和反革命的危险——试图改变权力集团关系的隐性努力，或者土地改革等。由于这些原因，学者们受到鼓励，实际上给予他们重奖和优厚的报酬，从而使他们的关于现代化的分析结果主要是通过思想层面上的影响产生出可以贯彻的政策。

埃弗里特·罗杰斯是一个农村社会学家；戴维·麦克莱伦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埃弗里特·哈根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们的著作

具有重大影响，我将简略地加以评论并且稍许把他们的著作加以漫画化。在那些试图把农民的思维归结为赞成发展（“世界性的”）和不具有发明创造力的“落后者”的人们中，罗杰斯是他们的领袖之一。他们的重要思想是，理性传播到农村的非欧洲群体中。发展（有条件的）的关键是把新思想传送给具有发明力的“接受者”。这些思想的大多数不是本身可行的（因此是非理性的），接受这些思想不需要农民具有更多的知识，而是要求他们具有较多的权利和土地所有权。但这一点被忽略了。麦克莱伦声称，总的来说非西方人没有现代化是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成就感”的驱动。或者当他们有了成就感时他们将会现代化，这一点对欧洲早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古希腊时期就是这样。他提出了一套复杂的理论，但没有任何证据。他认为非西方人，特别是农民，具有一种传统即拒绝各种变革的思维。他的模式最初是一个神话式的没有自觉心理的农民，这个农民没有创造力，服从父辈的权威（因此对具有发明力的孩子具有压制性），他们不愿意进行变革。所有这三位学者，以及他们数以十计的助手，制造出一种农民思维的一般模式，这种模式的农民在认知和表示态度（影响）方面是有缺陷的。但是，当然，不是不可救药。^⑨从这一学说最近派生出来的许多理论之一是斯蒂芬·马格林的西方的脑力“认知”理论，这一理论是古老的“原始心灵”思想和较新的关于传统主义的思想的融合，它在实质上辩称，西方的心灵现在是、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科学的、符合理性的，而且在理智上是精明的——“认知的”——而非西方心灵在传统上属于技术和艺术（“技艺性”）型，但不具科学性。马格林关于这一古老学说的文字游戏说，非西方的某些“技艺性”应该与西方的“认知性”结合在一起，因为“技艺性”具有较少的智力成分，较多的情感因素，不太会毁灭自然环境，对非西方人导致较少的体质破坏。这种区分像是老的关于科学思想和富有情感的具体思

维的双重论的区分。^⑧马格林的思想为经济发展理论界（如哈根，他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家）提供了关于非西方非理性论的例子。

如果我们去考察社会思想其他领域中所有的雷同论点，我们将会脱离主题。只要考察以下论点就够了：在地理领域中，自从60年代至今，关于发明思想的传播的观点起着重要作用。关于农民和非西方传统主义的老的假定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一些地理学家声称，非欧洲人没有足够的智力来使用现有的手段对付干旱和台风等自然灾害。一个名叫罗伯特·萨克的地理学家关于空间的认识能力推出了一种古典的欧洲中心主义理论：大多数非西方人（具有原始心灵的人和大部分农民）不能像现代的西方成年人那样利用空间的概念进行思维。在他引用的权威作家中——他的论点来自权威不是证据——是莱维·布吕尔和皮亚特。^⑨在美国的教育界，（西方的）理性双重发展的理论采取了新的形式，在很多领域具有很大影响，包括在测试领域中。^⑩在哲学领域中，在上面反复讨论的关于理性思想的潮流和心灵——身躯双重主义的再现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系，正如人们在卡特森和康德传统之间、特别是在与现代的新康德传统之间所看到的不同那样。^⑪

我并不是说，关于非西方非理性的学说在现代学术界中完全是霸道的，也不是说以上的提法没有遇到挑战。然而，总的来说，这一学说在思想领域中处于某种支配地位，也许人类学和经济学是例外。人类学在近几十年中相当牢固地认为原始心灵并不原始，其中有几段时间是间断的。^⑫而且在经济学的某些学派中他们非常需要万灵的经济理性原则，把这些原则作为他们的理论的定理，因此他们愿意承认每个人都具有理性。

2. 理性与欧洲奇迹

关于欧洲理性的思想经常被称为“韦伯思想”，因为马克斯·韦伯在对欧洲社会演变进行各种说明时很重视运用这一思想，而且在说明其他社会具有较少的理性的反面论证时也重视这一思想

的运用。然而，理性论的学说在 20 世纪初期的欧洲广为流传，那时韦伯关于这一题目的重要著作正在出版。他把这一传统的学说进行了编纂，而且补充了许多内容，因此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一学说真的可以被称为韦伯思想。从另一种意义，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意义来说，这一学说也可以被称为韦伯思想：韦伯把欧洲的社会演变置于一种强调现代化进程的架构中，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与他有时候所谓的亚洲文明即“传统主义”进行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化的模式在学者的头脑中牢固地建立起来，这时马克斯·韦伯是这一模式中最显著的、也是逻辑性最强的基本社会学说主张的来源。从那时起，当学者们写欧洲的崛起时，或者强调理性的个性特点时，或者社会层面的特点和制度时，——韦伯把这些东西看做是最初始的内容（而且从总体上来说作为欧洲理性的结果）——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韦伯思想（甚至当他们拒绝韦伯模式的某些部分时）。韦伯对我们今天关于“欧洲奇迹”理论的讨论的重要性在于，今天最有影响的、也许是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奇迹”思想学派的讨论都或多或少是韦伯的思想。因此我们对韦伯关于理性的观点至少需要进行简要的讨论。

韦伯对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细致的具有洞察力的分析，尽管他的洞察力存在着重要的局限性。他仍然怀有他那个时代、他的地位和阶级的傲慢，认为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是社会演变进程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是智力的演变，是人类“理性”的升华，是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智力和道德观念的升华。（他怀疑将来还会有进一步的类似升华。）在这一演变的每一个阶段，人们创造出新的社会形式，如更高形式的国家、法律体系、官僚机构、经济、城市等等，但是这些形式基本上是理性的产物，这些形式本身不是演变的最初原因。但是向更加理性的社会的迈进发生在欧洲，发生在欧洲人中间。在欧洲时

间隧道之外，所有其他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传统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非理性。

首先，关于欧洲人为什么表现出这种理性，韦伯言之甚少，也就是说，关于理性作为基础的原因他说得甚少。他引用了几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这就是种族，另外一个因素是自然环境。其他的因素看来深深地寓于文化之中。但是在基础原因的层面上，韦伯很少讨论事物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他很少试图说明欧洲人为什么具有独特的理性，为什么早在新教改革运动和现代化之前就具有这种理性。^⑭看来在他的关于社会动因的观点中有一种原因，那就是思想和价值观念，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演变。他把思想和价值观念作为社会进程、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最初始的原因。在这一概念下，他就不会去寻找非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根源。没有疑问，还存在其他原因。

关于理性的、进步的欧洲社会与非理性的、传统的亚洲社会（非洲和美洲很少提到）之间的不同，不管韦伯认为其基本原因是什么，他在描述这些所谓的不同时非常小心翼翼。他的最重要的论点见于他所著的《经济通史、新教道德观念和资本主义精神》。欧洲人的理性的发展——在此之前就存在了——导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经济道德观念”，它是一个价值观和期望的逻辑思维过程体系，这个体系在主要方面是伴随着新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特别是清教徒主义），但是理性发展的更基本的意义是导致产生了资本主义。在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基本的理性导致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道德观念”和新教运动：韦伯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用狭义的宗教来说明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他确实用宗教说明了所谓的亚洲传统主义的许多方面，但是当他这样做时，原生的非理性被看做是存在于宗教之中。（例如，他写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魔术般的传统主义”。^⑮）

欧洲人的优越理性产生了欧洲不同于非欧洲的其他重要区别。欧洲人基本上是热爱自由的，没有受到东方独裁主义的蹂躏；欧洲的城市比亚洲的城市更自由，亚洲的城市被韦伯想象成为（在本质上）仅仅是一个完全被大的帝国所控制的具体实体，欧洲的城市被韦伯想象成为真正的新的形式的社会，这种城市出现在中世纪并且开始了现代化。^⑨（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亚洲的城市并不像韦伯描述的那样。其中有些城市是自由的城市国家，其他城市在松散的帝国保护下实际上是自由的。而另一方面，欧洲的城市远不像韦伯所想象的那样独立。）由于理性的不同，土地所有的制度也是非常不同的：韦伯说（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纯粹传统的欧洲观点），私有财产的观念仅仅在欧洲真正出现。那里的封建家园几乎就是真正的私有财产，而亚洲的家产被看做是作为有地位的人的收入来源而暂时分配的土地，是一种为服务付出的工资，土地通常返还给国家。然而，欧洲的封建财产从法律上和实际上也是按照服役的期限等颁发的，而且在这两个大陆上这类财产一般都具有继承性，而且最终成为私有财产（见第三章）。当然，韦伯还谈到欧洲和非欧洲之间的其他不同，但是这里所举的例子足以表明他的总的态度。

这里的大多数论点并不是韦伯提出的，尽管他对这些论点进行了编纂整理，而且对这些论点进行了出色的发挥。但是韦伯成为集大成的人物，“韦伯主义”成为说明欧洲“奇迹”的最重要的理论形式。其基本的形式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理性是根本的原因。不同的理性的作用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欧洲永远前进、实现现代化和资本主义；非欧洲则是停滞不前、传统主义以及各种非理性的文化属性如迷信。这里的模式是简单的传播主义模式：理性以及现代化在欧洲是永恒的。欧洲以外的地方除非通过欧洲的传播不能实现现代化。

“西方理性”今天在说明欧洲独特的崛起及其“奇迹”时被

广泛应用。属于种族优越的那种欧洲人的优越理性，今天已经不再使用，甚至不再含蓄地使用，但是历史学家如何肯定一种优越性而不肯定另外一种优越性，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其原因被推到不可拨开的古代历史的迷雾中去，也许有时候还对古代自由生活的欧洲农民进行某些猜测，或者推到东方的独裁主义方面去，或者引用马克斯·韦伯的某些话语。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我认为欧洲理性的思想只不过是把它看做是一种定理。不管什么原因，欧洲人就是那样构成的。

埃里克·琼斯在他的《欧洲奇迹》一书中使用大量篇幅用理性来说明欧洲在历史上的优越性。他声称，亚洲人和非洲人缺乏基本理性。他的这类断言俯拾皆是，他不想对这种公认的非理性负责，人们不得不怀疑琼斯在现代“奇迹论”历史学家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怀有最深的偏见的人。他只简略地提到非洲人，认为非洲人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被毫不含蓄地描述成为更近似于野兽的生物而不是人。

在非洲，那里的人们使自己适应自然。猎人感觉他们自己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站在这个系统以外用好奇的眼光向里面看。他们肯定不认为自己超越这个体系或者感觉比这个体系更优越。毕竟，存在着巨大的食肉野兽，它们把人看作是猎物。关于这种生态的统一性的最具有启发性的标志可能是寻找蜂蜜的向导了……那是一种与人共栖的小鸟儿。它们会飞，咕咕作声，飞在猎人的前面，引导他们到野蜂群居的树丛里，人们把蜂窝打开，食用蜂窝里的蜂蜡。
(p.154)^⑩

这是一个《人猿泰山》的形象。大部分非洲人是农民，不是猎人（我们以前讨论过）。在伦敦的郊区，食肉的麻雀与人共栖，

但是琼斯只提到非洲人的“共栖”。(我们将会看到动物行为学也同样地被用于亚洲人。^⑩)

这里很少有从事发展和发明的动力和压力，只要感到有压力就使用奴隶去消除压力，而不是去改进方法。那里的人们把他们的财富用于奢侈的生活。由于冲突和抓捕奴隶，到处（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pp.155~156)

因此非洲人没有创造力，富于侵略性，喜欢奢侈的生活，成为奴隶主和奴隶。而猎人则近似于他们所狩猎的野兽。因此：人们“不清楚当地可能进行什么开发”。(p.156)

亚洲人的思维没有逻辑性，他们“相对来说缺少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经验主义的探索和批评” (p.161)，而且“缺少一种干净利落的进行逻辑辩论的传统，这一点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亚洲的科学‘失败了’” (p.162)。“在解释自然方面存在着共识的思想看来是无稽之谈” (p.162)——也就是说，亚洲人也许甚至没有对科学验证进行概念化的能力，没有区分经验真理和虚假的能力。他们没有创造力：“亚洲的体制压制创造力或者把创造力导向生产沉迷于声色之中的奢侈品” (p.231)。

亚洲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妨碍进步。“东方的哲学（强调感情，价值和宇宙论”，结果损害了经验主义的思想 (p.161)。东方人懒惰 (p.163)。他们（像非洲人一样）“喜欢奢侈” (p.170)，他们喜欢购买诸如“翠鸟的羽毛……宝石……、现代药典上所没有的药物” (p.164)。他们有一种“奴卑态度”，他们的军队缺乏“彪悍的”下级军官 (p.167)。他们通常是内向的，向内看；他们“越来越不喜欢流动的社会，正在经历着“奇怪的经历”，他们自愿地进行自我“孤立” (p.170)，没有进行探索的欲望 (p.168, 177, 203, 231)。他们沉迷于毫无意义的战争

(p.164, 188, 197), 没有成文的法律体系, 而且没有政治界限的概念 (p.167, 194)。那里盛行盗窃和抢劫 (p.189, 199, 209, 229~230)。

琼斯在大多数这类判断中 (我只是举出其中的一些例子), 一般是指亚洲人, 而且贯穿他们的整个历史。^⑩有些判断更具体些。伊斯兰社会在一段时间内有一些创造力, 从其他社会借鉴了技术, 而且保留了古希腊的科学。(这是一种标准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信念: 阿拉伯人在黑暗的世纪中保留了希腊的科学, 此后把这些科学交给欧洲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就像是某种知识的失物招领处一样。) 奥斯曼帝国 (琼斯所讨论的惟一一种真正的伊斯兰文化, 它是伊斯兰作为一个整体和所有时代的标志) 消除了人们的新思想。它导致产生了非理性、落后、倒退和“蒙昧主义思想迷雾” (p.183)。奥斯曼人甚至不知道“最基本的地理” (p.184), 甚至不会绘制像样的地图 (p.179)。(琼斯本人也没有多少地理知识, 也不懂地图。) 那里的统治者经常是“腐朽的”、“醉汉”、“智力不全的”、“好色之徒”, 用独裁主义和恐怖手段进行统治 (p.186~187), 他们的“哲学”就是偷窃和掠夺, 而且“没有法律盾牌”来对付这些弊端 (p.187~189)。

印度社会从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来说已经“冻结” (p.192), 其价值观念对经济发展有害。宗教被用来制裁所有的行动, 但是宗教人员的劝导又是“恶毒的或者随意的” (p.195)。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像奥斯曼统治者一样腐化堕落, 从利己的观点出发管理社会, 倾心“声色”, 妻妾成群, 珠光宝气, 无所事事, 热衷阴谋诡计和叛逆 (p.196)。国家完全是掠夺性的。技术“几乎停滞不前”, 甚至也不摹仿外国 (p.199)。琼斯用一种相当奇特的言论声称 (那里) “没有成文的法典” (p.197)。

在中世纪初期之前, 中国在技术方面富有创造发明力。从那时以后, 进步停止了, 发生了“倒退” (p.203); 有些技术甚至

被忘却。中国人变得“内向”(p.203, 216, 220)。中国从技术、贸易和探索方面“后退”。甚至农业技术的发展也停止了，只是由于开辟新的土地，进行了不合理的、无法代替的森林的砍伐，以及及时地幸运地种植了新世界的庄稼如玉米、红薯等，才使中国暂时免受灾难，尽管砍伐这些森林是“人类对生态采取的最为愚蠢的行动之一”，这一愚蠢行动导致了“水土流失，沟壑纵横，河床淤塞和洪水泛滥”(p.213)。(看来欧洲和北美洲砍伐森林似乎不是“愚蠢的”。)农民陷于“嫉妒和怀疑之中”(p.206)，他们是愚蠢的农民(p.212~217)，而且他们喜欢“最大限度的繁衍”而不是过“富裕的”生活(p.218)。国家是独裁的，只是为统治者“吸取收入”，而不提供服务(p.206)。他们(还是)喜欢奢侈，这是一种“虚无的文化优越感”(p.205)，是一种腐败的、腐朽的、寄生的统治阶级。中国人有着“反社会的习俗”(p.7)，是一种病态社会。

琼斯在描述亚洲人和非洲人的特征时，反复使用了动物行为学。这是一种对动物的行为进行比较研究的科学。为了表明“支配关系”，他列举了东方交配行为(p.109, 209)。多妻制具有“动物行为意义”，同时，“聚集”奴隶也许具有“显示的目的”。“对于表示屈服的标志给予了很多注意，如下跪、作揖、叩头”(p.209)。对印度也使用了一种“类似的人类行为学如对牛的敬仰”(p.19)。回顾一下非洲的“共栖现象”。

这些关于非欧洲人在智力和道德上的低劣性的信仰是老的殖民主义时代的偏见，琼斯只不过是重复了这些偏见。一些历史学家很重视《欧洲奇迹》一书。我认为，他们的态度部分地反映了在我们的学术界仍然残存着的这些偏见的程度，而且这些偏见是作为隐性信仰存在的。

其他一些持“奇迹理论”的历史学家试图把欧洲的理性加到他们的解释性理论的基础上，或者接近于基础的位置。迈克尔·

曼可以作为这类人的典型代表。我们已经讨论过他所构想的那些小的理论，关于北部森林地带铁器时代的讲印欧语的人的理论，他们极具个性，有进取心，热爱自由（所有这些思想都来自19世纪或者更早的学术界，但并没有实实在在的欧洲证据，也没有欧洲以外的相对的证据）。曼轻而易举地转到古希腊，他认为这里是早期的以印欧语为根基的理性主义的产物。希腊人创造了大多数符合理性的东西，从科学到民主、到伦理（对人类的尊敬）。与具有理性的来自于北方的讲印欧语的人相比较，地中海沿岸的其他人的贡献则很少。（甚至征服了欧洲农民的罗马人的影响也被模糊地认为是“非欧洲的”。^⑧当来自北部的欧洲人清除了森林以后，历史转向西北方向，曼所说的欧洲社会的“领导势头”转向看来是事先预定好的目标，这就是英国。^⑨在中世纪早期，大约在公元八百年左右，出现了理性的一个新阶段，即把老的文化 and 新的基督教结合在一起。这时欧洲人表现出“理性的爆发”和他们独特的创造力，产生了具有革命性的农业制度和其他制度。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古代理性、新的基督教的理性和极好的欧洲环境。^⑩对曼来说，这是欧洲奇迹的核心。关于这一构架需要进一步评论的惟一部分是中世纪技术革命的理论，我们在下边将予以讨论。

小林·怀特提出了一项非常有影响的理性论的形式，他的理论是关于中世纪欧洲人独特的技术发明力，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这一点。约翰·霍尔提出了另一种版本，很像曼的理论，只是他强调欧洲人关于理性政治的发明创造，而且他倾向于跟随埃里克·琼斯，对亚洲的历史作出了各种消极的判断。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讨论当今历史学家如何把西方理性的理论作为他们的关于欧洲奇迹的理论的基础。我只是提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近于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佩里·安德森，他从古代希腊的理性一直谈到欧洲中世纪的进步。芬利也是这样。罗

伯特·布伦纳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论：在资本主义突然出现之前，在英国的自由民中不存在理性，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理性才突然出现，欧洲的自由农民立刻变得具有创造力，使人眼花缭乱，而且开始了一场至今尚未结束的技术革命。^⑨

（四）技 术

在所有用狭隘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人中，技术决定论是最适于欧洲中心隧道眼光的。它看起来像是严酷的科学事实，或者可以幻想为严酷的科学事实。“X是在这里发明的，是在某个日期，并且产生了这些影响。”在谈到技术问题时，人们可以否认这里面有人种中心主义：“这是严酷的事实，无可争议。”而且技术的意义也同样是无可争议的：一种新的工具确实生产出更多的食品，一种新的武器造成更多的伤亡，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可能具有历史意义；否则，也可能就没有这些结果了。但是技术决定论的最大力量源泉来自一种所谓的“叠缩历史”的错误。当我们在脑海里回溯到中世纪的欧洲时，我们追溯了欧洲人在技术上明显比其他任何人都优越的时代，因此我们倾向于设想那种优越性在此之前的所有时代都存在。但是欧洲在技术上超越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在产业革命开始以后。甚至在17世纪或者更晚些时候，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并没有走在其他文明前面。通过叠缩历史使中世纪充满了现代欧洲所具有的令人叹止的技术属性。这样只差一小步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既然技术在历史上明显的是一个有力的驱动原因，而且既然欧洲一直享有技术，那么这就是欧洲奇迹的根源。

但是工具不是自身发明的，也不是自身生产的。如果使用技术决定论，不仅需要表明技术出现以后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还必须说明这项技术为什么得到发明，是谁发明的。在关于欧洲历

史进步的一些说明中，几乎所有的（我认为）技术决定论的争论最终都是关于发明人的争论，而不是关于发明本身的争论。最后都是某种韦伯主义的断言，即欧洲人比非欧洲人更富有发明力，更富有创新性和“理性”。技术决定论与其他的隧道历史理论的区别主要是它声称具有理性的欧洲人通过发明新的技术推动他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通过发明新的政治制度、新的社会组织的形式、新的宗教等。

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家断言，从后新石器时代起，技术在所有的时代都是主要的推动者。现在很难忽视这样的证据，古代在农业、运输和其他领域的最伟大的技术创新都是从南方和东方进入欧洲的，因此关于技术的争论倾向于从中世纪开始。但是，也存在着例外。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迈克尔·曼使一种老的思想得到复活，认为铁器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使欧洲的农民社会经历了一场革命，而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生这样的进程，铁器在欧洲导致产生了令人惊奇的、积极进取的（等等）类型的社会，这种社会植根于使用铁犁的讲印欧语的农民。与此同时他还断言，古代中东的东方独裁主义阻碍了技术发明，那里的农民被认为受到由于进行灌溉而产生的政治体制的严格控制。但是这一理论与大量的证据相矛盾。关于这一时期中东的技术进步人们知之甚多（从新石器时期的后期到“铁器时代”和以后），因此关于这里不具有发明创造力的概念是不合理的。铁器的使用并不是欧洲的发明，很可能来自中东，也有证据说明来自更远的地方（包括西部非洲）。中东的灌溉农业和非灌溉农业使用了犁，欧洲农业也使用了犁。犁在中国的使用可能比在欧洲的使用更早些。因此曼（和其他人）提出的关于技术的论点是不合理的，其心理和社会的推理是错误的。

其他许多持“奇迹论”观点的历史学家准备从古代希腊着手，把这里的人定为最初的独一无二的具有创造发明力的欧洲

人，但是希腊人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不如在他的南边和东面的邻居那么多，因此这类论点必须回到“理性”的抽象思想上去，这就是潜力，而不是事实，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罗马人具有一定的创造力，他们的邻居也具有创造力。在欧洲的黑暗世纪，大家都同意，技术上的进步并不引人注目，而在非洲和亚洲的某些部分技术的进步实际上正在得到健康的发展。我认为，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不愿意追随迈克尔·曼的观点，也不愿意追随那些声称发现在中世纪之前欧洲就取得了独一无二的技术进步的人们的观点，尽管在几十年前这种观点曾经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大多数人不会同意埃里克·琼斯在《欧洲奇迹》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即认为欧洲是“在它的不间断的技术知识积累中的突变文化”（p.4~5），因为这种过程在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的。

关于中世纪时期的技术方面的争论非常突出。在这里经常会看到欧洲“奇迹”历史学家经常提到的关于技术“向现代化起飞”的思想。通常采用的论点形式是：直到黑暗世纪时北部欧洲的人的确还相当落后，中世纪早期以后那里发生了某种觉醒，北部欧洲人这时突然作为我们所知道的那种人出现——世界上最富有活力、最富有进取心、最富有发明力、最迅速崛起（等等）的人——而关于这一崛起的关键是中世纪初期的一系列技术发明，这些发明主要是根据历史学家的断言，根据关于欧洲人发明的断言，而同时无视非欧洲人的发明，因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隧道历史。

小林·怀特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他所著的《中世纪技术和社会变革》提供了这类例子，也许是最纯粹的方式表述了技术决定论隧道历史的论点。这本书于1962年出版，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他的论点被吸收到许多“奇迹论”历史学家的理论中，包括曼、琼斯和霍尔（他不仅多次在他的著作中引用此书，而且用他的论点来支持他的理论的许多关于技术的论点）。这本书试图

表明，在中世纪时期技术创造发明是欧洲崛起的中心动因。怀特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的欧洲的发明，而且表明每项发明对欧洲历史所产生的令人惊奇的影响。下面是对初步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提供的一个例子。在中世纪发明的铁制的马镫具有“历史催化影响”。它使一种新式的骑兵战成为可能，创造出中世纪的骑士现象，而且导致产生了封建主义（骑士成为庄园主）。因此，“由于发明了铁制的马镫，才可能产生我们所知道的在上一个千年中骑在马背上的人的出现”。^⑭

但是，怀特的重要论点涉及到生产性的技术，特别是农业技术。他声称，在中世纪初期欧洲（特别是北部欧洲）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使欧洲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革命化变化，这一变化构成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崛起的重要说明。他相信，有三项欧洲发明具有关键作用：重型耕犁、马的项圈（以及马力的使用）和三田轮体制。

重型耕犁由（典型的是）八头牛来拉，怀特设想这种情况最初在6世纪的欧洲中部出现；然后这一技术迅速传到西北部欧洲，而且“对8世纪卡洛林王朝所爆发出来的活力起了重要的作用。”^⑮正像在他之前的人那样，怀特使人们注意重型犁的重要作用是正确的，他把重型耕犁看做是在潮湿的和较为寒冷的欧洲部分的一项重要农业发明创造。这对开垦土层较深的北部欧洲平原的重型土壤具有很大优势，而且鉴于北部欧洲潮湿的气候，深耕土壤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把这种耕作传播到具有较湿润的土壤的地区。因此，重型耕犁对中世纪农业生产提高总产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重型耕犁并不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发明的。在公元前由24头牛拉的犁已经在印度北部使用。^⑯南部欧洲使用较轻型的耕犁，因为那里的土层较轻、较干，但是从技术上来说区别并不大。看来可以肯定地说重型耕犁要么是从其他地方传播到欧洲北部，要么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农具并加以改造来适应当地的情

况。因此这不是一项欧洲的技术革命。而且这一发明在欧洲北部的影响也许应该归于社会力量，归于一种引进重型耕犁的社会力量，而不是归于这项技术本身。我们知道，例如，封建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耕种业的扩张，这部分地是由于庄园主的驱动，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扩大他们的领域来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利，也部分地是由于农民对庄园主不断要求他们提高剩余产品量的要求所作出的反应，为了满足这一不断增长的要求，如果农民不能找到一种新的增加总产量的方法，农民家庭的生存将处于危险的境地。看来，不管怀特对耕犁赋予了什么样的历史影响，实际上应该把这种影响赋予作为社会制度的封建主义。他所说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令人惊奇的。

怀特说，由于采用了重型耕犁，人口得到了巨大增长。耕作制度也转向了“开放的土地”。按照怀特的说法，这种耕作制度导向了人类合作（好像在此之前人们不知道群体生活，其他地方没有群体生活）即“群体模式”的发明。这是一场社会革命，一种“农民社会的再缔造”。这是“庄园经济的实质”，但忽视了庄园是由庄园主所有，而不是由村民所有这个事实。^⑧更为重要的是，此后“北部农民对自然的态度和对人本身的（黑体字是我加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因为许多家庭需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耕犁小组，因此他们分得的份额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成正比，而不是按照他们的需要。（“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大变化：过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现在他成了土地的使用者。”^⑨）

但这是一派胡言。不管是技术方面的论证，还是社会推理都是没有意义的。《最终税册》载明组成耕地小组的家庭占 2/3 或 3/5。^⑩开放土地制度看来很古老，在欧洲广泛存在，早期在亚洲和北部非洲也存在。^⑪使用耕作组和重型耕犁的北部村庄，其合作的程度并不比南部的村庄高，而南部的村庄使用的是轻型耕

犁。在一些社会中存在着村社土地所有制，这意味着比欧洲的开放土地制度更大程度的合作。庄园经济是一种社会制度，不是一项技术发明。其他事物可以依次类推。

怀特所说的第二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展被称为“马力的发现”。^⑧当然，一段时候以来马就存在。对于怀特来说，重要的发明是现代的马的项圈，他认为这项发明是在9世纪之前的西方出现的。按照怀特的说法，马的项圈改造了北部欧洲的农业和运输，使马代替了牛来拉犁和车。马的拉载量与牛差不多，但是速度快百分之五十。从这一事实出发，怀特得出了令人敬畏的结论。他说，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增长。商业活动得到加强，因为用马运输比用牛运输便宜许多。村庄变大了，几乎成了城镇，因为这时从家到土地的半径扩大。村庄的扩大产生了“一种更加城市化的生活道德”，使农村有了教堂、客栈、学校（现在孩子们“可以学习字母了”）。^⑨而且现在可以得到“来自远方的新闻”。这是一种总体的具有深刻意义的转变。它使村庄“城市化了”，使农民“从心理上作好了准备”来迎接“西方文化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⑩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种发明创造：马的项圈。

然而，马的项圈在此之前就广泛地存在于欧洲和亚洲，而且很可能当时是为了使用骆驼而不是马而发明的。^⑪此外，在犁地和运输方面认为马比牛优越的观点存在着广泛的分歧：使用马效率更高，但是养马的费用要高，而且还要求把种庄稼的地用来种饲料。在英格兰，马没有能够代替牛。村庄的规模与马的使用没有关系。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那里没有使用马力，而那里的村庄比北欧的村庄要大些。在像中国那样的国家里，经常用运河长途运输粮食，比用马拉的车运输效率要高得多。如此看来，从技术方面提出的论点和从社会方面进行的推论都没有意义。

最后，怀特对三田轮休制度的奇妙效果给以同样的重视。他的部分论点是每一个欧洲儿童都熟悉的，他们在学校中学习，

三田轮体制比老的二田轮体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为（主要）推广这种耕作制度使休耕的土地比例从二分之一大体减少到三分之一。但是，怀特还附加了另外一条好处。这样做可以广泛地种植燕麦，可以更广泛地使用马力。他在《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革》的一个章节“三田轮体制和肥力改良”中辩称道，三田轮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能够种植豆科植物，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欧洲的饮食，从而“引申开来可以解释……人口惊人增长的现象，城市规模的增大和数目的增多，工业生产的兴起，商业的发达，以及使那个时代充满精力的精神。”简而言之，小林·怀特说，“中世纪是充满了豆类的世纪。”^⑧

但是，所有这些（更不要说有关的双关语）都是站不住脚的。怀特辩称，人口增长缓慢是由于饮食的不平衡（他说碳水化合物过多，蛋白质供应不足），这是没有根据的。农民采用二田轮体制，不是因为缺乏蛋白质，因为早在实行三田轮体制之前就已经种植豆科植物了，谷物也同样含有蛋白质，人们还大量消费水果、畜产品等等。三田轮体制不是一项技术革命。首先，甚至更精细的耕作制度，包括没有休耕的耕作制度，早在中世纪之前在世界的很多地区已经实行，而且我认为在欧洲的某些部分（例如波河平原的某些部分）这是一种普通的耕作制度，那里的土质深厚肥沃，土质的水分涵养也好。其次，在许多生态平衡的地区，人们更喜欢采用二田轮体制度，不用其他耕作制度来代替这一制度，也有的地方是因为需要牧草而采用轮体制度。情况是复杂的，但总的脉络是清晰的：三田轮体制既不是一项技术革命也不是社会变革的源头。而且在其他大陆也有类似的耕作制度，因此不能说三田轮体制是欧洲的奇特耕作制度。

怀特在《中世纪技术和社会变革》中关于技术革命谈得很少。然而，他在其他部分谈到这一问题，我们看到他的基本论点的确具有很多韦伯主义观点。^⑨技术决定论化解成为意识形态决

定论，其重点是欧洲人的创造力和理性。怀特把这一点基本上归属于宗教：部分地归于“犹太教——基督教”，而在很大部分上归于“西方基督教”，而前者预示着欧洲的独特“对永恒进步的信仰”，从而导致了“对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信仰”。^⑧后者导致了“西方对基督教的一个信条的自发认识，即人超越自然并有权驾驭自然的能力”，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分离。对一个信仰西方基督教的人来说，自然富有惰性，没有价值。如果“认为精神寓于自然之中”那将是亵渎神灵。^⑨这就给予西方基督教一种驾驭、使用、改造自然的欲望和权利——即创造新的技术。这一论点的错误是明显的。首先，表现了对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教义的无知。其次，怀特恢复了种族中心论的神话，即古代的异教徒和现代的非基督教的信徒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充分地把人和自然分离，而且相信精神寓于所有事物中的原始观点。实际上，中世纪的基督教徒的确认为精神寓于所有事物之中。（这是上帝的意志。）他们不是绝对地把人与自然分离。这种二元论是现代的产物，主要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自然商品化。二元论是后笛卡尔的思想主张，而不是深深寓于“西方基督教”的某种思想。中世纪的基督教徒相信，世界只有一个，这是一个充满物质的空间，是一个不间断的链环。总的来说，中世纪的人不像怀特辩称的那样认为他们是处在“永恒的进步中”：他们相信地球的毁灭，而且在总体上相信上帝的创造是完美的、完整无缺的。怀特只不过是在叠缩历史，这是为了能够辩称，现在欧洲关于技术和技术变革的观点实际上是基本的，是欧洲人文化的古代属性，而且只有欧洲人具有这种属性。他的中心论点基本上是隧道历史：欧洲人具有独特的创造力，因此他们创造了独特的技术，并且取得了进步。

我相信，所有关于欧洲的技术在中世纪具有优越性的言论都将受到大致如此的怀疑，最终被证明它并不比其他地区的技术优

越。我认为情况是清楚的，本半球的所有文明都在创造出新的技术并且与周围的地区分享这些技术；这种“分享”随着在两个领域中的应用采取了通常的传播机制：农业技术从一个农民传授给另一个农民，其他技术（包括商业化了的农业技术）主要通过城市网络的贸易和运输进行传播，或者有时（如某些军事技术）随着征服行动的地图进行传播。因此我看到技术在欧洲、非洲和亚洲平衡式的发展。只是在1492年之后，由于欧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欧洲技术才开始超越亚洲和非洲的技术。中世纪的技术演化是否成为导致中世纪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我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留给别人。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为某种社会变革的理论进行辩护，只是说明欧洲社会变革的过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第三章，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说明技术和经济现象如何在中世纪的欧洲、非洲和亚洲出现，而且在这三个大陆上的变革进程——就技术和经济来说——相当类似。

在我们离开技术这个题目之前，有一个有趣的问题需要说几句：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公式”。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技术历史的知识比以前要多得多，这主要是通过李约瑟和他的合作者的著作得知的。^⑨在此之前的时代里，坚持欧洲奇迹论的人倾向于无视中国的技术成就。（韦伯也是这样，但比大多数人的程度要小一些。^⑩）他们采取的通常模式是承认中国的某些发明时间较早，但是声称，从总体上来看重要的技术进步发生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即使中国的真正重要发明，他们也经常把这些发明说成是玩赏性的，而欧洲人把这些发明付诸实用。（当然，这个系列包括火药，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被认为仅仅是为了做鞭炮。）如果人们把这些说法放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种经典式的关于中国模式的传播：他们在早期年代取得了某些进步，但后来进步缓慢，停滞不前，只有当欧洲人带来了新的思想时他们才又重新启动。

现在人们毫无疑问地知道，中国的技术与旧世界的西部处于同等水平，在某些方面超过西方，在某些方面不如西方，这是指在中世纪时和在此之前。^①这一新的知识对许多欧洲奇迹论是个致命性的打击，因为他们声称，在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在技术方面的进步是出现欧洲“奇迹”的重要因素。（如果说中国人在同一时期也达到了同样的水平，那么关于欧洲具有独特性的论点就不摧自垮了。）鉴于这种情况，许多奇迹论的理论作了一般性的修正，以便对新获得的知识给以考虑。其典型的公式如下所述。

① “如果中国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的确迫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自己的奇迹，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欧洲之外，只有中国的文明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欧洲比其他任何人都优越，这是没有疑问的。这对那些想表明印度、非洲、中东等其他地区不存在发展潜力的人来说，这种说法是方便有用的。

② “不管在中世纪中国发生了什么技术进步，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停止下来。”在这个公式里，这一论点在不同的技术领域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其中心论点是相当标准化的：中国中世纪的文化所具有的某些特点使它停滞发展、裹足不前。换句话说，在这里塞进来的是东方停滞不前的老一套学说。最典型的是，韦伯被援引用来表明这一观点：韦伯所宣称的中国不能取得进步的原因，几乎全部被用来说明这一点。有些历史学家抓住韦伯关于儒家学说具有窒息作用的论点不放。而其他一些人，不去理会韦伯关于中国人的个性的种族中心主义论点。但是韦伯关于城市、土地所有、官僚机构和帝国等观点，仍然经常被引用。中国的城市是“不自由的”，而且不存在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土地所有不是私有财产。中国的官僚机构和中国的帝国国家是“不合理的”，阻碍社会进步。

对于这一论点，可以分两步作出反应。首先，正如珀塞尔所

指出的那样，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的进步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为什么停止发生和如何停止发生（如果中国人真的停止了进步）。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必须说明，中国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富有技术发明创造的社会，而且在很多个世纪内，它的技术水平在技术领域超过了其他文明。在这一进程中韦伯一点也没有帮忙。韦伯的整个理论框架只是说明停滞，而我们所要论及的是中国取得的显著进步，而不是它的停滞不前。

第二步要求集中看一下准确的时间。按照欧洲奇迹论的历史学家的说法，中国取得进步的时期是被认为停止不前的时期。按照埃尔文的说法，中国的广泛的技术进步在14世纪初期结束。在这个时期，中国也许取得了最为长足的进步并拥有世界上最高度商业化的农业。中国的工业技术在纺织业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机械表已经为人们熟知。^⑩中国的商船队航行于东南亚并进入印度洋。中国的火枪无与伦比，运河技术蔚为壮观，等等。概括来说，伴随着明朝的兴衰所发生的变革与技术进步的下滑联系在一起，尽管在某些技术领域（造船、火炮、活字印刷——大约在1400年，在朝鲜^⑪——还有其他发明）继续取得进展。但是欧洲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取得重要的技术进步。在1350年后，欧洲在经济和技术方面都停滞不前。没有证据证明欧洲的技术在1492年前取得了进步。文艺复兴运动不是如像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场技术革命。^⑫1492年之后，欧洲再次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如造船）。真正重要的革命性的技术变革是否在18世纪之前开始，这个问题在欧洲历史学家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相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存在“停滞”的问题。而是，在两个世纪中进步缓慢下来，这种现象在所有人类文化中是人们所熟悉的，因为正常的过程就是发展的不平衡。这意味着，这是第三世界历史学家所集中关注的一个问题，

而欧洲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忽视它。由于欧洲人的商业在16世纪的扩大——我们在本书中认为1492年是这一过程的真正的起始日——野心勃勃的欧洲商业社会开始在各地与中国进行竞争和贸易，特别是在马尼拉和一些中国南部的港口。中国的商业社会为什么没有在这种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商业优势不断地转向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换句话说，这里没有什么停滞需要给予解释。问题是欧洲人怎样和为什么在1600年左右取得了长途贸易的重要控制权。由于后面的章节还要进行讨论，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说，这一过程并不反映在任何亚洲文明中存在着内部的文化的“障碍”。相反，这反映了1492年后欧洲海外企业在利润、规模和组织方面的巨大的迅速发展，而这一点其他人无法加以利用，因为新世界的金条越来越多地流入欧洲商人的金库（我们将在第四章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

在15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军事、外交和商业性的船队数次进入东南亚和印度洋。有些船只上配备了数百人；有些船非常大，在甲板上种了蔬菜。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伟大的航海活动的意义；我现在要说的是需要注意欧洲奇迹论历史学家企图把这些事实用来说明他们关于中国没有取得进步的理论。他们的标准说法是：“但是他们停滞下来。”事实上，中国的最后一次航海在1400年左右结束。但是他们航海的目的已经完成。中国的商业船队继续在东南亚进行贸易，没有停滞下来。的确，中国的皇帝有一段时间禁止中国船队出海（主要是在16世纪初期），但是这种禁令只不过是索取贿赂的（实际上是地役权）一种手段，而且并没有实际执行。对“奇迹论”历史学家来说，皇家禁止船队出海这件事成了中国停止进步的证据，只有欧洲具有取得“奇迹”的潜力。这不符合事实。

中国人可能已经发明了枪支；无论如何，在中世纪后期，他们制造火枪的技术与其他任何文化都并驾齐驱。欧洲奇迹论历史

学家在论述技术领域中的问题时（以及其他理论），他们的典型办法是卡洛·奇波拉在他的著名的而且有影响的《火枪、船帆和帝国：技术发明和欧洲扩张的早期阶段，1400～1700》所采用的办法。开始时他承认，“中国的火枪至少和西方的一样好，如果说不是更好的话，这种情况持续到中世纪初期。”^⑥但是，一个世纪以后（1517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广州的海岸并鸣放礼炮时，中国人奇怪地退步了：

欧洲人的炮声震醒了中国人……使他们看到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伙陌生的外来人，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们的海岸边，他们用优越的、坚不可摧的武器保护自己并进行威胁……如何对待这些“洋鬼子”？与他们打仗，还是置之不理？是模仿并采取他们的技术，放弃当地的习惯和传统，还是与他们断绝一切接触，隐遁到与世隔绝的梦乡中去？何去何从？……进退两难，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⑦

这样，关于亚洲停滞和欧洲奇迹的神话，用诡辩代替了事实。“中国公式”看来失去了可信性。但是，没有疑问，一种“印度公式”、一种“伊斯兰公式”和“非洲公式”等等，将会被制造出来兜售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我们在进一步讨论有关印度、中东和非洲在1492年前的技术发展时将会看到这一点。

（五）社 会

在第三章我们将讨论中世纪的欧洲，从社会范畴方面把它与中世纪的亚洲和非洲社会进行比较。社会范畴在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变革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社会范畴中（形式、事实）存在着阶级、国家、土地所有、贸易和城市化。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有限的，只是批评关于某种社会范畴使得欧洲在中世纪末期1492年之前崛起并领先于所有其他的文明的理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选择几个社会范畴，这些范畴是现代欧洲奇迹的

历史学家宣称能够完成这一历史领导任务的候选范畴。它们是推动所谓的“现代化起飞的”原动力。他们所喜欢的范畴看来是国家、教会、阶级和家庭。这些社会范畴经常用所谓的最基本的力量进行自身解释：欧洲理性，欧洲技术，欧洲人口独特性，或者欧洲环境的优越性。关于这些内容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因此下面的讨论是简要的。

1. 国 家

一种典型的论点是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模式着手，一种中等规模的、很好组合的、比较民主的国家，这种国家在资本主义兴起后出现，出现在现代化之后，以及法国和美洲革命之后。没有人否认，这种形式是独特的。但是，欧洲奇迹历史学家关于这种国家形式倾向于两点：它或者在欧洲历史非常早的时期出现，早到能够在现代化中起到原动力的作用，或者这种国家是欧洲文化内在的东西，这种国家形式自然地并且合理地是由热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反对独裁的中世纪或更早时期的欧洲人所创建的。有时候同时作出两个论断：欧洲的道德理性的推理，同时，在国家一级进行全面的论证。

例如，埃里克·琼斯在《欧洲奇迹》一书中正是这样做的。他说，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接近于“欧洲奇迹的核心”。^④他的这一论点，把欧洲具有内在的独特的热爱自由的传统偏见与一些非常古老的环境主义论点结合在一起。首先看看后者。琼斯使用了人们熟悉的论点，欧洲在早期有一批肥沃的核心地区，它们成为地区文化的核心地区，琼斯把这一论点转变成一种怪诞的论点，那就是，欧洲的生态核心地区自然地导致了一种中等规模的国家模式。他说，这种模式不像亚洲社会的“帝国”模式。在琼斯看来，帝国的内在本质是独裁专制，而且其内在本质是干预经济的发展。而欧洲的地理使它免受这一厄运。如果说一批欧洲现代国家享有生态“核心地区”，那么多数国家并不享有这一优势，

而且这些中心地区只有少数演变成为国家。他所列举的模式是环境主义理论的模式，也是无效的模式。无论如何，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也可以找到可与比拟的这种核心地区。中等规模的、独立的、能够从事生产性农业的环境是典型的东南亚环境，包括相当独立存在的大陆核心如伊洛瓦底和湄南河盆地，湄南河中游，以及红河，甚至更为孤立的地区，在苏门答腊（二、三地）、爪哇（三地）、巴里、龙目的、苏拉威西、吕宋等等。就此而言，印度和中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此类分割。在非洲也有明显的这类核心地区，包括尼罗河中游、乍得、刚果等等：西部亚洲、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等地也是如此。^⑩

其次，琼斯把这种自然的欧洲国家形象描述成为某种自然形成的他所称谓的“某种国家体制”，它们是一系列大体面积相同的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在中世纪相互作用，就像黑格尔所描述的个体那样，它们相互竞争而又合作，共同向前发展，就像是一个由会员组成的俱乐部一起走向现代化。这样，琼斯在中世纪就看到了深层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国联。通过叠缩历史，他使中世纪的欧洲整体充满了所有现代国家的优点：这些国家提供公共服务，鼓励经济自由发展，它们从一开始就是民主的等等。而所有这些，其最基本的原因是它们的周围环境以及生存在这种环境中的热爱自由的欧洲人。实际上，他所描述的这种国家类型和国家体制大约在17世纪之后才出现。琼斯发现了已经在使欧洲现代化的政治特性，虚伪地声称这些特性早就存在——有些特性是环境方面的，因此一直存在——因此他声称已经证明了欧洲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由于某种原因一直在欧洲（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存在着。实际上，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大杂烩，存在着一些拥有部分主权的封建政治单位，那里的情况是混乱的，作为国家的政体并不是总能辨认出来，而且很少具有琼斯所描述的这类政治体制的现代国家的特性。

但是，要弄懂这类政治历史模式的荒诞之处，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琼斯是如何谈论欧洲以外所谓的野蛮的、独裁的国家。在欧洲以外，一种自然的非理性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与美好的欧洲国家和国家体制相反的结果：巨大的东方帝国。亚洲在政治上为什么没有像欧洲那样发展？亚洲的政治“幼稚病”被琼斯说成是①心理上的劣势，包括在智力活力方面的非理性，缺乏创新性，而且在渴望进步方面存在缺陷，拒绝接受支配，崇尚兽性等等，以及②一种不好的自然环境。这些缺陷（和某些较小的缺陷）所产生的影响，构成了亚洲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即①人口增长没有得到控制；②坏政府，“东方独裁主义”或者如像琼斯那样给这种政府戴上帝国的帽子。《欧洲奇迹》这本书关于欧洲国家制度如何有利于发展等主要论据自始至终都是琼斯的反证，那就是亚洲帝国的邪恶性。然而，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这种反证像这种理论一样空洞无物。事实上，琼斯没有提供任何可信的证据来说明为什么这样的帝国存在于亚洲，而没有在欧洲存在。他也没有提供可信的论点来说明为什么大的国家不像中等规模或小的国家那样有利于进步。（他对亚洲所取得的真正的进步视而不见，对亚洲许多并非帝国的国家也熟视无睹。）当我们研究琼斯关于亚洲帝国的理论时，我们发现他的理论与国家的规模和类别无关，而只不过是他的关于非欧洲社会基本政治性质的一种概念。这种理论只不过是“东方独裁主义”的老思想。亚洲人，实际上所有的欧洲以外的人，自然都遭受到卑鄙的、独裁的、贪婪的、不负责任的邪恶的政府的统治。只有欧洲人懂得什么是国家并且享有自由。

这种理论在一些历史学家中并不罕见，他们企图论证欧洲的政治进程和形式是导致中世纪“奇迹的”原动力。这种理论的基本形式是传统式的。它主要包括三个命题：欧洲人具有一种古老的、底蕴很深的理性，这种理性是他们走向现代的公开的民主的

政治形式（或者不那么直接地说，走向个体的经济行为，因此倾向于喜欢一种最低纲领主义的国家）；欧洲以外的人情愿地自然地接受一种独裁的帝国国家形式，这种帝国有时很强大，但总是惟我独尊；欧洲的自然环境对政治现代化给以不同的独特鼓励（享有生态平衡的核心地区，肥沃的土壤，可以通航的海角和海湾或者水道）。在他们的论证中还有其他命题，但是上述三种命题是最为广泛使用的命题。

这些命题与一项意义深远的神学原则结合在一起：不管是什么原动力在发挥作用，它们早就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早在中世纪末期之前它们就使现代化进程启动了。当然，这是问题的核心。我在本书中论证，现代化（不管你怎么称呼它）确实在中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但不仅仅在中世纪的欧洲发生。因此，1492年之后的事件并没有启动现代化，只是使欧洲的变革在规模上得到增加，最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崛起的”社会。因此我们从一元论的命题的基础上论证，在中世纪欧洲并不比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享有更大的潜在的优势。推动中世纪的欧洲进入民主化和现代国家的力量本身并不说明欧洲享有任何独特性。

约翰·霍尔使用琼斯的基本模式，强调他所谓的“障碍”阻碍了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教的中东形成现代的国家形式。简单说：中国由于帝国体制受到损失。印度由于种姓体制（因此没有政治可言）而受到损失。^⑧伊斯兰地区的政治反映了部落主义。霍尔所描述的这些文化是这些体制的非常古老的形式，而且实际上不是这些体制的典型形式，他认定这些体制是冻结的、永久不变的，他把这些体制与后来的中世纪以后的欧洲的体制进行对照，从而推断这些因素的胚胎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他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一个论点，欧洲以外的地方总是缺少“奇迹”的潜力，而欧洲一直具有这种潜力。^⑨

迈克尔·曼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使用了“权利”这个抽象实体，

而不是更为有形的“国家”，但是他的论点没有根本的不同。他像其他一些“奇迹”论历史学家一样，试图对中世纪封建主义早期的政治上的混乱进行说明，那时的政体和主权支离破碎，他试图通过描述这种状态形成关于现代化初始的论点。这些很小的政治社会单位意味着，它们“更精细”，具有更多的内涵，孕育着更多的发展潜力，而欧洲以外的那些所谓的幅员辽阔的帝国政体则不具备这些条件。曼关于“精细”的概念基本上是一种价值概念，而不是事实。^⑩在这一情况下，我们不妨看看大宪章神话：把权利从国王下放给贵族在传统上被描述为走向民主的行动，尽管那时的贵族很难说是民主的，而穷苦的人们则希望能够越过他们直接向国王陈情。（而后来王室的权利的提高被描述为走向民主的进一步行动，只是你不能同时享有二者。^⑪）让·贝希勒使用了大致相同的模式——尽管他不像霍尔和曼那样，但与琼斯如出一辙，他贬低基督教在政治演化中的作用——附加了一个论点：贝希勒认为，中世纪的欧洲贵族（最初是印-欧“斗士贵族”）本身是民主的最初源泉，他莫名其妙地声称，贵族之间不仅是相互用民主的方式（尊敬的方式）处事，而且他们尊重他们的农户的权利。^⑫

但是，在中世纪不存在民主：欧洲的国家像其他任何地方的国家一样独裁。正如我们看到的古代希腊，欧洲存在的政治形式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说城市国家（也许）是最接近于民主的——其中一些是共和国，而实质上是商业寡头——看一看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的许多种类的城市国家也就清楚了。共和国的形式在亚洲和非洲也并不陌生。

2. 教 会

关于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教会在欧洲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的作用，许多理论列举了这样或那样的根据。^⑬（许多理论把这种作用赋予基督教，我在这里不作评论。）当然，教会的

确具有这样的作用。问题在其他方面。主要的问题是教会（或者各种教会）是否为欧洲和欧洲人提供了某种东西，而欧洲以外的人的宗教机构或者他们的文化机构没有提供这些东西。例如有一种说法，认为中世纪的天主教从文化上统一了欧洲，达到了其他地方没有达到的程度。但是可比的或者类似的进程也发生在其他地方。例如，那些多次遭到诋毁的帝国，如中华帝国，也从许多方面造就了统一，而伊斯兰教也为穆斯林世界造就了统一。还有人辩称，中世纪的教会对欧洲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提供了补偿，尽管那里缺少一种明确的强而有力的国家模式，还是发生了泛欧洲的发展。的确如此。我们所谈的问题具有可比性：教会是否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其他文明不能提供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否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经常使那里保持政治上的统一？我认为答案是，教会并没有给欧洲某种特殊文化品质，没有提供其他文明所没有的东西，没有提供使欧洲在社会演化中能够跑在其他文明前面的东西。

对于中世纪教会使欧洲在历史上具有优越性，而其他宗教机构或者文明不具有这种优越性的说法，我不认为这些说法有什么根据。例如，约翰·霍尔断言，“基督教为国家的出现提供了最好的外壳。”^④迈克尔·曼声称，中世纪的教会“不惜冒犯世俗当局，鼓励提高道德和改善社会”——人们对这种说法可能会提出疑问，不仅从比较的角度提出疑问，而且对欧洲教会所起的作用提出疑问。^⑤对哈拉姆来说，“中世纪的拉丁教会是资本主义早期现代思想的苗圃。”^⑥沃纳认为，“欧洲奇迹”（发生）……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基督教世界，而天主教的教义在西方占据着主导地位。^⑦这种说法没有与其他宗教或者文明进行比较，也没有看到假定的欧洲的兴起不是发生在中世纪，而是在此后的某些时候，而且基督教有助于后来的发展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没有必要去讨论马克斯·韦伯有名的关于宗教在欧兴起中所

起的作用，或者他的有名的说法，即关于新教改革运动在资本主义兴起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韦伯的观点当然是上面我所批判的观点。但是关于宗教的作用的根据不是本书讨论的问题，本书所关心的是关于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文明以及它们的活力的统一观点。

3. 阶 级

有三种关于阶级的论点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第一种是关于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在历史上的优越性的双层论点，这种论点可以概括如下：①没有阶级（或者“阶级存在前”）的地区和人群与欧洲的优越性风马牛不相干，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不相干，因为没有阶级的社会必然是没有进步的原始社会。②因此，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阶级层次化的社会（欧洲的一些社会）是进步的，而其他社会（主要是亚洲）是停滞的和落后的等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部分被笼而统之地宣布为没有阶级，因此与世界历史无关，这种论点仍然被广泛地使用着，存在于一些分析性的著作中（其中包括埃里克·琼斯的《欧洲奇迹》），存在于一些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如第一章提到的）以及一些（也许是主要的）世界历史现代地图上。（许多这样的地图上没有从新石器时期以后到1492年关于非洲的历史地图！¹⁹）关于这一问题，我不准备进行广泛的讨论，我只提出以下几点：非洲在1492年并不是没有阶级（在第三章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没有阶级的社会并不是停滞的社会，²⁰而且提出这类无阶级的论点的历史学家经常自我矛盾，他们宣称古代的和中世纪时期的没有阶级的欧洲人——“野蛮的部落”、德国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等——是非常进步的：在借用了阶级的思想以及罗马人的一些其他东西之后，这些原始的然而被认为是进步的、富有发明创造的、进取的、喜欢探索的、有成就感的欧洲人就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

看一看一个社会在历史上的阶级结构是人们的习惯，而且是

正确的，也需要弄清各阶级对变革是赞成还是抵制，他们的行动方向是什么。不进行这样的调查，我们的分析通常会带有偏向，把动因仅仅归于国王或者其他上层社会。如果简单地断言某一阶级在欧洲的历史上起到了某些有效的作用，而这个阶级在欧洲以外的文明中并不存在，欧洲中心主义就成了问题，这类论点在欧洲奇迹论的文献中是常见的。尽管保守的历史学家特别赞成，而且在那些死守老的“阶级社会阶段论”的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会经常看到。后者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是帕德古格的论点，其中奴隶式的生产方式，即最纯粹的奴隶方式——奴役性在商品生产中占主导地位而且还导致了经济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斗争——这种情况只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存在，这种特点在亚洲不存在，是亚洲社会“停滞”的部分原因。^⑩（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了大致相同的论点，他们声称，后来的奴隶种植园制度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因为工人是奴隶，不是工资领取者，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仅作一点评论：我认为，那些声称奴隶社会在经典的地中海地区比亚洲更为重要的断言，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也就是一个非地理学家最容易犯的错误。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地理比例问题。雅典帝国也许只有清帝国面积的百分之一。在一个规模小的、高度发达的中国的地区内，奴隶也很可能像在阿提卡一样重要，或者像在罗马的意大利种植园地区那样重要。

社会学家贝希勒辩称，导致欧洲奇迹的中心原动力是一个独特的欧洲阶级，即中世纪的贵族阶级。^⑪他对非洲不屑一顾。他问道，现代化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亚洲。^⑫他接受了许多标准的论点，把这些论点看做是对他的理论的部分说明。他辩称，发生奇迹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在欧洲存在着真正的贵族阶级。他描述了一个古老的印欧社会，其特征是贵族阶级的斗士。在印度，这个阶级变得腐败，但欧洲的贵族阶级则不然。^⑬

他对中世纪的贵族进行了细的定义，规定了它的特殊的社会品质“封建性”，以便使它与单纯的地主阶级相区分，使它与享有庄园权利的地主阶级相区分。贵族阶级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封建的忠诚纽带把他们作为地位平等的人连接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他说，这一阶级在社会上并不拥有政治权利，这一点正是它的独特的关键特征。而在其他地方，贵族阶级则受到（帝国的、独裁的）政体的压榨，或者变得腐败，正如在印度那样成为一种种姓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现代化可言。欧洲的贵族阶级拥有一种特殊的私人权利。这种权利是资本主义的权利的最初来源。（在这里，贝希勒自相矛盾，因为在封建时期贵族阶级确实就是政治权利。他只是提到，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着政治上的混乱，然后发生了过渡。^⑧）总而言之，贵族阶级发明了民主和最初的资本主义财产。欧洲的农民也同样是在很早时期就是最初的资本家。贝希勒全然不顾欧洲的农民是不自由的，是在中世纪受到压迫的群体，他把欧洲的农民描写得天花乱坠：农民们的村庄进行自治，是一种“共和”，具有使人想起城市生活的特点。^⑨“那里的农民是小型的企业家”。^⑩到14世纪，这种初期的资本主义农民成为欧洲真正的农民。农民的村落是小型的民主体。农民是自主的决策人。贝希勒全然不顾奴隶制，全然不顾贵族拥有土地的事实，剥削农民的事实，控制人们的生活的事实。在那里封建主义成了一种民主社会，而贵族阶级发挥着民主作用，农民是作为自由人生活着。而且，这些中世纪的农民具有了资本主义农民的所有属性，具有了18世纪和以后的资本主义农民的属性：进行投资，获得利润，进行资本积累。（而且他们非常明智，贝希勒说，他们不让大型家庭出现。）所有这些说法都是空谈，纯粹是在叠缩历史，把现代世界（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农民）推回到中世纪。

贝希勒把这些现象与印度对照。他对印度的描述是奇异的，

在印度的历史上没有贵族，这是由于种姓制度导致的结果，这也是印度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发展的“最深层原因”。^⑧（印度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贵族阶级。）印度社会没有政治深度：“印度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政体。”因此“印度的认同感永远不会是政治性的”——更不要说民主。^⑨（一派胡言。）种姓制度被用来代替在他笔下消失了的政体。（更是一派胡言。）印度不存在农民，它只有“农业工人”。^⑩这怎么可能呢？因为真正的农民是企业家的决策者，而这类人被认为在印度是不存在的（而实际上欧洲也不过如此）。就这样，贝希勒把一个神话般的印度用来作为他的基本论点的对照物：在欧洲，贵族和由他们创造的自由社会（即他们的盟友农民）是“奇迹”出现的主要源泉。但是欧洲的贵族和农民不具有这些浪漫化了的品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同一时期的许多其他地区存在着可以进行比较的阶级。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于阶级的概念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就所有分阶级层次的社会来说，阶级斗争是进步的原动力。较为近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上的演变比阶级斗争更加复杂，但他们继续强调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过程。我们必须注意到，关于阶级的概念，并不存在本质的欧洲中心主义内容，除非有人坚持认为真正的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的某个阶段或者形式仅仅发生在欧洲。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这样论辩的。例如，按照莫利斯·戈德利尔的观点，西方表现出“阶级斗争的纯粹形式”，而且“只有欧洲才创造了超越阶级组织的条件”。^⑪近期来最具影响力的这类观点，也许可以认为是罗伯特·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⑫布伦纳试图表明，1492年之前资本主义的兴起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仅仅限于欧洲的阶级斗争。然后他用他的论点作为证据来反对他所说的“第三世界主义者”，即关于非欧

洲地区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在当今（政治上）也具有重要性的主张。这一结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且对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发展理论的保守思想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布伦纳的理论当然需要本书给予注意。它并不是一种复杂的理论。

按照布伦纳的理论，奴隶与领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受到人口减少的影响，导致了西北部欧洲封建主义的衰落。（布伦纳没有提到非欧洲地区，而且很少提到南部欧洲。）在欧洲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农民赢得了这场阶级斗争，实际上成为小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对田园式的生产方式感到满意，不愿意进行创新。只有英格兰的领主仍旧掌握着土地，农民仍然是佃农。农民阶层进行了分化，产生了没有土地的劳动者阶级和一个新兴起的更大规模的佃农阶级，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租用大量的土地并且被迫（因为他们需要交租）实行商业化，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成为资本家。（布伦纳认为，奴隶、领主和拥有土地的农民没有进行创新，而城镇甚至英格兰的城镇在资本主义的兴起中也只起了很少作用。）英格兰的自由民佃农因而成了资本主义的奠基人。换一种说法：资本主义兴起是由于英格兰的农民在阶级斗争中的失败。实际上，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中，农民并不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资本主义在城镇或者靠近城镇的地方比乡村发展得更快；而布伦纳说的14世纪和15世纪英格兰农民的技术创新发生的时间要晚得多，并不能用来说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商业化的农业——实际上也是城市的资本主义原型——在这个时期在欧洲的南部得到了发展，（我将论证）在其他大陆上也在发展。布伦纳的理论显然是错误的。^⑩

4. 家 庭

关于欧洲的家庭比其他地方的家庭模式从根本上意义上说更加合理、更加文明的观点完全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当现代化学说

占据主导地位后，这种观念不再那么占据险要的地位；现在在社会科学家中几乎有一种共识，各种家庭类型的差异形成一个统一的连贯体，从“传统的”到“现代的”类型，或者换个说法，从“民间的”到“城市的”类型。有人辩称，传统的家庭倾向于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宽广的领域反映核心家庭的强烈亲属关系、倾向于组成大型的、扩大的家庭；而这种家庭又与高出生率相伴随。由于缺少中世纪欧洲家庭的证明资料，人们相当广泛地认为早期的欧洲家庭更符合传统的模式，这种模式被看做是“前工业”时期的家庭，与现代后工业革命时期的核心家庭形成对照，形成了小型的家庭，松散的亲属关系，较少的子女。这种变化被认为与所谓“人口模式转化相伴随”，这是从具有产业革命前条件特征的“传统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模式向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现代的”、后工业化时期的人口模式的过渡。

按照家庭现代化的理论，欧洲以外的不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时将经历本质上大致相同的变革。大型家庭将被核心家庭模式所代替。这种模式将注入现代的积极发展的态度：人们生育较少的孩子（以对付人口过剩），更多地考虑个人，因而也就是更多地考虑经营。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一些假设。在生育率和家庭规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证明材料（或者说超出核心家庭的强烈的亲属关系）；只是在富裕的现代社会中仅仅存在着一种相互关联：核心家庭和低生育率都是这些社会的特征。（一位著名的人口学家指出，核心家庭从原则上说每对夫妇可能比大型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¹⁹）此外，关于一个负责养家糊口的成年人，如果他（假定是男性）只是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而工作，而不是为了更大的家庭，包括他的父母、表兄弟和其他亲属，就更具有企业精神、更愿意积累资本、更具有竞争性的观点将是一个脆弱的假设。大型的家庭、具有亲密关系的家庭有更大的动力进行积累，例如，那些从事商

业的许多移民群体就是这样。一个成年人为什么仅仅是为了配偶和孩子而努力工作，而不是为了父母、姊妹等等而努力工作呢？（实际上人们可以形成这样的论点，一个有着多名就业的成年人的家庭肯定具有发展经济的优势。^⑨）随着现代化学说本身的发展，大约在1960年后，这些观点开始消失。很清楚，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都可能同样是现代化变革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没有发生变革的根本原因。问题并不在于家庭的结构。

在1960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关于欧洲家庭模式具有某种特性的概念在历史学家的讨论中重新出现，这部分地是由于约翰·哈吉纳尔具有影响的论文造成的结果。^⑩我们在本章的前面曾经注意到，在讨论关于“奇迹”的人口辩论中，历史人口学那时正在揭示出工业化前欧洲的证明材料（或者欧洲的一些部分），那里的生育率比“传统社会”要低一些。看来欧洲人比传统的社会的人结婚更晚些，传统社会受到马尔萨斯规律的制约，因此生育率达到最高峰。这些历史学家不是去清除掉马尔萨斯的模式，也不认为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积极地控制他们的人口，例如调整结婚年龄，这些历史学家还是简单地断言欧洲的独特性。其他前工业社会表现出“传统的”模式，伴随着不加控制的高生育率（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快速增长，而在这个过渡时期死亡率下降）。形成完整对照的是，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拥有一种合理的家庭制度，实行合理的人口控制。然后他们没有提供证据就断言，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享有比非欧洲地区更低的死亡率，并从这一点出发推论，欧洲使生育率控制在适当的合理的范围内，调整为低生育率，采用的主要办法是晚婚机制。那些提出这种论点的人根本没有考虑在其他社会的家庭也采取了大致相同的办法。有关这方面的证据正在一些欧洲以外的社会中挖掘出来。有一些社会的生育率比预想的典型的模式要低得多。还有一些社会在生育率方面也发生了变化，或者提高或

者下降，是对经济和其他条件的变革做出的反应。^⑩

哈吉纳尔的论文开宗明义：

就我们所知，在 1940 年之前的至少两个世纪期间，欧洲大部分的婚姻模式在全世界是独特的，或者几乎是独特的。在欧洲文明以外的人口中找不到类似的婚姻模式。“欧洲模式”具有明显的特点①结婚的年龄大而且②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从不结婚。^⑪

哈吉纳尔的某些论点非常缜密，而另外一些论点则非常随意。他认真地指出，晚婚的证据和（某种）低结婚率在 17 世纪前并不全然如此，而且欧洲中世纪的“不完整”证据意味着一种“非欧洲模式”。^⑫关于非欧洲地区他根本没有介绍历史资料，只是随意地把欧洲历史与 20 世纪非欧洲地区进行比较。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性非常清楚：非欧洲模式是“传统的”和永久性的，因此把 17 世纪的欧洲与 20 世纪中期的亚洲或者非洲进行比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⑬

这种晚婚和低结婚率的欧洲模式的独特性被广泛地、迅速地使用到欧洲历史“奇迹”的广泛理论中去。他们没有提供多少证据就把这种设想推回到中世纪。劳伦斯·斯通在 1977 年的著作中写道，“毫无疑问”在西北欧洲大部分地区，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结婚相当晚，至少是从 15 世纪起……这种晚婚风俗是西北部欧洲文明的特殊的独特特点。”^⑭在这里人们需要特别注意“相当”这个词。“相当”这个词儿只有与某种东西相比较时才有意义；然而他没有提供非欧洲历史的资料，甚至也没有打算提供。迈克尔·曼从铁器时代的印——欧农民社会中引出了这一模式。帕特里夏·克龙猜测，这可能是一种古代的日耳曼人的特点。埃里克·琼斯认为，这种模式发生在三千年或四千年之前。麦克法

兰认为这种模式起源于“基督教和日耳曼人风俗的一种特殊结合”。^⑩简而言之：这种模式在欧洲是非常古老的。

这里的日期或者时代当然是重要的。从17世纪起，西部欧洲经历了重要的变革，关于晚婚和低结婚率可以用许多新的事实加以说明：人口的流动、由于圈地运动丧失家园、城市化以及后来很容易理解的由产业革命引起的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甚至在16世纪时，西部欧洲仍然存在某种混乱现象。但是，如果这种婚姻模式出现在1492年前，也就是在社会动荡的发生日期之前，人们就可以肯定一种“欧洲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产业革命前”或者“传统的”模式。而且可以为此后的变革——“欧洲奇迹”营造出一种随意的理论。

他们还提出了其他假设。人们早已知道，核心家庭和新居（结婚的夫妇离开父母单独立户）在近几个世纪中是西欧的特点，而且被认为是现代化的一个特点。这符合标准的现代化理论：这个过程被认为会把扩大的家庭引向核心家庭。但是，欧洲奇迹理论历史学家现在辩称，核心家庭和新居是独特“欧洲家庭体系”的一部分。（拉斯赖特）^⑪他们又一次把这种模式推向历史的远期。他们一概而论地断言欧洲以外的人们没有这种模式。事实上，有很好的证据说明，核心家庭在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普遍存在。托伊伯分析了巴克的资料，他发现中国60%的农民在20世纪的初期就有核心家庭。^⑫这不是历史资料，其意义在于，按照现代化的理论，中国被认为是在家庭方面和许多其他方面特别“传统”的；实际上，关于中国的血统或者“亲属”——由于韦伯而出名——和扩大的家庭的看法存在着普遍的混乱。在拉丁美洲，大型的扩大的家庭并不常见。在印度，正如在中国一样，关于扩大的家庭的概念是含糊的，因为人们关于“新居”的概念是模糊的（在一个拥挤不堪的村庄，建房的空间成了问题），人们会发现新居和可用于建小房子的土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大型的（或联合的）家庭与继承权、权利、人口流动等方面的联系还存在更多的混乱。^⑮同时，回到欧洲来，所谓典型的核心——新居家庭模式的类型在中世纪来说也是很成问题的。（甚至在早期时代，关于独特模式的想法也是一种猜测，而且属于其他老的和受到怀疑的思想——本章前面曾经讨论过——即关于古代日耳曼部落和它们的独特的个体性、进取性等等。）中世纪的婚姻新居模式可能有时反映了庄园制的规则（例如分配住房），而不是像在奴隶制度和无保障的佃农制度文化下的居住规则，在不同类型的农村地区，例如在农场以外存在着雇佣关系的地区（如英格兰东南部的毛纺区）与具有“边疆”特点的地区之间应该加以区分。甚至对西欧婚姻模式是否前后一致也有理由提出疑问。^⑯然而，即使接受了关于西欧的一般概括，也不存在认为欧洲模式在历史上具有独特性的基础。^⑰

最后，这种模式还有一些相当华而不实的装饰物。他声称，这种独特的欧洲模式不仅仅是一种新居、核心家庭、结婚年龄和结婚率问题。西欧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在其他地方，婚姻是包办的。（然而，包办婚姻在现代欧洲出现之前看来是通常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人口高流动和社会遭受破坏之前的时期。他们经常求助于一种想法，认为非欧洲夫妻在被撮合成为夫妇之前是陌生人，这是殖民时代的一种偏见，这种思想得到一些非同寻常的文化状况的支持。在他们的论点中，浪漫的爱情被认为是欧洲理性的一种属性。欧洲以外的夫妻当然也像欧洲的夫妻一样相亲相爱。）其次，他们还断言，由于独特的欧洲家庭是核心家庭，产生了一种独特欧洲的人格类型。这种理论认为，小型的（欧洲的）家庭必然导致个人主义的、具有竞争性的、探索性的又是相互关怀的行为。正如我们在前边看到的，曼和琼斯提出了一种古代农民家庭形象，在森林的深处矗立着汉斯尔和格利特尔的房子，而且把这种模式看做是个人主义模式的历史渊源。麦克法兰

提出了可能是这一理论的最为极端的形式（他受到他的一些同事的责备，不是由于这一理论，而是由于他断言这一理论主要适用于英格兰人），他辩称早期的中世纪英格兰家庭产生了韦伯的资本主义人格特征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在本质上），导致这些特点的原因有一个链条，它从部落的风俗和宗教延伸到家庭，从家庭延伸到人格，从人格延伸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我们在下边还将讨论）。这一论点的提出主要是通过树立一种麦克法兰认为的“农民社会”模式，它具有农民家庭和农民思想的状态。早期的英格兰农村人口不适合这一模式。因此他们不是农民，而且不具有农民的传统特征，如传统的家庭类型和传统心态。^⑧许多人做出这样的评论，麦克法兰“农民”的概念是一个稻草人，不具有现代欧洲以外地区的特点，更不具有历史上欧洲以外地区的特点，而且他关于中世纪英格兰农村地区人们的观念，即认为他们都是农民的观点，在历史上是不成立的。^⑨

关于独特欧洲家庭的理论是欧洲奇迹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今天也正在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进行宣传。这一理论被用于两种不同的论点。其中一种论点把家庭理论与马尔萨斯主义相结合。论点的内容如下：一般来说，人类没有足够的理性控制他们的性行为，限制孩子的生育数目，以适应食品工业等条件的状况。因此，普通人经历着永久性的或者周期性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人口过剩导致了饥荒、战争和瘟疫，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已经减少的人口又开始过多地生育。在这里存在着非理性。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智慧的行为，而是（如马尔萨斯200年前所说）如同仓库前的牲畜。^⑩这一过程的历史结果妨碍了发展。例如，生产技术的所有改善仅仅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危机、人口的减少，从而又回到原来的状况——一种停滞不前的周期。一般来说，这或许是欧洲以外社会没有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与此相对照，欧洲人总是（或许近一千年来）表现出在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上的理性行

为。这包括关于婚姻的决定和孩子的生育。独特的欧洲晚婚、核心家庭、新婚新居、温暖的家庭是这种理性决策过程发生的重要机制。因此欧洲的家庭模式使欧洲人（或西部欧洲人，或北欧人）控制人口的增长，从而积累物质财富，否则过多的婴儿将使这些财富散失。这种原始的积累是欧洲不断进步的基础。这种理论，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是由很多历史学家提出的，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其中包括克龙、霍尔、琼斯、拉斯赖特、麦克法兰和曼。^⑩霍尔在下面的评论中（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援引过一部分）表述了这种理论的一种形式：

欧洲的家庭长期以来规模小、晚婚、是核心式的，而且对马尔萨斯所说的压力非常敏感……欧洲产量的增加由于没有被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所吃掉，它的经济增长没有像晚期的传统的中国那样走上斜路。人口与耕地的比率始终保持着优势，因为欧洲的家庭保持着相对的节制。^⑪

马尔萨斯的理论把人类贬低为野兽。但是即使那些接受马尔萨斯理论的学者，也不相信欧洲的家庭模式驱逐了马尔萨斯所说的灾难。

把“独特的欧洲家庭”理论运用于欧洲“奇迹”的论点的第二种方法是进行推论，说欧洲的家庭导致产生了欧洲人的独特的进取精神和行动，这种精神和行动导致了奇迹。这种论点经常广泛使用的形式体现于拉斯赖特的阐述中：

欧洲的家庭制度可能是产生一系列的欧洲特点的根源，如经济的进步，可能还包括发明。为所有个人都设定了结婚和生育的条件……进行储蓄和积累的必要性……欧洲的家庭制度培植了积蓄和节俭精神。^⑫

这样，这种家庭模式导致了初始的资本家的人格特点，而且在中世纪就已经起到了这种作用。这种说法同样是难以置信的，而且与 1492 前的生活现实也很难相符。拉斯赖特如同麦克法兰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做了虚伪的假定，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的欧洲家庭事实上可以进行储蓄、囤积、积累等等。这种论点要求当时的农民家庭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土地，或者至少是一个生活稳定的佃农，这样才能进行资本积累，不被主人或者地主剥削得体无完肤。关于中世纪西欧土地所有的集中程度存在着很多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拉斯赖特所描述的那种家庭的行为在奴隶制度下不可能普遍存在，在奴隶制度没落后，在农民不拥有土地的地方也不可能是普遍的。这一点应该是一条规律，而不是一个例外。^⑩这种理论看起来又是一种对历史的叠缩。18 世纪的具有企业精神的自由民农民又被推回到中世纪，把结果当作了原因。

许多其他关于欧洲家庭与欧洲奇迹的论点在当今学术界的讨论中是常见的，但是，由于篇幅限制，我仅举出一个例子，是劳伦斯·斯通的论述：

晚婚的模式必然会导致出几种后果……人们有理由假定，这对许多青年人来说，这种晚婚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风华正茂的男人的性欲……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可能导致产生精神官能症。……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大量的集体侵犯的现象，这也就是当时西方民族国家极度扩张暴力的根源。这对资本主义经济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刺激……为了结婚刺激他们进行储蓄，而且产生出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活力。^⑪

再引用一段：

青年成人的性升华可能是产生过度军事侵犯的原因，也是节俭、工作热情和西方人的企业家和学术精神的根源。^①

欧洲人征服了世界，因为它的青年人在性的方面受到挫折。

由于篇幅的缘故，我们不可能列举或者讨论其他普通常见的关于所谓的欧洲奇迹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本书后面还会提到其他一些解释，但是我希望本章的讨论已经足以说明，在1492年前的任何时候，欧洲的环境、欧洲人、或者欧洲文化没有什么特点能够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些特点使欧洲得到发展，而其他文明不能得到发展。

在此后的两章中，我将试图说明，这一整个问题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说明，用不同的方法给予答复。在1492年前，对其他文明相对来说，欧洲并没有崛起，1492年之后欧洲崛起，这不是由于“欧洲特性”的某些特殊品质所造成，而是由于16世纪和此后的时期实行了殖民主义，大量的财富流入欧洲。

三、注 释

①埃里克·琼斯1981年的书《欧洲奇迹》使“欧洲奇迹”这个词广泛传播，然而，在此之前这个词在很长的使用时期内就具有同样的含义：在中世纪之前或者在中世纪欧洲的独特崛起。并不是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用“奇迹”来进行描述，但是这个词被广泛接受。1985年在剑桥大学举行了一次名为“欧洲奇迹”的国际讨论会，这个事实就是一个证明。

②显然，我1976年的文章是全盘批判“奇迹”理论的第一篇出版物，也就是说是无条件地进行批判。1990年，萨米尔·阿明对我后来的论文进行评论时表示了他对这一批判立场的基本认

同。(Amin,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Comment,” 1990; Blaut,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89; 还见 Blaut, “Fourteen Ninety-Two,” 1992; and Amin, “On Jim Blaut’s Fourteen Ninety-Two”, 1992.) 有几位历史学家采取了接近这一立场的态度; 他们的观点将在本章后面进行讨论。

③其他论著有 Cyril Black’s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1966)。本章后面将讨论各个领域的此类著作。

④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历史学科本身的成熟程度。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对历史的影响, 这种影响并不完全是有益的, 但导致了人们去把握各种变数和“因素”, 而且如果可能的话, 把握它们的数量。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对 19 世纪必然进步的思想失去了信任: 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动乱和战争之后, 进步肯定不是某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 对此需要进行说明。第三个原因是欧洲思想的世俗化, 包括对历史的看法, 比如不能把人类的事件设想为是反映高层的某种力量的指导。再一个原因,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科学部门的普遍发展, 以及科学参与(而且从中吸取营养)国际的和国内政策的制定。这意味着, 每一个学科, 当它观察世界时, 都有某种程度的偏向, 总是把自己的学科看做是因素(对经济学家来说, 是市场因素; 对心理学家来说, 是动机因素; 对社会学家来说, 是人口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 对地理学家来说, 是资源因素。)他们倾向于按照历史的模式进行辩论, 把自己的因素看做是重要的, 把其他人的因素看做是第二位的。既然许多社会科学家是按照这种程序撰写历史, 这就导致了某种特别的辩护。

⑤我并不是说, 所有这些都是在整个历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大多数历史学学者致力于较小问题的研究, 他们小心翼翼

地研究具体事件，对这些事件形成有限的解释。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影响了对较小问题的概括，例如那些有利于说明现代化的因素受到重视——如人口因素、技术因素等等。而且还有一些研究领域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很少给予注意，这也是导致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将会看到，最明显的是关于欧洲技术历史的研究。此外，在专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现在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因此如果说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学受到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或者“体系”）的支配，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我怀疑，我自己对于“欧洲奇迹”问题的整体文献的注意可能使我过分强调了现代化的观点对历史整体影响的意义。还应该注意到，大多数解释欧洲独特崛起具体问题的著名作家都是专门学科历史学家——经济历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等等——而不是一般的标准历史学家。

⑥Cabral, *Unity and Struggle* (1979) .

⑦至于当前和将来，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两个论点。支持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人辩称，经济发展必须包括保护本地的资本，反对欧洲国家和它们的公司对本国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支配的人侵式扩散。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显然需要拒绝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支配。这两种人都倾向于采取“依赖论”或者“不发达论”，这种理论是关于历史和现代社会进程和发展的理论。第三世界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欢迎由外国资本利益集团主导经济的思想，他们通常反映了非常富有和非常右翼的那部分人的思想。由于非常富有的社会部分主导第三世界社会主体，这些少数人的观点经常决定了政策。而且，这种理论在第一世界的刊物中受到过分重视。

⑧见 James, *A History of Pan-African Revolt* (1938), *The Black Jacobins* (1938),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1970);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1944) 我们将在第四

章讨论这些问题。

⑨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74) and later works. 我的文章“*Geographic Models of Imperialism*” (1970) and “*Where Was Capitalism Born?*” (1976) 描述了一般理论的轮廓。

⑩我在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87) 讨论了这一问题。

⑪见 Van Leur 's 1934 essay “*On Early Indonesian Trade*”, 在他的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1955) 中再版。

⑫Duyvendak, *Ma Huan Re-examined* (1933); Needham and collaborator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在 1965 - 1984 年之间出版了六卷集;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1961) and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1971);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1973) .

⑬ Amin , *Unequal Development* (1976), *Eurocentrism* (1988) ,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Comment*” (1990) .

⑭Bernal, *Black Athena*, vol.1 (1987) and vol.2 (1991) .

⑮应该提到 Eric Wolf 's 1982 book *Europe and the Peoples Without History*。这本书对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文明历史提供了有用的和重要的考察并且表明那种认为欧洲以外的文明在历史上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理论是多么没有说服力（即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人民”）。然而，沃尔福没有进一步去探索真正的重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信仰，也就是欧洲人在许多方面都比非欧洲人更进步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对“欧洲奇迹”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但他没有直接面对那一理论。（应该注意到，大多数主流历史学家不再论证欧洲以外的文明现在或者过去从总体上是不进步的，从总体上是“非历史的”；相反他们论证的是变革的缓慢，“闭关”妨碍了变革等等——我们将会看到不同的措词并不总是构成不同的论点。）

⑯在学术研究中试图说明流行模式的广泛变革总是有风险

的，特别是当变革正在发生的时期，因此这一解释只不过是一种预感或者设想。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时期和争取民权斗争的时期，学术界对第三世界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1960年代之后情绪发生了变化。不仅更为保守的思想主导了西方世界，而且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在第三世界本身出现了：民族冲突，发展计划失败等等。西方学术界从来没有真正放弃关于欧洲主导的传统观点以及欧洲对欧洲以外的关系的观点，包括殖民主义传播主义观点，而且看来这种古老的范式也从来没有放弃，只不过是又一次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肯定的是，过去对依赖论给予的注意以及相关的观点离开了主流派学者。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这个过程更加戏剧化，因为人们更没有预料到。简而言之，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忽略了第三世界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在当前的作用，他们成为学术世界中惟一的发表关于第三世界的言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坚持认为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相当流行的，因为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是在世界的（内部）这一部分首先开始，然后扩散到世界（外部）的其他部分。在保守阵营中，不仅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具有霸主地位，而且现在人们开始听到关于距离种族主义不远的窃窃私语：关于第三世界的人民不具有发展潜力的观点。

⑰见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1977),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1985),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1985b);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 (1974);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1980).

⑱我仅讨论更为重要的信仰，也可能略去一些内容不予讨论。我将给予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信仰自身并非是明白无误的真

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将提出更加充分的依据对一些信仰提出争议。

①见第一章，注释②。

②Bowler, *The Invention of Progress* (1989); Harris,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968); Gossett,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1963); Jackson, *Race and Racism: Essays in Social Geography* (1987); Stocking,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1968); Trigger, *A History of Archeological Thought* (1989) .

③见 Bernal, *Black Athena*, 第一卷 (1987) .

④见 Gossett, *Race* (1963) .

⑤Blaut,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acism" (1992) .

⑥ "Hereditary neuralgia of the presumably strong tendency toward hysteria and autohypnosis of the Indian..."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India* (1967), p.387.

这一假设是韦伯关于布拉敏主义的分析的基础，构成印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

⑦很久以来表明黑人不适合工厂工作，不适合操作机器；他们经常进入全身僵硬的睡乡。这在经济历史中是一个可以感触到种族差异的例子。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1981, p.379) . 尽管韦伯在这里说，这仅仅是一个种族影响的“例子”，注意，这个例子对韦伯分析“理性”和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这里的“种族差异”从根本上把非洲人分离出去：是一个清楚的、温和的但是关键的种族主义的例子。根据同一思想，“人们发现，美洲的印第安人完全不适合种植园劳动”。(第 299 页)

⑧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1951), pp.231~232. 韦伯认为这些是“中国人的种族品质”(第 230 页)，尽管可能涉及到文化因素。

⑳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58), p.30; 韦伯在这里说“认为”构成西方人的理智的“最重要原因是遗传的差异是很自然的”，他认为“生物遗传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第30页）。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衡量其影响，因此我们应该主要关注文化因素（第30~31页）。这是这本书初版时（1904~1905）的典型的温和种族主义（正如我所说的）。

㉑我还没有讨论生物种族主义今天作为一种真正明晰理论是否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人们仍然接受但并不是有意识地接受。我想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一些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家坚持关于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个人之间存在差异的立场。他们是这样的极端、这样地执迷盲信，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他们中有少数人可能持一种明显的种族主义的内在理论，他们也许无意识地相信，非欧洲人的低劣性是由基因决定的。

㉒种族主义谬论有很多来源，见 Franz Boas' classic book,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1948); also Blum, *Pseudoscience and Mental Ability* (1978); Gossett, *Race* (1965); Haller, *Outcasts from Evolution* (1971); Jackson, *Race and Racism* (1987); Magubane, *The Ties that Bind: African-American Consciousness and Africa* (1987); Gill and Levidow, *Anti - Racist Science Teaching* (1987) .

㉓关于人口行为并不完全受社会控制的想法是一种原始的生理学事实或者因素，看来大多数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家持这种思想（很明显地包括 Eric Jones, Michael Mann, and John Hall）。基本命题看来是，如果社会没有找到削减人口的方法，包括增加食品供应以养活无法控制的不断增长的人口，人口增长将必然超出理性的界限，将必然发生人口过剩。例如，见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1 (1986); 如果农业的产量在

中世纪的欧洲没有提高，“大陆每个世纪都将会……经历一场类似马尔萨斯式的周期或者——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第 402 页）。这种观点有时甚至在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中也会碰到。请注意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的以下观点：“（我们）认为（在无所不在的性欲下……）人口中的怀孕数目将会超出在一定的激励机制内所希望的数目，而且这种并不情愿的过剩将会变得更大，如果人们现有的手段不那么完善的话……某种怀孕模式……除了一小部分各种超生（生育）外，被看作是“理性的”。Seccombe, “Marxism and Demography,” (1983), 第 31 页。这一论述的背景是关于欧洲中世纪社会演变的讨论，但其论点都是支持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理论。大多数激进分子和女权主义者拒绝马尔萨斯主义，而且会把塞克姆的观点看作马尔萨斯观点加以拒绝。

①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第 3 页。有一部分是引语。

②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第 219 页。

③ 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1985), 第 131 页。

④ 正如 E. 哈桑所指出的那样，“在各种人群中用不同的形式进行人口控制是普遍的”。（“Demographic Archeology,” 1978, 第 71 页）

⑤ 一些家庭怀孕的数目当然会超过他们的愿望，但有些家庭则少于他们的愿望，因为节育的技术是不完善的，但是超过数目的平均数将大体和这群人的价值观念和人口目标相一致。有关的技术环节发挥了调节作用，从结婚的不同年龄到新娘的不同嫁妆和价格，到结婚礼仪的复杂性（决定了接着出身门第决定配偶），到性关系的时间选择，到避孕方法的使用和流产方法的使用以及溺婴等做法。

⑤有关的多数学术研究来自印度，在那里殖民主义思想通常声称，贫困的根源是人们生的孩子太多。现在人口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反证了这一神话。例如，见 Mamdani, *The Myth of Population Control* (1972)，和 Nag, “How Modernization Can Also Increase Fertility” (1980)。例如，关于非洲见，Kitching, “Proto-Industrialization and Demographic Change” (1983)；Swindell, “Domestic Production, Labor Mobility, and Population Change in West Africa, 1900~1980” (1981)；Cordell and Gregory, *the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Population and Capitalism* (1987)。

⑥例如，见许多表明生育率可塑性的研究，包括 Nag, “How Modernization Can Also Increase Fertility” (1980)；Collyer, *Birth Rates in Latin America* (1965)；and Harewood, “Population Growth in Grenada” (1966)。

⑦见 Aston and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1985)，特别是 R. Hilton 的导言。

⑧可能更容易接受，因为马尔萨斯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解释对这些国家的学者和计划人员人来说是一个相当麻烦的问题，而且重要的是需要表明他们国家的贫困不是由于普通人的错误的人口行为造成的。

⑨例如 Montesquieu, 在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748] 1949) 一书中说，“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中更富有活力”(p. xiv. 2)。“有些国家过分炎热的气候使身体衰弱，使人们变怠懒、意志消沉”(p. xv. 7)。

⑩在我进行批评的讨论中，“非洲”几乎总是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因此我在当前的讨论中在同一意义上使用“非洲”一词。

⑪Blaut, “The Ecology of Tropical Farming Systems” (1963)。

⑫例如，见 Collins and Roberts, eds., *Capacity for Work in*

the Tropics (1988)。这本书没有发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热带气候具有相反的作用。

④两段引语 (Gilfillan, "The Coldward Course of Progress," 1920, and Lambert, "The Role of Climat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tions," 1971) 很难代表现代学术文献。

⑤按照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198 的说法, 印度的“使人体虚弱的气候”构成了印度落后于欧洲的一个原因。

⑥关于小农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具有开拓性的著作, 我们可以提到 Fred Hardy's "Some Aspects of Tropical Soils" (1936) 以及他在 *Tropical Agriculture* 中的文章, 还有 Robert Pendleton (especially Pendleton, "Land Use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1943, and Prescott and Pendleton, *Laterites and Lateritic Soils*, 1952), and G. Milne "A Soil Reconnaissance Journey Through Parts of Tanganyika Territory" (1947)。含有现代知识的第一部热带土壤教科书是 Mohr and van Baren, *Tropical Soils* (1954)。

⑦见 Nye and Greenland, *The Soil Under Shifting Cultivation* (1960); Blaut,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Shifting Agriculture" (1962); Ahn, *West African Soils* (1970)。

⑧见 Miller, *Way of Death* (1988); Cu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1990)。他的观点在许多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得到反响, 例如 Roberts, *The Hutchinson History of The World* (1987), pp. 54~56;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1967), pp.273~278。

⑨见 Wilken, *Good Farmers: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1987); also Nye and Greenland, *The Soil Under Shifting Agriculture* (1960); Blaut, "The Ecology of Tropical Farming Systems" (1963)。

⑩Denevan,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1976) .

①见 Cockburn and Hecht, *The Fate of the Forest* (1989) .

②这些边缘地区经常是农业地区，他们更喜欢集约化程度较低的土地使用法，因为由于历史的力量人类群体被赶出了较好的土地，显著的实例是殖民主义。

③例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牛津的历史学家 J.M. Roberts, 在他的广为流传的世界历史教科书 *The Hutchinson History of the World* (1987) 中，作了如下相当无知的阐述：“也许铁器（在热带非洲）的广泛传播最为重大的意义在于使农业发生了变化。为人们进入森林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用新的方法耕种土地（可能与来自亚洲的新的食物庄稼相联系……这又一次意味着非洲环境的重要的制约因素。大陆历史的大部分内容是对来自于外界（包括铁器和新的庄稼）所产生的影响作出的反响的故事”（pp.511～512）。如同欧洲和许多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非洲的农民在铁器来临之前用石器从事农业，而且在没有铁器的时候和地方仍然继续这样做。关于热带非洲铁器的时代，例如，见，Wai-Andah, “West Africa Before the Seventh Century” (1981) and Sinclair, “Archeology in Eastern Africa” (1991) .

④例如，见 Roberts (note 53 above); also Irwin, “Sub-Saharan Africa,” in Garraty and Gay, eds.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81), p.299.

⑤例如，见 Irvine's classical work, *A Textbook of West African Agriculture* (1934); Coursey, *Yams* (1967) .

⑥按照琼斯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的说法，“黑人继续向东、向南挺进，那里是小黑人和森林人的居住地，当时布尔人在 1830 年代从海角地带占领了大特里克的北部”（p.155）. 还见 Roberts *The Hutchinson History of the World* (1987), p.178.

⑤7 Curtin, *Economic Change in Pre - Colonial Africa* (1975); Cu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1990); Miller *Way of Death* (1988) .

⑤8 见 Wisner and Mbithi, "Drought in Eastern Kenya" (1974); Wisner, *Power and Need in Africa* (1989); O'Keefe and Wisner, "African Drought: The State of the Game" (1975) .

⑤9 同样的论点可以无条件地使用于西半球的农业。南美洲相对有限地区的雨林地带生态系统非常脆弱, 由于当地的地理条件(岩石在一些地区构成了不肥沃的土壤, 在另外一些地区几乎都是沙漠), 庄稼的种植必须采用轮休制农业(或者三季制)。但是这些地区在当前的雨林环境分布条件下是例外。总的来说, 亚马逊和圭亚那地带是一种非定居农业, 这是由于文化历史因素, 特别是人口的减少和牛群的大量增加造成的。实际上, 是牧牛场而不是轮休制农业在农业生产中导致了长期的雨林地带的环境退化, 因为 a. 牧牛场最大限度地进行索取而没有控制, 这是为了扩大牧区; b. 结果牧场导致了土壤的不断退化, 成为粗放的牧场草地, 不能像原来的森林那样保持土壤的生态系统。与此相对照, 采取轮休制的种植者们, 只是在一定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焚烧, 只是向小的地区索取, 而且认真地鼓励森林的再生。如果森林消失了, 他们的生机也就消失了。在潮湿的热带地区所发生的毁林现象不应该抱怨采取轮休制的从事农业的人们。见 Hecht and Cockburn, *The Fate of the Forest* (1989); Blaut,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Shifting Agriculture" (1963) .

⑥0 Buckle,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2nd ed., (1913), chap.2. 还见 Bowler, *The Invention of Progress* (1989), pp.28~29.

⑥1 Marx, *Capital*, vol.1 (1976), p.513n.

⑥2 琼斯实际上设法利用两种相反的理论达到同样的目的。在

较潮湿的非洲地区“生活是容易的”。在较干燥的地区“农业生产率不高”。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154. 还见 Jones, *Growth Recurring: 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 (1988) .

⑬“在非洲，土地的富庶和广袤使农民流动成为可能，因此必然导致建立国家的不良物质基础。所有的砍伐式农业情况大概都是如此”，John 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p.27. (“砍伐式农业是一种移动农业”)。

⑭Laibma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Theories of Transition” (1984), p.284. 然而，Laibman 的总论点根本不是欧洲中心主义。

⑮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vol.1, 2nd ed. (1913), p.93: “欧洲在各个时期所蒙受的鼠疫灾难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首先在东方发生，那里是鼠疫的自然诞生地，也是最为致命的地方。的确，这时在欧洲不存在这些残酷的疾病，很少在当地产生，最严重的疾病是在公元前第一世纪或者此后从热带国家传来的。”

⑯关于在人体内产生艾滋病病毒的理论是又一个非洲的灾难降临西方世界的例子，也是这种老式的传播主义传统的最新神话。这种病毒是否最早产生于非洲，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明，但是这一神话已经具有了丑陋的反响，这正如另外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想法（但又是经典式的），这就是艾滋病是从猴子传播给人体，而且是由于在某些偏僻的非洲部落中的某种奇特的性行为所造成的。（这种神话在 Shannon and Pyle 的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AIDS, 1989” 中得到了天真的报道）。见 Watts and Okello 对这一文章的批评，“Medical Geography and AIDS,” 1990。还见 R.C.and R.J.Chirimuuta, *AIDS, Africa and racism*, 2nd ed., 1989.)

⑰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1976), p.43.

⑥例如，见 Giblin, “Trypanosomiasis Control in African History: An Evaded Issue?” (1990); Tursh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Health: Mainland Tanzania, 1920~1960” (1987) .

⑦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1957) .

⑧见 Venturi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Oriental Despotism’ in Europe” (1963); P.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 (1974); B. Chandra, “Karl Marx, His Theories of Asian Societies, and Colonial Rule” (1981)。

⑨欧洲奇迹的理论家们仍然经常提出类似的论点。例如，John 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p.12: “中国社会在这个阶段停留了二千多年，而相比之下，欧洲的进步之快就像是跨栏冠军。”

⑩而且还要早得多。例如 Montesquieu, Bernier, Adam Smith, and Hegel (例如，见 “Introduction,” and “The Oriental World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56) . 还见 Venturi,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Oriental Despotism’ in Europe” (1963); P. Anderson 的历史评论, *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 (1974); and B. Chandra, “Karl Marx, his Theories of Asian Societies, and Colonial Review” (1981) .

⑪此前有人持这种观点。马克思可能是从他在柏林的地理教师 Karl Ritter 那里获得这种观点的。

⑫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75) .

⑬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考虑了其他因素，应该说，他们的分析具有猜想性。我认为，恩格斯晚年从“东方独裁主义”观点有所后退。见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P.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 (1974); Blaut,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89); and B. Chandra, “Karl Marx, His Theories of Asian

Societies, and Colonial Rule” (1981) .

⑦见 Laibma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Theories of Transition” (1984), and Bailey and Llobera, *The Asiantic Mode of Production* (1981) .

⑧ Weber,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976), pp. 84, 131, 142, 157, *The Religion of China* (1951), pp. 16, 21, 25, and “The Origin of Seignorial Proprietorship,” part 1, chap. 3, esp. pp. 56 ~ 57 in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1981) . 还参见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1976), pp. 93, 207, 259.

⑨ Weber,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976), pp. 157~158. 见 p. 84: “(埃及的) 经济基础是灌溉, 这是利用土地资源的重要因素。一个新的居住点要求开凿运河……因此开凿运河必然是一项大规模的活动, 要求某种集体的社会组织。这与个人清理原始森林的做法非常不同——这是美索不达米亚 (和) 埃及的王室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的根本经济原因。

⑩例如, 见 Denevan, *The Aboriginal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Llanos de Mojos of Bolivia* (1966) and “Hydraulic Agriculture in the American Tropics” (1982)。这些著作论述了在热带灌溉地区或者高地的农业。Golson, “No Room at the Top: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the New Guinea Highlands” (1977), 论述了新几内亚高地的灌溉; Doolittle, *Canal Irrigation in Prehistoric Mexico* (1990), 关于墨西哥的灌溉和早期农业; Harrison and Turner *Pre-Hispanic Maya Agriculture* (1978), 关于玛雅低地早期的灌溉。

⑪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p. 8~9.

⑫ 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pp. 12~13, 27~28, 36, 42~43, 53, 59, 99, 102, 137.

⑳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p.11. Also see pp.41, 123, 132.

㉑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还见他的文章“European Development: Approaching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1988).

㉒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p.94.

㉓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p.179.

㉔曼把欧洲在古代时期的起飞主要归于战车战争和铁犁雨带农业，但他承认，这两项发明都起源于中世纪的东方人，这使我感到，曼的中心动因推理是围绕着欧洲理性的概念：不管这些发明是谁创造的，毕竟是欧洲人利用了这些发明。这一韦伯的概念是曼的基本概念，将在本章下面表现出来。

㉕Bray, *Agriculture*, vol.6, part 2, of Needham and collaborator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1984).

㉖Blaut, “Two Views of Diffusion” (1977).

㉗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pp.247, 406, 408, 412, 504~510, 520, 530, 539~540.

㉘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p.509.

㉙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p.99

㉚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p.110.

㉛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10.

㉜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47.

㉝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8. 琼斯犯了一个常犯的错误，即认为在灌溉农业中每个工人的生产率低于非灌溉农业。情况并非如此。中世纪农民的生产率虽然已有耕畜也并不高。而且耕畜被用于灌溉，在亚洲某些水稻田农业中使用得很多。

㉞Mann, “European Development” (1988), p.10,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p.406;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p.90, 227; Crone, Pre-Industry? Societies (1989), p.150;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1976), p.295.

⑦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chap.5) . 曼实际上是在这类推算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古代战争的理论, 他在这里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军队像现在一样在行军的路途中供养自己和他们的家畜。

⑧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chap.2 和其他地方。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p.132, 引用琼斯的话说了同样的话。

⑨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p.111;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p.90, 105, 107, 226 - 227; Mann, "European Development: Approaching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1988), p.10;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p.406.

⑩有时“犯罪的心境”被看做是另一方面的对照反应。

⑪Levy-Bruhl, How Natives Think (1966) .

⑫例如, 见 Boas,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38); Radin, 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 (1927); M.Mead, Growing Up in New Guinea (1930) .

⑬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1987), p.59; Bowler, The Invention of Progress (1989), p.66; Whitman "From Philology to Anthropolog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1984); Bernal, Black Athena, vol.1 (1987); Said, Orientalism (1978) . 关于这一理论的最近表现来自苏联关于“东方独裁主义”的辩论 (Lelekov, "Round-Table: State and Law in the Ancient Orient," 1978), p.190. L.Lelekov 是一位历史学家, 他声称表达“自由”和“权利”的词语在最初的印欧语系中是基本用语, 但在近东的语言中情况不是这样, 他断言这必然影响“社

会思维”，这种论点受到哲学家 V. Ivanov (p.193) 的批判。

⑭见 Dalal, “The Racism of Jung” (1988)。In Jung’s work, 特别见 Psychological Types (1971) (例如: “如果我们回到原始的心理, 我们完全看不到个人概念的痕迹”(p.10);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1963), and “The Dreamlike World of India,” in Civilization in Transition (1927)。还参见他的门徒 1954 年的著作 Erich Neumann, 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例如: “意识的演化采取创造性的演化形式是西方人的一项特殊成就……这种具有创造性的意识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中心特点……在静态文化中, 或者在原始社会中, 仍然保持着人类文化的原有特点, 最早期的人类心理仍占主导地位。(pp. xviii~xix)。

⑮Piaget, Psychology and Epistemology (1971), p.61.

⑯例如, 见 Werner and Kaplan, Symbol Formation (1964)。

⑰见 Th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16 卷 (至 1985 年), 有许多这种现象的例子。在这一时期, 南部非洲的白人对这一美国杂志的十分之一经验主义文章进行了研究, 以表明非洲黑人认识能力的低劣。

⑱Rogers,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1962); Rogers and Shoemaker,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s (1971), pp.187 ~ 191; McClel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 (1961); Hagen,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1962) and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ookings Institution, ed.,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Countries: An Agenda for Research (1962), pp.1~39. 我仅引用了开头的话: 从这些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文献。

⑲S. Marglin, “Losing Touch: The Cultural Conditions of Worker Accommodation and Resistance,” in F. and S. Marglin, eds.,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

tance (1990) .

⑩Sack,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1980) . 在这里讨论的持传播主义理论的著名地理学家有 L. Brow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1981) and P. Gould (*Spatial Diffusion*, 1969) . 关于农民传统主义与自然灾害的关系的论述见 G. White, ed., *Natural Hazards* (1974), 这是大量文献中的一个例子。我在 Blaut, “Two Views of Diffusion” (1977), “Diffusionism: A Unitarian Critique” (1987), and “Natural Mapping” (1991) 中批评了这些论点和其他关于非西方的非理性论点。

⑪在美国的教育领域中, 占主导地位的标准大学入学考试 (SAT and ACT), 是向特定文化和特定性别内部 (以及环境) 特点倾斜的, 结果女性的成绩不如男性, 尽管他们在大学的高年级表现得比男性更好。非洲裔美国人 (在这方面还没有被研究) 在这类考试中的成绩是很低的, 与他们在大学中的表现没有联系。因此, 这类考试有效地减少了女性和少数民族人员的入学率。尽管情况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类考试被广泛地采用, 这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样的偏向在智商测验中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在加利福尼亚的学校中, 禁止把这类考试作为鉴别的工具。“原始心灵”和“原始语言”的偏向有时会联在一起, 例如在美国发生的关于所谓“只讲英语”问题的辩论和关于欧洲以外的文献是否值得和欧洲的文献一起包括在大学的教学大纲中。不久以前, 在波士顿从 6~8 岁的孩子 30% 都没有上小学, 因为他们不能讲英语, 而且不会讲英语被判定为智力发展障碍的证据, 波士顿声称, 没有足够的资源在“特殊的学校中”教育这些孩子。总体来说, 美国教育中的考试是非常种族主义的。

⑫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1980), 以及 Dewey (例如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1929) 的早期著作, Whitehead (例如, *Modes of Thought*, 1938), and G. H. Mead

(例如, *Philosophy of the Act*, 1938)。

⑬这是一个总的估计。一些人类学家继续坚持“原始心灵”主张或者密切相关的“传统心灵”主张。后者的一个例子是 George Foster 的著名的、有影响的 *Traditional Cultures* (1962), 前者的例子见 Hallpike's *The Foundations of Primitive Thought* (1979)。批评文章见 Schweder, “*Cultural Psychology: What Is It?*” (1990)。

⑭关于韦伯对“理性”的用法, 该词在他的理论中的基本地位, 以及它的不确定的定义和起源, 见: Cohen's introduction to the 1981 ed. of Weber's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1981), pp. xxv - xxvii; Lo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1982), pp. 40~42, 53~54, n. 49; Freund, *The Sociology of Max Weber* (1968), pp. 140~149. In Weber, see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1981), chaps. 29, 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58), pp. 13~31, 59~60, 79, 118~120, 191, n. 19, 265, n. 31, *The Religion of China* (1951), chap. 8, *The Religion of India* (1967), p. 387, and other works.

⑮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1981), p. 161. 还见 pp. 339, 355~368. 韦伯对亚洲人的非理性做过大量评论。

⑯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 (1968), pp. 1212~1374.

⑰在 *The European Miracle* 一书中括弧里的号码是页码。

⑱生态学家的术语“共栖”是指动物类别之间密切的相互具体合作的形式, 但很少用于人类。

⑲琼斯方法的典型特征是对每一种亚洲社会都找到一些可以挑剔的特点, 把这一特点与某些经历了产业革命的欧洲社会的现代后工业社会的令人愉快的特点进行比较, 然后把这两种特点看作是这两类社会永远具有的特点, 从而使得亚洲人具有一种可怕

的原始形象的图像，而欧洲人则具有出色的现代化的形象。

⑳ “法兰克人的封建主义，在许多方面具有后来的封建主义的原型特征，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漂移的欧洲农民社会与一种崭新的机会主义的‘非欧洲人’的混合体。” Mann, “European Development” (1988), p.16.

㉑ Mann, “European Development” (1988), p.17. 还见他的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例如 pp.190, 195, 213, 377, 404, 412, 510. (“当所有这些过程结束时，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中等规模的、有着湿润土壤的岛国蓄势起飞：英国。” 1986), p.510.

㉒ Mann, “European Development” (1988), pp.8~9, 11~12, 15~18 and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pp.377~378, 397~398, 402~408, 412, 500~510. 关于欧洲理性及其历史意义，见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1976), pp.41, 97, 106~107, 236, 238, 249, 256, 259, 264.

㉓ 见 P.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1974), part 3;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1975), chap.6; Aston and Philpin, *The Brenner Debate* (1985), pp.32~33, 42~51, 59, 63n, 214~215, 234~236, 306~316.

㉔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962), p.38; 还见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1976), p.234.

㉕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962), p.54.

㉖ Kosambi, *Ancient India* (1969), p.89; R.S.Sharma, *Light on Early Indian Society and Economy* (1966), p.57.

㉗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962), p.44.

㉘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962),

p.56;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1976), p.237.

⑫见 C. T. Smith,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1967), p.203; Darby, *The Domesday Geography of Eastern England* (1952) .

⑬ Orwin and Orwin, *The Open Fields* (1967), chap.3; C. T. Smith,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1967), chap.4.

⑭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962), p.57.

⑮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962), p.67.

⑯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962), p.68.

⑰ Bray,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6, part 2, *Agriculture* (1984), pp.304~328.

⑱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962), p.76.

⑲ White, *Machina Ex Deo* (1968) . 特别见一篇有名文章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chap.5) .

⑳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In White, *Machina Ex Deo* (1967), p.85.

㉑ White, *Machina Ex Deo* (1967), p.90.

㉒ Needham et al.,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1954~1984) .

㉓一些历史学家今天完全忽视这一证据，重复关于中国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的老概念。例如，见 Roberts, *The Hutchinson History of the World* (1987), pp.493~495, 502.

㉔ “中世纪”和“中世”可以方便地用于东部半球的大多数情

况或者所有情况下。

⑭Needham et al.,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4, part 2 (1965), chap.27.

⑮Needham et al.,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4, part 2 (1965), p.33. Arnold Pacey places the innovation in Korea. 见 Pacey's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1990), p.56.

⑯例如, 见 Lopez, "Hard Times and Investment in Culture" (1953), Thorndyke, "Renaissance or Prenaissance?" (1943) .

⑰Cipolla, *Guns, Sails, Empires* (1965), p.106.

⑱Cipolla, *Guns, Sails, Empires* (1965), pp.108~109.

⑲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124.

⑳那些不处在这种简单的生态核心地区周围的现代国家有: 西班牙, 意大利、德国、波兰、希腊、瑞典、俄罗斯等等。在20世纪之前, 英国(英格兰南部)也许只有某些部分和法国(巴黎盆地)近似于适合这种高度抽象的模式, 这种模式对某些目的是有用的, 但是对于大陆的政治历史则是无用的。这些核心地区有一些是核心国家, 有一些则不是。在现代的东南亚, 缅甸、泰国和柬埔寨与任何欧洲国家一样适合这种模式。

㉑在这方面, 见 Dirks, *The Hollow Crown* (1987) .

㉒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States and Societies: The Miracl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88) .

㉓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 "European Development" (1988) .

㉔关于欧洲国家相互矛盾的论证这并不是惟一的例子。罗马这个国家一方面被霍尔等人说成是一项重要的发明而且是欧洲许多政治特点的发源地或者惟一发源地; 另一方面罗马这个国家被其他人(包括曼)说成只不过是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如像东方的独裁国家; 欧洲被认为在政治上有所创新, 避免了帝国的

形式，形成了一种较小规模的更加民主的国家。

⑬Baechler,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Caste and Feudality (India, Europe and Japan)" (1988) .

⑭例如，见 White, *Machina Ex Deo* (1968);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 "European Development" (1988); 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Baechler,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988); K.E Werner,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West" (1988); and Hallam, "The Medieval Social Picture" (1975) .

⑮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p.135.

⑯Mann, "European Development" (1988), p.12.

⑰Hallam, "The Medieval Social Picture" (1975), p.49.

⑱K.F. Werner.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West" (1988), p.172. 这位德国的中世纪主义者辩称，“奇迹”的中心力量是基督教。他在这里是指天主教，是指教义（天主教和此后的新教派）体系，是指被教会和教义所影响的社会政治体制，是指欧洲人的信仰。按照沃纳的意见，这种信仰与他们的创造力有很大关系，与他们的“进取”意识和理性有很大关系。沃纳承认，许多动因因素在欧洲兴起中起了作用，他毫不犹豫地声称自然环境起了作用。但是很明显，这种理论的基础基本上是宗教。此外，人们感觉到，这位学者自己可能看到了在基督教盛行的欧洲的兴起中基督上帝的手。

沃纳首先强烈地辩称，从罗马帝国时代直到中世纪，欧洲的历史保持了体制的连续性和进步的连续性，而且后来的帝国建立了神灵的和世俗的体制，一直延续到中世纪，使那个世纪具有自己的特点。在这些机制中最主要的是天主教。

沃纳想把教堂描述成为自有教堂以来就对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把欧洲的兴起看作是在基督教作为一种体制和教义指导

下发生的一个过程。如果沃纳仅仅提出一种历史理论，而且使宗教具有支配性的作用，我将不在本书中讨论他的观点。我会同意，其作用被历史学家低估了，保守主义者在这方面比马克思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讨论沃纳的观点的理由是，它表明了他的信仰，不是一般意义的宗教而是基督教在欧洲“奇迹”的历史中起了有效的作用。沃纳的观点明显地是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也许下面的话具有关键性意义：

（如果）我不得不选择一个词的话，而且这个词能够表达我们所理解的“欧洲奇迹”的基本重要因素，我们将选择一个哲学术语……“不安于现状”……“积极进取”……心神不定（Ruhelosigkeit）当亚洲及其智慧以及它的伟大的宗教系统和哲学走向艺术境界时……寻找灵魂的中心和世界的中心，而且在上帝那里寻找寄托，当已经达到彼岸时，创造欧洲奇迹的欧洲人每当到达彼岸时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准备起飞，……但是到哪里寻找这种心态的动因呢？？罪恶的剧痛引起焦虑不安……使人们寻求宽恕和仁慈。拯救灵魂的重要性这时对个人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不管这个人处于什么社会等级，不管这个个人是谁……（没有自暴自弃）听从命运……责任感在我看来是欧洲人造就“奇迹”的一种力量。（p.185）

因此：欧洲的宗教——基督教，在“欧洲人”中灌输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揭示了“欧洲奇迹”的基本渊源。

对这一点的批驳如同我们对所有的关于欧洲被假设具有独特“理性”的思想批判是一样的。不管这种推定的特点来自于宗教（沃纳）或者来自于后新石器时期的欧洲部落（曼），或者来自于任何其他的来源，基本的批判是：如果你接受一条基本的真理，

这就是所有社会人群都具有同样的心境，你怎么能够真正地证明欧洲人比非欧洲人更聪明、更优秀、更勇敢？把人类心灵的主要动因归于通过社会发明、技术发明和纯粹的智力活动实现的文化变革，而且实际上没有例外，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但是把人们的心灵归于某些群体——而不是另外一些群体——把所有的发明能力、进取心、责任心、智力欲望、尊重他人等品质，也就是通常用“理性”这个词所概括的品质，都归于某些群体，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而且很值得怀疑。欧洲人是有理性的，但是非欧洲人也是有理性的。

⑬例如，见 Palmer, *Atlas of Modern History* (1957); Bjorklund, Holmhoe, Rohr, and Lie,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World* (1970); and Kinder and Hilgemann, *The Anchor Atlas of World History*, vol.1 (1974) .

⑭我在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87) 中讨论了这一点。

⑮Padgug, “The Problem of the Theory of Slavery and Slave Society” (1976) .

⑯Baechler,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988) .

⑰Baechler, 在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988), p.39, 表示，我们应该“把霍尔斯塔特 Halstatt (约公元前 600 年) 时期的野蛮欧洲……与在 19 世纪处于殖民化边缘的非洲相提并论。”

⑱贝希勒在日本发现了真正的贵族，但他认为日本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与欧洲竞争。

⑲贝希勒认为，黑暗世纪时期的政治动乱顺利地让位于强大的欧洲是个相当大的奇迹。“不可避免地”会“建设更大的政体”(Baechler,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988), p.50. 但是同样不可避免地是印度，1000 年前的政治动乱得不到医治，永远得不到医治，从那以后，“政体在印度不能成为现实”。(p.45) .

⑳Baechler,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988), p.59.

①⑦ Baechler,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988), p. 53.

①⑧ Baechler,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988), p. 56.

①⑨ Baechler,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988), p. 45.

①⑩ Baechler,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988), p. 53.

①⑪ Godelier, *Sobre el Modo de Produccion Asiatico* (1969), p. 58.

①⑫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1977);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1985, originally published 1976), and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1985). 在第一篇 (1976) 文章 *Past and Present* 出版之后, 在那个刊物上刊载了一系列批评文章, 布伦纳在 1982 年的一篇文章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A volume, 中作了答复,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包括 *Past and Present* 等批评文章, 是由 Aston and Philpin 编辑的, 于 1985 年出版。

①⑬ 我认为, 这一原罪理论流行的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 它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 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 经过观察, 它表明是一个相当传统的理论, 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具有乡村气的话。按照这一理论, 认为阶级斗争理论导致了传统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 第二, 布伦纳使用他的理论攻击不受欢迎的“第三世界主义者”依赖论观点、不发达理论、特别是三种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斯威齐、弗兰克、沃勒斯坦——他们辩称, 欧洲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后来的兴起关系甚大。布伦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主义隧道历史学家: 欧洲以外的地区在任何历史阶段对社会的演变都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他不知道殖民主义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见此后的第四章——他辩称, 欧洲

以外的世界对欧洲经济产生了商业影响，而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商业产物：它发生在英格兰的农村而且反映阶级斗争，而不是贸易。见 Brenner collected in Aston and Philpin (1985) by Hilton, Croot and Parker, Wunder, Leroy, Ladurie, Bois, Cooper, and others. 还见 Torras, "Class Struggle in Catalonia" (1980) and Hoyle, "Tenure and the Land Marke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r a late contribution to the Brenner debate." (1990) .

⑭ Taeuber, in Freedman,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1970) .

⑮ a. 如果只有一个家庭成员是领取工资的工人，失业就是一个灾难。如果一家有几个人是工资劳动者，一般当其他人被解雇时会有人赚取一些收入。b. 如果我们假定一种能够赚到一定百分比收入的能力，当乘以工资赚取人数的时候将会得到一笔更大的绝对结余数额，也就是说，资本；而且这一绝对资本数额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意义。c. 从亲属那里能够借到钱对小规模企业经营是有意义的。d. 亲属人员能够提供不付工资的劳动。这些原则在第三世界社会群体中是人们熟悉的。

⑯ Hajnal,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 (1965), pp.101~146. 这篇文章在欧洲奇迹文献中是最广泛引用的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之一。

⑰ 见注⑳。

⑱ Hajnal,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 (1965), p.101.

⑲ Hajnal,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 (1965), p.134.

⑳ 哈吉纳尔承认，关于欧洲以外的地区他只有当代的数据，他仅表示，历史数据将更清楚地证明他的观点，因为他认为欧洲

以外的现代家庭模式在按照欧洲的模式方向变化：正在欧洲化。而且当“对有关的数据提出了所有的限定后，没有疑问我们原先的概括仍然成立”。(1965), p.106.

⑮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 ~ 1800* (1977), p.509.

⑯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p.408; Cron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1989), p.152;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p.15 ~ 16; Macfarlane,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Modes of Reproduction 1300 ~ 1840* (1986) .

⑰ Laslett, “The European Family and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1989) .

⑱ Tauber, “The Families of Chinese Farmers” (1970), pp.63 ~ 86.

⑲ 见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1966), p.49.

⑳ 例如，见 Handler “Review of Macfarlane, A.,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1989); Hilton, “Individualism and the English Peasantry” (1980); Kertzer, “The Joint Family Household Revisited: Demographic Constraints and Household Complexity in the European Past” (1989); and Berkner, “The Use and Misuse of Census Data for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Family Structures” (1975), and “The Stem Family and the Developmental Cycle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 (1989) .

㉑ 例如，G.Le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1987), p.65 指出，“(许多)学者辩称任何社会的大多数家庭过去是而且一直是核心家庭，不管其文化因素是否有利于大型家庭。”

㉒ Macfarlane,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1978), chap.1 and “The Cradle of Capitalism” (1988), p.344.

㉓ 例如，见 Hilton, “Individualism and the English Peasantry”

(1980) and Handler, "Review of Mcfarlane, A.,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1989).

⑩ "看来(原始社会人们的)行为模式(对受孕和婴儿死亡)都与人们看到的许多动物的行为极其相似", Wrigley, Population and History (1969), p.37. Wrigley 描写的是当代猎人、采集者和捕鱼人。"关于动物社会习惯和动物数目调节"的关系的描述是"研究原始人的一个方便的出发点"(p.37)。

⑪ Crone, Pre - Industrial Societies (1989), p.153; 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1985), pp.130 ~ 132;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1981), pp.3, 13 ~ 15, 217 ~ 219, 226 ~ 227, 231, and elsewhere; Laslett, "The European Family and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1989), pp.235 ~ 240; Macfarlane, "The Cradle of Capitalism" (1988), chap.14;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 p.408.

⑫ 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1985), pp.130 ~ 131.

⑬ Laslett, "The European Family and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1989), p.237.

⑭ 见 Croot and Park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France and England Compared" (1985)。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在 the Aston and Philpin book,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 - Industrial Europe (1985), 详细讨论了中世纪欧洲低水平的土地所有制。

⑮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 ~ 1800 (1977), pp.53 ~ 54.

⑯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 ~ 1800 (1977), p.652.

第三章 1492 年之前

我在本章和下一章将论述三种广泛命题。

①1492 年前，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取得了走向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进展，这种情况同时也在亚洲的一些地方发生，其基本进程范围广泛。这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从阶级农业社会形式向资本主义的原始形式的变革过程。这完全不是有目的的安排；不是某种致力于某种事先确定的目标的演变行动，即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行动。我的论点仅仅表明，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在东半球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我将使用“封建主义”这个词来描述非洲、亚洲以及欧洲的农业阶级社会（而且说明这样使用这个词的理由），然后，我将把此后出现的形态称为“原型资本主义”。在 1492 年，在东半球各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很可能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原型资本主义的中心在所有三个大陆的不同地区出现，它们之间有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它从西欧、南部非洲延伸到亚洲东部。

②1492 年后，这种半球范围内的体制开始崩溃，这是因为欧洲人在美洲获得了财富和权利。美洲被欧洲人征服，而不是被亚洲人或者非洲人征服，这是因为欧洲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并不是由于欧洲的发展水平或者速度具有优越性，或者具有发展的“潜力”。

③在美洲以及此后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积累，使大量财富从这些地区流入欧洲。这是欧洲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最根本力量，同时也是亚洲和非洲的原型资本主义中心开始相对衰落以及此后绝对衰落的原因。发展出现在欧洲，而在其他地区出现了不发达。欧洲内部的许多进程是欧洲大陆发展变革的重要原因，但是引发欧洲发展然后继续为这种变革添柴加火的乃是来自殖民地的财富。

第一个命题就是本章的标题；第二和第三个命题则是第四章的标题。

我将不去而且不能表明这些命题的真理性。我只是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些命题，而且表明这些命题也符合一种首尾一贯的理论事实——我认为这种理论是站得住脚的理论。也就是说，我将尽量朝着“表明真理性”的方向努力，提供我所知道的证据，以及本章能够容纳的尽量详细的论证。这些论证的某些部分（例如1492年前非洲的发展）的论证已经远远超出现有的证据，因为在我看来需要肯定或者否定的事实还没有得到。文化传播主义派学者也没有花费足够的力量去寻找有关的证据。就这一部分而言，理论的演绎是在很强的经验主义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的。除了这一证据之外，还有上一章批判各种对立的理论时提供的证据，也就是批判否定欧洲以外地区在1492年之前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证据。可以说，这样做在我们考虑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时提供了一个平坦的场地。

一、中世纪的景观

1492年前，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各种文明在许多方面互不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又都非常相似。我认为，他们互不相同的方面对文化演变来说并不具有重要意义。^①我在第二章概述了关于

欧洲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说明了关于欧洲的独特崛起的各种理论，而且我试图表明这些理论不能令人信服。在此后的讨论中，我将讨论对文化演变来说是明显重要的某些文化内容，而且我将表明，中世纪欧洲的模式与其他文明的模式并没有重大区别。我将论证，生产方式、阶级结构、空间交换的制度和城市化，对许多文明来说大体上是相似的，在很大程度上沿着同样的道路演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半球范围内共同进程的各个部分。

在1492年前的一个世纪中，人类的大多数生活在有阶级的农业社会中。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自耕农，他们生产自己的生活用品，而且被迫把他们的产品（或者劳动，或者现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上层阶级或者统治阶级。统治阶级通常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且几乎总是拥有名义上或者实际上统治农民的权力。我所描述的是一种生产方式，也就是说，一些特点的复合体，包括物质资源诸如土地、物质文化（工具等）、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劳动、管理物质资源和产品分配的社会规则以及其他有关特点。对中世纪欧洲来说，这种生产方式称为“封建的”。这是一个更大的概念的一部分，那个概念是“封建社会”。欧洲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国家和政权的性质。另一个特点是地主阶级的文化，包括各种头衔、骑士制度等等。第三个特点是在某些地区和时代所存在的奴隶制度的重要性。在这些特点之下（或至少说伴随着）封建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一种地主——农民、阶级层次、农业社会的一般事实。在这个社会中地主阶级是用从农民生产者那里榨取的（总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剩余物品来养活的。这种生产方式及其变种，几乎总是东半球分阶级层次的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②因此，我将对所有这类社会使用“封建生产方式”这个术语。

其他人这样使用这个词时遇到了各种重要的反对意见。那些

学者坚持认为，欧洲的独特特点实际上是变革演化的引擎，因此当然拒绝把其他类型的社会描述成为“封建的”。例如，马克斯·韦伯认为，欧洲的封建庄园是独特的，而且是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或者条件）。那些从进化的观点认为奴隶制度是一个重要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愿意对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度的社会（尽管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经历过奴隶制度）使用“封建主义”这个术语。^③萨米尔·阿明拒绝在广义上使用“封建主义”这个术语，理由是这倾向于要求我们把欧洲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模式用来衡量其他大陆上的类似社会。因此，他更喜欢用“纳贡”这个术语，而不喜欢用“封建”这个术语。他正确地辩称，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税收和租金；现金、劳役和产品）榨取剩余产品的各种形式可以比作是一种纳贡。^④我的观点是，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家并不享有“封建主义”这个术语的版权，因此这个术语不仅有效，而且用于我们所观察的上述生产方式也是正当的，不管是用于各大陆或任何社会形态。还有其他反对意见。这个时期在各处发现的小型城市社会怎样界定呢？我们在本章的后面将讨论这一问题，对于脱离开基本的地主——农民模式的畸形社会我们怎样进行描述呢？还有分阶级层次的游牧社会呢？对于生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的阶级社会又该怎样界定呢？对这些问题的界定是重要的，我将试图在我们的讨论中加以论述。

对于农业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的起源和演化，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回答。直到最近之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农业、阶级层次化以及文明的其他属性起源于古代的近中东。（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在这些命题下，以及关于亚洲和非洲文化落后停滞不前的明确信仰和含蓄信仰，封建欧洲的农业景观必然是在质量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发展层次，这几乎成了一条定理——或者换个说法，必然具有获得迅速变革的更大潜力——这是对中世纪的亚洲、非洲的许多其他地区或者所有其他地区而言。在这种情况下

下，如果认为在这一时期农业仍然在向半球的外围地区扩散就将是合乎逻辑的。例如，如同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历史学家倾向于相信，南部非洲的大部分甚至在现代的早期仍然处于“前农业”时期。有了这个基本模式，学者们就有权猜测一般农业以及某种已驯化的植物和动物在总传播过程中最初到达了各个边缘地区的日期。

这一模式近期以来开始崩溃。在东南亚，农业（新石器时期）革命开始出现的日期很早，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人们一般承认，中东的农业有10000~12000年之久）。陶器的出现在东北亚和日本也差不多也这样古老。此后不久，早期的农业在印度、新几内亚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⑤今天，尽管多数人看来认为农业首先在中东出现，也有很多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许多人论断，农业在中东和东南亚分别独立出现，也许是同时出现；还有人认为西部非洲也是这种情况。但有一种情况是可能的，农业革命在各地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⑥我这样说是认为，各种庄稼、家畜、工具以及有关的思想的总体在许多社会中是同时发生的（可能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而且每种新的雏形倾向于迅速地扩散到半球的其他地区，而这种新雏形在那个地区是一种有用的发明，我把这整个过程称为“交叉传播”。这一过程逐步形成一种农业景观，出现在半球的广大地区，扩大到（中间有不重要的断裂）整个热带地区和享有相当有利的气候和土壤的温带地区。^⑦

毕竟，现在人们普遍接受，农业的扩散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到中世纪时，农业已经发展到东半球的多数地区，那里的环境最适合农业。农业还在扩散，但不能说是农业革命。农业向地球的两极扩散，几乎到达了现在的纬度。在西半球，1492年种植玉米的界线几乎到达了现在的纬度，小麦的种植到达了加拿大中部。在两个半球，几乎所有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的庄稼和牲畜的类

型那时都已经驯化，尽管品种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总起来说，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农业地区这时都从一系列的在本半球驯化的品种中选择了最适合本地环境条件和文化的庄稼和牲畜的搭配组合。半球的一个地区形成的相关的庄稼组合在很多其他地区也有。

一个非常具有戏剧化的证据是，1492年之后西半球的庄稼迅速向东半球扩散。玉米、木薯、烟叶、地瓜、白薯和其他庄稼极为迅速地扩散，使这些种植物在文化上具有了重要意义，这表明当扩散过程是一种以前不为人们熟知的发明时，这种种植物的扩散是多么迅速：我们可以假定，东半球种植的大多数庄稼的扩散已经不是那么迅速。农业扩散的地区主要是周边地区如高地、某些森林地带和偏僻的岛屿，主要是由于移民、征服以及缺乏土地等社会进程引起的。^⑧1492年前人们开始了农业实践，从南部非洲到北部欧洲，到北部亚洲，到东南亚以及包括檀香山在内的太平洋多数地区。就多数地区而言，我们所描述的“非农业”文化没有选择农业；因此它们不属于“前农业”时期。^⑨

就最复杂的农业技术的形式来说情况可能也是这样。关于灌溉、耕地、使用肥料、复杂的轮体制（包括不休耕的轮作）的知识，以及其他精耕农业的特点，这时可能已经扩散到农民认为所有可以使用这些技术的农业地区，可能是为了增加产量，可能是为了降低劳力需求，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剩余产品的交纳，或者为了其他文化原因。^⑩我还将进一步论证，在多数地区，重要发明的扩散速度非常之快，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很少受到缺乏技术知识的制约，只要某种技术已经被另一个半球的人们所掌握。^⑪但这是一种推测。

农业社会并不总是阶级社会，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多数农业地区在本半球表明，在这一时期农业和地主——农民阶级制度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封建的”生产方式。这一点存在

着两点争论。一种反对意见通常来自（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辩称中世纪欧洲以外的农业生产方式缺乏某种变革的潜力，也就是缺少我们所联系的欧洲封建方式的潜力。关于这一论点（即“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独裁主义”等等。）在第二章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第二个问题是空间模式问题。在中世纪东半球的地图上我们发现存在着阶级化的农业社会，还是发现存在着没有阶级的农业社会？答案需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阶级化的方式几乎在亚洲所有农业地区都占主导地位，一种明显的模式是地主——农民的冲突。争论集中在非洲。但是没有疑问，地主——农民剥削关系在东北部非洲（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地区占主导地位，从东大西洋沿岸到乍得湖的苏丹地区，东部非洲的某些湖区地区，围绕着津巴布韦的帝国东南部非洲，到中部非洲沿海的一些地区。现在人们还知道，很多森林地带和干旱森林地带的西非和中非的省份（阿坎、尤卢巴、刚果等等），也表现出这种生产方式或者某种类似的生产方式，而且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才真正刚刚开始。^⑩因此非洲封建生产方式的地图是很广大的。其次，我将论证（在萨米尔·阿明之后），几乎所有由国家组成的社会都是阶级社会，也就是中世纪的国家在剥削进程和统治阶级政治关系中发挥着密切的作用。就面积和人口来说，中世纪非洲的一半以上是按照国家组成的，因此我推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阶级化的。我可从对中世纪的农业的空间模式的粗略考察得出结论，那里存在着技术复杂的农业，存在着阶级，而且封建生产方式在非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某些地区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

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几乎在所有的地区都是地主阶级，尽管这一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可能采取几种不同法律形式。这一阶级的某些成员有封号，但是就演化而言贵族和士绅之间的区分并不是

重要的问题，而且两种形式（以及其他）在本半球都广泛存在。^⑩这一阶级毕竟自己认为是永存的，它们可以使用继承的封号作为阶级成员的符号，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起到同样的作用，或者同时采用两种方式。实际上，在中国的不同时期没有封号的士绅成员也可以改善家庭取得统治阶级地位和财富的机会，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政治风向的变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贵族等级上下之分，地主政府官员（也是从土地中取得）的区别并不重要。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讨论的，认为欧洲的中世纪地主阶级比其他地区地主阶级更接近于纯粹的私有土地所有制，这种传统的观点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韦伯把所谓的欧洲庄园模式和地主阶级在某种与高层的贵族和帝王的安排中所取得的土地的体制，与他认为是大多数其他社会所具有的特征的“服役制”进行鲜明的区分是错误的。

世袭制和服役制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在欧洲，服役制是一种严格的典型形式（是在保证忠诚和军事支持等条件下授予的），但是这种受封制有成为世袭制的倾向。广而言之，这种情况在其他社会中也是如此。按照服役制授予的封地或者赠予，可以从一个封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封地（或者是拥有一个可以变化的封地职位）。但是重要的是阶级成员可以使一个人拥有封地，从这里获取财富（并且从它的居住人那里），只要这个人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重要的是，只要有关的个人或者亲属集团享有有效的控制权，其财产就是私有的，这种情况在很多地区都是如此，尽管某些时期出现动荡或者更迭。而且土地可以在另外一些意义上称为是私有的，也就是土地在市场上的价值是私有的。但是这从基本上来说（或者几乎可以这样说）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环境。这种情况只在高度商业化的农村地区才能看到，不管是在欧洲或者欧洲以外，但是是在1492年之前。^⑪中国的士绅，印度的封地拥有人，甚至莫卧儿王朝的已经在服役期被授予封地的地

区财政拨款使用者，也很快出租封地或者改成可继承的私有财产，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特征。^⑤与许多其他地区的地主阶级相比而言，欧洲的封建时期地主阶级并不比其他地方先进，或者更愿意（比如说）实行资本主义和现代化。

所谓的欧洲庄园制度有时候被说成具有不同的封建主义特点，说成是一种特殊的走向私有制的欧洲巨人步伐和对劳动力的大规模使用，而且说这种情况对向资本主义演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总的来说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这种制度。在那个半球广泛地存在着大型家产，但是这种领地农业的特殊组织形式很少采用不付报酬的农民劳动力。庄园制度就其狭义而言包括协调领地强迫劳役农业，也包括农民家园，而且在庄园里除了农业生产外还有一些制造业，这种情况在欧洲以外的几个地区也有发现。这种形式在中国和印度南部具有重要地位。^⑥但是领地农业并不在整个欧洲占主导地位（在地中海地带并不常见），而且与资本主义农业没有相似之处。到14世纪，这种形式在西部欧洲几乎消亡。因此，这一特点在欧洲比在其他地区（如北部印度）有相对明显的发展，并不构成此后某些地区向资本主义过渡而其他地区没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因。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欧洲人过去对印度村庄的不确切定义。中世纪印度的村庄的确有联合的特点；的确存在着公社使用权益的控制（虽然不是明显的公社所有制）；的确表现出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马克思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对他来说可以说明村庄的凝聚力、可以在外来殖民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保持不变，而且同样，可以抵制社会变革。但是欧洲村庄也保持了某种联合的特点，甚至比印度的村庄更为明显。在印度种姓社会与村庄居住模式联系薄弱。^⑦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叠缩历史的经典错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来看欧洲农村的解体，并

因而认为这些村庄在许多世纪前作为村社实体已经消融。进一步说，真实的土地所有制在印度和欧洲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村庄只是名义上被授予权利（包括公共土地权利），这种权利又可能或者实际上被地主阶级所侵犯。大部分用于生产的土地的真实所有人，也就是世袭的或者转让财产的欧洲人在所有的两个地区都是统治阶级。最后，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也存在于欧洲农村。^⑧看来它在1492年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解体。总而言之，尽管印度的封建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同于欧洲的形式（或者多种形式），它仍然具有一种生产方式的同样的一般特点和同样的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潜力。这一论点也许可以用于亚洲和非洲人的许多地区。中世纪的欧洲村庄看来在半球的各种村庄居住点和社会形式中并不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

封建制度下的生产阶级通常包括农民，他们以家庭为单位耕种地主的土地并且提供劳役、产品或现金作为地租。农奴制在欧洲模式中经常被认为是典型的封建劳务形式。^⑨欧洲的基本形式的农奴在非洲和亚洲的确也能够看到，尽管在晚期罗马欧洲农奴化的具体历史是独特的，而且它的法律形式在其他地方也很少看到。我们所看到的是没有自由的劳动形式的概貌，也就是捆绑在某种地主的资产上的农民劳役，这种情况在三个大陆上都是如此。^⑩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其中包括布伦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贝希勒，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把14世纪和15世纪西部欧洲的农民相当理想化，而且把他们看做是自由农，充满了企业家精神等等。^⑪这又是在叠缩历史。但是，那里的农民是佃农，仍然以多种形式捆绑在资产上，只是在1492年之后，才在那里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自由农的强流，他们积累资本，属于一种富农式的阶级，愿意实现农村资本主义。欧洲的农民并不特别具有特殊性。那里的农民被迫提供劳役、产品或者现金作为租金、纳贡或者税收（付给地主），他们不能自由地从地主的领地迁移，而

且他们的地位被下一代人所继承，这种情况在中世纪的亚洲、非洲以及欧洲的许多地区都有发现。

在各种封建农业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相互联系性，这种联系性足以表明，我们不应该把整个半球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看做是相互分离的社会实体，而应该看做是具有地区差别的单一封建景观。它们之间有时有明显的边界，有时则没有。很明显，存在着大量的地区之间的交叉传播，例如，作为证据，在广大的地域存在着共同的农业技术。（某些欧洲历史学家断言，^②中世纪的欧洲农业在技术水平方面是独特的，并且因此引发了朝向资本主义的进步，这种断言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欧洲农业有与其他地区大部分相同的特征，没有独特发达的农业，也没有特别孕育着社会变革。）看来封建主义的演化很可能在半球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伴随着对农民的不断深化的压迫，因为对剩余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农民作出的反应包括技术进步和借鉴（传播），以及向周边地区和城镇的移民。同时，当统治阶级把他的黎民增加交纳剩余产品的所有潜力榨取出来后，就试图征服和剥削其他生产者人群，从而获得进行剥削的内部和外部封地，这也同时导致了地区之间进一步的相互联系。^③然而，与其同时，封建统治阶级社会的血缘关系、官僚关系、种姓制度是统一的，这种关系有时伸展到非常广大的地区。我们知道，那时并没有把社会整齐地化分为民族国家，语言区的界限也不明显，语言障碍不具有什么意义，甚至宗教差异也没有对思想、事务和人员的流动构成障碍。因此我们应该认为，所有（或者大部分）封建社会都享有共同的空间，通过这一空间社会力量 and 压力向各个方向扩散，扩散到非常遥远的地方，而且很容易跨越国界。有了这一概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作为一般的演化在半球的大部分地区按照大体相同的方式进行。

在中世纪的晚期，在所有三个大陆的许多农业地区，都存在着发生了深刻变革的迹象。存在着两类迹象：衰落的迹象，甚至是封建制度立刻崩溃的迹象；朝向商业化农业和农村资本主义变革的迹象。在半球的大部分地区，生产方式呈现出衰落状况，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压榨、农民起义、向农业边疆地区和城镇的移民，统治阶级间为了获得生产人口进行激烈的战争等等。到14世纪，封建主义进入一个危机阶段——尽管还不是崩溃——在欧洲、在亚洲的部分地区看来也存在类似的危机，而且也许——我们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无疑将会得知——存在于非洲。^④在所有三个大陆上，农民都在向城市迁移，可能具有大体可以相比的速度。在欧洲或者欧洲以外，这种迁移不可能在大的地区内形成一种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流，因为城市人口仍然在全人口中占很小比例，在15世纪末期各地情况都是这样。但这在农村地区仍然具有危机性的影响。这些危机是否表明有关的生产方式真的快要崩溃了，而且是由于内部矛盾的原因，也许这时还不能加以确定。但无论如何，封建主义在欧洲已经非常接近寿终之日。在1492年前，许多欧洲以外地区的封建主义也同样接近其临终之日。

我在这里进行的是反论和推测。我不是在论证地主——农民生产方式已经走过了它所分配的历史空间或者即将崩溃，或者把它自己转变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一种城市的背景下或者农村的背景下是否获得了最早期的成长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在下边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提出关于一般历史原因的理论。我只是论证，这种过渡或者衰落，或者别人把它称作什么别的东西，到1492年远远没有完成，而来自美洲的财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且同时促进了欧洲封建生产方式的最终没落。

我做以下推测：在总的农业（庄稼、家畜、工具、水利系统

等等)文化雏形极为迅速地交叉传播的总模式下,而且在与此平行的中世纪东半球阶级化的农业社会的相互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人们将会预料到,阶级化社会形式的一般发展和演变,在各个相邻的地区之间将会相对平衡地进行,它们的雏形进行扩散,社会压力将随着移民进行转移,随着征服和统治阶级的联盟而扩散。这种封建生产方式的演变也许在各地受到一种共同社会事实的局限:地主阶级和它的盟友(商人,贵族等等)坚持要求得到更多的财富,这种要求转换成为要求农民增加产量的经常压力,以便农民能够增加剩余品的交纳。我把这一点看做是一种长期的世俗潮流,这种潮流在农民中引起具体反应,包括技术进步,技术交叉传播,毁林开拓、农民起义、农村——城市移民、参与统治阶级军事冒险等等。然后我推测,这些机制缓和了社会紧张,这种紧张在许多地方是由于统治阶级要求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而引起的。这将使我们能够论证,如果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衰落或者在半球的一个地区处于危机之中,那么同样的情况在半球的其他地区也会发生。简而言之:有关的生产方式兴起,然后又在半球的范围内没落,1492年在欧洲发生的事也同样在非洲和亚洲发生。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预料到封建生产方式的没落或衰退呢?这是进行推测的最后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封建主义是演化的一个“阶段”,而且最终必然让位给下一个阶段——更高的演变(资本主义)“阶段”,这是一些机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我们也不能接受这种论点的保守主义形式。他们把封建主义让位给更高的和更“现代的”社会(资本主义)形式,看做是人类必然进步的结果,看做是社会、智力和道德进步的必然结果。我们也不能借助于马尔萨斯的关于人口压力必然增长的力量(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说明这一论点的虚伪性,主要理由是,人类文化总是控制他们的人口行为,表现出在一定程度上的理性)。我将提出下

面的说明模式。关于这一社会形式有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作为生活方式的家庭规模的农业；第二，地主阶级压榨或者试图压榨农民生产出不断增长的绝对剩余产品。农民生产者对这一点的反应是多方面的，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们当然试图增加他们的人口，只要每一个增加的人在这个社会里能够生产出必需剩余产品，也就是说，提供比他消费所需要的更多产品的劳动能力，提供比增加的社会成员所消费的更多的产品，提供个人交纳剩余产品的能力。当然他们尽量增加耕地，有时候试图迁移到其他地区，迁移到有新的农业土地的地方或者其他地方。但他们主要是加强劳动强度。也就是说，他们提高农业生产率，不断地试验新的庄稼品种、新的工具、新的技术，而且他们对发明创造的新闻随时注意，也就是说其他地方成功的发明创造——可能在附近村庄，或者在另一个山谷、另一个岛屿上。

技术改进的过程是没有限度的，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就要衰落了，这时技术改进的效果也就达到了它的极限。毫无疑问，当新的庄稼或者牲畜的类型在得到迅速的驯服期间，或者当主要的工具、铁被用于这个体系时，这一速度将达到最高点。到中世纪，改良速度下降到一定水平，不足以使农民满足地主对剩余产品不断提高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去管其他反应，如进行开拓或者从农村向城市移民——而这些情况在一些地区是可能实现的，在另外一些地区是不能实现的——这时我们的情况就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总危机。

到目前为止，这一讨论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农业生产者的改良主要是通过农场里自身的发明创造。这在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对家庭规模的农业来说情况大致如此。当然，农业生产还通过引进水利灌溉和施肥来加以改良。而且，在农场以外也有销售或者产品的交换，农业产品的销售或者交换是为了对农田投

入肥料、种子或者劳动。因此个体农场或者家庭农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自给自足的小地区制度。我们非常了解，而且这时的农民也很了解，把农民农场这样的小范围生产体系转变成为大的体系的最好战略是把这些小农场充分组合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大面积体系。这主要是要增加水和肥料的投入，例如石灰和肥料，并且改变庄稼的模式和牲畜的模式，过去这种模式主要是为了养活农场上的家庭，现在需要改变成为专业生产，能够出售产品，而且能最好地适应农场生态条件。（这一般意味着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增产的粮食既食用又出售，或者经济作物生产专业化如棉花。）今天，当我们说到最近几个世纪的“农业革命”时，我们是在描述这种大范围的革命：现代化的家庭农场买进大量肥料；买进许多工具、杀虫剂以及在其他地方生产的产品；他们还使用大量的自己家庭以外的劳动力；他们的专业化（有时）涉及到生态的优化。这个单子对本世纪以前发生的革命变革作了充分说明，它意味着内部的、小范围的改良——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农业发展的这个阶段起着次要作用。

为了使农牧业能够在大范围内得到提高，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农业商业化，因为把物品移入或者移出农业的小体系（最少也是村庄小体系）主要是买和卖的过程。看来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总危机将会带来两种可能出现的结果中的一个。一种是相对平稳的过渡，过渡到一种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存在着农场以外大规模的用现金购买农产品的要求和供给购买人的产品，并伴随着地主的现金支付（或者按照土地份额支付给地主，然后地主把这些份额变换成现金）。这种情况发生在大规模的非农业入口中，因此就出现了城市或者参与了重要的长途贸易。换个说法：如果商业化和城市化发生了，危机就有了出路。或者是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性变革：农民起义，温和的（如拒交地租）或者充满暴力的起义，重要的社会政治和宗教

生活里边的文化变革，或者其他同样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也许这两种形式在解决危机时以某种组合的形式发生。我的结论是，相当明确的模式是，封建矛盾激化，这是由于要求交纳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而农业家庭交纳剩余产品的水平日益降低，这就必然导致发生某种革命性的变革。我所提到的大多数变革实际上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发生过，而且推翻了作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封建主义，被现代制度所代替，它的模式就是英格兰“光荣的革命”。但我不是在论证，这种农村的过程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但它肯定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起了作用，特别是对提高城市化的过程和提高长途商品流动的过程，而这一点正是中世纪晚期整个半球的特点，我把这种过程称为“原型资本主义”，我们将在本章下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二、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原型资本主义

我使用“原型资本主义”这个词不是引进一个技术术语，而是为了避免对另外一个术语“资本主义”下定义。显然，我们通常认为的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在中世纪并不存在；我们所讨论的是它的祖先，（我将论证）它表现出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许多方面，但是其规模在空间上和社会上是很小的，而且一般来说是在一个更大的、占主导地位的与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经济制度的内部或者边沿。因此，原型资本主义是初始的资本主义，是接近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或者说是少年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存在于两种革命转变之前的时期，这两种转变使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其中的第一个转变是政治转变，这种转变通常在习惯上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革命（复数）”——大的政体的缔造，这种政体不是由封建地主阶级来主导，而是由上层城镇居民（市民，资产阶级）来主导，以及他们在农村具有企业家精神

的盟友。最著名的例子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定义性的例子是英国的“1688年的光荣的革命”。我将把1688年这个日子作为资本主义获得政治胜利的象征。第二个转变当然是产业革命，它到19世纪的后期才真正开始。我们将在第四章考察资本主义和非洲以外地区在这两种转变中所起的作用。

在所有三个大陆上，在上述的高度商业化的农业和矿业地区，我们发现了相对来说是小规模的农村地区（它们一般是大型港口城市的内地），这些地区明显地受到资本主义的渗透——原型资本主义——这种情况发生在1492年前夕。其中有佛兰德斯、英格兰东南部、意大利北部、摩洛哥的甘蔗种植区、尼罗河河谷、黄金海岸、基卢瓦、索法拉（以及假定的津巴布韦的部分）、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孟加拉、北爪哇和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那里的土地被具有商业意识的地主所有，或者被城市原型资本家所有。^⑧租金一般用现金支付，但福建省例外，在那里地主阶级收取农产品，然后到其他地方出售，这样可以榨取更多的现金利润。^⑨农业生产通过从农民家庭到种植园的不同办法组织起来，他们种植了相当大量的农业产品，出售并且出口产品：大米、棉花、蔗糖、胡椒等等。工业生产扩大到所有三个大陆农村：早期的“走出去制度”实际上是欧洲西北部非城市工业化，这时商会的控制减弱；可能这种情况在亚洲和非洲（在那里商业和手工业行会也很发达，而且在中世纪也很强大）某些地区也发生了这种情况。^⑩在更广泛的地区，商品生产已经充分渗透到农业经济，非常令人怀疑的是西欧农民农业是否比中国和印度等许多地区更加商业化，是否比欧洲以外的某些地区更加商业化。也许我们可以假定，城市化的水平是这个时期农业商业化水平很好的比较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必然代表着农业以外对农业产品的主要需求。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和印度农业商业化的程度比欧洲农业更高，因为在这些地区的整个人口中占更大比例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

从欧洲北部到非洲南部，再到亚洲东部，到处点缀着城市。有些城市是重要的封建社会的政权所在地。有些城市对这些社会来说或者从地理上来说处于边沿地带，而且主要出现在沿海地区，它们存在于大型的封建社会的间隙之间，在它们之间运输货物或者进行交易，为它们制造商品。如果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城市级别，即内部的和边缘的（或周边的），这个说法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存在着许多类型和层次，而且内部的、权利所在地的城市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各社会间进行贸易的主要中心和进行非农业生产的主要中心。然而，我们可以区分出一种特殊的城市集团，这些城市明显地是为了制造产品和从事商贸活动，而且处在强大封建国家的边沿（有些则处在这些国家中，有些是城市型国家甚至是城市国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长途海上贸易。这类城市坐落在西部欧洲沿海、地中海、东部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沿海地区。这些城市的生产方式最好描述成为初始资本主义，原型资本主义——当然不是封建主义——那里有领取工资的工人，他们显然是最大的劳动者阶级，商人、商人地主或者商人制造商是统治阶级，而且其经济活动是商业（商品运输、银行等等）、制造业（大型的和小型的）和商业化农业的混合体。

这时的商业航海城市有一些非常小，有一些很大，但看来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原型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阶级的形成和技术的发展方面大体处于同样的水平。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它们相互之间通过密切的商业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思想、技术、货物和人员通过这个网络向各个方向流动，不断进行交叉传播。^②（例如：马六甲，当葡萄牙人首次到达时，它正在与地中海进行贸易，还与亚洲内地、东部非洲和中东、印度、中国进行贸易，也许还有日本以及东南亚所有地区。历史学家图梅·皮尔使我们相信，在16世纪初期，那个城市的人们讲84种不同的语言。为了提高葡萄牙人的重要性，他断言“不管谁是马六甲的主人，它都

在扼住威尼斯的喉咙。”^②更早期的另外一个例子：卡拉的丹那沙林港在10世纪就已与中国和阿拉伯进行贸易。根据伊本·阿尔法基的说法，卡拉的鸚鵡可以讲波斯语、阿拉伯语、中国语、印度语和希腊语。^③

商业航海中心的网络从波罗的海到东地中海就像一串珍珠，从那里又走向索发拉（或者更远——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历史仍然埋葬于殖民主义的烟漠中）和东部的日本。这一网络还延伸到所有三个大陆的内陆，但是商业航海城市和航海路线与内地中心比较而言则最终具有更大的资本主义兴起演化的重要性。这是由于两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对外贸易处在原型资本主义活动最外沿；实际上处在法律能够管辖的范围之外。（沙漠边沿的内陆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这种边缘地位。）因此，一个原型资本主义港口城市可以从任何其他海洋港口搬运货物而不需要通过有国家组织的领土，从而可以回避纳税，不再被迫在中间贸易中心与外国商人进行货物买卖，或者被拒绝进入某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亚洲香料在1492年前的欧洲市场上的高成本，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在过去的商业运输中，这些香料需要通过设在内陆路线上的一些商贸中心，而每一个中心都要获取中间利润。葡萄牙人在16世纪运输的亚洲货物价格低廉，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香料可以在亚洲的港口装货，然后不经过中间商业网点直接运到欧洲的港口；也许是这一因素——海上运输比陆上运输（这类因素经常被过分强调）价格低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在海上进行的长途商品运输，包括主食品和奢侈品的运输，也是中世纪晚期原型资本主义活动，是那个时期城市经济中最接近于产业资本主义的内容。这些活动不仅涉及商品交换，而且涉及许多包括船只在内的商品生产、先进的技术、庞大的劳动大军、复杂的贸易和巨大的资本积累。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

回到对“原型资本主义”的定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遇到一种广泛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思想，这种倾向持如下立场：金钱、现金交换和贸易已经进行了一千年之久，但是并没有显示出资本主义，甚至也没有显示出资本主义的种子。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生产问题，而不是交换问题。“真正的”资本主义要求实行工资劳动并且生产商品。交换只不过是买和卖的活动；交换并不增加价值。对马克思来说，交换产生的财富主要来自不等价交换（一个市场的价格高于另一个市场等等），而不是由于劳动的投入和使用价值的生产。

从这一模式导致出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命题。其中之一是这样的论点，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并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中心原因，因为它们的主要活动是贸易、交换，而不是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不是在中世纪的城市，而是在中世纪的农业中。^④但是第二个命题对我们讨论的问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有关的论点是，它首先承认亚洲大规模的中世纪商贸城市和贸易路线比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更为可观，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在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生产而不是交换（贸易、商业）才是进程的重要环节。不管亚洲的贸易路线和城市如何高度发达，欧洲的封建农业生产（在这一论点中）都比欧洲以外农村和城市生产制度更加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且正是这一事实——欧洲农村社会的性质与欧洲以外农村社会的对照——才能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而不是在亚洲（或者非洲）兴起的重要因素。关于农村生产的谬误前面已经讨论过，但是，同样错误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亚洲（和非洲）的港口城市、商业航海中心，由于某种原因完全是或者大体上是与交换、“商业”相关。这里实际上有三个错误。首先，生产不仅是物体形式的变化，而且涉及地点的变化。如果认为把自然塑造成一个“东西”即商品的过程有实

体上的不同，那将是形而上学。当一个农民生产一种农业“物品”时，他或她不仅要种植这个东西，而且要把它从田地运输到农舍，然后运输到市场，他们还必须运输水或者肥料，或者把外边的劳力引进到农场。因此，农业生产既涉及形式的转换也涉及地点变化。一条汽车装配线就是形式和地点的变化过程。因此，总体来说，空间的移动也是生产的一个部分。这与商品的购买和出售整个明显的过程毫无关系。的确，农民的庄稼可以在农场进行交换，也可以在农场以外的市场进行交换。因此，中世纪的活动涉及到商品的长途运输，但其本身并不是“交换”；它们是在空间中的运输。它们涉及大量的劳动力，巨额的资本投资，重要的技术——航船、造船、银行、保险等等——而且涉及大量的吨位。它们在商品的目的地产生出使用价值，而商品在启运时则不具有价值或者只有较小的价值。简而言之，所谓的“中世纪贸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和制造如同交换一样起着同样大的作用。

第二个错误是这样一个观点，也是当今历史学家广泛持有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所说的城市、商品移动和这个复杂过程的其他方面只不过是一个琐碎的过程，仅仅涉及到为少数统治阶级使用的少量奢侈品的运输。实际上，中世纪通过海上运输进行贸易的大部分是人们生活需要的主要商品，诸如初级纺织品、铁器、大米、小麦、木材、船只（经常是从建造地驶向出售地的港口），等等。而且除此之外，不被认为是主要产品的吨位和价值，诸如胡椒、糖、精细纺织品、陶器等等的吨位和价值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类东西的市场是非常巨大的：中世纪的上层社会并不是不重要的。

第三个错误是没有看到工业生产在这些中世纪的城市和内陆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得出结论，中世纪的商业海运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婴儿床，这在亚洲、非洲或者欧洲都

是如此。

欧洲的原型资本主义港口城市并不比非洲和亚洲 15 世纪的港口城市更为发达。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情况都是如此。首先欧洲的城市就其绝对人口数量和相对人口数量来说，都不比亚洲或者非洲城市的人口更多。实际上，欧洲的城市化不如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那样发达。没有疑问，也不如欧洲以外的其他许多地区那样发达。在中国的明朝初期，城市人口可能达到总人口的 10%。^④在印度南部的维杰亚瓦达帝国也至少达到了这一程度：内陆的首都本身就有人口的 3%——欧洲可以与此相比较的中心如巴黎可能只是这个比例的一半——而且沿海城市数量多，规模大。^⑤第二点，商业技术发展也完全是发达的，具有复杂的体系，广阔的领域，有亚洲和非洲的商人和银行家广阔的活动领域，这正如欧洲一样。（图梅·皮尔说到 1515 年的古吉拉特商人：“他们是懂商业的人；他们……浸透了商业韵味”，而且“我们那些想充当职员和代理商的人需要到那里进行学习，因为商贸是一种科学。”^⑥）第三，生产的技术和材料，即使在生产和贸易的数量上存在差别，在商品的种类等方面存在着差别，看来也与三个大陆的很多商业航海中心的发展处于同样的水平。航海技术在整个半球也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尽管在各个大洋间有所区别，但不能说一个大洋的船只比另外一个大洋的技术更先进。^⑦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港口城市和其他工业中心的制造业，就总的规模和发展水平来说，大体上也是可以进行比较的。^⑧第四，亚洲和非洲中心的城市阶级构成看来与欧洲中心的阶级构成相似：在所有这些地区，都存在着强大的原型资本主义阶级和一个领取工资的工人阶级，有的地方没有其他阶级如封建地主阶级、奴隶等。最后，韦伯所提出的老的欧洲神话——欧洲的城市是某种比欧洲以外城市更自由的地方，其他地方的城市处于政体的包围和紧密控制之下——基本上是从经典的欧洲中心传播主义继承

下来的——这一神话想象早期欧洲的任何重要的东西都含有自由的成分，而亚洲的（更不要说非洲）的任何重要东西都被置于令人窒息的“东方独裁主义”之下，直到欧洲人到达那里并给他们带去自由时为止。所谓中部欧洲的“自由城市”并不是标准，而且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具有中心地位。从意大利到波罗的海，欧洲的许多商业航海城市的部分自治当然是一个事实，而且通常反映了较小的城市政体（经常是城市国家）的主导地位或者封建国家向城市部分的逐渐融合。由于利润或者权利的原因，使后者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这时在非洲和亚洲的各个部分情况也大致如此。小型的城市国家在印度洋沿岸附近也是常见的，在马格里布和东南亚也是常见的；还有些准独立城市，它们向大的公国表示约束力不强的忠诚。这一点在上一章曾经讨论过。

上面的讨论不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一种理论。我的目的不过是表明，所有关于欧洲具有根源性的优越性——假定亚洲和非洲缺乏城市化的基础或者认为欧洲发生了独特的城市化进程——的理论并不重要，都是非常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城市化的过程与农村化——欧洲农村封建主义——相比较只具有次要性意义。

把这种商业航海城市的整个网络描述成为一个单一原型资本主义体系并不夸张。^④阶级化农业社会的周围空间，如我前面所论证的那样，是由独立的社会和独立的政体构成的，但它们之间具有足够的联系，因此不断的交叉传播和其他运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也许是某种程度的大陆之间的平衡。这种统一性对原型资本主义城市网络来说更强烈。在我的心目中它的形象像是一串大小不同和颜色不同的花园晚会照明的电灯串联网络。在这些港口城市之间流动着的电流，比如说，就是那里的居民（海员、工人、商人等等）、物品（商品、船只、优良种子和庄稼的收获、乐器等等）和思想——技术思想、具有创造性的社会、经

济和宗教思想，等等。

所有这些从质的方面来说是大家所熟悉的，但对其程度并不完全了解，对它的空间规模，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它的统一性并不完全了解。这整个体系可以看做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它们相互之间紧密联系，因此必然具有迅速的、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交叉传播，这种传播实际上涵盖了所有的物质或者非物质文化雏形体系，这些雏形是与这个社会形式的经济、技术和生态进步相关联的。我认为，认为构成这个体系的各个社会间的深刻文化差异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关于技术——经济——文化生态的文化领域缺乏整体的思想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在我们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差异的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回想一下上而在人种学家斯图尔德等人的理论传统中关于进化和非进化的区分的讨论，或者部分非进化文化的讨论。^⑧）在这些时代，语言上的差别看来并不妨碍人们在商人间或者其他参与这一体系的人们中渴求利润。（回顾一下卡拉的讲希腊语的鸚鵡，在马六甲人们操 84 种语言）宗教方面的差异也不是什么障碍（有文件记载了穆斯林——基督教——犹太教之间在中世纪地中海地区进行的贸易^⑨）。当然存在着有限的社会网络和成员，在那里这是一个宗教或者国籍甚至是血缘的问题。阿布·卢格德表明，联系和区分的模式产生了一套相互覆盖的八种社会地区——她写了“13 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八股潮流”——尽管她的资料和论点与我现在的命题是一致的，认为所有的地区实际上是一种原型资本主义体系的次地区。^⑩国家的边界看来对跨体系的流动并不发挥重要的阻碍作用，除非是在某种相当有限的时期内，当政治冲突或者帝国政体和具体的做法由于某种政治分割的确导致破坏了从一个政治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贸易；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民族形式后来才变得重要，实际上是在 1492 年之后。^⑪

网络或者说制度看来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演变，主要是从 10

世纪到 15 世纪。在不提供原因的情况下，我将强调这样的事实，在这一体系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也就是就其规模和强度而言航海技术爆发式发展的时期，可以把它设想成为（或即是）空间革命。在农业革命中，就社会变革而言，我们不知道技术——生态的转换是根源还是结果，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尽管多数学者倾向于——不管他们的看法对错与否——把农业看做是原因，而把变革看做是结果。在中世纪空间革命时期，看来技术生产方面更多地反映了经济社会过程，而这个过程与正在出现的原型资本主义和城市的发展相联系，而不是作为一种原因。然而，中世纪的空间革命在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革命的一种后果：它加强了在空间中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像是早期的革命加强了在原地的生产。这不是说早期的造船技术和早期的看不见陆地的远程航海是不重要的：这是一个强度问题。

也许，作为最后一点推测，我们可以设想空间革命是一个更大的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是对封建生产方式的成熟和剥落作出的反应。上层社会要求更多的商品，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但是，封建主义正在出现的危机也可能是一个因素——从农民生产者那里能够榨取到的剩余产品的绝对数量的增加速度的减慢，以及伴随而来的压力和紧张——也与各大陆间原型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有关。无论如何，具有戏剧性远程的中世纪晚期航海发现、中国人的航海、印度人的航海、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欧洲人和其他人的航海应该被看做是一场真正的空间革命。

许多想法都是超出经验主义资料之外的推测。但是我们拥有关于各个商业体系平行发展的重要资料，以及关于各贸易区的重要资料。我们还有几乎是瞬息间传播奇迹性的案例：例如，火炮在地中海地区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可能是在同一个十年之中。^②就这一本书的论证来说，一个重要的概括如下：我所称谓的原型资本主义过程在中世纪晚期整个东半球发生，这并不令人

吃惊。非洲、亚洲和欧洲在1492年几乎同样接近——或者远离——资本主义和现代化。1492年之后，欧洲的发展速度加快，非洲和亚洲的速度放慢，这是由于美洲的财富被带回欧洲。

三、注 释

①关于我使用的“文化演变”这个词，见第一章，注④。

②这一章节中的讨论主要是关于东半球。第四章将单独讨论西半球。

③见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1947).

④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1976)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History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1985) .

⑤Kabaker, “A Radiocarbon Chronology Relevant to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1977); Megaw, *Hunters, Gatherers and First Farmers Beyond Europe* (1977); Vishnu-Mittre, “Origin and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1978) . 见讨论 the review in Blaut, “Diffusionism: A Uniformitarian Critique.” (1987) .

⑥Blaut, “Diffusionism” (1987) .

⑦这里的假定是，农业本身在演变，因为它是有用的，但是有一个相关的假定，人们不仅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地方实现了这一点，而是在许多地方并且由许多民族实现了这一点。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农业今天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是有用的，这一点肯定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传播主义是矛盾的。

⑧这一过程的例子包括中世纪在欧洲东部森林地带前沿农业向东移动以及伊拉克潮湿土地的开垦。在许多地区都用不同的方法扩大农田。此外，那些以前没有从事农业的社会被赶到了更小的或者条件不好的地区，这一点看来是肯定的，他们转向农业是

为了解决土地的不足并且把它作为增加食品生产的一种手段。

⑨见 R. Lee, "Art, Science, or Politics? The Crisis in Hunter-Gatherer Studies" (1992)。

⑩农业中的水利控制系统，包括灌溉、排水、宽体梯田——或者排水土地的建设与自然河堤的改造，可能几乎与农业一样古老，因为 a. 各地所有的农民都知道要控制水分（当水分损失时应增加；当水分多余时应减少，因为根部有可能被淹没）；b. 所有这些程序最初都是由个别的农场采取的小规模行动（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二章的讨论，关于“水力理论”的谬误）；c. 在新几内亚有非常古老的（9000年之久的）灌溉系统的直接考古证据（Golson, "No Room at the Top: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the New Guinea Highlands.", 1977），在热带的美洲有排水的或者垫高的农田体系，（Denevan, "Hydraulic Agriculture in the American Tropics: Forms, Measures, and Recent Research," 1982）。从此我们可以推论原始的灌溉和其他的水利管理系统：可能与新石器时期同样古老，与排水和垫高农田系统同时存在。所有这些都表明，精耕细作的技术已经传播开来，没有采用新技术不是由于缺乏信息，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灌溉系统作为一种社会进程传播开来，是与阶级社会相联系的。关于耕犁没有在非洲使用的神话见 Hopki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1973), and Onimode, *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Nigeria* (1982)。注意，在热带农业中耕犁用得很少——主要用于稻田的耕作。

⑪我猜测，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关于庄稼、工具、土地体系、劳力投入等等的选择，整体上导致了每个人大体相同的产出，这种产出在很多环境下不受环境质量不同的影响。在一些地区，采用了非常精细的耕作制度如轮体制、水稻种植。但就每小时投入的产出量来说在这种机约制和粗放制模式中的产量大体相

同。如果承认两点假定，这一论点则能够成立：a. 迅速的广泛的传播已经发生；而且 b. 农业人口控制了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产量和休闲得到最好安排。这种情况在阶级社会中不会存在，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对技术和劳力的使用的局限深刻地受到统治阶级的需求和权利的影响。

⑫例如，见 Kea, *Settlements,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Gold Coast* (1982); Isichei, *A History of Nigeria* (1983); Rodney, *A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545~1800* (1970); A. Smith,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Central Sudan" (1971); Us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Katsina (1400~1883)* (1981) .

⑬见 Blaut,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89)。的确，在所有这些社会中都存在着平行的高地位的人群，牧师、官僚、军人等等，但看来并不存在任何大规模的、清晰的封建社会——我把干旱地带和畜牧地带的少量小规模的城市权力中心除外，也排除少数大型城市，在那里财富和地位明显地与土地所有相分离，而且与从农民那里榨取的剩余品相分离。

⑭显然，这种私有的（可出售的）农业土地所有制主要出现在重要的城市地区附近、港口附近、矿区附近等等。见 Rawski,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1972); Das Gupta, *Malabar in Asian Trade: 1740~1800* (1967); Nicholas, "Town and Countryside: Social and Economic Tensions in 14th Century Flanders" (1967~1968); Kea, *Settlements,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Gold Coast* (1982); Rodney, *A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970); Us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Katsina* (1981); Sherif, *Slaves, Spices and Ivory in Zanzibar* (1987) .

⑮关于亚洲的可继承性封地和土地财产的重要性，例如，见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1973); Sharma, *Indian Feu-*

dalism, c.300 ~ 1200 (1965); Fei Hsiao-tung, *China's Gentry* (1953); Fu and Li, *The Sprouts of Capitalistic Factors Within China's Feudal Society* (1956); Rawski,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1972); Tu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 (1979); Liceria, "Emergence of Brahmanas as Landed Intermediaries in Kamataka, c.A.D.1000~1300 (1974); Mahalingam, *Economic Life in the Vijayanagar Empire* (1951); Hasan, "The Position of the Zamindars in the Mughal Empire (1969); Raychaudhuri,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1965); Yadava, "Secular Land Grants of the Post-Gupta Period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Growth of the Feudal Complex in Northern India" 1966). 关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这方面只有零碎的证据), 例如, 见, Smith,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Central Sudan" (1971); Mabogunji, "The Land and Peoples of West Africa" (1971); Kea, *Settlements,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Gold Coast* (1982); Isichei, *A History of Nigeria* (1983); Onimode, *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Nigeria* (1982); FRELIMO, *Historia de Mozambique* (1971); Rodney, *A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970); and Us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Katsina* (1981).

⑩关于中国的庄园制度见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1973). 关于印度见 Gopal, "Quasi-Manorial Rights in Ancient India" (1963); Mahalingam, *Economic Life in the Vijayanagar Empire* (1951); Yadava, "Secular Land Grants of the Post-Gupta Period" (1966); Yadava, "Immobility and Subjugation of Indian Peasantry in Early Medieval Complex" (1974). 印度历史学家承认印度和欧洲庄园形式的重要不同。然而, 在印度的早期封建主义时期, 庄园制的劳动具有某些农奴制的特点, 具有某些工资劳动者的特点和某些佃户农民的特点。早期的印度封建国家

看来自给自足的程度较小，也不像欧洲的固定模式的庄园那样隔绝。

⑰马克思的观点在“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1979）中提出。Irfan Habib 部分地效仿 Kosambi（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写道“印度创造的传统农村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式的”，那是在公元前 200 年和公元 650 年之间，这个过程包括“手工业的乡村化”和无地的人们在村庄有计划的定居：Habib, in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Pre-British India”（1965）。

⑱关于在中世纪欧洲农村中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例如，见 Sylvia Thrupp, “Medieval Industry 1000~1500”（1972）。

⑲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1947）。

⑳农奴制并不是中世纪欧洲所有地方的特点。关于亚洲和非洲的不自由的劳动，例如，见，Yadava, “Immobility and Subjugation of Indian Peasantry in Early Medieval Complex”（1974）；Levitzion,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Western Sudan to 1500”（1972）；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1973）。

㉑见 Brenner and critics in Aston and Philpin,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1988）；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1977）；Baechler,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Caste and Feudality (India, Europe and Japan).”（1988），见第二章关于 Brenner and Baechler 的评论。

㉒包括 Lynn White, Jr. in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1968）；Michael Mann, “European Development: Approaching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1988）；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1974）。

㉓Blaut, *The National Question*（1987），chap.7.

④关于印度，例如，见 A.Chicherov, “On the Multiplicity of Socio-Economic Structures in India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1976); I.Habib, “Problems of Marxist Historical Analysis” (1969); S.Gopal, Nobility and the Mercantile Community in India” (1972); Radhakamal Mukherjee,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1600 ~ 1800 (1967); Ramkrishna Mukherje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958); Jha,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India (1963); Nurul Hasan, “The Silver Currency Output of the Mughal Empire and Prices in India During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1969); Yaddava, “Immobility and Subjugation of Indian Peasantry in Early Medieval Complex” (1974)。关于西部非洲，见 Kea, Settlements,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Gold Coast (1982)。关于中国，见 Harrison,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 (1969); Parsons, Peasant Rebellion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1970); Fu and Li, The Sprouts of Capitalistic Factors Within China’s Feudal Society (1956)。

⑤Appadorai, Economic Conditions in Southern India (1936);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1974); Nicholas, “Town and Countryside: Social and Economic Tensions in 14th Century Flanders” (1967 ~ 1968), pp.458 ~ 485; Rawski,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1972); T.Raychaudhuri, Jan Company in Coromandel (1962)。

⑥Rawski,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1972)。

⑦见 Appadorai, Economic Conditions in Southern India (1936); Gemet,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962); Habib, “Problems of Marxist Historical Analysis”

(1969); Mahalingam, *Economic Life in the Vijayanagar Empire* (1951); K. Nilikanta Sastri, *A History of South India* (1966); Tu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 (1979); Kea, *Settlements,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Seventeenth - Century Gold Coast* (1982), Sherif, *Slaves, Spices and Ivory in Zanzibar* (1987) .

⑳ Blaut, "Where Was Capitalism Born?" (1976) .

㉑ Pires, *The Suma Oriental* (1944 edition) .

㉒ Pires, *The Suma Oriental* (1944); Di Meglio, "Arab Trade with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from the 8th to the 16th Century" (1970) . 它的位置暂且放在丹老地区: 见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1961) .

㉓ 这篇文章在关于中世纪资本主义兴起的大城市化作用的著名辩论中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 这种观点与 Maurice Dobb (他提出时非常小心) 有关, 而其反对者——强调城镇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则与 Paul Sweezy 为伍。见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1947), Sweezy, "A Critique" (1976) . 这篇论文在关于“依赖论”的辩论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 Robert Brenner 辩称城镇和贸易从根本上说没有关系, 这是因为问题的关键是生产, 而不是交换。Brenner 认为 (错误地) 在中世纪的世界里城镇并不是真正重要的生产场地。见 Brenner,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1985), pp. 38 ~ 39. Also see Chapter 2, note 172, above.

㉔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1973) .

㉕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1973); Mahalingam, *Economic Life in the Vijayanagar Empire* (1951); Naqvi, *Urban Centres in Upper India, 1556 ~ 1803* (1968); Satish Chandra,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the Medieval Period"

(1964) .

㉔Pires, *The Suma Oriental* (1944) . 还见 K.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1985); Chan-Cheung, "The Smuggl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967); Di Meglio, "Arab Trade with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from the 8th to the 16th Century" (1970); Elvin, "China as a Counterfactual" (1988); Gupta,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India During Medieval Period* (1970); I. Habib, "Usury in Medieval India" (1964); Jha,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India* (1963); Pires, *The Suma Oriental* (1944); Prakash,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Urban Centres in Indi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extiles" (1964);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2nd ed. (1965); Jan Qaisar, "The Role of Brokers in Medieval India" (1974); Simkin,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1968); Toyoda, *History of Pre-Meiji Commerce in Japan* (1969); Udovitch, "Commercial Techniques in Early Medieval Islamic Trade" (1974) .

㉕Needham and collaborator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1954~1984), vol.4, part 3; Lewis, "Maritime Skills in the Indian Ocean, 1368~1500" (1973); Lo, "China as a Sea Power" (1955); Ma Hu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970);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2nd ed. (1965) .

㉖S. Chaudhuri, "Textile Trade and Industry in Bengal Suba, 1650~1720" (1974); Elvin, "China as a Counterfactual" (1988); Gernet,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962); Jha,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India*

(1963); Naqvi, *Urban Centres in Upper India, 1556 ~ 1803* (1968); Needham and collaborator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1965 ~ 1984)*; Jan Qaisar, "The Role of Brokers in Medieval India" (1974); Rodinson, "Le Marchand Musulman" (1974); Rodinson, *Islam and Capitalism* (1973); Bodo Wiethoff, *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O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 (1963); Yang, "Government Control of Urban Merchants in Traditional China" (1970) .

⑳我在 Blaut, "Where Was Capitalism Born?" (1976) 中提出了这一思想。Janet Abu-Lughod's 的重要著作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 ~ 1350* (1989) 是第一次用确切的详细内容表明了这一制度如何在 14 世纪发挥作用的。还见 S. Chaudhuri, "Textile Trade and Industry in Bengal Suba" (1985); Simkin,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1968);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74)*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1976)* .

㉑Steward,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1955)* . 见注㉑。

㉒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1972)*;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1967)*; Lane,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1973)* .

㉓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 ~ 1350* (1989), fig. 1, p. 34. 这八个地区中有一个地区是从中国经过中亚到黑海的非航海国家环。

㉔Blaut,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87)* .

㉕Needham and collaborator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1965 ~ 1984)*, Vol. 5, part 7; Needham, *Gunpowder as the Fourth Power, East and West (1985)* .

第四章 1492 年之后

一、关于 1492 年的说明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 1492 年，资本主义正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许多地方缓慢地出现。在那一年没有任何理由预言资本主义将在欧洲胜利，而且是仅仅在两个世纪之后。

但是，我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在这里是指将政治权力由旧的封建地主阶级手里转到资产阶级（市民，积累资本的新富）手里的政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这确实是一个革命时代，不是一个短暂的事件，但是，我将按照人们的习惯追溯到 1688 年，即发生英国的“光荣的革命”的那一年。在那一年（除次要条件外），资产阶级肯定在英国获得了政权。资产阶级已经在荷兰获得了政权，而且在欧洲南部的一些小的国家也获得了政权，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如法国）资产阶级正在有力地“兴起”，尽管与封建的政治机构的冲突在国家政权一级还没有取得胜利。应该强调，获得胜利的资本主义还不是产业资本主义。对于产业资本主义之前的时期进行任何概括都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它的规模比早期的“简单商品生产”和“商业资本”要大的多。但是，产业革命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即 18 世纪才发生。那些把产业

革命简单地概括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的人忽视了一大段重要的历史，包括欧洲内部和欧洲以外的历史。

为了说明欧洲资本主义在欧洲于（具有象征性地）1688年取得政权，需要了解：①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亚洲人到达并征服了美洲，而且攫取了殖民主义的首批成果，原因是什么；②征服获得胜利的原因；③16世纪对美洲财富掠夺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以及对美洲的工人的剥削对欧洲的转变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后果；④17世纪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欧洲企业对欧洲的转变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以及对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最终获得政治胜利的影响。

我们将在以下的段落中总结每一过程，并不妨由此来“说明1492年”。然后我们将转而说明资本主义——在1492~1688年——在欧洲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欧洲部分地区取得政权的问题，以弄清殖民主义以及欧洲以外的世界在这一划时代的变革中的意义。最后，我们看看殖民主义以及欧洲以外地区在产业革命的初期所起的作用，那大致是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我们还将看看伴随发生的过程：非洲和亚洲进入不发达时期。

这一考察应能引导出对资本主义在欧洲定心这一基本事实的说明。我使用“定心”这个词是为了强调本书的一个重要理论论点：在1492年之前，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在世界许多地区已经开始；1492年之后，新的力量进来，使欧洲以外的演变进程缓慢下来，停下来，使欧洲内部的进程加快。因此，1492年之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不过是把它总部移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仅具有简单演变的含义。

（一）为什么美洲被欧洲人征服而不是被非洲人或亚洲人征服

欧洲中心传播主义的核心神话之一就是关于（所谓的）美洲的发现。^①典型的说法大致如下：欧洲人更富有进取心、更富有

冒险精神、更富有成就感，他们在中世纪晚期比非洲人或亚洲人更现代化，他们有高超的技术和更先进的经济，他们出去探索世界，征服世界。他们还扬帆出海，在 15 世纪初期到达非洲海岸，于 1492 年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这一神话对文化传播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原因有二：它说明了欧洲现代扩张的内部的和内在的力量，它使人承认这一征服及其后果（墨西哥的矿场、西印第安的种植园、北美的殖民定居地等等）对欧洲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同时不需要把这一过程的任何功劳归于非欧洲人。

实际上，在另一个半球那里的人们也和欧洲人一样，在营造资本主义的原型、商业——航海中心，欧洲人那时并不具有特殊的素质或优势，也不具有独特的冒险精神，也没有特别先进的航海技术优势。他们的确享有机会：就广义的可进人性而言，具有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这一点应该着力强调。比如说，如果南印度中心比欧洲中心更容易进入西半球，那么，印度很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场地，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在中世纪晚期，世界各地的海上商人都在进行远洋航海。在 15 世纪，非洲人扬帆出海到东南亚，印度人到非洲，阿拉伯人到中国，中国人到非洲，等等。^②这些航程大都经过辽阔的大洋，而且大部分涉及探险。两个非欧洲人的例子最为有名：郑和于 1417~1433 年远航到印度、非洲；印度人环好望角航行而且显然大约在 1420 年到达大西洋的 2000 英里处。^③在这个时期，航行的半径大了，这是资本主义原型一般演变的功能，是贸易的扩大和航海技术发展的结果。各个地区的航海技术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被认为具有演变意义上的优势，新的思想和技术进行着迅速的传播和交叉传播。整个半球都在参与并分享空间革命的成果。

当然，欧洲商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航海发现。但是这个过程的实质是欧洲人追赶亚洲和非洲人的资本

主义原型，当时的欧洲人处于半球体系的边沿，正处在从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衰落的制度中走出来的时期。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国家与马格里布的国家相互冲突，欧洲的商人在那里和东地中海遇到了商业困难。开通通向西部非洲金矿地区的海道，加上自古以来人们所熟悉的航道，使用非欧洲人和欧洲人所熟悉的航海技术，这些是当时使用的明显战略。^④到 15 世纪晚期，航行的半径延长，因此航海到印度成为可能（借助于非洲人和印度海员的导航）。1492 年跨越大西洋的飞跃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冒险之一。但这一点被看做是人们分享航海和地理知识的结果，是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商业成就的潜力以及其他因素，从半球的角度来看，非欧洲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

欧洲人有一个优势。从伊比利亚半岛进入美洲，比从欧洲以外的具有远洋航海能力的商业航海中心进入更容易些。是否能够进入就一部分原因来说是航程问题。索法拉被认为是当时东部非洲最南部的（更南部也许还有其他港口）主要港口，它距美洲登陆地比加那利群岛（哥伦布出海地点）大约远 3000 英里。离人口稠密的可进行贸易或进行掠夺的海岸地点远 5000 英里。从中国到达美洲的西北部海岸的距离就更远，距富有的墨西哥社会就更加遥远了。

我们还需要补充各条海路的航海条件。从印度洋驶入大西洋是逆风。北太平洋多风暴，风向不定。从加那利群岛到西印度是信风，回程向北走，进入西风带。显然，探险者进入未知的海域时并不掌握这一信息。大西洋的渔民在 15 世纪所掌握的地理知识有多少，仍然没有答案，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问题。人们猜测在 1492 年之前这些渔民在纽芬兰和大浅滩附近打鱼。更具体地说，伊比利亚半岛的海员来往于加那利、马德拉岛和亚速尔群岛之间，他们像哥伦布横跨整个大洋那样，利用了这一基本的风力的转换；哥伦布知道信风（东风带）有助于他启程，而且他有理由

相信，西风带将有助于他的回程。这里所说的是很大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在15世纪晚期伊比利亚半岛的船只比非洲或亚洲船只更可能到达（来回程）美洲。而且，即使后者进行了这种航行，哥伦布在西印度登陆更可能比非洲的船只到达巴西或者中国的船只到达加利福尼亚导致出历史性的后果。

这是不是环境决定论呢？如果说这是环境决定论，它不会比油田对中东社会的影响更大。我在这里只是说有利于和不利于远洋航行的环境条件。无论如何，如果是从环境方面进行解释或如欧洲中心传播主义所说的那样，一群人比所有另外的人群更优越，我肯定选择从环境方面进行解释。

在我们离开这个题目之前，需要问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既然西部非洲人比伊比利亚半岛人离美洲更近，为什么西部非洲人没有“发现”美洲呢？答案看来可能是，西部和中部非洲的商业和资本主义原型的中心没有以发展海上贸易为方向（东部非洲也是这样）。远洋贸易航道通过苏丹到达尼罗河和中东，通过萨哈拉到达马格里布和地中海。海上贸易在整个西海岸进行，但规模不大，因为那里的文明主要是内地文明，贸易伙伴在北部和东部。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马格里布的贸易城市没有到达美洲？这是因为这个地区（如同伊布恩·哈顿不久前所说）的政治和商业都不景气。在1492年时，这里处于伊比利亚半岛人和土耳其人的压迫之下。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这一地区缺乏从事远洋航行的能力。而且，这些城市直接与苏丹和产金地区贸易，没有欧洲人那种经济动力，去绕过萨哈拉陆地寻找新的、更便宜的到达产金地的路线。

（二）为什么征服取得成功

自1492年第一次与美洲进行接触之后，美洲对欧洲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具有了重要意义。开始接触之后，立刻开始了一个爆

炸式的、大规模的对美洲国家和文明的毁坏，对贵重金属的掠夺，对当地劳动力的剥削，以及欧洲人对美洲土地的占有。如果我们要了解所有这些对欧洲（以及资本主义）的影响，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快发生了——简而言之，为什么征服取得了胜利。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需要了解这一征服的原因。非文化传播主义的历史观关于所有历史因果论点的出发点是在其工作中认定，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相比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不具有内在的优越性，并不具有取得进步的“更高潜力”的先行性。这首先使人们认识到欧洲人在1492年对非洲人和亚洲人而言，在意识形态、社会和物质方面没有特别的优势。但是，这一立论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对所有的人类群体都必须持同样的假定。那么，为什么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不是美洲人发现了欧洲（或非洲，亚洲）？为什么进行初次接触后欧洲人征服了美洲文明，而不是被打败，被赶出美洲海岸？文化统一论的工作假定——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人类体质的统一性——在这里面对着文化传播主义的倾向，后者把美洲人民说成是原始的和与历史发展无关的人。^⑤

关于美洲文明的屈服有几个直接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许可以说它本身就提供了足够的理由。这就是欧洲人把曾经在东半球普遍流行的疾病带到美洲，使那里的人口大幅度减少。^⑥第二个因素是欧洲人所拥有的在军事技术方面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应该从适当的角度来看。军事技术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大到——在初期的战役之后——本身可以决定对美洲军队的胜利，因为美洲军队在人数上占很大优势，而且美洲的军队早晚也会采用敌人的技术。美洲具有辽阔的领域，而且在1492年拥有一个很庞大的人口，至少有五千万人，而且可以想象为二亿，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在有国家组织的社会中，具有相当大的军事能力。^⑦军事技术在历史上倾向于在一

个相对短的时间内从一个阵营向对立的阵营传播。而且，西班牙人的原始枪支与美洲的弓箭相比，其优越性实际上不是很大。我认为，因此可以肯定，如果问题仅仅是军事能力问题，那么形势将会变得对欧洲人不利。那就不会有征服，或者征服只限于有限的区域内，肯定不会席卷南部安第斯中部的伟大文明。问题是，历史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是由于引进了难以相信的、严重的和迅速蔓延的疾病所造成的影响。抵抗活动崩溃了，这是因为美洲人在参加战斗之前就死于瘟疫。^⑧墨西哥中部约90%的人口在16世纪被消除：这些死亡大多数发生在早期，从而有助于政治征服。在这个半球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特别是人口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多数是具有国家组织和高度文明的地区。可能美洲整个人口的3/4在那个时期被消除。^⑨在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战斗中、在墨西哥和秘鲁矿区的劳动营中进行劳动的人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去，而更多的人死于瘟疫，这就是在大多数地区对征服的抵抗被打败的原因。

美洲人对东半球疾病易于受到感染，他们的军事技术低于另一个半球的人，这一点可以用直截了当的文化演变的理由来说明，尽管关于这一问题的证据有一部分是间接的。西半球直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还没有人居住；关于首批到达这里的人存在着争议，但是大多数学者不认为在30000年之前那里有人居住。首批到达那里的移民也不掌握农业。最早的移民发生在东半球农业革命之前；此外，移民的发源地——也就是西伯利亚东北部——也不适宜农业，天气太冷，甚至也不适宜现代农业，而且我们将不会预期这样的文化在2000年前早期农业时期出现——尽管在……一些低纬度的文化中农业处于实验之中。移向美洲的人是旧石器时期的狩猎者、采集者、捕鱼人和拾蚌人。他们分小批到达这里，显然是分小批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分布在南部美洲和北部美洲。过了几千年之后，人们才真正地去发掘狩猎、捕鱼、采集、

采蚌的资源。人们假定，人口增长缓慢——但这只是猜测——人口增长最终达到一定程度从而发生了农业革命。^⑨在东半球农业革命看来大约发生在（一个质的变化）10000~12000年以前；^⑩因此西半球的文化演变与东半球的演变大体平行：形成了农业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礼仪中心、科学、写作、城市、封建阶级结构和商业。的确，看来西半球社会在缩短差距。但是在1492年，其最先进的和强大的国家的军事技术仍然远远落后于东半球的国家。金属刚刚开始使用，还没有发明火枪。因此科尔特军队对莫科特苏马的军队占有优势，皮萨罗的军队对因卡斯的军队占有优势。（当科尔特的军队到达特诺奇蒂特兰时阿兹特克人正在大量死于欧洲疾病，看来是美洲商人把这种疾病从古巴带到了墨西哥。同样地，因卡斯人是在皮萨罗人到达之前被疾病征服的。^⑪）

美洲人对东半球疾病容易感染，此后美洲居住区遭受破坏、国家崩溃、被欧洲人打败和奴役，都可以用这同一总模式进行解释。一小批人口进入美洲，而且可能当他们出发时把东半球的疾病的一小部分带来。此外，他们来自相当孤立的、人口稀少的半球，而且由于气候寒冷那里没有典型的热带疾病。可能更重要的是疾病本身的历史。许多疾病起源或者成为重要的流行瘟疫是在农业革命期间或在此之后，而且与农业有着生态联系。城市化以及人类对土地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态体系，给动植物带来某些变化。在东半球，人类进入这些生态环境是在对西半球进行初期移民之后，因此移居到美洲的人没有把这些疾病带来。此后的移民很可能带来了疾病（尽管这也不太可能，因为他们来自寒冷的和亚洲的某些孤立的地带，而且是分小批来的。）。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在数千年中美洲的居住地人口稀少，人们从事着狩猎、采集、捕鱼的生活方式，没有农业居住点和城市化，这些情况将会使移民美洲的人带来的某些疾病消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美洲的人口将失去体质上对这些已经不存在的疾病的免疫

力，他们当然不具有对以前不曾接触到的疾病的免疫力。人们知道，美洲的破坏在于疾病，而东半球的人们对这种病毒具有高度的免疫力，对他们来说这些疾病只不过是“小病”而已。

因此对于美洲的失败的解释不需要再去注意各种神话，这些神话把美洲的失败说成是缺少理智、迷信或者其他的经典说法，经常是关于美洲文明的种族主义神话。（这些神话中最为广泛流传的是墨西哥人把科尔特的部队想象成神，美洲人在他们面前无法进行战斗，在他们的神威面前倒下去。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在两种居民之间存在的技术差别相对来说是小的，东半球的疾病对西半球居民的影响可以用西半球的历史及其后果来进行解释。美洲人不是被征服：他们感染了疾病。

（三）1492 年的欧洲

在 1492 年，欧洲社会缓慢地走出封建主义并走向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景象意味着即将发生革命变革，也没有什么意味着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是非常迅速的。15 世纪英国毛纺贸易的发展并不是（如经常被描述的那样）一种革命的经济变革的迹象：欧洲南部与它竞争的毛纺工业处于衰落之中。^⑬ 这个世纪农村的发展主要反映为在前一个世纪鼠疫发生之后（在一些地区）人口的恢复，正在发生的农业商业化也在一些时候取得了恢复。^⑭ 城市在缓慢地发展，城市人口仍然占整个人口的一小部分（意大利和低地国家除外）；欧洲的城市人口比许多欧洲以外地区的城市人口要少。^⑮ 甚至有迹象表明经济在萎缩，而不是发展。^⑯ 就经济而言，意大利的复兴运动没有使意大利的中心提高到很多欧洲以外中心的水平，包括附近的伊斯兰国家（例如开罗），而且复兴运动根本不是一场技术革命。^⑰ 为了说明当时的背景，这些内容都应该提到。1492 年前，欧洲的发展是缓慢的，甚至在走下坡路。当然——而且这一点被大多数欧洲历史学家所接受——在

1492年并不存在真正的革命的变革。

在1492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发展和变革的速度猛然加快，欧洲明显地进入了一个迅速蜕变的时期。关于这一事实不存在争议，可以从大家所熟悉的关于物价、城市发展和许多其他方面的统计数字中看出。^⑬存在争议的问题是16世纪的这种爆发式的发展变革与在美洲（在非洲和亚洲也是重要的但却是第二位的）开始的经济剥削之间的因果联系。人们一致认为后果是深刻的。但是它是否真的导致了欧洲经济的质的变革？或者说它是否突然把已经发生的过程加快了呢？或者它仅仅是影响了诸如通货膨胀的进程？要回答这些问题，只有打破欧洲历史隧道，而且看一看1492年和1688年间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期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象征时期。

二、殖民主义和欧洲的兴起 1492～1688年

（一）16世纪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

在美洲的企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是资本积累：利润问题。尽管中世纪法律的某些内容融合到新世界（对欧洲人来说）的法律和土地赠予制度之中，而且如果说伊比利亚半岛人的政府取得了利润的主要部分——尽管通常是被过高估计——所有欧洲个人和团体参与这种企业活动的目标都是为了赚钱，除传教士以外都是为个人或者自己的国家（通常是前者）赚钱。

几乎在各个地方，带头的集团总是欧洲的原型资产阶级，不仅有商人，而且有实业家和以利润为目的的地主——不仅有伊比利亚半岛人而且有意大利人、佛兰芒人、荷兰人、德国人、英国人等等。这一阶级社会从美洲的企业那里获得利润，而且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在欧洲的投资、购买土地、发展商业化农业、开发

工业（如造船、制糖等等）。这些行业与殖民企业的发展相联系，为正在增长的欧洲经济发展有利可图的商业服务活动（比如偷盗式的大西洋捕鱼业），建设城市机构等。利润的一部分重新被投入更多殖民风险企业，投入在美国、南亚、非洲和黎凡特的贸易企业。这一过程有一种微妙的具有欺骗性的方面，那就是欧洲商人在所有市场上对各类物品进行大量收购，这种收购发生在欧洲内部和欧洲以外，这是由于这些商人这时握有大量稀有金属或者金属制造的钱币，他们可以付出从前从未听到过的高价。16世纪从美洲带回的黄金和白银也许有一半是走私进来的，因此可以直接用于这种企业，其他部分是通过海关之后迅速进入流通的，因为伊比利亚半岛人的政府是用黄金和白银购买货物和劳役的。^①

16世纪的殖民企业通过多种办法产生资本。一种办法是开金矿和银矿，第二种办法是农业种植园，主要在巴西。第三种办法是与亚洲进行香料、布匹等交易。第四种办法一点也不逊色，是欧洲投资者在美洲对各种生产性和商业性企业进行投资获得利润，包括在墨西哥和秘鲁生产当地消费品取得的利润，以及从其他地方取得的利润；通过出售从欧洲进口的货物获得利润；通过从美洲（皮革、染料等）一系列二级出口产品获得利润；通过在美洲出卖土地获得利润；通过家庭和公司 in 墨西哥和其他地方拥有的土地的赠予汇回欧洲的利润。第五种办法是奴隶。第六种办法是海盗。注意，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资本积累；这里边没有什么所谓“原始积累”的神秘事物。^②（从工资劳动者那里获得的价值，更不要说从强迫劳动中获得的价值，其中的许多价值是来自生产的价值，不仅仅来自贸易。）通过这些途径形成的积累是巨大的。它的数量如此巨大，以致不能把这一进程说成是原型资本主义在欧洲积累的一个小的附属物。我认为，这种积累已经大

到足以使欧洲发生重大转变，也就是资产阶级权利的兴起以及产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我们将讨论以上这些具体办法。

1. 贵金属

我们首先注意到从美洲出口的黄金和白银，以及这些金属在东半球市场经济中的流通地位。在那里黄金和白银几乎在所有市场上已经提供了共同的价值度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这种金属在欧洲发现美洲后立刻开始流动，而且据说到1640年至少有180吨黄金和17000吨白银已经运到欧洲。^④（真正的数字至少应为是这一数量的一倍，因为这些数字的记录在某些地区和时期是很差的，而且走私占着重要地位。^⑤更多数量的黄金来自在非洲的殖民活动。在从1561年到1580年期间，大约全世界生产的85%的白银来自于美洲。在半球经济中流通的黄金和白银就其数量来说从整体上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在16世纪中，半球的白银贮存可能增加了三倍，黄金的储存增加了20%，这是由于从美洲运来了金块和银块。^⑥此前在此储存的大部分黄金和白银必然已经冻结在使用当中，不允许直接和间接地转换成为钱币，这个事实对我来说意味着，美洲的金块和银块的数量可能要比整个东半球以金银为基础的货币的供应多一倍。（在欧洲，金属钱币的流通在这个世纪增加了八倍。^⑦这个过程应该合理地看待：这种钱不断地大量流入欧洲，通过欧洲而且从欧洲流入到亚洲和非洲，又不断地在进入点加以补充（塞维利亚、安特卫普、热那亚等地）。美洲提供了更多的金银供应，而且使握有这些钱币的人，在所有市场上比在之前所有其他人，都能对所有的货物提供更好的价格，包括土地和劳役。

学者们通常都低估了这些金银流通的重要性，主要有三个原因（除了明显的文化扩散主义外，也不包括通常低估欧洲以外地区事件重要性的倾向）。首先，这一过程被看做是一种纯粹的原

始积累。但是这些金属是由工人开采的，而且是由工人运输的；有关的企业也从总体上承担风险资本，而且具有各种原型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人们所熟悉的特征，这些特征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它部分地受到国家的控制的事实不能改变这一论点，某些劳动是不自由的这种事实也不能改变这一论点）；而且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都围绕着矿区在墨西哥、秘鲁和美洲的其他地区建立起来。

第二，关于贵重金属的流通对欧洲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的论点被一些学者斥之为“货币主义”（大体来说，这种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货币本身的变化对经济总体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指责中的错误是他们没有看到16世纪经济本身的、适当的、地理的和社会的背景，把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也就是汇率的浮动和相对缺少空间摩擦，归咎于那个时代的经济。这里有两个事实是基本的。首先，对贵重金属的拥有在空间上来说是高度地方化的。欧洲商人作为一种社会群体获得贵重金属而且使之在外部市场活动起来，走向欧洲的农村，走向欧洲以外的市场。其次，贵重金属的供应基本上是连续的，因此欧洲原型资本家在对商品提供价格方面享有优势，包括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他们提供的价格一直比其他地方的竞争者提供的价格要高。因此原型资本主义群体在不断地破坏整个东半球市场上的竞争，包括欧洲内部和欧洲以外，最终他们控制了大多数海运商品中心的国际贸易，从索法拉到加尔各答，再到马六甲。^②对这些市场的渗透，对贸易基地的获得，对一些小的但是重要的生产地区（如摩鹿加群岛的一些岛屿）的控制，就不再是欧洲人的理性或者冒险性，而是反映了欧洲人能够获得美洲黄金和白银，通过里斯本、安特卫普、阿卡普尔科（在“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里）等地区进行运输。

关于美洲黄金和白银的重要性的第三种怀疑是与厄尔·汉密

尔顿的经典理论批评相联系的。他的理论认为，贵重金属的供应在欧洲经济的生产要素中产生了不平衡性，因此带来了暴利，从而在实际上使经济失去稳定性，使它走向资本主义。^④汉密尔顿是少数看到美洲的黄金和白银是导致欧洲变革的重要的中心原因的经济历史学家之一，尽管他对产生这一变革的机制的看法是（部分地）错误的。贵重金属没有在任何直接意义上改变经济。它使原型资产阶级获得财富，从而给了他们巨大的加快变革的力量，使这种变革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走向资本主义。这种变革当时已经发生——不仅仅在欧洲——而且阻碍着欧洲以外的资本家分享这一过程。美洲的金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且在使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中心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2. 种植园

奴隶种植园制度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7世纪和以后的时期。但是对早期殖民主义重要性的一般低估，也就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重要性的低估，其部分原因是倾向于不去注意种植园制度早在16世纪就已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而且，大西洋甘蔗种植园经济的早期历史表明了原型资本主义殖民经济侵蚀封建经济的办法。种植甘蔗并不是一种新的企业；甘蔗（与神话不同）并不是一种稀有商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边沿地带甘蔗种植（也不同于神话）不是无足轻重的经济上的心血来潮。商业和封建的甘蔗糖生产在15世纪就出现在地中海地区。^⑤尽管对于种植甘蔗的组织方法人们不太了解，但人们知道商业化的蔗糖生产2000年前（它明显的是一种孔雀王朝的国家产业）就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到了中世纪，这种封建的而且可能是原型资本主义制度在非洲东部也发现了，包括西部非洲的一部分、摩洛哥、埃及、塞浦路斯、黎凡特、地中海欧洲部分和其他地区。^⑥如果说甘蔗糖在北部欧洲并不是一项重要商品，那是因为它与蜂蜜等其他含糖物的比价。欧洲人开始把甘蔗种植园制度引进到新的大西

洋岛屿居住区，从马德拉岛到圣多美岛，然后在美洲扩大生产。但是在整个 16 世纪，新的种植园仅仅是代替老的地中海的糖业生产区，供应欧洲——地中海整个市场的生产到后来才发展起来。^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代替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种植园生产，使用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优势：空闲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力。在 19 世纪之前没有其他产业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如像种植园制度那样重要。

在 1600 年，巴西出口了 3 万吨糖，总销售额达 200 万英镑。等于那个时期从英格兰向全世界年总出口额的二倍。^⑨我们会记得，这个时期英国的出口主要是羊毛，有时被认为是早期现代欧洲的“觉醒”，实际上是“崛起”的典范。而且在 1600 年，在巴西每个人从蔗糖赚取的金钱，除了印第安人外，差不多相当于这个世纪后期每个英国人的收入。^⑩巴西的种植园产业积累率在 16 世纪末非常之高，足以产生每两年使其生产能力增加一倍的资本。^⑪在 17 世纪初期，荷兰原型资本主义群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巴西蔗糖企业，主要是运输和销售范围）估算，该产业的利润率每年达 56%，总额每年接近 100 万英镑。在比这稍早一点的时期，利润率更高些。但是在 16 世纪末期，当时的生产成本——包括购买奴隶的成本——只有蔗糖销售收入的五分之一。对于这些统计数字应该看到它的背景，蔗糖与其说是一种满足已经兴起的欧洲的新需求的产业，对地中海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者如西班牙、意大利、摩洛哥、埃及等来说，不如说是（从本质上说）对一种非常重要的商业产品供应釜底抽薪。

18 世纪晚期，蔗糖当然是种植园体制的中心内容。但是其他种类的资本主义生产，主要的并不是惟一的是农业，农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如同巴西的种植园制度一样紧密，它甚至在 16 世纪末期之前就具有某种重要意义，例如，在摩鹿加群岛和某些欧洲人参与印第安人资本家组织的在南部印度的胡椒生产。染料、

烟叶和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从美洲运到欧洲。一个非常巨大的农业经济在美洲的某些部分存在着以便支持居住点和其他居住点对食物、纤维、皮革和其他必需品的需要。1492年之后（或者之前？）西欧的渔民和捕鲸人在纽芬兰和北美一些严寒地带开发了巨大的产业。

就所有这些而言，还必须补充从在东半球的其他殖民和半殖民活动中获取的利润。^③早在16世纪奴隶贸易的利润就非常高。欧洲各个国家的商业资本家从里斯本与亚洲和东部非洲进行的纺织品特别是香料（亚洲的香料由葡萄牙人运输到安特卫普出售，它没有代替传统的地中海上的货流，而是增加了数量，因此提供了一种新的重要的积累来源）获得了大量利润。除此之外在亚洲内部也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利润，这是由于在东部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之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后来也参加了）控制了那里的长途海洋贸易。概括地说，然而，西半球殖民活动的积累远远超出了16世纪在东部半球进行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活动的利润。总而言之，就其数量而言，在那个世纪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的生产和贸易中获得的巨额企业利润，也就是说，迅速积累的资本，直接培植了而且（在欧洲）间接地增加了重要的推动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欧洲经济变革的过程，从缓慢的演变改变成为迅速的革命。

3. 影 响

对于16世纪在美洲和其他地区的殖民生产以及在亚洲和非洲进行的贸易和海盗活动等对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意义，看来有两种特别好的方法进行评估。一种方法是追溯殖民主义对欧洲社会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看一看货物和资本的流动，看一看在殖民企业刺激下创造的劳动力向产业和地区的流动情况，看一看与殖民（而且更多地是在欧洲以外）企业或者与此密切联系的城市化的兴起，等等。把这个总的过程与这个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整

体变革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以确定是否对欧洲发生的来自欧洲以外的明显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影响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者。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第二种办法是试图对全球的劳动力的数量（自由的和不自由的）进行计算，这些劳动力受雇于欧洲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企业，同时还要计算欧洲本身的劳动力的数量，也就是与欧洲以外企业活动有关的受雇佣的劳动力，然后看一看与欧洲兴起有关的经济活动总劳动力市场与这个数量的关系。这一任务也还没有完成。的确，就我所知，对16世纪美洲居民区实际上也包括欧洲的劳动大军和劳动市场进行的研究很少。因此我在这里所提出的命题，即关于16世纪殖民主义（和有关的在欧洲以外的活动）对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意义可能也还不能得到检验。

当然，仍然有表征性的表象。有些表象已经提到过：对由殖民地向欧洲的出口数量 and 价值的估计。我们对劳动力也可以进行猜测。一种办法是通过人口。在16世纪中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约为900万。^④关于16世纪美洲人口的估计差别很大，而且对那里的人口水平和下降率存在着很多争论，^⑤但对当前来说，讨论具有很大推测性，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方法论论证，我将不管上述的争论而从全球的估计着手。墨西哥在中世纪的人口可能大约为600万，那里的人口从被征服前的约3000万的水平不断下降，这一数字（也许更少）是1600年代的十分之一。^⑥在安丁地区的人口主要是为西班牙人从事矿业和纺织业，可能（我猜测）在16世纪晚期总数达到500万。也许我们还应加上伊比利亚——美洲人地区的200万人口，这些地区处于欧洲人的控制之下而且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欧洲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那么，让我们使用大体估计为1300万美洲人口这个数字，他们在16世纪中晚期具有为欧洲人提供剩余价值的潜力。那里的人口看来比伊比利亚半岛人口多。这个应该与欧洲更大地区的人口

进行比较，当然包括低地国家，这些国家与美洲（和亚洲）在这一地区的剥削有密切联系，但还有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一些地区。那么我们假定欧洲的人口为2,000万，而美洲的人口为1,300万。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论证，欧洲人比美洲人更深入地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在欧洲人占主导地区的那1300万美洲人口。很可能，参与劳动的那一部分美洲人口——作为领取工资的工人、参与被迫劳动包括奴隶劳动，而且作为提供货物和实物地租的农民——并不比参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经济商业化的伊比利亚人少。而且，对印第安人劳动的剥削比对伊比利亚人劳动的剥削要严重得多，因为在这个时期印第安劳动者实际上被累死——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强迫劳动——因此每一个美洲工人所产生的资本必然会高于一个欧洲人。（我们需要再次注意，我们是在讨论产业革命前、基本是中世纪的欧洲经济。不能说，例如，在生产中使用欧洲劳动力时其技术含量或者是生产中的固定资本比在使用美洲的劳动力时更高。因此剥削从最终意义上来说是指一种人力功能。）

下面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来自美洲人劳动的资本积累直接进入了正在建设资本主义的欧洲经济部门，而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工人和农民仍然基本上与中世纪的经济部门相联系。然后我们必须附加上非洲和亚洲的劳动。而且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欧洲工人，他们的劳动须被看做是欧洲以外经济的一个部分。从这一明确的推测性推理出发，在16世纪晚期的殖民经济和半殖民经济中劳动的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工人，是在为欧洲的原型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兴起提供大量的和更高的剩余价值和积累资本。他们的劳动如同欧洲工人的劳动，具有同样的意义。

关于16世纪美洲的劳动大军人们知道的很少，但是，同样

可以作出某些猜测。拉斯·卡萨斯断言，在16世纪上半叶有300万或者更多印第安人在西班牙美洲北部成为西班牙人的奴隶。这一数字过去被人们忽视，现在人们认真地看待这一数字。^⑨人们知道，仅在尼加拉瓜就有40多万人成为奴隶。^⑩人们还认识到，印第安人的奴隶劳动对那个时期欧洲人在美洲的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在巴西的甘蔗种植，在迈索亚美利加和安第斯山的开矿业等。让我们推测，10万印第安人在16世纪中期某一年分作为奴隶为西班牙人劳动。也许在世纪的后半期有2万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和安第斯山矿区从事自由的或者强迫的劳动。^⑪下面的假设是可靠的，这就是五倍于那个数字的人参与了全部的矿业经济。波多希是位于安丁的大银矿城市，在1570年代有12万人口（比巴黎、罗马、马德里、塞维尔的人口多）。还有更多的但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印第安人在大庄园或者其他企业劳动，或者定期提供强迫劳动，或者提供实物地租。（在墨西哥的科尔斯特有5万印第安人。^⑫在世纪的末期在亚美利加和圣多美岛上可能有10万非洲奴隶。^⑬1570年，^⑭在美洲可能有30万欧洲人、穆拉托人和梅斯蒂索混血人。可以想象他们中有25万是工人。

如果估计100万人在16世纪末西半球的欧洲经济中劳动，这可能是不无道理的，也许他们中有一半人参与明显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劳动。这在当时是否比欧洲的原型资本主义劳动大军人数量要多呢？虽然所有这些都是推测，但它指明了一种结论，这就是美洲劳动力的确是参与了16世纪原型资本主义企业的整个劳动大军中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三个数量：在大陆非洲参与奴隶贸易的劳动；^⑮在欧洲以外地区（圣多美、特而纳特、加尔各答等）的劳动也是欧洲经济的一部分或者为欧洲贸易生产产品；还有在欧洲内部或者欧洲外部的欧洲人的劳动，也构成欧洲以外经济的一个部分，他们是海员、士兵、码头工人、司机、职员和工头等。

到16世纪末，欧洲的崛起已经开始。随着资本流入欧洲，殖民企业的其他影响也流入了欧洲的体制或者地区，第二个层次上的原因开始出现，包括农业扩张和变革，原始制造业、城市以及农村居住区的扩张和商业经济。人们曾经仔细观察过后面这些方面，但主要是在隧道历史的框架内；结果是，欧洲在16世纪的兴起被看成为一种全盘在欧洲空间体制内发生的过程，而且其全部（或主要）原因是来自本土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幅不准确和不完整的图画。城市化是在发生，但是主要是在与欧洲以外经济相联系的地区。通货膨胀（附有某些条件）在这些地区也非常严重。^④在16世纪处于发展中的欧洲经济的部门中，某些部门如海盗业和造船业则直接与欧洲以外的经济捆绑在一起，而其他部门，如小麦生产和北大西洋捕鱼业，则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是由那种经济刺激起来的。^⑤

我将作以下概括。在16世纪初期，开始阶段的条件是一种西部欧洲和中部欧洲的经济，那里的经济正在缓慢地但又确定无疑地向资本主义演化——正如在这同一时期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一样。新的势力在边界撞击的过程中侵入到欧洲的体制中来，这是由于对美洲的征服和发生在欧洲以外的其他事件引起的，这些侵入的进程主要包括资本和物质产品（而且当然包括寓于这些事物中的劳动）。然后这些现象与正在发生的经济、技术、人口和其他变革相互影响。许多新的变革出现了，它们不是欧洲以外事件直接刺激的结果，而是由于已经发生的变革而产生的，而这些变革本身主要是那些欧洲以外边界进程的结果。欧洲内部的变革当然助长了在美洲和亚洲发生的进程的强化，这些变革又在欧洲内部引起了更多变革。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地理模式。这就是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经济变革的倾向，它首先发生在参加欧洲以外进程的商品海运中心附近。很明显，并不是在1492年存在的所有这些中心

都在同一水平上参与了这一进程，而是在如伊比利安、意大利和佛兰芒等地建立起的港口城市走在前面。但是这种网络是足够严密的，地处汉莎同盟国和英国的港口是早期的参与者，同时还有具有特殊经济特点的内地城市如奥格斯堡和巴黎。这一过程从这许多中心扩展到欧洲的内地，首先是那些提供主要货品如小麦的地区——当时波罗的海地区小麦贸易和庄园小麦生产在中部欧洲和东部欧洲的一些地区是很有名的——以后是其他地区。在任何一个确定的时间，我们都看到一种广阔的不规则空间模式（地理学家把这种模式称为“距离衰变”），这种模式表明，越向欧洲中部内陆移动，城市化水平和商业化水平就越低。

其他进程也在发生，因此我所提出的模式就过于简单了。在一些地区人口的增长反映了16世纪与欧洲以外事件相联系的经济变革，但在其他地区则显示了自14世纪和15世纪以来人口下降的恢复。还有其他变革，如农民起义，反映了封建经济晚期的总危机，但是16世纪价格的上升和（至少在某些地区）地租的上升构成了引发震荡的力量。至于宗教改良运动，我的论点是，按照托尼的传统，它总的来说是一种结果，而不是16世纪在欧洲发生经济变革的独立原因。^⑥但是是什么样的变革呢？是封建主义的内部坍塌？是来自欧洲之外世界力量的撞击？很可能，16世纪改革运动在空间上的传播主要反映了欧洲的各种力量，^⑦但是到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在最深层次上参与欧洲活动的各种地区多半是新教的中心。简而言之：16世纪欧洲变革的空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与美洲的结合，而且从第二个层次上说欧洲与非洲和亚洲的结合，但是这种模式仍然有些不够清楚。

总体来说，16世纪欧洲变革和现代化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在整个大陆的多数地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然而概括起来又是相当清楚的。1492年后，欧洲以外的构成部分导致了对欧洲变革的巨大刺激，它一方而导致欧洲经济变革和发展速度的提

高，另一方面导致资本主义在欧洲积聚的开端（下面还将讨论这一进程）。到16世纪末，这些欧洲以外的力量为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胜利（工业化前）打下了基础，或者说为1688年的光荣的革命和在这以后在英格兰的革命打下了基础，而不是在埃及、津巴布韦、印度或者中国（所有这些地区同时发生作用）。

（二）17世纪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

17世纪中期，在欧洲发生的变革非常迅速而且规模巨大，要分清这一时期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及其后果是非常复杂的。在这同一时期，无论就规模或地区来说，在美洲以及非洲和亚洲的沿海地区都发生了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大规模殖民主义扩张，而且就这些欧洲以外地区进程来说，由于缺乏有关生产、劳动力的数目、资本积累和其他有助于我们判断殖民主义（就其广义而言）在欧洲变革中所起的作用的数据，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太复杂了，我们无法在这里进行了令人满意的讨论。我将限于一种走马观花的模式——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到17世纪初期，荷兰人和英国人已经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心出现。^④尽管西班牙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继续向欧洲注入大量白银和一些黄金，而且葡萄牙在巴西的种植园和在亚洲的贸易活动继续是重要的积累来源，1600年后殖民企业的扩张主要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西印度种植园体系，它在1640年之后得到爆炸性的扩张。（在此后的50年中输入到巴巴多斯的奴隶就达5万人。在17世纪中可能有200万奴隶输入到美洲。）^⑤如果我们把荷兰和英国蔗糖殖民地像大城市国家那样放在同样的经济空间，很可能甘蔗种植经济在这个扩大了欧洲经济（或者“大西洋经济”，人们经常这样称谓）中就是除了家庭农场农业以外的最大的生产部门了，而且远比其他单个的大经济部门生产出更多的价值。（巴西的种植园一部分的是为荷兰

资本生产，到17世纪中期，仍然在规模上比西印第安种植园的规模大。)但是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东半球的企业也得到非常迅速的扩张；东印度公司是在1600年左右成立的，而且到1650年荷兰人和英国人共同控制了两个大陆之间与亚洲的大部分贸易——不平等贸易，而且具有半殖民地贸易意义——以及与非洲的奴隶贸易。同时，西班牙企业在美洲（不管是否存在“17世纪萧条”）产生了重要的积累。而且，我们不能忽视其他欧洲以外的各种各样的积累来源：这时有规模最大的在西北大西洋的捕鱼业，欧洲人在北美洲的初期居住点开采资源，还有奴隶贸易、海盗业、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企业，等等。

问题的关键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企业在17世纪欧洲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中起了什么中心作用？我所设立的模式涉及到两种因素。第一种因素是16世纪过程的继续和扩大，正如我所论证的那样，在1492年之后发展缓慢的欧洲经济在欧洲以外的力量的推动下加快了发展速度。到下一个世纪的中期，欧洲的资产阶级巩固了他们的阶级地位而且（在关键的地区）已经吸引了许多封建贵族参与资产阶级的企业，^⑨而且摧毁原型资本主义在欧洲以外的企业的进程已经开始，这是由于从美洲流入了资本（而且作为第二个层次的原因，还有非洲和亚洲）。

现在，除了贵重金属储存外，在1500~1650年期间来自欧洲以外企业积累的资本在欧洲的资本投入中占了可观的数额，甚至在欧洲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如此，甚至在那些资本具有一定流动性的经济部门也是如此。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提供重要的增长：它在各地使商人企业家群体能够对产品、劳力和土地出更高的价格；它在各地使投资资本握在阶级和群体的手中而不是握在传统的上层社会，上层社会的群体不愿意积累比他的社会需求更多的钱，不愿意在新的风险企业中把获得的资本用于再投资。简而言之，殖民资本是一种新的资本。没有殖民资本，1492年之前中

世纪晚期富有惰性的经济就会继续以缓慢的步伐走出封建主义并且走向资本主义（或者如像资本主义的某种东西），然而那就不会有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

也许资本主义的本质在超出工人——资本家阶级关系的总体水平上是把利润用于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资本主义企业从技术方面来说可能是原始的或者是先进的，但为了存活，它必须积累资本。它从来不会处于平衡状态。这一点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能够得到继续增长和扩大的条件上。这一增长不涉及任何重要意义的技术变革：生产的增长主要是吸收更多的工人和更大、更多的生产资料进入传统的生产过程以获得更多的产出。由于存在着欧洲以外的企业和其他企业，扩张所需要的资本随时可以获得，在这种情况下，17世纪的关键问题是市场或者需求。资本家可以取得资本，可以取得劳动力——在当时生产水平上不需要真正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而且资产阶级可以取得原料（一些来自欧洲，一些来自殖民地）。在那个时期一个资本企业的成长受到的最大限制也许是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出售更多产品从而可以生产更多产品，获得更多资本等等。

一些市场存在于欧洲本身，起初反映出资本主义企业出售传统产品（如食糖）的能力，它的价格比封建经济的流行价格要低，但是逐步形成的城市化和大陆上的商业化又形成了反馈，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兴起而产生的，这本身又产生了资本主义更大的内部市场。但是，17世纪原型资本主义企业市场的主要成长以及资本主义崛起的主要资金也许是来自机制的外部。人们熟知与东欧的贸易中存在这种情况。人们知道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市场上也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些欧洲以外的市场在数量上的意义没有得到充分估价。就英国资产阶级来说，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市场——包括英格兰和从国外再次进口的农业和非农业产品——是在美洲、非洲和亚洲，同时还有波罗的海

地区的非传统市场。对荷兰人来说，欧洲以外的商业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意大利社会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东部地中海地区。

作为金银和其他产品的提供者，欧洲以外世界的重要作用在17世纪比16世纪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使扩大对资本产品的需求成为可能——包括强制性的需求，如奴隶种植园。这种需求很大，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能力和产量能够以难以想象的高速继续进行。这种产量的增加是由于17世纪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两种重要力量之一而导致的。第二种力量就是它在政治上的胜利，即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胜利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法律和政治权利，从而在它渴望获得积累的过程中把社会的结构撕裂。强迫推行无产阶级化因此成为可能，而且政府几乎支持旨在进行积累的新的社会精英提出的所有战略。因此，一场产业革命——也就是生产方法的改造——发生了，产量从而可以更快速地增加，而且成为（不妨可以说）不可避免。

三、资本主义的定心

“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个短语通常使人想到一种形象，那就是工厂、汽船、众多的领取工资的工人、煤的烟尘笼罩下的城市：产业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没有谈到产业资本主义——产业革命——而只是讨论了这一巨大事件的先兆。现在让我们简略地看一下其中的一些先兆。

1492年前，产业资本主义最终兴起的大部分重要先决条件已经出现，不仅仅出现在欧洲的某些地区，而且也出现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1492年后，在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获得了三个额外先决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从美洲的矿业和种植园获得的巨大的财富积累和从亚洲和非洲的贸易中获得的巨大的财富积累。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与第一个条件紧密相连的，这就是产品市

场在西部欧洲以外获得了巨大的扩张，这些产品或者是在西部欧洲生产或者是进口然后再出口；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非常巨大的、几乎是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社会部门在西欧的宽广领域中取得了政治权力，这种事件除了在一些非常小的地区之外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事件，即资产阶级革命，使资本主义阶级群体得以出现并动员国家力量为它将来的兴起服务，甚至整个社会都为殖民主义冒险做出贡献，而且为诸如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作出准备。与此同时，国家的警察和军事力量也可以被动员来迫使人们离开土地成为领取工资的工人，可以强行使人们和资源为有利的国外战争服务。所有这三点先兆正如我所论证的那样出现了，是由——或者说否则就不会出现——殖民主义导致的结果。

关于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历史学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们提出的大部分供考虑的原因，或者“因素”，是“欧洲奇迹”论中的各种理论。我们讨论过这些理论，而且在第二章曾试图加以批驳。例如，关于欧洲经济和政体在中世纪的一般现代化，中世纪的技术革命，在中世纪和此后的“理性”，等等。这些理论都被编织进此后发生的对产业革命的大部分普通解释之中。我希望我们已经表明，所有这些过程在欧洲外部以及欧洲内部都发挥了作用，因此不能看做是仅仅在欧洲发生的事件的原因。

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事件发生的顺序和日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产业革命的概念通常是与两个更加具体的变革联在一起的：蒸汽机的发明和工业生产中的一般先进技术，以及在工业生产中雇佣劳动的形成。但是时间的确定是错误的。产业革命中的技术方面在这个过程的很晚时期才具有重要意义，它发生得太晚了，因此不能用来解释这场革命。当然，技术革命是在从1492年，比如说，到1750年才在欧洲的制造业中发生，但是这种技术很少是欧洲独有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且特别重要的

是，在此后很晚时候在生产中最终在提高制造业生产和提高劳动力方面居重要意义的技术进步发生的时间要晚得多：那是在 18 世纪最后 10 年，而且更加混乱的是在 19 世纪。在农业中，主要的技术进步是在一种不断下降的农业劳动力的环境中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的所有重要的技术变革都是传统的，而且在欧洲以外也是人们熟悉的。（少数学者强调新的庄稼的出现如萝卜，但是这类事物仅有很小的重要性——除了在此之前引进的马铃薯——如果与资本和购买的肥料的投入的增加相比较的话。西部欧洲的农民学会了增加产量的办法，而同时又减少劳动的投入，这在历史上或者农业地理上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因此，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农业革命可以被看做是产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在产业革命中技术因素不是首要原因，除非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所说的，它可能是半球范围内非常缓慢的变革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发生得太晚了。

有一种论点认为，在制造业生产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是产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一种论点与这种论点类似。这种论点最通常是由那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他们严格地遵循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理论结构。那就是，不容置疑，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可能有完全成熟的产业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相对来说）是自由的劳动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工人可以转换雇主。但是，这种条件在 18 世纪晚期并不存在。雇佣劳动占主导地位，但是很少在制造业雇佣，而且工人也很难看到自由劳动市场，或者真地可以选择受雇的地点。这些特点是产业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在产业革命真地发展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条件。

这些关于导致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的理论在本质上都是文化传播主义，而且它们把这个过程看做是发生在欧洲历史和社会内部的演化。我们在第二章注意到一种反文化主义、反欧洲中心主义历史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主要是、但不仅仅是由欧洲以外

的世界学者提出的，它在过去的50年中得到发展。在历史学的讨论中没有任何其他舞台像这个正在出现的重要的学派那样对产业革命的起源的辩论发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关于欧洲产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有赖于殖民过程的论点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广泛地接受。^⑤此后，可能是由于文化传播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它的指导性命题是欧洲是进步的自动源泉，但这一命题不再受到欧洲历史学家的青睐。^⑥这一理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由一批殖民主义学者有力地提出。也许可以理解的是，印度学者强调高度发达的印度棉纺织工业不仅提供了英国工业的某些新技术，特别是在印染方面，而且受到英国人的强行压制——一些印度学者所谓的“印度的非工业化”过程——这是为了使英国的工业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得到发展。^⑦（棉纺织工业在产业革命的早期是领先部门。）而且在1930年代，西印第安学者，著名的C.L.R. 詹姆斯和埃里克·威廉斯，开始提出以奴隶为基础的工业和奴隶贸易是英国和法国工业化的重要原动力的论点。这一总的论点发展成为一个广泛的理论，现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学者广泛地坚持这一有时被非常狭隘地称为“加勒比历史学派”的理论，其中很多人是非洲裔美国人和非洲学者。这一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我将试图给予简要的概括，但不去注意坚持这一理论的学者中所存在的次要分歧。

最基本的和一般的论点最初是由C.L.R. 詹姆斯和埃里克·威廉斯提出的。他们的命题是，17世纪和18世纪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制度是工业体系的一种相当高级的形式，明显是当时存在的最先进的形式。他们以及此后同一学术传统的作家们表明，种植园制度涉及大量的资本化，复杂的经营组织，非常发达的工业技术（在矿业、糖酒制造、运输等等），在制糖厂中的大批劳动大军以及甘蔗制糖的劳动大军，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的自由工人劳动大军，即有监工又有奴隶，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巨额利

润——这种利润不仅来自种植园和生产，而且来自奴隶贸易和其他配套部分，威廉斯把它称为“三角贸易”^⑤（詹姆斯在他的海地革命经典历史著作中说，黑色雅各宾——“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是法国革命的经济基础……在18世纪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的法国工业都起源于发往几内亚沿海或者美洲沿海的货物和商品。”^⑥）我将把这一论点加以扩大，使之成为一个更加一般化的命题：在欧洲人于17世纪和18世纪控制的整个经济空间中，他们发现有可能推进资本主义产业生产制度——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半机械化的——使之达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主要是在种植园体系中使用奴隶劳动，直到产业化生产演化成为总的体制、足以获得利润，甚至当劳动大军领取赖以生存的工资时，工资的数额可以使工人阶级得以生存并繁衍，然后这一制度可以集中化，进口到欧洲本身。^⑦换言之，产业革命最初时期是非常粗犷的、不发达的，而且实际上是野蛮的，如果想使产品获得利润就无法使用自由劳动。因此，捕捉和强迫奴隶劳动成为进行生产的必要做法，或者换个说法，其他地方的殖民统治（如在印度）需要被迫按照非常低的价格提供商品。

詹姆斯和威廉斯都辩称，来自这一综合体的利润对其产业革命初期阶段的资本起了重要作用，提供了许多也许是一大部分资本。威廉斯的著作《资本主义和奴隶制》，为这一论点提供了经典表述和论证。他详细地表明，利润是怎样来自奴隶贸易、奴隶种植园，以及附属的经济部门，怎样流入英格兰，然后变成投资的形式，为产业革命及其基础设施（运河、港口等等）提供“燃料”。（欧洲的）主流学者社会的多数人拒绝了这一理论观点。一般观点认为，产业革命几乎全部是欧洲各部分间的现象，而且诸如奴隶贸易、奴隶种植园、和从这些地方来的利润只不过是细节问题和附带问题。^⑧人们曾经作出阶段性的努力来驳斥这一论点，但是真正受到经验主义批判的那一部分理论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恩格曼和其他人试图表明，如果对18世纪英国经济作了各种新经典主义经济学的假定，而且如果使用传统上关于从美洲带去的奴隶的低统计数字，那么看来奴隶贸易并不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但是实际上奴隶贸易本身只不过是威廉斯和其他人所考察的整个复杂问题的一小部分；实际上，种植园作为一种产业制度更接近于他们注意的中心问题，因为人们把劳动力花费在这里去生产大批商品。因尼凯里和其他人表明，运往美洲的奴隶的数字被低估了。最后，新经典主义的假设（其中有的论点认为，在18世纪的产业中有“正常”利润，似乎产业革命、要素和产品市场在那之前已经成熟）受到广泛的怀疑。

另外一股批判潮流来自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布论纳和拉克洛，他们持有刚刚讨论过的欧洲中心文化传播主义的传统历史学派观点。^⑤他们的观点建立在两种论点上，其中之一是教条式的，另外一种则是荒谬的。首先，他们声称，不自由的劳动，按其定义就不能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的部分。这种观点由詹姆斯作出了答复，他表明其错误是用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看待17世纪和18世纪的劳动制度，而那个时期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是成熟的具有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更加有力的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他表明资本主义在各种生产条件下使用一系列的劳动制度，强迫劳动是各种制度中的一种。^⑥第二，马克思批评家声称，欧洲以外所发生的进程以及此后引起向欧洲输人的商品和资本，应该称为“交换”而不是“生产”，而且因此不能看做是资本主义或者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论点简直是虚伪的：奴隶种植园的生产也像伯明翰制针厂的生产一样是生产。

诸如贝利、别克尔斯、达里提、明茨、谢里登、索络、鲁滨逊、罗德尼等学者，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阿明、沃勒斯坦和弗兰克近年来强烈地支持我所提到的批判理论。^⑦传统的历史学家有时候把它称为“威廉斯论点”。我要说明的是，这一“论点”

是一个内容更广泛的观点：它表明了当前一个理论体系的状况——对殖民主义在产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注意。

争论的另一点是关于需求的意义。争论的各方承认，关于增加生产能力的决策，就其整体来说导致了产业革命。关于生产决策的判断基础是生产的额外商品能够销售掉。传统的历史学家通常把需求的增长作为某种欧洲现代化的自然产物来处理。^⑥持批判观点的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殖民主义的出现是由于需要，为了提高需求的水平，产业家需要作出努力来提高生产能力，而当革命真正发生时，就需要使用强大的新的生产技术。持批判观点的历史学家的确表明，大量的需求是由奴隶贸易导致产生的，是由种植园（需要食品，衣服、机器、轮船等等）导致的，而且是由总的贸易范围的扩大引起的，在18世纪和以后的时期，欧洲的商品在这种贸易中流通。我将把这一情况作下列概括：如果欧洲人在他们的殖民地里没有生产出巨大的需求，那就不会有产业革命发生，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历史事实，而不是其他事实，推动了产业革命的发展。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进程发生了：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集中在欧洲，这是由于殖民主义给予欧洲人一种权力去发展它们自己的社会并且阻碍其他地方的发展。正是这一发展动力和不发达现象从主要方面说明了现代世界。

在这一章以及前面的一章中，我试图用经验主义证据表明不存在“欧洲奇迹”。非洲、亚洲和欧洲在1492年前在同等水平上都发生过资本主义的兴起。自那以后，欧洲才领先。正像我在本章中试图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生是由于欧洲的地理位置接近于美洲，而且是由于欧洲人从美洲以及此后从亚洲和非洲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不是由于欧洲人更聪明或者更勇敢、或者比欧洲以外的人更优秀，或者更现代化、更先进、更富有进取心、有更多的理性。所有这些都是欧洲中心文化传播主义的神

话，最好通通忘掉。

四、注 释

①欧洲人没有“发现”美洲：这里住着几千年前由西伯利亚北极地带迁移来的人们。因此我倾向于不要把欧洲人的到达认为是“发现”。同样关于西半球是“新世界”的思想也是虚假的，因为对住在那里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很难说是新的，他们在1492年迎接了哥伦布的到来。然而，在某种上下文的情况下，很难避免使用“新世界”这个短语，我有时也使用这个词。

②见 K.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1985); Simkin,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1968); Sherif, *Slaves, Spices and Ivory in Zanzibar* (1987). 非常可能，西部非洲人在1492年前乘船去过美洲。(见 DeVisse and Labib, “Africa in Intercontinental Relations,” 1984.) 然而，看来在西部非洲不像在东部非洲那样有重要的商业航海港口城市，因此跨大西洋的航行在1492年前对于非洲和美洲没有产生重要影响。这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由于没有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大量长途海上贸易，很可能沿海航行的船只非常小，它们可以很轻便地向西航行到美洲，因为有一股强大稳定的向西吹的风，但是回程可能西风带区向北或者向南偏离许多——大概相当于欧洲南部的纬度或者在南方相当于纳米比亚的纬度。因此，返航将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从未来的学术研究中或许能够得知，1492年前西部非洲的海员、摩洛哥的海员和西部欧洲的海员经常到美洲海岸去捕鱼或者捕鲸（可能是在大浅滩）；如果在这方面出现了足够有力的证据，那么我们就认为很可能西部非洲人熟悉返航航程，也熟悉美洲海岸的某些部分。但是现在还没有这种证据，因而我们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西部非洲任何到达美

洲的船只都被风吹离了航线，这样回程将是非常困难的。这种航行在事先不知到航程有多远和航程的曲折（除非美洲的海员知道航道并向非洲的海员提供航道信息，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美洲人在1492年前跨越了大西洋。）其次，美洲海岸的部分，也就是最接近非洲的那一部分，大体上说是巴西的亚马逊河口以南的海岸，看来那里没有重要的人口集中地，也没有重要的黄金和白银的制品来吸引贸易或者强盗。（假定，如果西部非洲人到达了西印度，他们将会发现很多这种制造品，正如哥伦布那样。）第三，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将会把单程航程转变成为大规模的征服，但是看来在西部非洲沿海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大规模的贸易，商业阶级—资本家，银行和其他资本主义机制是在西部非洲内地的城市中心发现的，看来不是在沿海的城市中心：这些地方不是重要的商业航海中心。对内地的城市来说，重要的长途贸易在大陆上向北向东伸展，不像是从沿海港口向海洋发展大规模的贸易。

一些学者坚持关于西部非洲人进行了跨大西洋航行假设的真实性，我不能接受这种假设。其中第一种假设认为，非洲人在1492年前对美洲文化发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种假设认为，西部非洲人像哥伦布那样跨越了大西洋，但是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于欧洲人，没有进行屠杀、掠夺和奴役，没有像欧洲人那样使美洲人遭殃，自己发财；因此，他们没有试图进行征服。关于支持在哥伦布时期之前从非洲向美洲文化扩散的证据，来自我们在第一章所讨论的欧洲“极端扩散主义”学派老论点。他们声称，古代的埃及人或者腓尼基人跨越大西洋，而且实际上把文明带到美洲人那里去。一些现代学者对此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坚持认为埃及是明显的非洲文明——我肯定这是对的——那么是非洲人而不是想象中的欧洲人把文明带到了美洲。第二方面的证据显然是非洲人的面部特征，很像墨西哥南部奥尔梅克人的头颅。但是哥伦布时

期以前的某些美洲人必然具有这种特征：这种特征在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并不少见。但是对这一理论的最严肃的不同意见如下：奥尔梅克文明是美洲人知道的最古老的文明。如果奥尔梅克文明来自非洲，而不是由美洲人在当地创造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美洲人根本没有自己创造文明的能力；需要通过扩散从其他地方把某种文明带到这里。这种观点被看作是对拉丁美洲人的深刻侮辱，拉丁美洲人认为——我肯定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西半球的人们自己创造了他们的文明。也可能他们从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员那里取得了少数驯化家畜，但是真正的文明是一种独立的发明，不是扩散。我们再次注意到，争论的形式来自古典的扩散主义：某些人群具有创造力，而其他人群仅仅是模仿。认为非洲人把主要的文明进步带到了美洲的论断是没有说服力的，它的基础是脆弱的、令人怀疑的证据。

对我来说更为麻烦的是这样的论点，即当非洲人与哥伦布同时或者在他之前跨越大西洋时，他们没有欧洲人的野蛮价值观，因此没有试图去征服、掠夺和奴役。如果接受这一论点，那么就必须相信，在欧洲文化中具有某种绝对基本的本质，那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非常根深蒂固的本质，从而使欧洲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人。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张，即欧洲人具有人类独特的特性；这只不过是从反而说明一种论点，即他们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其进步性，而是其进取性、掠夺性和贪婪性。我还是对下面的论点感到更为坦然：人类具有共同的基本心态（“精神的统一”）。这样就可以把欧洲征服者的嗜血成性解释为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文明的结果：在封建社会中形成一种具有压迫性的阶级结构，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原型，在这种制度下为获得财富不惜任何代价，可以采用任何方式。嗜血成性的原型资本主义到处随心所欲地进行征服、掠夺和奴役——只要那里能产生利润。这种情况可以在东半球的很多地方发现，可

以在所有三个大陆上看到。我在本书中的论点是，由于在欧洲的沿海存在着重要的商业航海中心，我认为这是推动欧洲人在美洲进行征服的关键因素，而不赞成说西部非洲人有类似的行动。大的原型资本主义中心在非洲的内陆曾有发现，但那里带有长途海洋贸易的特点。东部非洲的索法拉和基卢瓦具有这类特点，但我们在本章看到，它们与在美洲进行掠夺的地点的距离比伊比利亚和加那利出海口远得多。（我没有援引具体的学者的话，我曾经批评他们的观点，因为在一个脚注里不可能充分地、公正地讨论他们的理论观点。显然，关于在哥伦布时期之前有重要的非洲文明传播到非洲的理论，我不同意伊万·范·塞提马的理论，尽管他认为在哥伦布之前非洲人曾经到过美洲的看法很可能是对的。关于他的观点见他的重要著作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1976)。

③ Files,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 (1972); Ma Hu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970);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Influence* (1959) .

④我还没有看到有关北部非洲人或者西部非洲人定期来往于博亚尔多角海岸的航行资料证据。（见 DeVisse and Labib, "Africa in Intercontinental Relations", 1984.）看来中世纪的航海技术——欧洲的和欧洲以外的——在葡萄牙人于15世纪开始进行这样的航行之前还有困难。然而，“发现”是没有问题的。这一航线在古代就知道。重要的陆上路线与整个海岸线平行，从菲斯南部到塔克卢尔（在现代的达卡附近）和以远（见 Niane, "Mali and the Second Mandingo Expansion" 1984, and Levitzion,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Western Sudan to 1500" 1971），而且在加那利和沿海地带带有中世纪的居民点。从基本上来说，陆路费用较低，而且可能更快些。葡萄牙人的“发现”是绕开北部非洲人和西部非洲人商业利益的一种办法。他们使用欧洲人的航海技术和东部非洲人的航海技术。西部非洲人在那个时期还不掌握这种

技术（已经使用的技术，或者知道已经使用的技术）。应注意到，葡萄牙人通过博亚尔的航海战略基本上也是向大西洋岛屿航行的战略，摩洛哥的海员和欧洲人一样熟悉这种战略。

⑤ Blaut, "Diffusionism: A Uniformitarian Critique" (1987).

⑥ 关于总的评论，见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1972) and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1976)。见 Borah and Cooke, "La Demografia Historica de America Latina: Necesidades y Perspectivas" (1972); Whitmore, "A Simulation of Sixteenth-Century Population Collapse in the Basin of Mexico" (1991); Alchon, *Native Society and Disease in Colonial Ecuador* (1991); Lovell, "'Heavy Shadows and Black Night': Disease and Depopulation in Colonial America" (1992)。

⑦ 关于征服时期美洲的人口的争议评论，见 Denevan,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1976)。

⑧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1972); Alchon, *Native Society and Disease in Colonial Ecuador* (1991)。

⑨ 关于各种计算的讨论，见 Denevan,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1976); Denevan, "The Pristine Myth: The Landscape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1992); Lovell, "Heavy Shadows and Black Night" (1992); and Whitmore, "A Simulation of Sixteenth-Century Population Collapse in the Basin of Mexico" (1991)。

⑩ 这里的假定是，在打猎、采集、捕鱼，拾蚌等食物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人口继续增长。在某种完全是假定的时期，那些试验庄稼种植的人发现，一种新的更好的食品（和纤维）能够从农业获取，而且开始了改良。注意，这一论点不是马尔萨斯主义。

⑪ 见 Fiedel, *Prehistory of the Americas* (1987)。

⑫ 见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1972), Lovell,

“Heavy Shadows and Black Night”, and Alchon, *Native Society and Disease in Colonial Ecuador* (1991) .

⑬ Miskimin, *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1300~1460* (1969) .

⑭ Abel,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1980) .

⑮ de Vries,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1984) .

⑯ Hodgett,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1972) (“在 1320 年以后的 200 年可以说是 (欧洲) 整体经济下滑的时期” p.212); Lopez and Miskimin,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1961~1962); C.T.Smith,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Before 1800* (1969) .

⑰ Lopez, “Hard Times and Investment in Culture” (1953); Thomdyke, “Renaissance or Prenaissance?” (1943) .

⑱ Braudel, “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 to 1750” (1967); de Vries, *European Urbanization* (1984) . 关于这些变革对亚洲的迅速影响, 例如, 见 Atwell,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1982); Aziza Hasan, “The Silver Currency Output of the Mughal Empire and Prices in India during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1969) .

⑲ Céspedes, *Latin America: The Early Years* (1974); McAlister, *Spain and Portugal in the New World, 1492~1700* (1984) .

⑳ 在经典政治经济学中, 在某些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 关于“原始积累”的思想被用来作为资本积累包罗万象的方法, 它在本质上不涉及资本主义企业。财富掠夺等是“原始积累”, 而且一般来说, 16 世纪从美洲殖民地带回的财富被认为是原始积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通过明目张胆的掠夺、奴役和屠杀

从欧洲以外攫取的财富流回母国并在那里转换成为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但是“原始积累”并不能真正地进行准确的定义。我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在美洲积累起来的财富只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之前的一部分财富的意义上是原始的。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涉及到劳动和劳动产生的价值方面，这种积累是正常的积累。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区分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如果在殖民地升华的不是“真正的”或者“普通的”积累，学者们可以辩称殖民地的经济是落后的和“封建主义的”，而不是某种原始资本主义。

⑲ E.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1934); Brading and Cross, "Colonial Silver Mining: Mexico and Peru" (1972); H. and P. Chaunu, *Se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vol. 6, pt. 1 (1956); Cross, "American Bullion Production and Export 1550~1750" (1983).

⑳ 见注⑲.

㉑ Vicens Viv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1969).

㉒ Vilar, *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 1450~1920* (1976).

㉓ 然而，非欧洲商人在中国海和印度洋从事着大量的贸易活动。

㉔ E.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9), and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934). 见重要著作 Walter Prescott Webb, *The Great Frontier* (1951), 这部著作的一部分理论基础是哈密尔顿的理论，认为在这个时期和此后的时期内美洲在欧洲的兴起中具有很大重要性。

㉕ Galloway, *The Sugar Cane Industry: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from its Origins to 1914* (1989); Deerr, *The History of Sugar* (1949~1950).

⑳例如，见 Galloway, *The Sugar Cane Industry* (1989); Deerr, *The History of Sugar* (1949 ~ 1950); Watso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 700 ~ 1100* (1983); N.S.Gupta,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India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1970); Niang, ed.,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4.* (1984); Bray,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6, Part 2, Agriculture* (1984).

㉑Deerr, *The History of Sugar* (1949 ~ 1950).

㉒Simonsen, *Historia Economica do Brasi, 1500 ~ 1820* (1944); Furtad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Brazil* (1963); Minchinton,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1969). 同时见更为普通的但极为重要的著作: I.Wallerstein, A.G.Frank, and S.Amin, 特别是 Wallerstein's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3 vols. (1974 ~ 1988), Frank's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1968) 以及他的 *World Accumulation, 1492 ~ 1789* (1978), and Amin's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74) as well as his *Unequal Development* (1976).

㉓Edel, "The Brazilian Sugar Cycle of the 17th Century and the Rise of West Indian Competition" (1969).

㉔Furtado, *Economic Growth of Brazil* (1963).

㉕见 K.N.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1985); Satish Chandra, *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 (1987); Magalhaes - Godinho, *L' E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aux XV et XVI Siecles* (1969).

㉖de Vries, *European Urbanization* (1984).

㉗William Denevan, "Introduction," in Denevan, ed.,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1976), and “The Pristine Myth: The Landscape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1992); Lovell, “Heavy Shadows and Black Night” (1992).

⑭见 Borah and Cook, “La demografia historica de America Latina: necesidades y perspectivas” (1972); Whitmore, “A Simulation of Sixteenth-Century Population Collapse in the Basin of Mexico” (1991).

⑮Semo, *Historia del Capitalism en Mexico: Los Origenes, 1521~1763* (1982).

⑯Radell, “The Indian Slave Trade and Population of Nicaragu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76).

⑰Bakewell, “Mining in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 (1984).

⑱Semo, *Historia del Capitalismo* (1982).

⑲关于各种计算, 见 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969); Furtado, *Economic Growth of Brazil* (1963); Deerr, *History of Sugar* (1949~1950); Florescano, “The Formation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Hacienda in New Spain”; Inikori,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9), esp. pp. 57 and 248; McAlister, *Spain and Portugal in the New World* (1984).

⑳McAlister, *Spain and Portugal in the New World* (1984).

㉑在当前的讨论中, 我对非洲特别是非洲奴隶贸易的影响很少给予注意, 见第二章。

㉒Fisher, “The Price Revolution: A Monetary Interpretation” (1989).

㉓Dunn, *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 (1972), pp. 10~11.

㉔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52)

edition)。

④7 Hannemann, *The Diffusion of the Reformation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1518-1534* (1975)。

④8关于中心从伊比利亚转移到莱茵河下游和英格兰地区南部的原因存在争论。可能是同一种力量使这一北部地区成为中世纪的商业航海中心，使它能够控制海外的企业：那就是，巨大的人口，附近丰富的肥沃土地和森林资源，能够进入许多市场（莱茵河，波罗的海等地区）。还有意大利，那里具有同样的优势，还处于通向大西洋的要道，有适合海运和渔业舰队迅速发展的条件。

④9见 Deerr, *The History of Sugar* (1949-1950); 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969); and Inikori,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9)。关于奴隶劳动是不是属于无产者，是关于奴隶种植园制度讨论中的一个严肃问题（见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1985）——这个问题将在本章到后边讨论。然而，关于奴隶（和其他强迫）劳动对资本积累的贡献不存在意见分歧，因此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也不存在分歧。“剩余价值”被用于不同于产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适当含义。

⑤0然而，相当一部分老的土地占有人加入了新的企业。如果认为这种新的原型资本主义精英简单地反对老的精英，那是不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其中有一些是由于从字面上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商人不属于早期资本主义阶级的思想和不属于企业家积累阶级的思想。关于中世纪商人在原型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见 Thrupp,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1948); Cams - Wilson, *Medieval Merchant Venturers* (1967)。

⑤1见 R.W. Bailey, "Africa,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

ographic Review” (1986); W.Darity, Jr., “British Industry and the West Indies Plantations” (1990) .

⑳当然，存在例外。Brooks Adams 在他 1895 年的著作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pp.259 ~ 260) 中辩称，英国人 1757 年在普拉希的胜利直接使英国得到廉价的印度棉花（和其他在印度的“掠夺物”），使英国的棉纺织业进入了爆发式的工业化，直接并且立刻导致了工业上的重要发明：1764 年的珍妮纺织机，1776 年的走锭精纺机和 1768 年瓦特的蒸汽机。

㉑见 Palme Dutt, *The Problem of India* (1943); Alavi et al., *Capitalism and Colonial Production* (1982) .

㉒C.L.R.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1938) and *A History of Negro Revolt* (1938);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1944) . 同时见晚期著作 James,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ern World” (1970); 以及 Williams 的晚期著作, *British Historians and the West Indies* (1966) . 近期的重要著作有: R.W.Bailey, “The Slave (ry)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extile Industry of New England” (1990); W.Darity, “British Industry and the West Indian Plantations” (1990); J.Inikori, “Slavery and the Revolution in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England” (1989) . 同时见以下注释㉓。

㉓ *The Black Jacobins* (1938), pp.47 ~ 48 .

㉔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论述 (Blaut,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87, chap.7), 在种植园对奴隶劳动的压迫和剥削程度不能适用于欧洲文化社区本身。(确实曾经试图进行同样的压迫和剥削, 但很快放弃了, 转而使用奴隶劳动)。总的说, 文化规则和实践

限制了社会中对生产者的剥削水平，这是为了保持社会和平——但这种规律并不适用于外部的或者外国工人。

⑤⑦见出色评论 C. Robinson, “Capitalism, Slavery and Bourgeois Historiography” (1987)。还见出色评论 Bailey, “The Slave (ry)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0)。

⑤⑧见 Brenner’s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1977); E.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1977)。

⑤⑨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1974~1988)。

⑤⑩见 Bailey, “The Slave (ry)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0), Darity, “British Industry and the West Indian Plantations” (1990),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1985), and Robinson, “Capitalism, Slavery and Bourgeois Historiography” (1987); 还见 Beckles, “‘The Williams Effect’: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and the Growth of West Indian Political Economy” (1987); Sheridan, Sugar and Slavery (1973), 以及他的 “Eric Williams and Capitalism and Slavery: A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1987); Solow, “Capitalism and Slavery in the Exceedingly Long Run” (1987); Inikori, “Slave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1989);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1972)。

⑤⑪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采取了这样的处理办法：“英国现代早期工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连续性，自我发展的能力，提供自身发展的动力。在这里……关键是（英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结构”（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1985, p.53）。

第五章 结 论

一、结 论

本书有两个基本主题或者论点。首先，我在第一章试图说明欧洲中心传播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什么，而且表明这一理论——或者超级理论，或者世界模式——怎样在一个世纪以前支配了欧洲的学术研究，为什么今天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欧洲的学术研究。其次，我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仔细地研究了传播主义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欧洲在历史上的优越性或者先行性的理论，以及“欧洲奇迹”理论，我试图批驳这一理论。

对传播主义的分析本应比我这本书所作的分析更加深入。今天许多传播主义理论和设想对思想领域和行动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不幸影响，但在这里没有给予讨论。我在其他著作中探讨了传播主义对民族问题或者民族主义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①而且探讨了有关农民农业的理论和实践。^②当然，其他作者探讨了传播主义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以及传播主义带来的问题。^③然而总的来说，对传播主义的批判仅仅是开始。

批判将涵盖许多学术和实践领域。在这里——为了说明这一点——举出四个例子。

①哲学二元论，即从笛卡儿到康德和新康德主义者在欧洲思想界形成的关于认识论和人种学的理论主张体系，看来部分地是内层和外层二元论的设想。理性是内层。单纯的物质，单纯的感觉，是外层——即非欧洲世界和那里的居住者的非理性思考。

②所谓的大撞击理论，即所有的事物都是在一个空间——时段点开始的——而且这个点看来就是最大的传播主义。大撞击宇宙起源论不是用经验主义的证据来支持基本的判断，而是用所谓“合理的思想”来支持基本的判断（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并把它的偏见罗织成为科学。^④

③关于艾滋病是从非洲传出来的理论使人想到一连串的理论，每一种理论都说明某种瘟疫是从欧洲以外向欧洲逆向传播的结果。（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讨论了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即《艾滋病——非洲和种族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表明艾滋病来自非洲的理论可能实际上是关于这种人类疾病的传播主义观点的一种新版本说法。^⑤如果是这样，那么艾滋病病毒——逆转录酶病毒——引起的疾病的原因需要重新考虑。在非洲以外发现的形式可能比在非洲内部发现的形式更能说明问题和更有助于找到治疗办法。

④产业革命开始后的许多关于经济历史的理论以及关于当今经济发展的理论，看来都深深地陷入传播主义。产业革命没有从欧洲扩散到非欧洲地区。产业革命如像在欧洲那样也在非欧洲地区发生（我们在第四章讨论了这一问题），而且关于工业化扩散到非欧洲世界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一种虚伪的（顺从主义的）思想。在第三世界兴办组装工厂的活动和扩散并不是真正的工业化，而是一种全球规模的产出体系：外层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内层提供大部分原料和消费，而且几乎获得所有的利润和永久性的基础设施。日本早就开始了工业化，那里没有传播主义的影响。^⑥韩国和一、二个东亚小国家的工业化在最近几十年没有被

其他地方所效仿。^⑦因此，工业化的传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的传播过程，而是一项政治议程。是一项需要进行学术探讨的议程。

因此，这本书并没有得出真正的结论。这本书本身是一篇序言：是对一种严重心灵疾病的研究、处方和治疗的序言。

二、注 释

① Blaut,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87); Blaut and Figueroa, *Aspectos de la cuestion nacional en Puerto Rico* (1988).

② Blaut, "Two Views of Diffusion" (1977) and "Diffusionism: A Uniformitarian Critique" (1987).

③在第二、三、四章曾经提到这一著作。

④见 Talkington, "But the Editor Looks at the Universe from a Different Frame of Reference" (1986); Frankel, "Marxism and Physics. A New Look" (1991).

⑤ Chirimuuta and Chirimuuta, *AIDS, Africa and Racism* (1989). 关于艾滋病的一种天真的传播主义观点，见 Shannon and Pyle,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AIDS" (1989); 见 Watts, Okello, and Watts, "Medical Geography and AIDS" (1990) 对这一观点的批判

⑥日本的工业化正是由于没有传播才得以实现。它是惟一的避免了欧洲支配的处在欧洲以外的重要国家，这是由于它是不可进入的。在主体社会中，它对欧洲人来说是距离最远、最不可以进入的国家，而且到19世纪欧洲列强征服中国时，日本已经开始了军事现代化；因此它战胜了俄国，开始了殖民主义扩张，在1900年左右开始了产业革命。

⑦在天平的另一端，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大国有大量的工业，但是就其规模来说——而且按人均来说——它们的工业化与第三世界的小国家相差无几。见 Amin, *Delinking: Toward a Polycentric World* (1990) .

Bibliography

- Abel, W. (1980).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 Abu-Lughod, J. (1987–1988). The shape of the world syste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2(4):3–25.
- . (1989).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dams, B. (1895).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New York: Macmillan.
- Adams, W., Van Gerven, D., and Levy, R. (1978). The retreat from migration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7:483–532.
- Ahn, P. (1970). *West African soi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jayi, J., and Crowder, M., eds. (1972).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lavi, H. (1982). India: The transition to colonial capitalism. In H. Alavi, et al., eds., *Capitalism and colonial production*. London: Croom Helm.
- , Burns, P., Knight, G., Mayer, P., and McEachern, D., eds. (1982). *Capitalism and colonial production*. London: Croom Helm.
- Alchon, S. (1991). *Native society and disease in colonial Ecuador*.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min, S. (1973). *Neo-colonialism in West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 (1985). Modes of production: History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Society* 49:194–207.
- . (1988). *Eurocentr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 (1990).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comment. *Science and Society* 54:67–72.
- . (1990). *Delinking: Toward a polycentric world*. London: Zed Books.
- . (1992). On Jim Blaut's "Fourteen ninety-two." *Political Geography* 11:394–396.
- Anderson, J. (1882). *New manual of general history*. New York: Clark and Maynard.
- Anderson, P. (1974).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ppadorai, A. (1936). *Economic conditions in southern India (1000–1500 A.D.)*. 2 vols. Madras: University of Madras Press.
- Asad, T., ed. (1975).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London: Ithaca Press.
- Aston, T., and Philpin, C., eds. (1985).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twell, W. (1982).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95:68–91.
- Baechler, J. (1988).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Caste and feudality (India, Europe and Japan). In J. Baechler, J. A. Hall, and M.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 Hall, J. A., and Mann, M., eds. (1988).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Bailey, A., and Llobera, J., eds. (1981).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ailey, R. (1986). Africa,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ographic review. *American History: A Bibliographic Review* 2:1–91.
- . (1990). The slave(ry)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extile industry of New England.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4(3):373–414.
- Bakewell, Peter. (1984). Mining in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 In L. 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Colonial Latin America*, Vol. 2.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an, P., and Sweezy, P. (1966).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rnes, H. E., ed. (1925). *Ploetz' manual of universal history*. New York: Blue Ribbon Books.
- Beckies, H. (1987). "The Williams effect":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and the growth of West Indian political economy. In B. Solow, and S. Engerman, eds., *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 The legacy of Eric William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kner, L. (1975). The use and misuse of census data for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family structure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5:721–738.
- . (1989). The stem family and the developmental cycle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7:398–428.
- Bernal, M. (1987).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1.,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 (1991).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2, *The arch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Bhatia, B. (1967). *Famines in India*.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 Björklund, O., Hølmhoe, H., Røhr, A., and Lie, B. (1970).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world*.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 Black, C. (1966).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laikie, P. (1978). The theory of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 spacious cul-de-sac.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268–295.
- Blaut, J. (1962).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shifting agriculture. In *Symposium on the impact of man on humid-tropics vegetation*. Canberra: UNESCO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 Printer.
- . (1963). The ecology of tropical farming systems. *Revista Geográfica* 28:47–67.
- . (1970). Geographic models of imperialism. *Antipode* 2(1):65–85.
- . (1973).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Antipode* 5(2):22–26.
- . (1976). Where was capitalism born? *Antipode* 8(2):1–11.

- . (1977). Two views of diffus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7:343–349.
- . (1979). Some principles of ethnogeography. In S. Gale, and G. Olsson, eds., *Philosophy in geography*. Dordrecht: Reidel.
- . (1982). Nationalism as an autonomous force. *Science and Society* 46:1–23.
- . (1984). Modesty and the movement. In T. Saarinen, et al., ed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An inventory and prosp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Research Paper No. 209.
- . (1987). Diffusionism: A uniformitarian critiqu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7:30–47.
- . (1987). *The national question: Decolonizing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 . (1989).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53:260–296.
- . (1989). Review of J. Baechler, J. Hall, and M.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3(3):441–448.
- . (1991). Natural mapping.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n.s.):55–74.
- . (1991). Review of P. Curtin, *The plantation complex*.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7:472–474.
- . (1992a).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acism. *Antipode* 24(4):289–299.
- . (1992b). Fourteen ninety-two. *Political Geography* 11(3):355–385.
- , and Figueroa, L. (1988). *Aspectos de la cuestión nacional en Puerto Rico*. San Juan: Editorial Claridad.
- , Frank, A. G., Amin, S., Dodgshon, R., Palan, R., and Taylor, P. (1992). *Fourteen ninety-two: The debate on colonialism, Eurocentrism, and history*.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 , and Ríos-Bustamante, A. (1984). Commentary on Nostrand's "Hispanos" and their "Homeland."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4:157–164.
- Blum, J. (1978). *Pseudoscience and mental abi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oas, F. (1938).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New York: Macmillan.
- . (1948).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New York: Macmillan.
- Bois G. (1985). Against the neo-Malthusian orthodoxy. In Aston, T., and Philpin, C., 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rah, W., and Cook, S. F. (1972). La demografía histórica de América Latina: necesidades y perspectivas. In J. Bezant et al., eds., *La historia económica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D.F.: Sep-Setentas.
- Bowler, P. (1989). *The invention of progr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Brading, D. A., and Cross, H. C. (1972). Colonial silver mining: Mexico and Peru. *Hispanic-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2:545–79.
- Brantlinger, P. (1988). *Rule of darknes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mperialism, 1830–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raudel, F. (1967). 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 to 1750. In E. Rich, and C. Wil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4: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72). *The Mediterrane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ray, Francesca. (1984).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6, part 2, *Agriculture*. (Joseph Needham, principal author and editor.)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nner, R. (1977).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4:25-93.
- . (1985).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In T. Aston and C.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in *Past and Present* No. 70, 1976).
- . (1985).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In T. Aston, and C.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in *Past and Present*, no. 97, 1982).
- . (1986). The soc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wett, J. (1980). Development, the diffusionist paradigm and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56-79.
- Brown, L. (1981). *Innovation diffusion: A new perspective*. London: Methuen.
- Buckle, H. T. (1913).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4 vols., 2d ed., rev. New York: Hearst's International Library.
- Bury, J. B. (1932). *The idea of progress*. New York: Macmillan.
- Cabral, A. (1979). *Unity and struggl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Amílcar Cabr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arter, G. (1968). *Man and the land: A cultural geograph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Carus-Wilson, E. M. (1967). *Medieval merchant venturers*. 2d ed. London: Methuen.
- Césaire, A. (1972).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éspedes, G. (1974). *Latin America: The early year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Chambers, M., et al. (1987). *The Western experience*. 2 vols., 4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Chan-Cheung, J. (1967). The smuggl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F. Drake, ed., *Symposium on historical, arch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on south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handra, B. (1981). Karl Marx, his theories of Asian societies, and colonial rule. *Review* 5(1):13-94.
- Chandra, S. (1964).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the medieval period. In B. Ganguli, ed., *Readings in Indian economic history*. Bombay.
- , ed. (1987). *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 New Delhi: Sage.
- Chaudhuri, K. N. (1978).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5).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udhuri, S. (1974). Textile trade and industry in Bengal Suba, 1650-1720. *Indian Historical Review* 1:262-278.
- Chaunu, H., and Chaunu, P. (1956).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Part 1. Paris: SEVPEN.
- Chicherov, A. (1976). On the multiplicity of socio-economic structures in India in

-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In G. Abramov, ed., *New Indian studies by Soviet scholars*. Moscow: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 Childe, V. G. (1951).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Henry Schuman.
- Chirimuuta, R. C., and Chirimuuta, R. J. (1989). *AIDS, Africa and Racism*, 2d ed.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Chisholm, M. (1982). *Modern world development*. Totowa, N.J.: Barnes and Noble.
- Choudhary, A. (1974). *Early medieval village in north-eastern India (A.D. 600–1200)*. Calcutta: Punthi Pustak.
- Cipolla, C. (1965). *Guns, sails, and empi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 New York: Pantheon.
- Cockburn, A., and Hecht, S. (1989). *The fate of the forest*. London: Verso.
- Cohen, I. (1981). Introduction to Weber, M.,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s.
- Cohen, M. (1977).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er, W. F. (1868). *Outlines of general history*. London: T. Nelson and Sons.
- Collins, K., and Roberts, D., eds. (1988). *Capacity for work in the tropic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lyer, O. (1965). *Birth rates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 Conklin, H. (1969). Lexicographical treatment of folk taxonomies. In Tyler, ed., *Cogni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Cooper, J. (1985). In search of agrarian capitalism. In T. Aston, and C.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rbridge, S. (1986). *Capitalist world development*.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Cordell, D., and Gregory, J. (1987). Introduction to D. Cordell and J. Gregory, eds., *African population and capitalis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oursey, D. (1967). *Yam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rone, P. (1989).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Croot, P., and Parker, D. (1985).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France and England compared. In T. Aston, and C.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sby, A. W. (1972).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O: Greenwood Press.
- Cross, H. (1983). South American bullion production and export 1550–1750. In J. Richards, ed., *Precious metals and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 Curtin, P. (1969).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 (1975). *Economic change in pre-colonial Africa: Senegambia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lal, F. (1988). The racism of Jung. *Race and Class* 29(3):1–22.
- Darby, H. (1952). *The Domesday geography of eastern Englan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rity, W., Jr. (1990). British industry and the West Indies plantation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4(1):117–148.

- Das Gupta, A. (1967). *Malabar in Asian trade: 1740-180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 Vries, J. (1984).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err, Noel. (1949-1950). *The history of sugar*. 2 vol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Denevan, W. (1966). *The aboriginal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llanos de Mojos of Bolivia*. *Iberoamericana*, no. 4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76). Introduction to W. Denevan, ed.,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1-1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 (1982). Hydraulic agriculture in the American tropics: Forms, measures, and recent research. In K. Flannery, ed., *Maya subsistence: Studies in memory of Dennis E. Pulest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 (1992). The pristine myth: The landscape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 369-385.
- , ed. (1976).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DeVisse J., and Labib, S. (1984). Africa in intercontinental relations. In D. Niane, ed.,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Paris: UNESCO.
- Dew, T. (1853). *A digest of the laws, customs, manner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 New York: Appleton.
- Dewey, J. (1916). The logic of judgments of practice. In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29).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New York: G. P. Putnam.
- Di Meglio, R. (1970). Arab trade with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from the 8th to the 16th century. In D. S. Richards, ed.,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Oxford: Cassirer.
- Dirks, N. (1987). *The hollow crown: Ethnohistory of an Indian kingdo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bb, Maurice. (1947).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Doolittle, W. (1990). *Canal irrigation in prehistoric Mexico: The sequenc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DuBois, W. E. B. (1965). *The world and Africa: An inquiry into the part which Africa has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Dunn, R. S. (1972). *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Duruy, V., and Grosvenor, E. (1901).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Crowell.
- Dutt, R. P. (1943). *The problem of Indi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Duyvendak, J. (1933). *Ma Huan re-examined*. *Verhandlungen der Koninklijk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te Amsterdam, afdeling letterkunde, nieuwe reeks*. Part 33(3):1-74.
- Edel, M. (1969). The Brazilian sugar cycle of the 17th century and the rise of West Indian competition. *Caribbean Studies* 9(1):24-45.
- Edmonson, M. (1961). Neolithic diffusion rates. *Current Anthropology* 2(2):71-86.
- Eliot Smith, G. (1928). *In the beginning: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Morrow.
- . (1933). *The diffusion of culture*. London: Watts.
- Elvin, M.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88). China as a counterfactual. In J. Baechler, J. A. Hall, and M.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01–11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Engels, F. (1970).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3. Moscow: Progress.
- . (1974). What have the working classes to do with Poland? In D. Fernbach, ed., *Karl Marx: Political writings*, Vol. 3. New York: Vintage.
- . (1975). Letter to K. Marx, June 6, 1853.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Progress.
- Fei Hsiao-tung. (1953). *China's gen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edel, S. (1987). *Prehistory of the America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lesi, T. (1972).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Frank Cass.
- Finley, M. (1975).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Press.
- Fisher, D. (1989). The price revolution: A monetary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883–902.
- Fisher, G. (1885). *Outlines of universal history*. New York: Ivison, Blakeman, Taylor.
- . (1896). *A brief history of the nations and their progress in history*.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
- Fleck, L. (1979).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lorescano, E. (1984). The formation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hacienda in New Spain. In L. 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Colonial Latin America*, Vol. 2.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ster, G. (1962).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Frake, C. (1969). The ethnographic study of cognitive systems. In S. Tyler, ed., *Cogni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Frank, A. G. (1968).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 (1969).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In his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 (1978). *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ankel, H. (1991). Marxism and physics: A new look. *Science and Society* 55:336–347.
- Freedman, M.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 Freeman, E. (1874). *General sketch of history*. New York: Holt.
- Freire, P. (1972).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FRELIMO (Frente de Libertação de Moçambique). (1971). *Historia de Moçambique*. Porto, Portugal: Afrontamento.
- Freund, J. (1969). *The sociology of Max Weber*. New York: Vintage.
- Fu Chu-fu and Li Ching-neng. (1956). *The sprouts of capitalistic factors within China's feudal society*. 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no. 7.
- Furtado, C. (1963). *The economic growth of Brazi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yfe, C., and McMaster, D., eds. (1981). *African historical demography*. Edinburgh, Scotland: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 Galeano, E. (1972). *The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alloway, J. H. (1977). The Mediterranean sugar industry. *Geographical Review* 67:177-192.
- . (1989). *The sugar cane industry: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from its origins to 1914*.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rraty, J., and Gay, P., eds. (1981).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Dorset Press.
- Gernet, J. (1962).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blin, J. (1990). Trypanosomiasis control in African history: An evaded issu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31:59-80.
- Gilfillan, S. (1920). The coldward course of progres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5:393-410.
- Gill, D. and Levidow, L., eds. (1987). *Anti-racist science teaching*.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Gilman, A. (1874). *First steps in general history*. Cambridge, MA: Riverside Press.
- Godelier, M. (1969). *Sobre el modo de producción asiático*. Barcelona, Spain: Ediciones Martínez Roca.
- Goitein, S. (1967).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lson, J. (1977). No room at the top: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the New Guinea Highlands. In J. Allen et al., eds., *Sunda and Sahul: Prehistoric studies in Southeast Asia, Melanesia and Australia*. London: Academic Press.
- Goodrich, S. G. (1843). *Peter Parley's common school history*. Philadelphia: E. H. Butler.
- Gopal, L. (1963). Quasi-manorial rights in ancient Indi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6:296-308.
- Gopal, S. (1972). Nobility and the mercantile community in India.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50:793-802;
- Gorman, C. (1977). A priori models and Thai prehistory: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beginnings of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In C. A. Reed, ed., *Origins of agriculture*. The Hague: Mouton.
- Gossett, T. (1963).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Dallas: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
- Gould, P. (1969). *Spatial diffusion*.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Resource Paper no. 4,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Graebner, F. (1911). *Methode der ethnologie*. Heidelberg, Germany.
- Gupta, N. S. (1970).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India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Delhi: Chand.
- Habib, I. (1963).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 . (1964). Usury in medieval Ind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6:392-419.
- . (1965).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pre-British India. *Enquiry* 2(2,n.s.):21-75.
- . (1969). Problems of Marxist historical analysis. *Enquiry* 3(2,n.s.):52-67.
- Hagen, E. (1962).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s*.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 . (1962).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ookings Institution, ed.,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countries: An agenda for research*, 1-39.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Hägerstrand, T. (1967).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Translated by A. Pr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jnal, J. (1965).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 In D. Glass and D.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Chicago: Aldine.
- Hall, J. (1985). *Powers and liber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 (1988). States and societies: The miracl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 Baechler, J. A. Hall, and M.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allam, H. (1975). The medieval social picture. In E. Kamenka and R. Neale, eds.,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beyond*.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er, J. (1971). *Outcasts from evolution: Scientific attitudes of racial inferiority, 1859–190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Hamilton, E. J. (1929).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Economica* 9:338–357.
- . (1934).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milton, G. S. (1985). Why no capitalism in China? Negative questions i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1:187–211.
- Handler, R. (1989). Review of Macfarlane, A.,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1078–1079.
- Hannemann, M. (1975). *The diffusion of the Reformation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1518–1534*.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search Paper no. 167.
- Hansis, R. (1976). *Ethnogeography and science: Viticulture in Argentina*. Ph.D. dis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 Hardy, F. (1936). Some aspects of tropical soils. *Transaction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oil Science* 2:150–163.
- Harewood, J. (1966). Population growth in Grenad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15:61–84.
- Harris, M. (1968).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Crowell.
- Harrison, P. (1969).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 New York: Atheneum.
- , and Turner, B. L., eds. (1978). *Pre-Hispanic Maya agricultur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 Hasan, A. (1969). The silver currency output of the Mughal Empire and prices in India during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6:85–116.
- Haskel, D. (1848). *Chronology and universal history*. New York: J. H. Colton.
- Hassan, F. (1978). Demographic archeology. In M. B. Schaffer, ed., *Advances in arch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egel, G. (1956).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 Hilton, R. (1980). Individualism and the English peasantry. *New Left Review*, no. 120, pp. 109–111.
- . (1985). Introduction. In T. Aston, and C.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ed. (1976).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Ho Ping-ti. (1977).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Chinese agriculture. In C. A. Reed, ed., *Origins of agriculture*. The Hague: Mouton.
- Hodgett, A. J. (1972).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 Methuen.
- Hopkins, A. (1973).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oward, A. (1975). Pre-colonial centers and regional systems in Africa. *Pan-African Journal* 8(3):247-270.
- Huddleston, L. (1967).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European concepts, 1492-1729*.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Hoyle, R. (1990). Tenure and the land marke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r a late contribution to the Brenner debat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3:1-20.
- Hudson, B. (1977). The new geography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1870-1918. *Antipode* 9(1):12-19.
- Hulme, P. (1992). *Colonial encounters: Europe and the Native Caribbean 1492-1797*. London: Routledge.
- Huntington, E. (1924).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3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Inikori, J. (1987). Slave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B. Solow and S. Engerman, eds. (1987). *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 The legacy of Eric William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9). Slavery and the revolution in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England.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3(4):343-379.
- , ed. (1979).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UNESCO.
- Irvine, F. (1934). *A textbook of West African agriculture: Soils and crop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rwin, G. (1982). Sub-Saharan Africa. In J. Garraty, and P. Gay, eds.,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Isichei, E. (1982). *A history of Nigeria*. London: Longmans.
- Ivanov, V. (1985). Round-table: State and law in the ancient Orient. (Discussion.) *Social Sciences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16(3):177-201.
- Jackson, P., ed. (1987). *Race and racism: Essays in social geograph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James, C. L. R. (1938a).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 . (1938b). *A history of Negro revolt*. London: Fact. Rev. ed. (1969), *A history of Pan-African revolt*. Washington, DC: Drum and Spear Press.
- . (1970).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J. A. Williams and C. F. Harris, eds, *Amistad I*, 119-164. New York: Vintage.
- Jett, S. C. (1991).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geography of the blowgu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ransoceanic contact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1:89-102.
- Jha, S. C. (1963).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India*. Calcutta: Mukhopadhyay.
- Johnson, K. (1977). *Do as the land bids: A study of Otomí resource use on the eve of irrigation*. Ph.D. diss., Clark University.

- Joly, N. (1897). *Man before metals*. New York: Appleton.
- Jones, E. L.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8). *Growth recurring: 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Jung, C. (1963).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 (1964). The dreamlike world of India. In his *Civilization in transition* (*Collected works*, vol. 1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1971). *Psychological types* (*Collected works*, vol. 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baker, A. (1977). A radiocarbon chronology relevant to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C. A. Reed, ed., *Origins of agriculture*. The Hague: Mouton.
- Kagan, D., Ozment, S., and Turner, F. (1987). *The Western heritage*, 2 vols.,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 Kea, R. (1982). *Settlements,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Gold Coas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Keightley, T. (1849). *Outlines of history*. Rev. ed. London: Longmans.
- Kerridge, E. (1968).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A. M. Kelley.
- Kertzer, D. (1989). The joint family household revisited: Demographic constraints and household complexity in the European past.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4:1–16.
- Kinder, H., and Hilgemann, W. (1974). *The Anchor atlas of world history*, Vol. 1. New York: Anchor Books.
- Kitching, G. (1983). Proto-industrialization and demographic chang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4:221–240.
- Kniffen, F. (1965). Folk housing: Key to diffus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5:549–577.
- Koepping, K.-P. (1983). *Adolf Bastian and the psychic unity of mankind*. St. Lucia,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 Kosambi, D. D. (1969). *Ancient India*.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 Kroeber, A. (1937). Diffusionism. I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5:139–142. New York: Macmillan.
-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clau, E.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 Laibman, D. (1984).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theories of transi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48(3):257–294.
- Lambert, D. (1971). The role of climat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ropics. *Land Economics* 47:339–344.
- Lane, F. (1973).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aslett, P. (1988). The European family and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In J. Baechler, J. A. Hall, and M.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Lattimore, O. (1980). The periphery as locus of innovation. In J. Gottmann, ed., *Centre and periphery: Spatial variation and politic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Lee, G. (1987).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M. B. Sussman and S. K. Steinmetz, eds.,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Plenum.

- Lee, R. (1992). Art, science, or politics? The crisis in hunter-gatherer stud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4:31-54.
- Lelekov, L. (1985). Round-table: State and law in the ancient Orient. (Discussion.) *Social Sciences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16(3):177-201.
- Lentnek, B. (1969). Economic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commercial agricultur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9:65-84.
- Lerner, R., Meacham, S., and Burns, E. (1988).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11th ed. New York: Norton.
- Le Roy Ladurie, E. (1985). A reply to Robert Brenner. In T. Aston and C.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itzion, N. (1972).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Western Sudan to 1500. In J.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évy-Bruhl, L. (1966). *How natives think*.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Lewis, A. (1973). Maritime skills in the Indian Ocean, 1368-150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6:238-264.
- Lewis, W. A., ed. (1970). *Tropical development, 1880-1913*.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iceria, M. A. C. (1974). Emergence of Brahmanas as landed intermediaries in Karnataka, c. A.D. 1000-1300. *Indian Historical Review* 1(1):28-35.
- Lloyd, G. (1990). *Demystifying mentaliti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 Jung-pang. (1955). China as a sea power.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489-503.
- Lopez, R. (1953). Hard times and investment in culture. In R. Lopez, ed., *The Renaissance. A symposium*.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 and Miskimin, H. (1961-1962).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4:408-426.
- Lord, J. (1869). *Ancient states and empires: For colleges and school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 Lovell, W. G. (1992). "Heavy shadows and black night": Disease and depopulation in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 426-443.2
- Lowie, R. (1937). *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Rinehart.
- Löwith, K. (1982).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Ma Huan. (1970).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bogunji, A. (1972). The land and peoples of West Africa. In J.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cauley, T. (1850-1861).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5 vols. London: Longman.
- Macfarlane, A. (1978).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 (1986).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Modes of reproduction 1300-184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 (1988) The cradle of capitalism. In J. Baechler, J. A. Hall, and M.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agalhães-Godinho, V. (1969). *L'e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 et XVI siècles*. Paris: SEVPEN.

- Magubane, B. (1987). *The ties that bind: African-American consciousness and Africa*.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 Mahalingam, T. (1951). *Economic life in the Vijayanagar Empire*. Madras: University of Madras Press.
- Malinowski, B. (1927). The life of culture. In G. Eliot Smith, ed., *Culture: The diffusion controversy*. New York: Norton.
- Mamdani, M. (1972). *The myth of population contro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andelbaum, M. (1971). *History, man and reason: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nn, M.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8). European development: Approaching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In J. Baechler, J. A. Hall, and M.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annheim, K.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Marglin, S. (1990). Losing touch: The cultural conditions of worker accommodation and resistance. In F. Marglin and S. Marglin, eds.,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rkham, S. (1944). *Climate and the energy of n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 (1976). *Capital*. New York: Vintage.
- . (1979).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12:125–33. Moscow: Progress.
- , and Engels, F. (1975).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3d ed. Moscow: Progress.
- , and Engels, F. (1976). *The German ideology*. Moscow: Progress.
- McAlister, L. (1984). *Spain and Portugal in the New World, 1492–17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Clelland, D.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 McKay, D. (1943). Colonialism in the French geographical movement. *Geographical Review* 33:214–232.
- McNeill, W. (1967). *A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76).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 Mead, G. H. (1936). *Movements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38). *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ad, M. (1930). *Growing up in New Guinea*. New York: Blue Ribbon Books.
- Megaw, J., ed. (1977). *Hunters, gatherers and first farmers beyond Europe: An archeological survey*. Leicester, England: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erriman, T. (1875). *The trail of history*. 3d ed. Boston: Merriman and Stewart.
- Miller, J. (1982). The significance of drought, disease, and famine in the agriculturally marginal zones of West-Central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3:17–61.
- . (1988). *Way of death*.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ilne, G. (1947). A soil reconnaissance journey through parts of Tanganyika Territory, December 1935 to February 1936. *Journal of Ecology* 35:192–265.
- Minchinton, W. (1969).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London: Methuen.
- Mintz, S. W.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Miskimin, H. (1969). *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1300–1460*.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Mohr, E., and van Baren, F. (1954). *Tropical soils*. Amsterdam: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
- Montesquieu. (1949). *The spirit of the laws*. New York: Hafner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748.)
- Mukherjee, Radhakamal. (1967).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1600–1800*. Allahabad, India: Kitab Mahal.
- Mukherjee, Ramkrishna. (195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2d ed.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 Müller J. (1842).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o 1783*. 4 vols. Boston: Webb.
- Nag, M. (1980). How modernization can also increase fertility. *Current Anthropology* 21:571–588.
- Naqvi, H. K. (1968). *Urban centres in Upper India, 1556–1803*.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 Needham, J. (1985). *Gunpowder as the fourth estate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 and collaborators. (1954–1984).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6 vol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umann, E. (1954). *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Scribner's.
- Newsom, L. (1985). Indian population patterns in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0(3): 41–74.
- Niane, D. (1984). Mali and the second Mandingo expansion. In D. Niane, ed.,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Paris: UNESCO.
- , ed. (1984).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Paris: UNESCO.
- Nicholas, D. M. (1967–68). Town and countryside: Social and economic tensions in 14th century Flander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0:458–485.
- Nisbet, R. (1980).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 Nurul Hasan, S. (1969). The position of the Zamindars in the Mughal Empire. In R. Frykenberg, ed., *Land contro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Indian histo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Nye, P., and Greenland, D. (1960). *The soil under shifting cultivation*. Farnham Royal, England: Commonwealth Agricultural Bureaux.
- O'Keefe, P., and Wisner, B. (1975). African drought: The state of the game. In P. Richards, ed., *African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 Onimode, B. (1982). *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Nigeria*. London: Zed Books.
- Orwin, C., and Orwin, C. (1967). *The open fiel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Osaе, T., Nwabara, S., and Odunsi, A. (1973). *A short history of West Afric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Pacey, A. (1990).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A thousand-year hist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adgug, R. (1976).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slavery and slave society. *Science and Society* 40:3–28.
- Palmer, R., ed. (1957). *Atlas of world history*. Chicago: Rand McNally.
- Panikkar, K. M. (1959). *Asia and Western influenc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Parsons, J. B. (1970).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Pearse, A. (1980). *Seeds of plenty, seeds of want: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Pendleton, R. (1943). Land use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Geographical Review* 33:14–41.

- Perry, W. (1935). *The primordial ocean*. London: Methuen.
- Piaget, J. (1971). *Psychology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Grossman Publishers.
- Pinar, W. (1974). *Heightened consciousnes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urriculum theory*. Berkeley, CA: McCutchan.
- Pires, T. (1944). *The Suma Oriental*. London: Hakluyt Society.
- Ploetz, C., and Tillinghast, W. (1883). *Epitome of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Mifflin.
- Prakash, I. (1964).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urban centres in India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extiles. In B. Ganguli, ed., *Readings in Indian economic history*. Bombay, India.
- Prescott, J., and Pendleton, R. (1952). *Laterites and lateritic soils*. Slough, England: Commonwealth Agricultural Bureaux.
- Purcell, V. (1965).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2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Qaisar, A. J. (1974). The role of brokers in medieval India. *Indian Historical Review* 1:220-246.
- Quackenbos, J. (1889). *Illustrated schoo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 Radell, D. R. (1976). The Indian slave trade and population of Nicaragu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W. Denevan, ed.,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Radin, P. (1927). *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 New York: Appleton.
- . (1965). *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ethn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Ratzel, F. (1896). *The history of mankind (Völkerkunde)*.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 Rawski, E. (1972).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Raychaudhuri, T. (1962). *Jan Company in Coromandel*. The Hague: Nijhoff.
- . (1965).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Enquiry* 2(1,n.s.):92-121.
- Reclus, E. (1876-1894)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aris: Hachette.
- Reed, C. A., ed. (1977). *Origins of agriculture*. The Hague: Mouton.
- Richards, P., ed. (1975). *African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 Robbins, R. (1832). *The world displayed in its history and geography: Embrac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Cre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W. W. Reed.
- Roberts, J. (1987). *The Hutchinson history of the world*. 2d ed. London: Hutchinson.
- Robinson, C. (1987). Capitalism, slavery and bourgeois historiography. *History Workshop* 23:122-141.
- Rodinson, M. (1973). *Islam and capi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 . (1974). Le marchand musulman. In D. S. Richards, ed.,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Cambridge, England: Cassirer.
- Rodney, W. (1970). *A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545-180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 (1972).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London: Bogle-L'Ouverture Publications, and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 Rogers, E. (1962).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 and Shoemaker, F. (1971).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Rorty, R. (1980).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Rouse, I. (1961). Comments on Edmonson's Neolithic diffusion rates. *Current Anthropology* 2:96.

- . (1986). *Migrations in pre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xborough, I. (1979). *The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 Sack, R. (1980).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 Said, E.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Sanderson, E. (1898).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year 1898*. New York: Appleton.
- Sastri, K. N. (1966). *A history of South Indi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fall of Vijayanagar*. 3d ed. 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midt, W. (1939). *The culture historical method of ethnology*. New York: Fortuny.
- Schweder, R. (1990). Cultural psychology: What is it? In J. Stigler, R. Schweder, and G. Herdt, eds., *Cultural psychology: Essays 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combe, W. (1983). *Marxism and demography*. *New Left Review* no. 137, pp. 22-47.
- Semo, E. (1982). *Historia del capitalismo en México: Los orígenes, 1521-1763*. Mexico, D.F.: Ediciones Era.
- Shannon, G., and Pyle, G. (1989).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AID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9:1-24.
- Sharma, R. S. (1965). *Indian feudalism, c.300-1200*.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Press.
- . (1966). *Light on early Indian society and economy*. Bombay: Manaktalas.
- Shepherd, W. (1911). *Historical atlas*. New York: Henry Holt.
- Sheridan, R. (1974). *Sugar and slaver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 (1987). Eric Williams and *Capitalism and slavery: A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In B. Solow and S. Engerman, eds. *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 The legacy of Eric William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erif, A. (1987). *Slaves, spices and ivory in Zanzibar*. London: James Currey.
- Simkin C., (1968).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monsen, R. (1944). *História econômica do Brasil, 1500-1820*, 2d ed. São Paulo, Brazil: 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 Sinclair, P. (1991). Archeology in eastern Africa: An overview of current chronological issues.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32:179-219.
- Smith, A. (1972).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Central Sudan. In J.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C. T. (1969).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before 1800*. London: Longmans.
- Smith, P. (1868). *An ancient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records to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3 vols. London: Walton.
- So Kwan-wai. (1975).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Solow, B. (1987). Capitalism and slavery in the exceedingly long run. In B. Solow and S. Engerman, eds. *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 The legacy of Eric William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and Engerman, S., eds. (1987). *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 The legacy of Eric William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encer, H. (1969).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 Spradley, J., and McCurdy, D. (1975). *Anthropology: A 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Wiley.

- Steele, J., and Steele, E. (1883). *A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peoples*.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
- Steward, J. (1955).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l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tocking, G. (1968).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 (1987).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 ed. (1984). *Functionalism historicized: Essays o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tone, L. (1977).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weezy, P. (1976). A critique. In R. Hilton, ed.,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Swindell K. (1981). Domestic production, labor mobility, and population change in West Africa, 1900–1980. In C. Fyfe and D. McMaster, eds., *African historical demography*. Edinburgh, Scotland: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 Swinton, W. (1874).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New York: Ivison, Blakeman, Taylor.
- Taueber, I. (1970). The families of Chinese farmers. In M. Freedman, ed.,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lkington, L. (1986). But the editor looks at the universe from a different frame of reference. *Science and Nature*, nos. 7–8, pp. 94–100.
- Tarde, G. (1903). *The laws of imit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 Tawney, R. H. (1952).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Taylor, G. (1945). *Environment and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emu, A., and Swai, B. (1981). *Historians and Africanist history: A critique*. London: Zed Books.
- Thalheimer, M. (1883). *Outline of general history for the use of schools*.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
- Thapar, R. (1978). *Ancient Indian social history: Some interpretations*. New Delhi, India: Orient Longman.
- . (1982). Ideolog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Indian history. *Review* 5:389–412.
- Thorndyke, L. (1943). Renaissance or prenaissa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65–74.
- Thrupp, S. (1948).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 (1972). Medieval industry 1000–1500. In C.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Middle Ages*. London: Collins.
- Tiedemann, C., and Van Doren, C. (1964). *The diffusion of hybrid seed corn in Iowa: A spatial diffusion study*. Institut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ervice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Bulletin B-44.
- Titow, J. Z. (1969). *English rural society, 1200–1350*.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Tolman, E. (1951). A Psychological model. In T. Parsons and E. Shils, ed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orras, J. (1980). Class struggle in Catalonia. *Review* 4:253–265.
- Toulmin, S., and Goodfield, J. (1965). *The discovery of tim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Toyoda, T. (1969). *History of pre-Meiji commerce in Japan*. Tokyo: Japan Cultural Society.

- Trigger, B. (1989). *A history of arch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ng, C. (1979).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 Turner, B. (1978). *Marx and the end of Orien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Turshen, M. (1987).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health: Mainland Tanzania, 1920–1960. In D. Cordell and J. Gregory, eds., *African population and capitalis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Tyler, S., ed. (1969). *Cogni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Tytler, A. (1844).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Creatio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 ed. Boston: Massey.
- Udovitch, A. (1974). Commercial techniques in early medieval Islamic trade. In D. S. Richards, ed.,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Cambridge, England: Cassirer.
- Usman, Y. B. (1981). *The transformation of Katsina (1400–1883)*. Zaria, Nige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Press.
- Van Leur, J. C. (1955).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 W. van Hoeve.
- Van Sertima, I. (1976).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Van Young, E. (1983). Mexican rural history since Chevalier: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olonial haciend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8(3):5–61.
- Vavilov, N. (1951). *The origin, variation, immunity, and breeding of cultivated plants*. New York: Ronald Press.
- Venturi, F. (1963).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oriental despotism” in Europe.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4:133–143.
- Vilar, P. (1976). *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 1450–1920*. London: New Left Books.
- Vishnu-Mittre. (1978). Origin and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7:31–36.
- Vives, J. Vicens. (1969).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chtel, N. (1984). The Indian and Spanish conquest. In Bethell, 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Colonial Latin America*, Vol. 1.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i Andah, B. (1981). West Africa before the seventh century. In G. Mokhtar, ed.,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2.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Africa*. Paris: UNESCO.
- Wallerstein, I. (1974–1988).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3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rren, B. (1980).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Watson, A. (1983).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 700–110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tts, S. J., Okello, R., and Watts, S. (1990). Medical geography and AID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301–304.
- Webb, W. P. (1951). *The great frontie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Weber, G. (1853). *Outlines of universal history*. Rev. ed. Edited by F. Brown. Boston: Brewer and Tileston.
- Weber, M. (1951).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 .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s.
- . (1967). *The religion of India*. New York: Free Press.
- .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 . (1976).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London: New Left Books.

- . (1981).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Wendorf, F., and Schild, R. (1980). *Prehistory of the Eastern Sahar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erner, K. F. (1988).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West, 300–1300. In J. Baechler, J. A. Hall, and M.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erner, H., and Kaplan, B. (1964). *Symbol form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Wheatley, P. (1961).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before A.D. 1500*.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 (1971).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Chicago: Aldine.
- Whelpley, S. (1844). *A compound of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12th ed. New York: Collins Brothers.
- White, G., ed. (1974). *Natural hazards: Local, national,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Lynn, Jr. (1962).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68). *Machina ex deo: Essays in the dynamism of Western 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 (1968)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In his *Machina ex deo: Essays in the dynamism of Western culture*, 75–9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Whitehead, A. N. (1929).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 . (1938). *Modes of thought*. New York: Macmillan.
- . (1948). *Science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 Whitman, J. (1984). Philology to anthropolog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In G. Stocking, ed., *Functionalism historicized: Essays o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Whitmore, T. (1991). A simulation of sixteenth-century population collapse in the Basin of Mexico.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1:464–487.
- Wiehoff, B. (1963). *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Ü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 Hamburg, Germany: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 Wilken, G. (1987). *Good farmers: Tradition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llard, E. (1845). *Universal history in perspective*. 2d ed. New York: Barnes.
- Williams, E. (1944). *Capitalism and slave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 (1966). *British historians and the West Indies*. London: Andre Deutsch.
- Williams, R. (1990). *The American Indian in Western legal thought. The discourses of conqu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sner, B. (1989). *Power and need in Africa*.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 , and Mbithi, P. (1974). Drought in Eastern Kenya. In G. White, ed., *Natural hazards: Local, national,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ttfogel, K.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olf, E.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s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rigley, E. (1969). *Population and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 Wunder, H. (1985). *Peasant organization and class conflict in eastern and western*

- Germany. In T. Aston and C.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dava, B. (1966). Secular land grants of the post-Gupta period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growth of the feudal complex in northern India. In D. Sircar, ed., *Land system and feudalism in ancient India*. Calcutta, India.
- . (1974). Immobility and subjugation of Indian peasantry in early medieval complex. *Indian Historical Review* 1:18-74.
- Yang Lien-sheng (1970). Government control of urban merchants in traditional China.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8:186-206.
- Yapa, L. (1980). Diffusion, development, and ecopolitical economy. In J. Agnew, ed.,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Syracuse, N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Syracuse University.
- Zwernemann, J. (1983). *Culture history and African anthropology*.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 Uppsala Studie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Uppsala, Sweden: Uppsala University.

Index

- Abel, W., 209
Abu-Lughod, J., 51, 57, 172, 177, 178
Acapulco, 190
Accessibility. *See* Location
Accumulation, 129, 152, 187, 189, 192, 195, 199, 204–206, 212
 primitive, 188, 189, 210
Adams, B., 212
Adulthood, 17, 95–98
Africa, Africans, 4, 15, 20–22, 45, 51, 57, 62, 64, 98–99, 103, 105–107, 109, 116, 119, 120, 123–124, 138, 140, 149, 153, 155–158, 160, 162, 166, 168–169, 171, 173–174, 180, 183, 187, 188, 189, 193, 195, 196, 197, 200, 201, 203, 206, 209
 East, 167, 182–183, 191, 192, 207–209
 South, 89, 141, 144, 152, 155–157, 166–167
 apartheid in, 75, 141, 144
 myth of emptiness in, 75
 North, 3, 46, 82–90, 157, 209
 tropical, 69–80, 140, 141
 West, 79, 155, 181–183, 191, 204, 207–209
African-Americans, 98
Agriculture, 29, 44–45, 117, 154–165, 169
 aridity and, 80–90, 143
 drainage, 85–86, 143, 164, 174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213
 intensific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157–158, 161, 163–164, 166
 irrigated, 74–78, 80–90, 109–110, 143, 162, 164, 174
 labor productivity in, 89, 91, 143, 157, 174
 medieval, 110–115, 157–165, 168
 origins. *Se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peasant. *See* Peasants
 plantation. *See* Plantations
 rain-fed (dry field), 74–76, 84, 86, 88–91
 sedentary, 74–76
 shifting, 72–76, 141–142, 174
 tropical, 70–77, 140, 174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4, 7, 23, 44–45, 155–157, 164, 172, 174, 185–186, 209
Ahn, P., 140
AIDS, 77, 215–216
 and Africa, 142, 215–216
Ajayi, J., 176
Akan, 157
Alavi, H., 212
Alchon, S., 209
Alliance for Progress, 49
Amazon river and basin, 71, 74, 207
America, 51, 103, 152, 162, 173, 180, 183–184, 187, 200, 204, 206, 208–209
 Latin, 22, 76, 131
 North, 180
 South, 141
Americans, Native, 97, 138, 194, 195
Amin, S., 51, 56, 57, 47, 135, 136, 137, 154, 173, 177, 205, 211
Andean region, 20, 184, 194, 195
Anderson, J., 44
Anderson, P., 58, 108, 138, 142, 146, 176
Angola, 49
Anthrax, 78
Anthropology, 23–24, 30–33, 65, 97, 102
 and primitive mind, 97, 102
Antilles. *See* West Indies, Antilles
Antwerp, 189–190, 192
Appadorai, A., 176
Arabia, 92, 167
Arabs, 98, 99, 181
Aristocracy, medieval, 123, 125–127
Armenia, 43
Aryan theory, 12, 84, 89

- Asad, T., 48
 Asia, 21–22, 77, 80–90, 103–107, 123, 155–158, 160, 162, 165–166, 171, 173, 180, 183, 187–189, 193, 195, 196, 197, 200, 206
 aridity in, 80–90
 East, 30, 46, 152, 167
 South, 46, 56, 76, 167
 Southeast, 21, 56, 76, 117–120, 167, 171, 181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81–83, 125, 157
 Aston, T., 140, 149, 150
 Athenian empire, 125
 Atlantic Ocean, 181–182, 211
 crossing, 14, 181, 207–209
 Arwell, W., 210
 Augsburg, 197
 Australians, 45
 Azores Islands, 182
 Aztecs, 185
- Baechler, J., 122–123, 125–127, 147, 149, 160, 176
 Bailey, A., 142
 Bailey, R., 205, 212, 213
 Bakewell, P., 211
 Bali, 120
 Baltic Sea, 167, 171, 197, 200, 211
 Bangladesh, 71
 Barbados, 68, 71, 197
 Barbarism, zone of, 14
 Barnes, H. E., 44
 Beckles, H., 205, 213
 Belief–value matrix, 38
 Beliefs, 30–43
 compatibility of, 34–37
 conformality and binding of, 35–41
 ethnography of, 30–41
 explicit and implicit, 36, 40–41, 65
 truth and, 30–32
 Bengal, 166
 Berkner, L., 150
 Bernal, M., 44, 55, 57, 137, 138, 144
 Bernier, F., 142
 Bible Lands, 3, 5, 7, 29, 43–45, 81
 Big Bang Theory, 214–216
 Birth
 conception and, 67, 139
 control, 66–67, 129, 139
 rates, 128–130, 140
- Björklund, O., 149
 Black, C., 136
 Black death, 46, 77
 Black magic, 16
 Blaut, J., 48, 49, 136, 138, 140, 141, 142, 143, 145, 149,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209, 212, 215
 Blockages, historical, 69, 80, 117, 137
 Blow-gun, 11
 Blum, J., 139
 Boas, F., 97, 139, 144
 Bogeyman, 16, 47
- Bois G., 150
 Bojador, Cape, 209
 Borah, W., 209, 211
 Bourgeois revolutions, 165, 179–180, 187, 199, 200
 Bourgeoisie, 179, 195
 Bowler, P., 48, 138, 141, 144
 Brading, D., 210
 Brantlinger, P., 48
 Braudel, F., 178, 210
 Bray, Francesca, 143, 146, 211
 Brazil, 20, 182, 188, 191–192, 195, 197, 216
 Brenner, R., 58, 108, 127–128, 138, 146, 149, 150, 151, 160, 176, 177, 205, 213
 Britain, 108, 146–147, 150, 166, 179, 187–188, 191–192, 197, 203, 211, 213
 Brown, L., 145
 Buck, J. L., 131
 Buckle, H. T., 76, 77, 141, 142
 Burghers. *See* Bourgeoisie
 Burma, 147
- Cabral, A., 54, 136
 Cairo, 187
 Calicut, 190, 196
 Cambodia, 147
 Cambridge University, 135
 Canada, 43, 156
 Canals, in China, 93, 113
 Canary Islands, 182, 208, 209
 Cape Bojador, 209
 Cape of Good Hope, 181
 Capes and bays theory, 92, 122
 Capitalism, 8, 51, 102, 152, 161–163, 165, 167, 169–170, 179–180, 187–206, 210
 centration of, 180, 191, 197, 201–206
 in colonial America, 55
 origins and rise, 55, 102, 127–128, 150
 triumph of, 179
 Caribbean. *See* under West Indies
 Carter, G., 47
 Carus-Wilson, E., 212
 Cassava, 156
 Caucasus, 11, 43
 Center-periphery model, 14
 Centration of capitalism. *See* Capitalism, centration of
 Céspedes, G., 210
 Ch'in empire, 125
 Chad, Lake and region, 120, 157
 Chambers, M., 46
 Chan-Cheung, J., 177
 Chandra, B., 48, 142
 Chandra, S., 177, 211
 Chao Phraya Basin, 120
 Chariots, 143
 Chaudhuri, K. N., 177, 207, 211
 Chaudhuri, S., 177
 Chaunu, H. and P., 210
 Cheng Ho, 181, 182, 207
 Chicherov, A., 176
 Childhood, 17, 95–98

- China, 15, 21, 29, 46-47, 56-57, 78, 82, 87, 94, 96, 110, 113, 115-120, 122-123, 125, 131, 158-159, 166-167, 169-170, 173, 181-182, 198, 216
 Jones on, 67, 106-107
 Weber on, 64, 103, 116
- Chirimuuta, R. C. and R. J., 142, 216
- Christendom, 18
- Christianity, 123-124
 and diffusionism, 18-19, 21, 60-61, 108
 Western (L. White, Jr.), 114-115
- Church, 119, 123-124, 147-149
- Cipolla, C., 118-119, 147
- Cities, 153, 161, 167, 196, 207
 ancient, 84
 European, 84, 128, 188, 193
 medieval, 113, 167, 175, 177
 mercantile-maritime, 167-173, 181, 196, 207
 Weber on, 84, 103-104, 116
- City-states, 104, 123, 167, 171
- Civil Rights movement, 5, 137
- Civilization, zone of, 14
- Class, 33-34, 41, 57, 88, 119, 123-128, 154, 157-158, 170
 Baechler on, 125-127
 Brenner on, 127-128, 150
 Godelier on, 127
 in precolonial Africa, 124-125
- Class struggle, 8, 53, 127, 149, 150
- Classless society, 123-125
- Climate and personality, 70-71
- Climatic determinism or energy, 70-71, 140
- Clocks, in China, 117
- Cockburn, A., 140, 141
- Cognition, 98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93, 101
 of space, 101
- Cohen, I., 145
- Collier, W., 43, 44
- Collins, K., 140
- Collyer, O., 140
-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49
- Colonial Office, British, 24
- Colonialism, 2, 4, 10, 18-30, 41, 49, 51, 53-57, 62, 70-71, 75, 81, 96, 135, 140, 150, 152-153, 179, 187-206
 and diffusionism, 16, 18-30, 53-58
 classical, 21-25
 modern, 26-30
 and rise of Europe, 2, 17-29, 187-205
 settler, 15, 21-22, 25, 183
- Colonizer's model, 10, 17-30, 41-42
- Columbus, C., 209
- Corago, 157
- Conklin, H., 49
- Conquest of America, 179-186
 disease and, 183-186
 technology and, 182-184
- Consciousness, 98, 100-101, 144
- Contemporary ancestors, theory of, 16
- Continnence, European sexual, 66-68, 121, 133-135
 Hall on, 134
 Jones on, 67, 121
- Cook, S. F., 209, 211
- Cooper, J., 150
- Cordell, D., 139
- Core areas, ecological and political, 93-97, 120, 122
- Coromandel, 166
- Cortés, H., 185, 186
- Cotto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164, 166, 212
 in Britain and India, 203
- Counterdiffusion, 17, 77. See also Black magic; Dracula; AIDS; Plagues
- Coursey, D., 141
- Cro-Magnon, 4
- Crone, P., 131, 133, 144, 150, 151
- Croot, P., 150, 151
- Crosby, A., 209
- Cross, H. C., 210
- Crowder, M., 176
- Cuba, 29, 53, 185
- Culture, 11, 27, 32-33, 94, 123, 172, 183, 208, 212
 Curtin, P., 76, 79, 140, 141, 211, 212
 Cyprus, 191
- Dalal, F., 144
- Danube R., 93
- Darby, H., 146
- Darity, W., Jr., 205, 212, 213
- Darwin, C., 4, 23
- Das Gupta, A., 175
- Decolonization, 28-30, 49, 55, 137
- Deerr, Noel, 210, 211, 212
- Degeneration, 44-45
- Demesnes, farming, 112, 159
- Democracy, 8, 88, 107, 120-121, 126
- Demography, and diffusionism, 42, 53, 66-68, 93, 119, 139
- Denevan, W., 140, 143, 174, 209, 211
- Dependency theory, 55, 137, 149, 177
- Depopulation
 of America, 141, 184-186, 194
 of Mexico, 184, 194
 of West Africa, 76, 78-79
- Descartes, R., 214
- Development, 27-30, 53-55, 100-101, 105, 129, 133, 136, 152-153, 214-215
 even and uneven, 152-153, 162
- DeVisse J., 207, 209
- Dew, T., 44
- Dewey, J., 38, 49, 145
- Di Meglio, R., 176, 177
- Diffusion, 11, 47, 98, 100-101, 115, 136, 145, 155-157, 161-162, 171, 173-174, 215
 criss-cross, 115, 156, 160-162, 167, 171, 173
- Diffusionism, 11-30, 52-54, 70, 100, 104, 137, 142, 180, 183, 189, 203, 205, 208, 214-215
 as a belief system, 41-43
 classical, 21-26, 81, 95-98, 170
 extreme, 11-12, 27, 47, 49
 modern, 26-30

- Diffusionism (*cont.*)
 origins of, 18-21
 Dirks, N., 147
 Disasters, natural, 93, 145
 Disease, 60, 107, 142. *See also* Plagues
 and conquest of America, 184-186
 and Africa, 77-80, 142
 and Europe, 77-78
 and tropics, 77-80, 142
 Dobb, M., 173, 176, 177
 Doolittle, W., 143
 Dracula, 16, 21, 47
 Dualism, 95-97
 Man and Nature, 112
 mind-body, 101
 philosophical, 101, 145, 214
 Dualistic-developmental theory of
 rationality, 95-98
 DuBois, W. E. B., 55
 Dunn, R. S., 211
 Duruy, V., 44
 Dutt, R. P., 55, 212
 Duyvendak, J., 56, 137
- East India companies, 24, 197
 East Indies, Dutch, 49
 Edel, M., 211
 Eden, Garden of, 3, 43-44
 Edmonson, M., 47
 Education, U. S., 101, 145
 Egypt, 12, 47, 82-83, 87, 143, 191-192, 197, 208
 El Salvador, 71
 Eliot Smith, G., 47, 49
 Elvin, M., 57, 117, 137, 175, 176, 177
 Empires, 120, 147
 Chinese, 123
 Oriental. *See* Oriental despotism
 Roman, 147
 Emptiness, myth of, 15, 25, 75
 Engels, F., 48, 82-84, 86, 127, 142
 Engerman, S., 205
 England. *See* Britain
 Environment, 69-94, 119
 arid, 80-90
 European, 90-94
 humid-tropical, 69-80, 141
 Environmentalism,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69, 140, 141, 182, 183
 Episteme, Western (Marglin), 101
 Equilibrium theories, 27-28
 Ethiopia, 157
 Ethnogeography, 23, 32
 Ethnography of beliefs. *See* Beliefs
 Ethnohistory, 32
 Ethnoscience, 2, 32-43, 49
 Ethology, 105, 107, 151
 Eurocentrism, 1-2, 7-11, 47. *See also* Diffusion-
 ism
 Europe, 43, 45, 51, 90-94, 152, 186-187
 Greater, 3-8, 14, 46
 European intellect, 1, 15-17, 20, 95-108, 121
 mind, 58
 miracle, myth of, 50-151, 214
 personality, 132-135, 144
 rationality. *See* Rationality, European
 spirit, 1, 15-17, 20, 103-104, 121
 Evolution, cultural, 11, 16-17, 22-26, 47, 57,
 65, 85, 127, 152-153, 172, 174, 185, 209
 Evolutionism, 12, 24, 47
 Exploitati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161
- Family, 58, 68, 119, 128-135
 extended and nuclear, 128-134, 150
 European, 90, 126, 128-135
 Hajnal on, 129-130
 Macfarlane on, 131-134
 modern, 128
 preindustrial, traditional, 68, 128
 Stone on, 130-135
 Fei Hsiao-tung, 175
 Feminism, 139
 Feudal mode of production, 154, 157-165, 171,
 173
 Feudal property and tenure, 83, 104, 158
 Feudalism, 8, 46, 51, 95, 110, 112, 126-128, 146,
 152-154, 158-165, 197, 210
 in Africa, 157-158
 in India, 55, 158, 160, 175
 Fez, 209
 Fiedel, S., 209
 Fiefs, 158, 175
 Figueroa, L., 215
 Files, T. 209
 Finley, M., 108, 146
 Fisher, D., 211
 Fisher, G., 44
 Fisheries, Atlantic, 92, 182, 188, 192, 196-197,
 207
 Flanders, 166, 188, 197
 Fleck, L., 49
 Florescano, E., 211
 Forests, 89, 106, 140, 143
 and ancient Europeans, 84, 107
 European, 89-90, 94, 108
 tropical, 71-76
 Foster, G., 145
 Frake, C., 49
 France, 147, 179, 203, 204
 Frank, A. G., 51, 149, 205, 211
 Frankel, H., 216
 Freedman, M., 150
 Freedom, love of, in Europe, 26, 107, 119,
 120-121, 171
 Freeman, E., 44
 FRELIMO, 175
 Freund, J., 145
 Fu Chu-fu, 175, 176
 Fukien, 166
 Functionalism, 27
 Furtado, C. 211
- Galloway, J. H., 210
 Garraty, J., 141
 Gay, P., 141

- Genesis, Book of, 23, 43–45
 Genoa, 189
 Gentry and nobility, 158
 Geography, 1, 3–8, 17, 23–24, 31–32, 45, 47, 65, 96–97, 101, 125, 127, 136
 in 19th-century education, 3–7, 96
 Germanic culture, ancient, 25, 131–132
 Germany, 147
 Gernet, J., 176, 177
 Giblin, J., 142
 Gilfillan, S., 71, 140
 Gill, D., 139
 Gilman, A., 44
 Glorious revolution (English), 165, 197
 Godelier, M., 127, 149
 Goitein, S., 178
 Gold, 183, 188–191
 American production, 188–191
 and Asian trade, 118, 190
 stock in E. Hemisphere, 189
 Gold Coast, 166
 Golson, J., 143, 174
 Goodfield, J., 48
 Gopal, L., 175
 Gopal, S., 176
 Gossert, T., 48, 138, 139
 Gould, P., 145
 Grand Banks, 182, 207
 Greece, 4, 8, 50, 88, 107–108, 123, 147
 Greenland, D., 140
 Gregory, J., 139
 Grosvenor, E., 44
 Guilds, medieval, 166
 Gunpowder, 115, 117
 Guns, cannon, in China, 117–119, 173
 Gupta, N. S., 177, 210
- Habib, I., 55, 175, 176, 177
 Hagen, E., 100–101, 144
 Haitian revolution, 204
 Hajnal, J., 129–130, 150
 Hall, J. A., 59, 67, 77, 86–87, 91, 108, 122–124, 139, 141, 143, 144, 147, 151
 Hallam, H., 124, 147
 Haller, J., 139
 Hallpike, C., 145
 Ham, 44
 Hamilton, E. J., 190–191, 210
 Handler, R., 150, 151
 Harnemann, M., 211
 Hanseatic League and cities, 197
 Hardy, E., 140
 Harewood, J., 140
 Harris, M., 44, 47, 49, 138
 Harrison, P., 143, 176
 Hasan, A., 175, 210
 Haskel, D., 48
 Hassan, F., 139
 Hawaii, 156
 Hecht, S., 140, 141
 Hegel, G. W. F., 53, 142
 Hegelianism, 43, 48, 91, 120
- Hilgemann, W., 149
 Hilton, R., 140, 150
 Historians, 52–59, 65, 136
 absolutist, 76, 79–80
 Historical and ahistorical societies, 137
 Historical atlases, 124
 Historiography, modernisation and, 53–59
 History, 1, 3–8, 97, 127
 in 19th-century education, 3–7, 43–46
 march of (Mann), 91, 108
 textbooks, 3–7, 43–46, 96, 124
 Western, 46
 world, 46
 Hodgett, A. J., 210
 Holism and reductionism, 22, 33, 41, 48, 119
 Hølmhoe, H., 149
 Hopkins, A., 174
 Horse-collar, horse power, 111, 112–114
 Household, extended-family and nuclear-family, 128–129
 Hoyle, R., 150
 Huddleston, L., 48
 Hudson, B., 45
 Hulme, P., 48
 Humboldt, W. von, 97
 Huntington, E., 70
 Hydraulic society. *See* Agriculture, irrigated;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Oriental despotism
- Iberia, 181–182, 183–184, 188, 197, 211
 Ibn al-Faqih, 167
 Ibn Khaldun, 183
 Iceland, 93
 India, 21, 47, 69, 82, 96, 98, 103, 106, 111, 116, 119–120, 122, 131
 caste in, 122, 126, 161
 classes, 126
 de-industrialization of, 203
 medieval polity, 122
 personality (Weber), 64, 103, 138
 Indian Ocean, 92, 117–118, 171, 182
 Individual(ism), 25, 87, 90–91, 119, 132, 135, 144
 English, 132
 European, 87, 90–91, 107, 109, 132–133
 Indo-European peoples, languages, 44, 50, 88, 97, 109, 131
 Indo-European warrior aristocracy (Baechler), 123, 126
 Indochina, French, 49
 Indonesia, 92
 Indus valley, 82
 Industrial revolution, 8, 55, 107, 165, 179, 180, 201–206, 213, 215–216
 and mechanization, 202
 Industrial production, medieval, 110–115
 Inflation, 16th-century,
 in Asia, 210
 in Europe, 187, 196
 Inikori, J., 212, 213
 Inner Asia, 93

► 300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

- Innovation, 15, 110-115, 116, 128, 149, 163
 Insanity. *See* Sanity
 Inside and Outside, 1, 5, 12-17, 30, 42, 138, 214
 Interests and values, 30-31, 37-41
 Invention, independent, 11-12, 47, 208
 Inventiveness, 12-14, 17, 105, 108-109, 110-115, 208
 Iron, 88-89, 169
 early use, 7, 75, 88-89, 109, 141
 iron age, 7, 50, 88-89, 91, 107, 109, 131
 Irrawaddy plain, 85
 Irvine, F., 141
 Irwin, G., 141
 Isichei, E., 175
 Islam, 119, 122, 123
 Italy, 166, 171, 187, 192, 197, 211
 Ivanov, V., 144
- Jackson, P., 138, 139
 Jagirdars, 158
 James, C. L. R., 55, 137, 203-206, 212
 Japan, 5, 30, 82, 149, 155, 167, 216
 Japheth, 44
 Java, 71, 120, 166
 Jett, S. C., 47
 Jews, 99
 Jha, S. C., 176, 177
 Joly, N., 45
 Jones, E. L., 50, 58, 67, 70-71, 77, 86-87, 89, 91, 93, 104-108, 110, 120-121, 123-124, 131-133, 135,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7, 150, 151
 Judeo-Christian teleology, 114
 Jung, C., 98, 144
- Kabaker, A., 173
 Kagan, D., 46
 Kalah, 167, 172, 177,
 Kant, I., 214
 Kantianism, Neo-Kantianism, 48, 101, 214
 Kaplan, B., 144
 Kea, R., 174, 175, 176
 Keightley T., 43, 44, 48
 Kenya, 49
 Kertzer, D., 150
 Keynesianism, 27
 Kilwa, 166, 208,
 Kinder, H., 149
 Kitching, G., 139
 Koepping, K. P., 47
 Korea, 147
 Kosambi, D. D., 146, 175
 Kuhn, T., 37, 49
- Labib, S., 207, 209
 Labor,
 counterdiffusion of, 16
 colonial, 193-196
 Labor force, colonial Americas and Europe, 193, 195, 196
 Laclau, E., 205, 213
 Laibman, D., 142
- Lambert, D., 71, 140
 Landlords, 158-160, 162, 170
 Landownership,
 medieval European, 104, 159, 160
 peasant, 127, 160
 Lane, F., 178
 Languages, primitive, 97, 145
 Las Casas, B., 195
 Laslett, P., 131, 133-134, 150, 151
 Le Roy Ladurie, E., 150
 Lee, G., 150
 Lee, R., 174
 Lelekov, L., 144
 Levant, 191
 Levidow, L., 139
 Levitzion, N., 176, 209
 Lévy-Bruhl, L., 97, 101, 144
 Lewis, A., 177
 Lewis, W. A., 48
 Li Ching-neng, 175, 176
 Liceria, M. A. C., 175
 Lie, B., 149
 Lisbon, 190
 Livingstone, D., 23
 Llobera, J., 142
 Lo Jung-pang, 177
 Location, accessibility, 2, 157, 161-162, 169-173, 181, 182, 197
 Lombok, 120
 Lopez, R., 147, 210
 Love and marriage, in Europe, 132-133
 Lovell, W. G., 209, 211
 Lowie, R., 49
 Löwith, K., 145
 Luzon, 85, 120
- Ma Huan, 177, 209
 Mabogunji, A., 175
 Macaulay, T., 48
 Macfarlane, A., 131-133, 150, 151
 Madeira, 182, 191
 Madrid, 195
- Magalhães-Godinho, V., 211
 Maghreb, 171, 181, 183
 Magna Carta, 122
 Magubane, B., 139
 Mahalingam, T., 175, 176, 177
 Maize, 107, 156
 Malabar, 166
 Malacca, 167, 172, 190
 Malaria, 78
 Malthus, T., 48, 66-68, 133
 Malthusian theory, 66-68, 73, 87, 129, 133-134, 139-140, 162, 209
 Mandani, M., 139
 Mandelbaum, M., 48
 Manila Galleons, 190
 Manila, 117
 Mann, M., 59, 86-91, 93, 107-110, 122-124, 131-133, 139, 143, 144, 146, 147, 148, 150, 151, 176
 Manorial system, 159-160

- Maquiladora plants, 215
 Marglin, E., 145
 Marglin, S., 101, 145
 Mariana Islands, 49
 Markets, 17th-century, 199–201
 Markham, S., 70
 Marriage pattern, European and non-European, 129–135, 139
 Marx, K., 25, 39, 48, 76, 82–84, 86, 127, 141, 142, 158, 159, 175, 202, 205, 210, 212
 Marxism, 46, 55–57, 77, 94–95, 137, 148, 168, 177, 202, 210, 212
 Marxists, Eurocentric, 46, 56, 58, 83, 108, 125, 137–138, 149, 157, 162, 205, 213
 Maya civilization, 72–73
 Mbithi, P., 141
 McAlister, L., 210, 211
 McClelland, D., 100, 144
 McCurdy, D., 49
 McKay, D., 45
 McNeill, W., 45, 46, 79, 140, 142, 143, 144, 146, 209
 Mead, G. H., 48, 145
 Mead, M., 97, 144
 Mediterranean, 43–44, 92, 159, 167–168, 172, 181, 183, 200
 Megaw, J., 173
 Mekong valley, 120
 Merchant capital, 179, 188, 192, 207–208, 212
 Mesoamerica, 86, 195
 Mesopotamia, 82, 85, 120, 143
 Metals
 age of, 7
 precious. *See* Gold; Silver
 Mexico, 20, 180, 182, 185–186, 188, 190, 194–195, 208
 Middle East, 4, 7–8, 45–46, 63, 82–90, 109, 110, 116, 155, 156, 167, 170, 183
 Migration, rural–urban, 161–162
 Mill, J. S., 48
 Miller, J., 76, 140, 141
 Milne, G., 140
 Minchinton, W., 211
 Mind
 criminal, 144
 European. *See* European mind
 female, 96
 and matter. *See* Dualism
 primitive, 17, 95–102, 144–145, 148, 151, 206
 traditional, 15, 98–102, 145
 Mintz, S. W., 205, 212, 213
 Miskimin, H., 209, 210
 Moctezuma 185
 Modernization, 2, 27–30, 52–54, 59, 98–102, 206
 as history, 53–54, 136
 theory, 27–30, 98, 128–129, 131
 Mohr, E., 140
 Moluccas, 190, 192
 Montesquieu, 140, 142
 Morocco, 166, 191–192, 207, 209
 Motivation, need-achievement (McClelland), 100, 125
 Mozambique, 49
 Mukherjee, Radhakamal, 176
 Mukherjee, Ramkrishna, 176
 Müller J., 43
 Myth, 59
 Nag, M., 139, 140
 Naqvi, H. K., 177
 Nationalism, nation–state, 119–120, 172, 214
 Nazism, 27, 63–64
 Needham, J., 56, 115, 137, 143, 146, 147, 177, 178
 Neocolonialism, 26–30
 Neo-Kantianism. *See* Kantianism
 Neolithic revolution. *Se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Neolocaliry, 131–133
 Netherlands, Holland, 187–188, 194, 197
 Neumann, E., 144
 New Guinea, 155
 New World (term), 207
 Newfoundland, 192
 Niane, D., 209, 211
 Nicaragua, 195
 Nicholas, D., 175, 176
 Niger Valley, 86
 Nile river and valley, 82, 86, 166, 183
 Nisbet, R., 48
 Noah, 43, 44, 48
 Nurul Hasan, S., 176
 Nye, P., 140
 O'Keefe, P., 141
 Oceania, 158
 Okello, R., 142, 216
 Olmec civilization, 208
 Onimode, B., 174, 175
 Operation Bootstrap, 49
 Orient Express model, 4, 45, 91
 Oriental despotism, 3, 4, 25, 80–92, 120, 142, 157, 171, 174
 Hall on, 87, 147
 Jones on, 86–87, 120
 Mann on, 87–89, 109, 147
 Marx and Engels on, 81–82
 Weber on, 83–84, 86, 103–104
 Wittfogel on, 84–88
 Orwin, C. S., 146
 Ottoman empire, region, 20, 45, 81, 96
 Outside. *See* Inside
 Overpopulation, 66–68, 121, 129, 133, 139. *See also* Demography; Malthusianism
 Pacey, A., 147
 Padgug, R., 125, 149
 Padmore, G., 55
 Paleolithic, 124
 Palmer, R., 149
 Panikkar, K. M., 55, 209
 Paris Basin, 170, 195, 197

- Parker, D., 150, 151
 Parsons, J. B., 176
 Peace Corps, 49
 Peasants, 100-101, 107, 109, 112, 133-134, 154, 161-162, 214
 Chinese, 166
 European, 104
 Indian, 127, 166, 175
 Pendleton, R., 140
 Pepper, 166, 169
 Perry, W., 47, 49
 Peru, 184-185, 188, 190
 Philosophy, 26, 101, 106, 145, 214
 Philpin, C., 140, 149, 150
 Phoenicians, 47, 208
 Piaget, J., 99, 101, 144
 Piracy, 188, 196-197
 Pires, T., 167, 170, 176, 177
 Pizarro, F., 185
 Plagues, 78, 142. *See also* AIDS; Disease, Black death
 counterdiffusion from non-Europe, 16, 77
 Plantations, 166, 188, 191-193, 197-201, 204-205, 212. *See also* Slave plantation
 Brazil, 191-193
 Caribbean, 198-201
 Ploetz, C., 44
 Plow, 88-89, 110-112, 174
 Poland, 147
 Polygenesis, theory of, 3, 23, 43-45, 61
 Portugal, 181, 188, 192, 194, 197, 209
 Potato, 156
 in Europe, 92, 201
 Potosí, 195
 Powell, J., 23
 Prakash, L., 177
 Precious metals. *See* Gold; Silver
 Prescott, J., 140
 Printing, in China, Korea, 117
 Production versus exchange, 168-170, 177, 205
 Progress, 1, 14, 16, 19, 20, 22, 24, 48, 53-54, 60, 102, 114, 132, 136, 155, 180, 206
 Progressiveness. *See* Progress
 Property, private, 15, 25-26, 83-84, 88, 104, 116, 158
 concept of, 15, 25-26
 in medieval Europe, 83-84, 104, 127
 in non-Europe, 25-26, 83-84, 116, 158, 175
 Protocapitalism, 152, 165-173, 181
 in Asia and Africa, 153, 165-173, 190, 195, 197
 Protocapitalist system, network, 168-173, 177
 Psychic Unity of Mankind, 12, 47, 94-96, 184, 208
 Psychology, 17, 94-100. *See also* Mind, Reasoning
 cross-cultural, 98-100, 144
 primitive. *See* Mind, primitive
 Puerto Rico, 49
 Putting-out system, 166, 215
 Purcell, V., 116, 177
 Pyle, G., 142, 216
 Qaisar, A. J., 177
 Quackenbos, J., 44
 Racism, 27, 29, 43-44, 61-65, 138
 cultural, 64
 moderate, 64-65
 and myth of European miracle, 1, 4, 29, 61-65, 186
 Weber and, 64-65, 138
 Radell, D. R., 211
 Radin, P., 49, 97, 144
 Rain forest, 72-76, 141
 Rational Modern Adult European Man, 96-97
 Rationality, 15, 17, 19, 21, 94-109, 145, 149, 186, 214
 and diffusionism, 17, 60, 94-108, 214
 European, 15, 17, 19, 27, 30, 47, 88, 94-108, 110, 114, 120, 129, 135, 139, 143, 149, 206
 Hall on, 87
 Indo-European, 107, 109
 Jones on, 58, 104-107, 120
 Jung on, 98
 Lévy-Bruhl on, 97
 Mann on, 107-110
 Piaget on, 99, 101
 Weber on, 102-104, 145
 Rawski, E., 175, 176
 Raychaudhuri, T. 175, 176
 Reasoning. *See also* Thought, abstract and concrete
 theoretical vs. empirical, 17, 96-101, 105
 Reclus, E., 45
 Red R. (Vietnam), 120
 Reductionism. *See* Holism
 Reformation, Protestant, 103, 124, 197
 Regionalism, 27
 Relativism, cultural, 27
 Religion and rise of Europe, 8, 18-19, 29, 60-61
 Renaissance, 117, 187
 Restlessness, of Europeans, 108
 Rhine R., 93, 211
 Rice
 wet, agriculture, 85, 143, 166, 169, 174
 Richter, K. 82, 142
 Robbins R., 43
 Roberts, D., 140
 Roberts, J., 45, 46, 140, 141, 147
 Robinson, C., 205, 212, 213
 Rodinson, M., 177
 Rodney, W., 175, 205, 213
 Rogers, E., 100, 144
 Røhr, A., 149
 Roman land law, 25
 Rome, 4, 8, 25, 50, 107, 110, 125, 147, 195
 Rorty, R., 145
 Rostow, W., 53
 Rotation, 74, 111, 113-114
 fallowless, 114
 shifting, 74
 three-field, 111, 113-114
 two-field, 113-114

- Roy, M. N., 55
 Rules, cultural, and exploitation, 212
 Russia, 147
 Rwanda, 71
- Sack, R., 102, 145
 Sahara, 76, 183
 Sahel, 76
 Said, E., 48, 58, 144
 Sanderson, E., 44
 Sanity, insanity, 17, 96
 Sao Tomé, 191, 195–196
 Sastri, K. N., 176
 Savagery, zone of, 14, 44
 Savages, 4, 60, 96
 Schmidt, W., 49
 Schweder, R., 145
 Science, social, 31, 37, 38–41, 54, 97
 Seccombe, W., 139
 Semitic peoples, 44, 63
 Semo, E., 211
 Serfs, 127–128, 134, 154, 160, 175–176
 Service tenure, 158
 Seville, 189, 195
 Sexual frustration, and rise of Europe (Stone),
 134–135
 Shannon, G., 142, 216
 Sharma, R. S., 55, 146, 175
 Shem, 44
 Sheridan, R., 205, 213
 Sherif, A., 175, 176, 207
 Shipping, 169–170, 181, 196
 African and Asian, 117–118, 170, 181
 medieval, 117–118, 169–170
 Shoemaker, F., 144
 Siberia, 199
 Silver, 183, 188–191
 American production, 188–191
 and Asian trade, 118, 190
 stock in E. Hemisphere, 189
 Simkin C., 177
 Simonsen, R., 211
 Sinclair, P., 141
 Slave plantation, 70, 125, 191–198, 204–205
 Slave trade, 70, 79, 188, 192, 199, 203–205
 Slavery, 62, 70, 79, 107, 125, 170, 192, 195, 197,
 203–205, 208, 212
 Smallpox, 78
 Smith, Abdullahi, 175
 Smith, Adam, 142
 Smith, C. T., 146, 210
 Sofala, 166, 208
 Soils. *See also* Agriculture
 fertility, 72–77, 85, 89, 91
 gley, in Europe, 92
 podzolic, in Europe, 92
 temperate, 90–92
 tropical, 42, 71–76, 140
 waterlogged, 92
 Solow, B., 205, 213
 South China Sea, 92
 Sovereignty, concept of, 15, 25
 Soviet Union, Russia, 29, 76, 81, 84
 Spain, 181, 188, 192, 194, 197
 Spatial revolution, medieval, 169–173, 181
 Spatial transport of commodities. *See* Location;
 Spatial revolution
 Spencer, H., 22, 48
 Spices, 168, 192
 Spradley, J., 49
 Stages, evolutionary, 125
 Stagnation, cultural, 6, 17, 84, 90., 116, 124–125
 Stagn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heory of, 115–
 119, 142, 147
 Stalinism, and theory of Oriental
 despotism, 81
 State, 8, 58, 81, 85, 87, 94, 119–123, 141, 147,
 157, 161, 172
 in Asia, 123, 126. *See also* Empire; Oriental
 despotism
 medieval European, 122
 modern, 120–122
 size of, 94, 119–122
 Steele, E., 44
 Steele, J., 44
 Steward, J., 47, 172, 178
 Stirrup, iron, 111
 Stocking, G., 47, 48, 138, 144
 Scone, L., 130, 134–135, 150, 151
 Sudan, 157, 183
 Sudanic caravans, 93
 Sugar, 166, 169, 191, 200
 Sugar-cane. *See* Sugar
 Sulawesi, 120
 Sumatra, 120
 Swai, B., 48
 Sweden, 147
 Sweet potato, 107, 156
 Sweeney, P., 149, 177
 Swindell K., 139
 Swinton, W., 44
- Tacuber, I., 131, 150
 Takrut, 209
 Talkington, L., 216
 Tarzan, 97, 105
 Tawney, R. H., 211
 Taylor, G., 47, 49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108–109
 Technology, 29, 57, 94, 108–119, 161, 184, 186,
 202
 ancient, 109–110
 Chinese medieval, 116–119
 European medieval, 110–115, 128, 160–161,
 163
 Ternu, A., 48
 Tenochtitlán, 185
 Ternate, 196
 Testing (ACT, SAT, IQ), 101, 145
 Textbooks, as cultural windows, 6, 43–46
 Textiles, 169, 192, 203. *See also* Cotton
 Thackeray, W., 48
 Thailand, 147
 Thalheimer, M., 44

- Thapar, R., 48
 Theory, scientific, 17, 24, 31–32, 34
 Third World, 54
 Third Worldism, 79, 125, 149
 Thorndyke, L., 147, 210
 Thought, abstract and concrete, 17, 96–99, 103.
 See also Reasoning
 Thrupp, S., 176, 212
 Tigris–Euphrates valley, 82, 86
 Tillinghast, W., 44
 Tobacco, 159, 192
 Tolman, E., 38, 49
 Torras, J., 150
 Toulmin, S., 48
 Toynbee, A., 71
 Toyoda, T., 177
 Trade winds, 182
 Traditional society, 6, 68, 98, 128
 Traditionalism, 15, 98–102, 145
 Transoceanic diffusion, 11, 14, 207–209
 Travel, radii, 181
 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 154
 Trigger, B., 138
 Tropical soils. See Soils
 Tropical-nastiness theory, 69–80
 Tropics, humid (term), 71
 Trypanosomiasis, 79–80
 Tung, C., 176
 Tunnel history, 3–8, 103, 109–110, 115, 150,
 180, 187
 Turkey, 45, 183
 Turner, B. L., 143
 Turshen, M., 142
 Tyrler, A., 43

 Udovitch, A., 177
 Underdevelopment, 153, 180
 Underdevelopment theory, 55–56, 137, 149
 Uniformitarianism, cultural, 42, 47, 122, 124,
 184, 208
 United Nations, 28
 United States, 28, 43
 Urbanization. See Cities
 Usman, Y. B., 175

 Validation of belief, 34
 Values, 15, 30–31, 37–41, 103, 207
 Vampires, 16, 21, 47
 Van Baren, F., 140
 Van Leur, J. C., 55, 56, 137
 Van Sertima, I., 208–209
 Venice, 167
 Venturi, F., 142
 Verifiability, 34, 36, 40
 Verification of belief. See Verifiability
 Vijayanagar, 170
 Vilar, P., 210
 Village, 90
 European, 159–160, 176
 Indian, 127, 159–160, 175–176
 Virgin Islands, US, 49

 Vishnu-Mittre, 173
 Vives, J. Vicens, 210
 de Vries, J., 209, 210, 211

 Wage labor, 167, 202–205
 and slave labor, 203–206, 212
 in post-conquest America, 189
 Wai Andah, B., 141
 Wallerstein, I., 51, 149, 205, 211, 213
 Warren, B., 58, 138
 Watson, A., 210
 Watts, S., 142, 216
 Watts, S. J., 216
 Webb W. P., 210
 Weber, G., 43
 Weber, M., 15, 47, 59, 64–65, 83–84, 86–90,
 102–104, 115–116, 124, 131, 138, 142, 143,
 145, 158, 170
 Weberianism, 54, 64–65, 87, 102–104, 114, 117
 Wei R., 86
 Werner, H., 99, 144
 Werner, K. F., 61, 124, 147–149
 West, the, 1, 46, 94
 West Indies, 20, 55, 180, 182, 203, 207. See also
 under specific topics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203–206
 Whaling, 207, 192
 Wheat, 169, 197
 Wheatley, P., 57, 137, 177
 Whelpley, S., 43
 White, G., 145
 White, Lynn, Jr., 61, 108, 110–115, 146, 147,
 176
 White man's grave, 78
 Whitehead, A. N., 37, 49, 145
 Whitman, J., 144
 Whitmore, T., 209, 211
 Wiethoff, B., 177
 Wilken, G., 140
 Willard, E., 43
 Williams, E., 48, 137, 203–206, 212, 213
 Williams, R., 48
 Williams thesis, 55, 205
 Wisner, B., 141
 Wittfogel, K., 83–88, 142
 Wolf, E., 137
 Women, and rationality, 96–97
 Woolen trade, English, 191–192
 World models, 30–31, 41–43, 214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206
 Wrigley, E., 151
 Wunder, H., 150

 Yadava, B., 175, 176
 Yam, 74–75
 Yang Lien-sheng, 177
 Yellow R. 86

 Zamindars, 24, 175
 Zimbabwe, 157, 166, 197
 Zwernemann, J., 47

主题精品图书推荐

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现代社会学文库）

王 宁 著

大 32 开 定价：22.00 元

2001 年 9 月出版

ISBN 7-80149-583-7/F

本书共分 14 章。第一章是对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论述。剩余的 13 章则按 4 个部分进行组织：消费行动（第 2~5 章）、消费文化（第 6~9 章）、消费环境（第 10~12 章）和消费问题（第 13~14 章），其顺序是先微观，后宏观，再进入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最后，结束语则对本书的引申含义做了简要的概括和讨论。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

文化与谈判——解决水争端（现代社会学文库）

[法] 居伊·奥立维·佛尔

杰弗里·Z. 鲁宾 主编

大 32 开 定价：18.00 元

2001 年 4 月出版

ISBN 7-80149-529-4/D

居伊·奥立维·福尔 (Guy Olivier Faure) 教授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主讲国际谈判, 是上海欧洲管理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邀教授。在美国《外交词典》一书中被评为“历史上有名的谈判大师之一”, 著有《国际谈判: 分析、方法、问题》等多本有关谈判的书籍。

杰弗里·Z. 鲁宾 (Jeffrey Z. Rubin), 美国塔夫茨大学心理学教授, 哈佛大学法学院谈判专题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著述、合著十多本涉及国际冲突与谈判以及第三方调停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的著作及论文。

本书对中国读者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为本书的一些结论适用于各类谈判, 尤其是涉及与外国人的商业、合资企业和各种社会关系的谈判。它能够告诉中国读者如何利用文化这一各国、各民族特有的不同因素, 达到自己想争取到的谈判目的。

读者对象: 从事国际关系、社会科学工作的研究人员, 特别关心水资源争端而引起的国际冲突的学者和工作者, 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中从事国际关系工作的人, 以及对文化或对谈判及解决争端的理论与实践感兴趣的学者和研究人员

新社会学 (现代社会学文库)

[法] 菲利普·柯尔库夫 著

大 32 开 定价: 12.00 元

2001 年 2 月出版

ISBN 7-80149-467-9/B

菲利普·柯尔库夫 (Philippe Corcuff), 法国里昂大学政治研究院讲师。

本书介绍了近现代西方国家社会学发展的一些新流派和新理论, 是一本把众多社会学界理论家放在一起论述的著作。为了解近期社会理论的最新热点提供了一个深入浅出的导引性读本。

读者对象: 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人员, 大专院校师生, 政府工作人员

犯罪致富——毒品走私、洗钱与冷战后的金融危机（现代社会学文库）

[法] 蒲吉兰 著

大 32 开 定价：14.80 元

2001 年 2 月出版

ISBN 7-80149-468-7/F

蒲吉兰 (Guilhem Fabre)，法国社会经济学家、汉学家，现任法国阿佛尔大学国际问题系教授。

本书主要以日本、墨西哥、泰国、俄罗斯等国为背景，运用了大量翔实的资料，着重围绕贩毒、洗钱等问题，以新的视角和思路，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分析了 90 年代以来先后在日本、墨西哥、泰国和俄罗斯发生的金融危机根源等。作者提醒人们，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新兴工业国和转轨国家尤其要高度重视犯罪经济对金融领域的侵蚀和渗透，警惕因腐败而走上“经济犯罪化”道路。

读者对象：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人员，政府工作人员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现代社会学文库）

许欣欣 著

大 32 开 定价：19.80 元

2001 年 1 月出版

ISBN 7-80149-356-7/D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流动的状况。以 1978 年末开始进行的农村联产承包制为起点，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微观领域的局部变革到宏观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步步推进和深化，导致大量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及分配体系的重组。这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及

分配关系的变动不仅引发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化，而且将继续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研究、教学人员、理论宣传工作者

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现代社会学文库）

李沛良 著

大 32 开 定价：26.00 元

2001 年 2 月出版

ISBN 7-80149-431-8/D

李沛良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兼崇基学院院长。1965 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进修，1968 年获博士学位后即返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曾兼任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职。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社会研究中各种相关的数学统计方法。从较简单的统计叙述开始，逐次进入统计推理、多变项分析和社会变迁分析，循序渐进，层次分明。本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力求文字简明，避免繁复的数学推算。因此，对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和参考书。

读者对象：社会学专业师生，社会学工作者

文化与人性（现代社会学文库）

[美] M.E. 斯皮罗 著

大 32 开 定价：18.80 元

2001 年 2 月出版

ISBN 7-80149-164-5/C

本书共收论文12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强调人性取决于个人需要；讨论了美国人类学研究中的物质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第二部分反映了斯皮罗的功能主义理论的概貌；阐明了心理动力学过程和文化信仰系统的功能分析。第三部分评述了宗教的主要定义；分析了宗教的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强调了人类家庭制度的全人类性质。

读者对象：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工作者，一般读者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第二版）（现代社会学文库）

[德] 沃尔夫冈·查普夫 著

大32开 定价：12.80元

2000年4月出版

ISBN 7-80149-003-7/C

沃尔夫冈·查普夫，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曾任德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并长期担任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在社会变迁、社会发展及现代化理论方面自成体系，自成一派，其理论与方法长期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不可动摇的规范和经典。

本书内容主要涉及社会变迁、社会创新、现代化理论、福利发展、两德统一后前民主德国的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德国社会的变化及其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读者对象：社会学研究者，大学生，外国问题研究者

仪式与社会变迁（现代社会学文库）

郭于华 主编

大32开 定价：22.00元

2000年8月出版

ISBN 7-80149-372-9/K

► 310 主题精品图书推荐 ◀

本书力图从仪式与象征入手探讨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与以往不同的是，本书将仪式作为文化时空中的活动的积累过程，关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行为者参与创构活动的相互关系，同时注重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由此使本书在认识和解释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方面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

读者对象：社会学、经济学及历史学工作者，社会与文化研究、教学专业人员

内部流动与分化——一家国有企业的二十年（现代社会学文库）

游正林 著

大 32 开 定价：17.80 元

2008 年 8 月出版

ISBN 7-80149-366-4/F

本书是对一家国有企业来做的个案研究，对该企业内部的职业地位、收入分配、住房分配、岗位调整、工作调动和职务晋升等问题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作者指出该企业未能很好地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复杂的内部因素，这种种因素阻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其不能迅速、有效地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

读者对象：社会学、经济学类大学师生，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

宗教社会学（现代社会学文库）

戴康生 等主编

大 32 开 定价：23.00 元

2000 年 4 月出版

ISBN 7-80149-329-X/B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戴康生主编。本书内容主要

探讨宗教与社会关系、宗教的社会功能、现代社会的宗教与世俗化、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宗教。本书搜集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内容丰富。

读者对象：党委机关统战部门干部，宗教研究机构相关人员

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现代社会学文库）

李培林 张翼 著

大 32 开 定价：22.00 元

2000 年 1 月出版

ISBN 7-80149-251-X /C

本书认为，国企行为相互矛盾的两个目标：追求效用、利益最大化；追求福利最大化，导致了企业负担过重、冗员过重的后果。改变此现状，国家应提供“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等替代性资源，同时使企业产权明晰化，通过各种有效手段促使国有企业冗员从传统产业、第二产业向新兴产业、第三产业转移。

组织社会学（现代社会学文库）

[法] 克罗戴特·拉法耶 著

大 32 开 定价：8.00 元

2000 年 1 月出版

ISBN 7-80149-208-0 /C

本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组织社会学的历史，研究目标、代表人物、理论基础、指导原则及目前的最新发展，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法国的组织社会学流派和策略分析，指出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就是：理解集体的运转逻辑以及它引起的合作形式。

读者对象：社会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社会学系师生，企业管理人员

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现代社会学文库）

王章辉 等主编

大 32 开 定价：19.80 元

1999 年 4 月出版

ISBN 7-80149-125-4 / C

本书论述了英、法、德、美四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历史条件、过程和特点，评价了此种转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同时产生的社会问题。

读者对象：社科研究人员，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政府政策研究人员

环境社会学（现代社会学文库）

[日] 饭岛伸子 著

大 32 开 定价：10.00 元

1999 年 1 月出版

ISBN 7-80149-074-6 / C

本书作者为日本著名学者、环境社会学创始人。这本书对环境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及方法作了探讨，以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公害问题为实例，讨论环境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及治理环境的迫切性。环境社会学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和自己独特的实证研究，追求人类群体和生存环境的理想存在形态。

读者对象：有关政府部门，环境研究机构，社会学者和关心环保问题的有识之士

健康社会学（现代社会学文库）

[美] F.D. 沃林斯基 著

大 32 开 定价：30.00 元

1999年4月出版

ISBN 7-80050-248-1/G

本书是当代美国在健康社会学领域最富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主要讨论了当今社会最大的行业——卫生保健系统。书中全面介绍了美国社会医疗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诸多与其相关的学科——卫生经济学、卫生保健伦理学、政治科学等，探讨了医疗体制、医疗模式、卫生政策、保健服务等热点问题。

性的政治（现代社会学文库）

凯特·米利特 著

大32开 定价：29.80元

1999年1月出版

ISBN 7-80149-099-1/C

本书为20世纪女性文学经典，其划时代的意义和引起的反响使本书成为女性主义一个里程碑。作者提出两性关系是政治问题，并运用社会发展观点，从学术角度对文学中“性”这一复杂敏感问题进行分析，对劳伦斯、王尔德等人在作品中对性的处置作出批评。“本书在攻击男性一统的秩序时，旁征博引而又注意分寸，提出问题的方式既严肃又意气风发”。作者因此成为名作家和全美妇女运动代言人。本书是在美国再版8次的畅销书。

读者对象：社会学者，文学创作者、爱好者，文学研究工作者

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现代社会学文库·性社会学译丛）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大32开 定价：18.00元

2001年2月出版

ISBN 7-80149 438 5/D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 剑桥皇家学院院士、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前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

本书作者吉登斯试图阐述以下这些问题: 性革命这个富有争议的术语, 在今天能被赋予什么含义? “性态”是如何形式的? 这与已经影响到更大范围的个人生活的变化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这本书旨在为妇女、儿童、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祈求进行辩护, 本书不乏社会学大师理论上的严谨和经济范例运用上的恰如其分。

读者对象: 有关专业研究人员, 社会工作者, 大专院校相关师生

女人的身体 男人的目光——裸乳社会学 (现代社会学文库·性社会学译丛)

[法] 让-克鲁德·考夫曼 著

大32开 定价: 20.00元

2001年4月出版

ISBN 7-80149-515-2/B

让-克鲁德·考夫曼 (Jean-Claude Kaufmann), 法国社会学家, 任职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 索邦巴黎第五大学教授。他善于运用社会学调查的方法, 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进行研究, 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著有《夫妻情节》一书。该书从内衣的角度分析夫妻关系,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目前考夫曼的研究方法和书籍已引起了各国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

本书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 选择了海滩裸乳这种日常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 作者收集了大量资料, 并在海滩上采访了三百多人, 用以研究人们对女性身体暴露程度的看法, 书中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历史的演变; ②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③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④构建新规范的真实性的真实性; ⑤

常态构成的现实使日常的民主运作成为问题。

读者对象：社会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社会学调查专业研究人员，社会学爱好者

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理论译丛）

[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等著

大 32 开 定价：25.00 元

2002 年 1 月出版

ISBN 7-80149-617-5/D

本书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华勒斯坦的《自由主义之后》、《反体系运动》、《有托之乡——21 世纪之历史抉择》3 本书之综合，集中体现了这位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学家的观点。

书中认为，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取得了胜利；恰恰相反，自由主义甚至是更加衰微了，1989 年是其终结。世界进入了“自由主义之后”的时代。在自由主义之后的几十年里，世界体系将进入一个“黑暗时期”。通过对现代世界体系分化过程的考察，作者分析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提出了我们面临的历史选择，设想了在更合理、公平的社会基础上重建世界体系的道路。书中以分析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反抗运动为基础，阐明了反体系运动的历史成就和局限。书中还对 1789~1989 年期间和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种种引人注目的政治思潮和社会现象进行了详尽的、引人深思的分析，并对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展望。全书内容极为丰富，见解令人信服，分析简明扼要。

读者对象：本书特别适合哲学、世界历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社会学专业的研究者、爱好者阅读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译丛）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大 32 开 定价：22.00 元

2000 年 12 月出版

ISBN 7 80149 - 405 - 9 / B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名的理论家之一，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

本书是作者学术历程中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之一，书中认为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社会理论，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社会学的其他理论都不能全面解释社会进化或者提出社会进化的构思。它们只能说明某一社会现象领域，并且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本书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和研究观点。

读者对象：哲学、社会学领域研究人员，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员，理论
宣传工作者

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变迁（社会理论译丛）

[瑞典] 汤姆·R. 伯恩斯坦 等著

大 32 开 定价：19.80 元

2000 年 9 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357 - 5 / F

汤姆·R. 伯恩斯坦 (Tom R. Rums)，瑞典以色列普萨拉大学社会学教授，瑞典高级社会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欧洲共同体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本书作者是引动者——系统——动态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书中收录了伯恩斯坦教授的 7 篇有代表性意义的论文，分别从社会经济学，市场制度及动力学方面进行论述。本书不但有其理论研究意义，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大

潮中，对于我国经济政策、市场制度的制定，通货膨胀的治理、社会秩序的规范都有一定的意义。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金融学、市场管理等学科的教学研究人员，大学相关学科研究生、大学生

嫉妒与社会（社会理论译丛）

[奥] 赫尔穆特·舍克 著

大 32 开 定价：20.80 元

1999 年 2 月出版

ISBN 7-80050-042-X / C

赫尔穆特·舍克 (Helmut Schoeck)：奥地利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美因兹大学教授。其著作甚丰，主要有：《人性的，过于人性的》、《社会学及其疑难问题的历史》、《科学方法和各种价值》、《相对论和研究有关人的学问》、《精神病学和责任心》等。

该书深入分析了嫉妒心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及其对于群体和社会的制约、平衡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本书论述清晰简洁，语言活泼生动，资料丰富且逸趣横生。

读者对象：社会学研究人员及学校师生，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对社会学感兴趣人群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理论译丛）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大 32 开 定价：19.00 元

2000 年 4 月出版

ISBN 7-80149-272-2 / C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

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大师级学者。他生于1938年，曾在赫尔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学习，1953年在莱斯特大学授课，1970年成为剑桥皇家学院院士，1996年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兼任剑桥大学教授。著述颇丰，主要代表作有“历史唯物主义三部曲”，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民主—国家与暴力》与《超越左与右》。

本书立意明确，当代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反思的现代化阶段，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政治光谱中的左、右两大阵营都无法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以及有效的对策，因此必须超越左右的认识局限，综合众多理论，建立新的理论出发点，以此来制定能够解决当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方案，本书全面阐述了作者改造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系列理论构想，对世界上众多国家关于社会民主的未来的争论影响极大。

读者对象：有关学科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党政领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社会理论译丛）

[美]詹姆斯·S. 科尔曼 著

大32开 定价：66.00元

1999年9月出版

ISBN 7-80050-157-4/C

詹姆斯·S. 科尔曼，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本书是由当代社会学界权威人士詹姆斯·科尔曼教授撰写的一部经典著作。作者认为：人类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为了理解人类正在走向何方，需要一种社会理论做指导方能研究出人类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能否改变这一方向？怎样选择前进的方向？本书共分五编，从最基本的人的行动和关系谈起一直论述到复杂的社会行动的数学分析。

读者对象：社会学研究人员、大中专院校师生